孤　　琴

巫寧坤

目　　次

海明威的古巴情
韩战中国战俘的悲歌
蒋彦永，你真傻!--纪念 “六四” 十五周年

孤 琴（代序 ）

之子期宿來，孤琴候蘿徑。
-孟浩然

去年，北京的朋友們聽說我又要來美國，都以為我會到紐約或芝加哥那種繁華的大都市去。一聽說我只不過是要到中西部一個小城裏的小學院去，我的好朋友們都異口同聲地說：「去幹麼？就你一個人去？你會孤獨得發瘋！」他們還般出「人是社會動物」這句名言，告誡我對單獨監禁之苦掉以輕心。他們的關懷使我感動，但我教他們放心，我保證不會發瘋。我還答應要跟他們談談遠離親友、窮居獨處的滋味。

一

闊別近半個世紀之後，回到當地青年人稱為「沉悶的小城」中的學院，我感到過去和現在融為一個孤獨的時刻。站在同一幢古舊的主樓前，我恍看見自己在一九四六年秋天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第一次踏上這些台階，懷著學院裏唯一一名外國學生的孤獨感。我看見我自己逃避孤獨，去和本土學生打成一片。放眼望去，學院景物依舊，數十年間只添了幾座大樓，也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事物。樸實的紅磚主摟那塊刻有「1989」子樣的奠基石依然如故。那座新教堂盡管很雅致，也不過是舊教堂的翻版。大學生們青春煥發，與當年我在這裏時似乎沒有什麼兩樣。

經過初來乍到的興奮後，我大部分時間獨自呆在學院公寓內。我正忙于寫回憶錄的消息一傳開，我的孤獨就變得幾乎神聖不可侵犯了。反正也說不上有什麼社交生活。白天，每個人都在忙各自的事；到晚上，家家戶戶都在自己的起居室裏共享天倫之樂。逢星期天，幾乎每個人都在早晨上教堂，下午看電視上的籃球比賽。老年人間或在某個葬禮上作意料之中的露面。我沒有教堂可去，也沒有葬禮可參加，我也不看現場或電視上的籃球比賽。

一部電腦的屏幕整天無動于衷地凝視我，仿佛一位不倦的告解神父那嚴厲的面容。時間一天天過去，空蕩蕩的公寓似乎顯得更空曠。難得有客人來訪，也不受任何電視影像打擾。雖然離秋去冬來還很遠，秋天已十分寂寞，我難得聽到一片葉子

飄落。一個冬天的晚上，大雪封門，我感到自己活像一只冬眠的動物，忘情於時空之外。我的孤獨開始像一片莽原或荒漠包圍我。我會身不由己地變成境遇的犧牲品，或遭到國內朋友們不幸而言中的厄運嗎？

後來，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我如常步出公寓樓，準備到餐廳去用早餐。我吃驚地發現地面上鋪著一層厚厚的新雪，而雪一向會使我感到心曠神怡。積雪的人行道上留下了我孤獨的腳印。使我的心靈充滿一種童真的喜悅，仿佛我正向著某個未知世界邁進。一只孤獨的鳥兒在冬天明淨的空中飛掠而去。一輛輛汽車上覆蓋著勻整的雪衣，排列在街道兩旁，「靜如屏息做崇拜的修女」。一位獨孤的小姑娘臉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從一個地下室的窗子向我揮手。我佇立在那里，心裏不期然響起濟慈抒寫激動人心的發現的詩行：

於是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天象觀察者，
突然一顆新星游入他的視野；
或者像頑強的科爾特斯用鷹的眼睛，
盯住太平洋-而他所有的隨從，
全都面面相覷，將信將疑-
寂然無聲，在達里恩一個山頂上。

太好了！我也發現了一個寧謐的新世界，一個雪白的孤獨世界！小姑娘天使般的微笑點石成金，我的莽原開出了千萬朵鮮花。我雪中的腳印走進了我荒漠中的綠洲。我從東窗望出去，遠眺積雪覆蓋的曠野，舊情縈懷，心靜如水，口中哼起一首蕭邦的《前奏曲》，那是我在這裏做學生時巴恩哈特小姐教我在鋼琴上彈奏的，巴恩哈特小姐已經不在了，還有別的許多人。但是在我的孤獨世界裏，時間停頓，萬物同在。

二

我的孤獨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瘋人院，而是一個別具一格的美麗新世界，一個燭照的透明新天地。擺脫了社會動物的小外殼，我成了無限空間的帝王，隨心所欲在宇宙中遨遊。銀河並不比我窗下的街道更遠。世界古今名城像海市蜃樓般一座座從我眼前飄過，而我再也沒有遊客那種無謂的好奇心。紫禁城剝掉了皇家的威儀和宮廷的陰謀，也無非是一座鬼城罷

了。米蘭的大教堂曾經以無數的尖塔和雕像使我心醉神迷，現在也不過是對永恆生命的一場幻夢。而威尼斯的大運河則在無止無休的死亡嘆息聲中奔流著。沿著時間之河而下，我聽到陳子昂的悲歌：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但我並不愴然涕下。我以新的眼睛去看，新的耳朵去聽，新的心靈去感。從現實的幻影中浮現出來，生者與死者顯得既熟悉又生疏。生者看上去彷彿早就死了，死者看上去彷彿還活著。那些曾經困擾過我、偽裝過別人的種種虛榮、矯飾、感傷、偽善，現在都像化裝舞會後的假面具一樣被丟棄了。我那些善良的好友也難免沒有敵人的種種罪過，而敵人也像朋友一樣是有求于血有肉的人。尤其是，我在孤獨之鏡中看到我自己一絲不掛，卸下一層層偽裝。我看到自己滿身污點，遠遠多於我臉上的老年斑。我的愛已受玷污，我的恨微不足道，我的歡樂何足掛齒，我的悲傷無關緊要。但我並不愴然涕下。擺脫了那些令人喪志的萬千眼前俗事的羈絆，我與世無爭。擺脫了那些折磨我心靈的對得失的斤斤計較，我與己無爭。走出了把我和其它社會動物隔絕的羨慕和妒忌的牢牆，我懷著憐憫和謙卑，擁抱人和歷史。

我重讀我喜愛的作品。孤獨之中，空氣不受艱深的批評或枯燥的學問污染，那些熟悉的書頁帶著嶄新的秘密打開，用一種親密的語調講話，向我敞開它他們的心扉，並聆聽我的苦痛。現實與虛構合而為一，我的孤獨成了神奇的宇宙。亞當和夏娃從西斯廷教堂的穹頂走下來，與哈姆雷特和奧菲莉亞交遊。米開朗基羅與艾略特創造的普魯弗洛克談心，普魯斯特那個傷心欲絕的小瑪塞愛上了卡波的「那不勒斯漁童」。柴可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與愛米麗?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一同上演生命的悲劇。我一生從來沒有這樣豐富，這樣真實。這裏是我的桃花源。

三

春天把我從冬眠中喚醒。我邁著輕快的步伐，走在綠棚成蔭的大樹下，精神抖擻，眼前的林蔭道似乎要伸展到一個未知世界。丁香、木蘭、鬱金香和其它各種繽紛斑斕的花草，把荒涼的門庭變成了生命和色彩的花園。偶爾會有一個過路人微笑著向我道聲「早上好！」我則報以無聲的微笑，唯恐打破我孤獨的幻境。我又踫見在那個下雪的早晨向我揮手的同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姑娘。這一回，她在一件我從未見過的樂器上彈奏著寧靜的調子。她露出同一個天使般的微笑，然後從樂器上抬起她的小手，向我揮了揮說：「早上好！你喜歡我的孤琴嗎？」

孤琴！原來這就叫孤琴。我立即發現這正是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一個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獨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為社會動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達到這樣的心態：身在「眾生要承受的萬千劫難」之中，仍能彈奏孤琴。這不正是柳宗元筆下那令人難忘的孤獨漁翁的境界嗎？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簑笠翁
獨釣寒江雪

或者，像陶淵明在另一首詩中所寫的：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那麼再見吧，冬眠！我要回到我在人境中的孤舟，彈奏我的孤琴。

（黃燦然譯自英文原著）

燕京末日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電聘。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贊不絕口，令人心向往之。於是，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兼程回國任教。七月中旬，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有芝大同學伯頓夫婦和李政道博士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怎麼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從廣州乘火車經上海抵達北京，西語系系主任趙蘿蕤博士來前門車站接我。她是英語界的前輩，兩年多以前從芝大學成歸國，回母校任教。朝鮮戰事爆發後，燕大美籍教授紛紛回國，她出任系主任。由於師資不足，她除了在國內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兩位前輩外，又不遠萬里約我來共事。別後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蒼老多了。

她為我雇了一輛馬車，車頂上放著我的七、八件行李，駛往青年會搭乘校車。這是我初次來到北京，從車窗看出去，滿目絳色的宮牆，陽光下金光閃閃的琉璃瓦，身穿草綠色制服的軍人熙來攘往，我彷佛闖入了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別的故國。上了年紀的校車，一路顛顛簸簸，足足走了個把小時，終於到達西北郊的燕大校園。燕園門口有兩頭大石獅子守衛，兩扇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只見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裏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

由於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蘿蕤是燕大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的女兒，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薰陶，不但能詩能文，而且彈一手好鋼琴。燕大西語系畢業後不久，她就將當時以晦澀聞名的艾略特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在芝大攻讀博士學位時，她研究的專題是亨利・詹姆斯的小

說。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後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裏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多歲，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仿佛背負著甚麼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裏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發火了：「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

不久之後，住房調整，他們搬到燕東園一座兩層小樓的樓上，樓下住的是系裏另一位英語副教授吳興華，也是個單身漢。我倆一見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據說我們倆是燕大有史以來最年青的副教授，興華比我還小一歲。他身材瘦長，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終日手不釋卷。見面後不久，他就把過去發表過的幾首新詩拿給我看，和幾十年來中國流傳的新詩大不一樣。真是相逢恨晚。興華從不自我標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便道來燕園探親訪友，我才聽他說起當年他在上海主編一個文學刊物，最先發表了興華的詩作，當時詩人年方十六，而主編卻在編者按裏說，這是中國新詩的轉折點。後來他又發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讀過。可惜「解放」後他就決定不寫了。興華為家傳的肺結核所苦，在本校畢業後錯過了到美國深造的機會，而他在英美語言文學方面的造詣卻是有口皆碑的。他還精通意大利文，當時已開始用詩體翻譯但丁的《神曲》。

我們的客廳裏有一座壁爐，初冬寒夜，我倆常在壁爐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產的「蓮花白」酒。不論他背幾首古詩，或讀幾首他的舊作，都讓我感到滿心的喜悅。周末，陸志韋校長有時來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陸先生是芝加哥大學三十年代的心理學博士，對語言學又很有研究，國學方面也有極深的造詣。他們兩位都是橋牌高手，談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橫生。怎料到，這樣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復返了。

到校後兩周，我就上課了。蘿蕤安排我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都是四年級的課程。我從未教過書，只有兩周時間備課，而且沒有課本可用。蘿蕤鼓勵我試用馬列主義觀點講授英國文學史，而我對馬列一竅不通。我帶回的幾百本書中，有《資本論》的英譯本，有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科

德威爾研究英國文學史的理論著作《幻覺與現實》，有美國「進步作家」德萊塞和法斯特的小說，還有法斯特抨擊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文《文學與現實》。我只得臨時抱佛腳，每天在我帶回的手提打字機上寫講稿，用生吞活剝的「階級斗爭」之類的新概念、新名詞裝扮英國文學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驢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幾個男女學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於談戀愛，有的忙於搞政治活動。也有幾個真正熱愛文學的男生找上門來，談論 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1984》之類的作品，或是借閱我從美國帶回來的小說。那些「思想進步」的學生也找上門來，問我的個人經歷，問我對新中國的印象。盡管蘿蕤和興華都提醒過我，跟學生談話要小心，我和是無拘無束地和他們交往，怎麼想的就怎麼說，因為我還沒學會講假話，也沒料到實話實說會有什麼後患。

我對新環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麼好的。八年前我去國時，全國戰禍連年，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如今，人民顯然安居樂業。外國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煙鬼都改造好了。土改運動解放了農民，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結構。（當時我還不知道成千上萬的地主慘遭殺害。）無數仁人志士為之前赴後繼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仿佛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裝，喊同樣的口號，重復同樣的套話，絕對服從各級黨組織，這和自由民主有什麼相似之處呢？我開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國不到六個星期，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給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師做報告。風度翩翩的總理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號召全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說，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過去是為舊社會服務的，腦子裏充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账枷搿，F 在無產階級是新社會的領導階級，知識分子必須學習批判錯誤的舊思想，「建立工人階級的正確立場、觀點、方法」，才能「為人民服務」。總理告誡大家，思想改造是一個艱巨的、甚至痛苦的過程，但卻是勢在必行的。我聽了一個小時之後，思想就不斷開小差，筆記也沒認真記。散會出來，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腦袋想起一個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說的「洗腦筋」的前景，難道這麼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也許不會吧，我還

心存僥幸。怎料到，這位以關心知識分子聞名的總理已經發出了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戰的檄文！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我們先分成小組學習周總理的報告，又聽其他領導人做報告，然後就開始用共產黨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法寶」檢討各自過去的所作所為和資產階級思想。我所在的小組有兩位鼎鼎大名的「進步教授」，聽了他們熱烈擁護「思想改造」的高論，我只有自認落後。

時隔不久，全國開展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書生氣十足的教授們，大多以為學校是清水衙門，教書匠兩袖清風，這個運動和我們掛不上鉤。哪知道，掌握「辯證法」的共產黨卻認為這三種罪行的根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而舊大學又正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和堡壘，因此我們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壘」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於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當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千把人的學生隊伍中涌現出一批積極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犯下的罪行。校長辦公室被查抄，全部檔案被搬到圖書館大閱覽室，亂七八糟堆在一張張大閱覽桌上，聽任積極分子搜尋文化侵略、甚至特務活動的罪證。忙亂了幾天，一無所獲。終於有一名積極分子發現一位美國教授試用一種新方法進行英語教學的報告，其中提到實驗對象時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獲至寶。美帝國主義分子竟敢拿中國學生當實驗品，還辱罵中國學生是「pigs」（豬）!這被抓住作為文化侵略的鐵證，又拿到全校大會上大張撻伐。我如墜五里霧中，更感到落後了。蘿蕤經常出席各種會議，在工作組和本系積極分子的「幫助」下檢討西語系的問題。興華在積極分子帶動下，在運動中活躍起來，「進步很快」。我四顧蒼茫，仿佛在波濤洶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葉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聲中，陸志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的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我對這一套逐漸麻木不仁

了，可是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吳興華也登台作了「大義凜然」的發言，卻使我感到震動。興華是陸校長最器重的學貫中西的典範，又是他談天說地、玩橋牌的忘年之交，這是燕園裏的一段佳話。怎麼也沒料到，這位有知遇之恩、溫文爾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態，在全校師生面前，滿口批判八股，不僅痛訴自己如何長期為陸某的學者面貌所欺騙，而且譏刺老人家在玩橋牌時好勝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頭來。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隨後也慷慨激昂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曾幾何時，享譽海內外的陸志韋校長成了「眾叛親離」的「美帝國主義分子」！不過，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陸家有一位多年相處、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組也不放過，三番五次動員教育站出來，控訴陸家對她的「殘酷剝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廚房操起一把菜刀來就抹脖子，差點兒鬧出人命來。有人說，這也算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也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當選為世界基督教理事會六主席之一，足以證明他和國際宗教界反動勢力相勾結。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等人同臺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批判者振振有詞地問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誰不知道，艾森豪威爾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販子，那麼和他沆瀣一氣的趙紫宸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嗎？」另一位重點批判對象是哲學系系主任張東蓀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為美帝效勞，盡管由於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當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這三位國內外知名的學者當年都冒著風險公開支持過共產黨，曾幾何時又都被打入了另冊，無異於階下囚。

誰會料到，「三反運動」竟開始敲響了燕京末日的喪鐘！

三

下一輪批判對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指控組織「十人團」。原來他們不時聚餐清談，三杯下肚不免發發牢騷，譏刺時政。他們必須在會上從實交代，互相檢舉。有中文系學生揭發，其中一位講師出過一個作文題目：《從猿到人，從人到？》這個學生憤怒地質問他是何居心？這位講師嚇得面無人

色，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磕頭求饒。主持會議的黨員又指責他斯文掃地。歷史系著名的聶教授「態度惡劣，對抗運動」，立即「隔離反省，交代問題」。後來我在校園裏踫見過他的家屬，手裏堤著飯盒去禁閉室給他送飯。「十人團」兩名重要成員、歷史系系主任齊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陳教授當時在南方參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問題。兩位教授風塵僕僕趕回燕園，經工作組「啟發」之後，便在文學院師生大會上沉痛檢討，聲淚俱下。

凡此種種都使我這個新近還鄉的游子感到無所適從。我意識到我落後於這個新時代。但是我畢竟還年青，我的教學生涯剛剛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棄。我也願意學習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門而入。我任課的四年級班上三位女生積極分子找上門來「幫助」我，給我「送禮」。這些「禮物」原來是我平日跟一些學生閑談時講過的三言兩語，現在送來幫助我檢查思想。譬如說，有一天有一位女生問我，中國的報紙和美國的有什麼不同。她當時正在由我指導寫畢業論文，題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說 The Wings of the Dove（《鴿翼》）。我回答說，我覺得《人民日報》和美國的報紙大不一樣，「十‧一」前幾天，頭版看不到大標題新聞，半個版面都是慶祝口號，諸如「中國共產黨萬歲！」之類的老套，這也能算新聞嗎？三位送禮的客人還算客氣地問我，這種言論是否表明我不僅敵視社會主義新聞事業，而且意圖腐蝕天真幼稚的學生？我一驚，一時說不上話來，主要倒不是因為她們小題大做，而是沒料到我這張沒遮攔的嘴巴的閑談竟然也被記錄在案！

西語系以「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聞名，趙蘿蕤教授帶頭在全大會上當著一百多名師生做檢討。她首先批評自己如何畢生醉心文學，不問政治。繼而批評自己在西語系教學工作中，也是重學術，輕政治，在全系師生中造成不良影響。再按照當時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響、西方教育、資產階級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後表示決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著重檢討自己解放前追隨國民黨大員、胞兄俞大維，而疏遠了自己「追求進步」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聲。胡稼胎教授著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後。興華檢討自己自十六歲考上燕大，踏進燕園以來，一直埋頭做學問，不問政治，自命清

高，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俘虜，幸而通過這場運動認識了自己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積極分子紛紛發言，贊揚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後短短幾個月內犯過什麼錯誤，眼看著一個個我平日敬重的前輩們的榜樣，也知道在劫難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滿以為可以過關。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聲勢洶洶，如臨大敵。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小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在談話中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我嚇壞了，伸頭仔細一看，書皮上畫著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蓋茨比》）,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裏想：「我承認我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我的檢討自然沒通過，又做了一次才勉強過關。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詳細陳述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和各方面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有問題就講清楚，不要有任何顧慮。我在學習會上表態時說我毫無顧慮，平生事無不可以告人言，這次不遠萬里來歸為新中國工作，足以證明我的心跡。可是我照樣得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歷史，再到文學院教授會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寫出一份自傳。我自以為寫得既忠實又詳盡，無可挑剔。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新燕京攝政王」的歷史系翦伯贊教授、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約我到他府上談話。他也住在燕東園，別的教授這時都是兩家合住一座小樓，他卻是獨佔一座，而且因為他藏書豐富，學校正在為他擴建。我走進他的書房，果然四壁書架上擺滿了線裝書，足見主人學識淵博。翦教授坐在一張紅木大書桌後面，招呼我在書桌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

他一開口就是居高臨下的口吻：「找你來有點公事，黨組織委托我找你談一談你的自傳。你交代了你本人歷史的輪廓，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他點了一枝香煙，對著我噴雲吐霧。

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個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氣，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著氣簡慢地回答：「我沒什麼好補充的。」

「別著急嘛，別感情用事。我們每人都有一部歷史，不管你是否願意正視它。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相信正視事實，放下包袱，向黨交代一切問題。你一定可以回憶你成人後的重大經歷，特別是最近發生的事。譬如說，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呢？還有真正的動機呢？」

「我已經在自傳裏講得一清二楚。」

「你是談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沒有什麼重大的遺漏需要補充。我對自己的歷史著作就不斷進行補充。」

「我沒什麼好補充的。」

「悉聽尊便。你可以補充，也可以不補充。我已經說過，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還來得及，嗯，……」

「坦白？我沒什麼好坦白的。我回國來不是搞什麼「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來，學校終於復課。可是，文科的教學計劃改動了不少。課程有增有減，教師試用馬列觀點自編自寫教材。我教的「英國文學史」停開，因為「無用」。

改開一門「美國進步小說」選修課，教材是我帶回的法斯特和德萊塞小說，選課的學生也寥寥無幾。興華從五月起就被調去「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擔任翻譯工作，他教的三年級閱讀課也由我兼任。畢業班學生關心的是為期不遠的畢業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學論文還沒寫就已提前調到外事部門工作，教師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師們一面忙於思想改造，一面忙於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研究教學改革。教育部發下一套蘇聯某師範學院的英美文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的小冊子，蘿蕤帶領我們學習，沒完沒了地討論如何虛心借鏡。不久，上級宣布全國高等學校向「老大哥」學習，進行「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按科系分別併入調整後的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聽候分配。於是，蘿蕤又帶領我們學習院系調整方案，最後人人表態，服從分配。這時已是暑假，上級又決定把五所大學的全體教師都送到青島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又可避免干擾分配工作。這是我初游這片避暑勝地，雖然不會游泳，倒也能把幾個月來擾人的記憶暫付海濤。

從青島回來後不久，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系教師分配情況，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把我從萬里之外請回來的，現在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英語教授的陣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著手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是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她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她既是趙紫宸的愛女，又是陸志韋的乾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於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禁得起如許粗暴的沖擊？同時，陳夢家教授在清華大學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時此刻，我決不能和這位敬愛的大姐「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只能強作歡顏，好言寬慰，讓她不要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為家的。

論功行賞，陸校長的愛女榮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吳興華榮任北大西語系英語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剛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歲，現在就要領導數十位英語教師，其中包括朱光潛、趙蘿蕤、楊周翰、李賦寧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贊教授榮任歷史系系主任，執歷史界的牛耳。另一方面，陸志韋則貶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組，趙紫宸貶到市內燕京神學院，張東蓀未分配工作，繼續接受審查，三人統統遷出燕園。

十一月，我也離開燕園，一輛卡車連人帶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門火車站。離開蘿蕤到車站接我不過一年多，燕京大學已經換了人間，「新北大」當上了風光旖旎的燕園的主人。

四

故事並沒到此為止。翦伯贊官運亨通，又當上了新北大副校長。興華也一帆風順，兩年後當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評上高教三級職稱，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他用詩體翻譯的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繼問世。成為文學翻譯的經典。同年，我從南開調回北京一所外語學院任教，第二年「反右運動」中就被划為「右派」，流放北大荒。沒料到，「進步很快」的興華竟然也沒逃此劫，罪名是「反蘇」，因為他主張在英語教學中不必向蘇聯學習。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動言論」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時，陳夢家在考古所當上了「右派」，蘿蕤因受刺激過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進步」，幸免於難，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長的丈夫曾昭倫教授卻是全國聞名的「大右派」。這一來，當年燕京西語系三位男教授和兩位女教授的丈夫統統都打成了「右派」，一個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園內「紅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間，多少位教授們成為「横掃」對象。當年的燕京大學英語教授中，多年來兢兢業業「追求進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憤自盡。時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倫教授，也含恨告別了他曾經熱愛的黨。我的同齡人、才華蓋世的吳興華在校園烈日下勞改，口乾舌燥，向監工的學生討水喝，從他手裏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個湖邊，我初到燕園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聽他背誦中國古詩或英文詩，如聽天籟。）污水下肚，繼續勞改，數小時後倒斃。紅頭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殺，死有余辜」，要打成「現行反革命」。後經破腹驗尸，證明死於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遺孀和兩個小女兒雖幸而逃脫了「現行反革命家屬」的厄運，卻照樣掃地出門，只得到海淀鎮上覓得一間民房棲身。興華的骨灰寄存在八寶山公墓，限期兩年。他的遺孀被長期下放，等她返京時，骨灰早已被「處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經不起勞

改的折磨也離開紅塵。趙蘿蕤教授碩果僅存，可是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不堪紅衛兵的輪番凌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症發作，他終於得以解脫。

在燕京的領導人中，陸志韋校長在科學院文字改革小組韜光養晦，仍是當然的「橫掃對象」。後來又以七十高齡發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幹校」，孑然一身，精神逐漸失常，一代宗師流離鄉野，嚴然里爾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長逝。哲學系系主任張東蓀教授死於獄中，罪名是「為美帝提供政治情報」。馬克思主義史學權威翦伯贊教授，多年來飛黃騰達，卻被「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親自點名批判，終於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雙雙服毒自盡，「自絕於黨」。蘿蕤的父親、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教授，幸得善終，於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齡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後餘生，從安徽返京，到頤和園附近的學院辦理「錯划右派改正」，順道重訪燕園。那天正趕上寒流侵襲，冷雨淒淒。我沿著似曾相識的未名湖踽踽獨行，欲哭無淚，腦子裏冒出兩句舊詩：忍看朋輩成新鬼，天陰雨濕聲啾啾！

生別常惻惻

「人生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年青時候，未經喪亂，哼這兩句詞只感到一點淡淡的哀愁，並不體會離別之傷痛。後半輩子，苟全性命於亂世，親友往往天各一方，離多會少，久而久之大家對生離死別也麻木了。劫後餘生，浪跡天涯，「往事回思如細雨」，有時反倒不免黯然神傷。

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在北京，歷時大半年的「反右運動」已接近尾聲。三月二十一日，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布對全院「右派分子」的處理。小小學院，師生攏共不過三、四百人，榜上有名的竟有二十餘名。我名列榜首，當然恭與其盛，妻子也得在座陪綁。我受到一等一級處分，「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當天正趕上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右派」屬「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上仍享有公民權，奉命參加投票。大會收場後，二十幾名人犯被一位大義凜然的小幹部叫到一起，先聽他聲色俱厲地教訓一通，然後排成雙行押解前往大食堂，行使共和國公民的選舉權，為獨一無二的候選人投「神聖的一票」，證明他所說的「社會主義法制的無比優越性」。

回宿舍的路上，熟人相逢都不屑一顧。我出身寒門，從小就習慣世態炎涼的滋味，因此並不感到意外。回到家中，妻子遞給我一杯清茶，我接過來有氣沒力

地往沙發上一靠，看到白磁杯上的七個黑字，「一片冰心在玉壺」，感到心裏一片冰凍，真不知言從何起。可巧丁兒趔趔趄趄地摸了進來，給我解了圍。丁兒不久前剛過了兩周歲生日，盡管家中大難臨頭，媽媽還是為寶貝兒子包了餃子，「

爸爸，大爸爸，」他邊走邊嚷，「我生日那天，你說天一暖和就帶我上動物園看大象。早起阿姨帶我上頤和園，樹上都開滿了花。你快帶我去看大象吧！」我把他摟進懷裏，強笑著說：「小丁丁，快啦，快啦！爸爸一得空就帶你去。」他嘟著小嘴說：「你可不能騙我呵！」我說：「爸爸甚麼時候騙過你？你等著瞧吧。」夜間，孩子睡下後，妻子說：「這孩子別的甚麼也不要，只惦著跟你去看大象，……」我說：「一天到晚，不是批斗，就是勞動，哪有空啊？眼看我該走啦，說甚麼也得帶他去一趟，你放心吧。」妻子眼淚汪汪的，我不知說甚麼是好。

受到「勞教」處分的，除我外還一名助教和一名學生，兩

人當場就被武裝人員押走了。我因系列教授，須上報國務院認可，才算手續完備。三個月前，我剛從筒字樓搬進新蓋的高級樓，這時又被趕回筒子裏去，聽候處理。白天繼續在圖書館勞動，晚上回屋給小丁丁講故事，他有時聽得入神，有時笑得滿屋生春，我心裏想的只是「講一次少一次了」。四月十四日，下班時，監督我勞動的小幹部吊著官腔對我宣布：「我奉學院領導之命通知你，關於你的處分決定已由國務院批准。十七日下午二時整，上級派人到你宿舍來送你去接受勞動教養。你準時在門口守候，不得哒`。為了給你充分時間做好必要準備，上級決定從明天起，免除你勞動兩天。黨對你如此寬大，你應感恩圖報，努力通過強迫勞動改造思想，立功贖罪。」我茫然不知說甚麼是好。

回到家裏，妻子遞給我一杯清茶，我悄悄地告訴她早在意中的消息。她沉吟說：「小丁丁跟你那麼親，來人把你帶走的時候，說甚麼也不能讓他在跟前。你不是答應帶他去動物園看大象嗎？明天早起就去吧。完事以後，讓王阿姨送他去姑媽家跟奶奶住幾天。星期天我去接他回來。」我說：「難為你想得真周到，你上班，我領兒子逛公園。怎麼說呢！」

第二天清早，小丁丁一睜眼就說：「大爸爸，你到底甚麼時候帶我去看大象啊？」我說：「這天兒多好，大院兒裏的桃花都開了，咱倆今天就去！」他一骨碌坐了起來，嚷嚷道：「真的？真的？」孩子的媽說：「真的，當然真的！大爸爸甚麼時候騙過你？你可別總讓他抱著，你一天比一天沉，爸爸這些日子身上又沒力氣。你走累了請王阿姨抱抱，看完大象阿姨還帶你到姑媽家找奶奶去，好吧？」小丁丁樂壞了，急急忙忙吃完早飯，就一連聲催我和王阿姨出門。

我們從西苑上 332 路公共汽車到了動物園。下車後，我從王阿姨手裏接過孩子，在園子門口水果攤上買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小丁丁緊緊地抱著蘋果，我緊緊地抱著他，直奔象苑。他一瞅見大象就樂得哈哈大笑。「你好多天沒帶我來看大象了。我好喜歡大象。你再帶我來，快快地，多多地！你答應嗎，大爸爸？」

我一下答不上來。跟他實話實說嗎？還是說句謊話騙他一下呢？給你自己兩歲的孩子留個謊言告別？我哽得說不出話來。「一有空就帶你來，小丁丁，」我搪塞了過去。這時他看到一頭大象用鼻子捲起一根香蕉。興奮得直叫：「大爸爸，快瞧，你快瞧啊！」同時張開兩只小手要拍巴掌。他手裏的蘋果

啪嗒一聲掉進象苑，滾到一頭象跟前，立即就給牠用鼻子捲走了。小丁丁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伸著胳臂嚷嚷：「我要我的蘋果，我的大紅蘋果！」我趕緊把他摟得緊緊的，哄他說：「快別哭啦，好孩子，爸爸再給你買一個……」突然間我感到支持不住了，王阿姨趕忙把孩子接了過去，只聽她說：「爸爸累了，小丁丁，阿姨帶你找奶奶玩去。」我的心往下一沉，迷迷糊糊地看著孩子消失了，才想起沒給他買蘋果。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那個失去的大蘋果不停地在我眼前跳動，好像一個童話裏的金蘋果 ，好像是我們生活裏無可挽回地失去的甚麼東西。一回到家裏，妻子就問我：「小丁丁哭了嗎？」我說：「本來倒是沒哭，後來……」

後來，後來我就走了，風雪北大荒，三年苦役。妻兒老小受株連都被趕到安徽，從此天各一方，只有從妻子的短信，和偶爾夾在信裏的黑白小相片，可以看出小丁丁快長成大丁丁了。後來，趕上人禍造成的空前大饑荒，我在京畿清河勞改農場餓得奄奄一息，妻子不知我死活，好不容易請了假千里迢迢趕來探監。雖說擠硬席火車苦不堪言，她還是把丁丁帶上了。妻子信中常說孩子怎樣念叨爸爸，我滿心指望小丁丁連蹦帶跳沖進我懷裏，只擔心我抱不動他了。哪知道，我囚首垢面，衣鞋襤褸，孩子一見就嚇得鑽進媽媽懷裏。「這個人多可怕，媽媽，是誰啊？」他說。「我害怕，我怕。你快領我去找大爸爸吧。」媽媽緊緊摟著孩子說：「這就是你大爸爸啊！快叫爸爸吧！」孩子剛張口叫出「爸-爸」就放聲大哭起來。我多麼想把他摟過來，跟他說：「別怕，別怕，好乖乖，大爸爸好想你！」可是好像有一條鴻溝把我們父子倆分開了，我耷拉下腦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妻子好不容易才哄得小丁丁止住眼淚，十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已經到頭了。我轉身出門，趕往工地去勞動，連頭也沒敢回。三年多以前和孩子分手的情景又回到眼前，我再也忍不住眼淚了。我一直想再見面時一定要給他買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 ，現在我忽然明白過來，再紅再大的蘋果也永遠彌補不了他失去的那個金蘋果了。

腥風千里揚州路

我是土生土長的揚州人，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彩衣街老宅，直到三七年逃難才離鄉。小時候，我並不覺得家鄉有甚麼好。一道破破爛爛的城牆，一條條凹凸不平的青石板街道，灣灣曲曲的一人巷，堆滿街頭巷尾的垃圾，有甚麼好？甚麼「三分明月二分在揚州」，甚麼「煙花三月下揚州」，甚麼「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仿佛都是無稽之談。

蘆溝橋炮聲一響，幾個月後日寇兵臨城下，我上過五年半的揚州中學宣布解散，全體師生齊集樹人堂，合唱《松花江上》，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全場泣不成聲。會後，大家紛紛離校，我也加入了流亡學生的隊伍。誰料到，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就從此漂泊天涯。十幾年當中，跑過不少中外名城，我反而日益懷念我那「一無是處」的故鄉了。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從芝加哥大學兼程回國，應聘到燕京大學任教。游子還鄉，滿以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為人民服務了。我把寡母從揚州接到北京同住，暫時就不急於還鄉。誰料到，一入彀中，一切便都身不由己。先是我中了「陽謀 」暗算，發配北大荒，老母和妻子兒女被趕到合肥。及至「文革」十年浩劫，紅衛兵勒令我的老母離城，這時我已身為「牛鬼」，一籌莫展，只能眼睜睜看著老人家在離家十五年之後又孤身還鄉。

一九六八年二月，接到堂弟從揚州發來的電報，得知老母病逝。我立即請假去奔喪。經過一晝夜車船的折騰，我這個游子終於踏上了闊別卅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聲：「故鄉，你的游子回來啦！」可是故鄉變化不小，乍一看幾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牆不見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見了，我的腳下是一條板著幹部面孔的水泥大街，兩旁排列著千篇一律的兩、三層的水泥樓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塵滿面，鬢如霜」，形同陌路。我問了幾次路才找到家門，兩扇黑漆大門變成了一扇寒磣的小門。進們後才知道經過房改，原來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經住上好幾家了。聽堂弟妹們說，老人家是因為缺醫少藥，糖尿病加劇致死。焱Ｔ谝婚ｇ黑屋子裏，老人家在那裏面度過最後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棺材是用兩扇舊門板打的。第二天一早，我跟在一輛平板車後面，把靈柩送往城郊去入土為安。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從小是孤兒，在叔父家長到

三十多歲，被嫁給我父親當填房，接管六個未成年的兒女。父親賦閑，家裏靠典當過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們拉扯大了，還不讓失學，談何容易！後來，她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國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滿心以為從此可以歡度晚年了。無奈十七年來，老人家受我株連，沒過上幾年好日子，最後還趕上「文革」苦海無邊，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脫。

多年來，雖然說不上為揚州魂牽夢繞，我還是常常惦著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一行。怎麼也沒料到，「三十一年還舊國，」竟是在腥風血雨中來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來的，磨難還沒盡頭哩。當年那些恐懼和夢想，它們曾驅使我在腥風血雨中背井離鄉，去追求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如今，夢想早已破碎，恐懼卻牢牢地織入生活的經緯。游子還鄉彷彿是一場醒不了的噩夢中的插曲。

安葬後第二天，弟妹們忙於「鬧革命」，我獨自到大街小巷去走走，看看故鄉似曾相識的面貌，聽聽久已生疏的鄉音。彩衣街的名字是怎麼來的，我小時從來沒聽說過，現在也無心去打聽。只覺得這彩色斑爛的名字，對兩旁貼滿大字報的長街，真是絕妙的諷刺。我想起當年那些擺攤子的手藝人，或是用麵團，或是用梨膏糖，作成形形色色的神仙人物，孫悟空啦、豬八戒啦、哪吒啦、托塔李天王啦，一個個神采飛揚，五色繽紛。那些彩衣神仙曾為我孤寂的童年添過多少生趣，畫過多少好夢！

一個過路的胖男駭好奇地睜著大眼睛朝我看，我便問他還有沒有做麵人兒和糖人兒的，他笑呵呵地說：「一聽就曉得叔叔是外地來的。掃四舊早就把他們掃光了。」

我說：「你不覺得可惜嗎？」

胖孩子說：「那有甚麼法子！文化大革命嘛！」

我說：「你說得對。你的揚州話說得真好聽。」

他說：「揚州人不說揚州話說甚麼？」

我笑著用揚州口音說：「我也會說揚州話。」

小胖子又樂呵呵地說：「叔叔說的又不像。」

我突然感到失落了，我多麼羨慕那位「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的詩人。

滿街到處都是高音喇叭，播送著震耳欲聾的革命歌曲。我心裏卻回蕩著來自童年的歌聲。年年夏天黃昏時分，沿街人家往往在家門口乘涼。總有一個瞎子，中年男的，穿一身土白布褂褲，邊走邊拉胡琴。有一個十來歲的姑娘，背後拖著一條漆

黑的大辮子，一手扶著瞎子，一手提著一個收錢的小布口袋，低頭唱著各種小調。時隔數十年，我早已附庸風雅，胡亂哼哼西洋歌曲，可是她常用《四季相思》的調子唱的孟姜女萬里尋夫的故事卻難以忘懷。古城夏夜，她那如泣如訴的哀歌讓我過早地體味到人生的苦難。我曾取笑自己，畢竟孟姜女的故事早已是老古董，秦始皇那個暴君也早已遺臭萬年了，何必自作多情，為古人擔憂。沒料到，「反右」浩劫中，我被充軍比萬喜良還遠幾千里呢。妻子也像孟姜女當年一樣，為冰天雪地中服苦役的丈夫做棉衣，又千辛萬苦、長途跋涉去獄中探望人命危淺的丈夫。我在故鄉的土地上踽踽獨行，忍不住流下淚來。不用問人：「今天還有盲人歌女唱孟姜女嗎？」

出天甯門，沿瘦西湖走到綠楊村。冬天湖水淺，沒有遊船。我猛然想起當年綠楊樹下有位老者，身上穿件道袍，手提一根釣魚桿，桿端掛著個布口袋。湖裏有遊船經過時，老人家就站起身來，不緊不慢地把口袋伸到船上，抑揚頓挫地唱一段道情，討點錢。他常唱的那段，我又輕輕哼了起來：「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驀抬頭月上東山。」何等的神仙境界！不用問，這樣的老漁翁早已絕跡，道情自然也沒人唱了，鄭板橋這樣的「反動」思想也難逃紅色恐怖的熊熊烈火。

等我重訪了「長堤春柳」和五亭橋，斜陽已晚。回到彩衣街，經過一家燒餅店，猛然聞見一股烤燒餅的香味撲鼻而來，又把我帶回少年的歲月。每天清早，我背上書包，走到娘床前去要幾個銅板，然後就連蹦帶跳上學去。到了燒餅鋪，買兩個剛出爐的燒餅，一路走一路吃。蘿卜絲燒餅一年四季都有，雪白的蘿卜絲配上香噴噴的蔥花，比「獅子頭」還好吃。豌豆苗燒餅只有春天有，鼓鼓囊囊的夾滿了碧綠粉嫩的豆苗，色香味俱全，今天想起來還流口水。此刻站在燒餅鋪前，我忍不住問道：「有蘿卜絲、豌豆苗的燒餅嗎？」

一個年輕的師傅打量了我一番，笑著說：「早已不做了。只做「椒鹽草鞋底」，大路貨。同志是外鄉來的吧？」

我怎麼能忘記，整整七年前，也是春節期間，我在勞改營裏餓得奄奄一息，娘從北京去探監，從茶淀火車站到清河勞改農場，一雙小腳走十多里碎石子路，手裏提著食品袋。眼看著白髮蒼蒼的老母疲憊不堪的神情，我好容易才忍住眼淚。娘從袋子裏先拿出個紙包，邊打開包邊說：「我記得你小時候最愛

吃烤爐燒餅，蘿卜絲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連影子也沒有。白蘿卜倒有，不如揚州的好吃。現在好麵粉也困難，春節一戶才配給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蘿卜絲，加了蔥花，滴了幾滴麻油，包了十個小餅子，一個一個在煤球爐上烤出來的，自然沒有燒餅鋪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說：「哭甚麼，吃吧。」

我一邊說著話一邊吃起燒餅來，不知不覺就把十個都報銷了。

娘問：「味道還可以嗎？」

我說：「說不上，我是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再來十個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說：「聽說你們這裏餓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著，我就放心啦。」

今天我還活著，您卻只是一杯黃土了，而我被「掃四舊」嚇得連一個燒餅也沒敢供在您靈前。

再見了，似曾相識的故鄉！我好比一個失去的古王國的考古工作者，從時間的窖穴裏發掘到一些碎片、幾塊化石，也許它們會為我打開一扇門，讓我走進那個塵封土埋的世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往事回思如細雨-紀念汪曾祺逝世七週年

曾祺走了七年了。一 代 散 文 大 師 在北京突然去世的噩 耗是從董樂山兄的來信中得知的。樂山當時為肝疾所苦，“心緒不定”， 1997 年 5 月 21 日信上說：“不過過了 70，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 ，你的老同學汪曾祺已于 5 月 16 日逝世，我是看報才知道的，剪下給你一閱。”報上登的是曾祺的恩師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的話：“像曾祺這樣下筆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沒有了 。”回想 90 年 7 月 離京來美前曾專程到曾祺家去辭行,約好回國後好好喝兩杯,“憶苦思甜”。誰料到，幾年來欲歸無計，當年辭行竟成了訣別。不到兩年以後，樂山本人也因肝癌含恨而終。關山間阻，親故凋零哭亦遲，真不知言從何起。

一

從頭說起吧。1936 年春，我在揚州中學讀完高一，到鎮江參加集中軍訓，和鎮江中學的汪曾祺、蘇州中學的趙全章編在同一個中隊。三人同年，都是 16 歲，三個月同吃、同住、同操練，簡直比親兄弟還親。三年以後，三人都當上了流亡學生，竟又都考上昆明西南聯大，全章和我讀外語系，曾祺讀中文系。三人同住大西門外新校舍一棟宿舍，蹤巧三人又都愛好文藝，“臭氣相投”，朝夕過從。

每天課後，我們仨就帶著兩三本書、鋼筆、稿紙，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館，一邊喝茶，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邊看書，聊天兒，或是寫點兒什麼東西。誰寫好一篇，就拿出來互相切磋，曾祺的文采從一開始就讓我們倆嘆服。我們最早的習作就是在茶館裏泡出來的，投給中央日報文藝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詩小文都陸續登出來了。家山萬里的窮學生，經常飢腸轆轆，一拿到稿費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時深更半夜還冒著雨到翠湖去逛蕩，享受免費的湖光夜色。那些日子，相依為命，樂在苦中，幾乎有點兒“樂不思蜀”了。

二

1943 年秋，我離開昆明來美，八年以後才在北京重逢。雖

說彼此都在一個城市工作，其實咫尺天涯，也難得見上一面。後來，我和曾祺都中了“陽謀”，更是從此天各一方，一別就是“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1980 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開始體味“見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設法見見面，喝上兩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畢竟還是離多會少，無可奈何。於是，我要曾祺給我畫一張畫，掛在家徒四壁的屋裏，這樣就可以每天見畫如見人了。

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從這張畫說起的：

寧坤要我給他畫一張畫，要有昆明的特點。我想了一些時候，畫了一幅，右上角畫了一片倒掛著的濃綠的仙人掌，末端 開出一朵金黃色的花。左下畫了幾朵青頭菌和牛肝菌。題了這樣幾行字：

“昆明人家常於門頭掛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懸空倒掛，尚能存活開花。于此可見仙人掌生命之頑強，亦可見昆明雨季空氣之濕潤。雨季則有青頭菌、牛肝菌，味極鮮美。

曾祺說，“我的畫，遣性而已，”友人索畫，隨手畫了就奉送。這張畫，不僅“想了一些時候”， 而且題詞顯然還留了底稿，足見他是鄭重其事的。仙人掌懸空倒掛在右邊，左邊是四行草書題詞，仙人掌下面又有一行半寫作畫緣起：“寧坤屬畫，須有昆明特點，作此圖。”左下還有三行小字：“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是日大風，不能出戶，曾祺記”。題詞下面畫著四朵昆明特有的香菌。這幅畫，從構思到畫面布局和題詞，處處可見匠心，淡泊寧靜，爐火純青，無疑是曾祺畫中的精品。

曾祺在文中又說：“我的那張畫是寫實的。我確實親眼看見過倒掛著還能開花的仙人掌。”我不禁納悶兒，他為何要如此表白？文革浩劫已經過去多年，難道他還心有餘悸，怕好事者說他不是寫實，而是別有用心嗎？又隔了幾年，在《自得其樂》一文中寫道：

“畫中國畫還有一種樂趣，是可以在畫上題詩，可寄一時意興，抒感慨，也可以發一點牢騷。”原來如此！那麼，這幅畫固然是“寫實的”，是否同時也“抒感慨”呢？是否也是為久經倒懸之苦而猶能存活開花的一代人的寫照呢？

三

1994 年冬春之間，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客，客中寂寥，十分想念都中故人，給曾祺寫了封信，久未得覆。我倆當時都已“過了 70”，我下意識中可能也嘀咕“什麼意外都可能發生”，便給南京的一位作家朋友寫了封信查詢。朋友回信說，“汪曾祺現在大紅大紫，要出全集，哪有功夫為你浪費筆墨。”我難以置信，四月下旬又給曾祺一信，探聽究竟。並說，他給我畫的昆明風情留在北京家中，客中孤寂，可否請他再給我畫張畫，寫幾個字寄來，以慰相思。5 月 12 日接來信，拆開一看，竟是我 12 月 15 日原信，連信封和附件在內，並無他本人只字，深以為怪。次日，得 5 月 6 日信，掛號，附字畫各一件，大喜。信上說：“4 月 25 日信收到，前來信，因為把你的地址搞丟了（我這人書信、稿件向來亂塞），故未覆，與‘大紅大紫’無關也。”我眼前出現了他北京蒲黃榆家中那張小書桌，上面堆滿了文稿、書信、字畫，如見故人。

曾祺是畫花卉的，這幅畫的是“丁香結”，題詞是：“此畫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眼鏡不知置于何所只能沿著感覺摸索為之以寄寧坤”，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字是一副清秀的草書對聯：“寧坤客中飾壁：往事回思如細雨，舊書重讀似春潮。”他在《七十書懷出律不改》中寫道：“書畫蕭蕭餘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5 月 14 日，我在沙田買到 1993 年出版的《汪曾祺散文隨筆選集》，其中就有八篇憶兒時的文章，篇篇淡淡如細雨。但我不禁聯想到“無邊絲雨細如愁，”曾祺這樣的性情中人，回思往事的細雨能沒有淡淡的哀愁嗎？

他的往事中也包括幾年的“右派”生涯啊。他在 1991 年寫的《隨遇而安》一文中談到他當“右派”的經歷和感受。文章一開頭就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真是“下筆如有神”！其實這淡淡的“微言”豈止是“細如愁”而已，他說“人到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文章結尾處，他終於慨乎言之：

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經死掉的，大多數還在努力地工作。……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

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曾祺對政治並無興趣，卻一再被莫名其妙地捲入政治的旋渦。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文天才，他的心是脆的 ，身經數十年家國之痛，無論他多麼寧靜淡泊，他的旎昴軌蛋黃 獑幔克 Z 重心長地留下一句話：“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言猶在耳，宛如春潮，他已經走了七年了。

一本杜詩的滄桑

一九五七年那個難忘的夏天，北京城殺氣騰騰，中了「陽謀」暗算的知識分子紛紛墮入「右派」的泥坑。當時我在西郊一所外語學院任教，經過半年多批斗勞動後，受到「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的一等一級處分。次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上級機關的一輛軍用吉普車把我押解到半步橋，關進北京市監獄內新開業的勞動教養所，從此開始了二十餘年的賤民生涯。

離家前夕，懷孕已七個多月，她一邊為我收拾行裝，一邊說：「換洗衣服，盥洗用具，放在你這個舊洗衣袋裏。不知道你會有空看書嗎？」

「勞動改造嘛，有空時間也不會多的，」我說。「把那天新買的《杜甫詩選》，還有那本原文的《哈姆雷特》扔進去吧，有空時翻翻吧。」

於是，馮至編選的一本杜詩就伴隨我踏上了「路漫漫兮的流放征途。四月十七日下午三時許，我就被關進勞教所二樓一間牢房，一蹲就是一個多月。二十多個青壯年男人擠在一起，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一日兩餐啃有霉味的窩窩頭，日日夜夜聞屋角裏尿桶散發的臊味。間或晚飯後有一點空閑，我就從枕頭下面拿出《杜甫詩選》來看看，我的心成了「天地一沙鷗」，飛出鐵窗到詩聖的自由天地中去遨遊。六月五日晚飯後，我正在看杜詩，忽然接到妻子從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於三日清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她取個名字。恰巧我剛剛讀過杜甫贊孔明的詩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我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也不得一見，只得託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從人間地獄祝願她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六天以後，奉旨離京，八百名勞教分子浩浩蕩蕩搭乘「專列」，由大批武裝警衛押送離京，車行數日，無所事事，幸有杜詩可讀，沿途隔著車窗遠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萬般無奈，信筆在詩集末頁空白處留下了四居感言：「相識遍天下，知心無一人。唯有詩千首，天涯慰寂寥。」風雪荒原，三年勞改，這本杜詩成了我的知心難友。老杜久經喪亂，對生離死別感慨最深：「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我幼年喪母，後來一兄一姐相繼夭折，抗戰期間父親又為日軍所

害，還不上二十歲我就飽經了死別之痛。一九三七年冬，日軍逼近揚州，我高中還沒畢業，就含淚告別家人，流浪他鄉。誰會料到呢，當年我雖沒當上亡國奴，二十年後，日軍早已戰敗，中國大陸也已「解放」，我倒反而在自己的國土上成為階下囚，萬里迢迢，妻離子散，竟又體驗到「生別常惻惻」！但一想到生不逢辰如我者何止萬千，何況妻子年紀輕輕守著小兒女，度日如年，我豈能顧影自憐。安史之亂中，杜甫被擄至長安，身為階下囚，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苦難，而是流落他鄉的妻子：「今夜鄜州月，閨中知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請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千載之下，同病相憐，我竟在興凱湖邊為老杜一哭。

對遭逢不幸的友人，杜甫也是一往情深，生死不渝。李白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流放夜郎，杜甫當時流寓秦州，不但不懂得「劃清界限」，反而魂牽夢繞，寫一首又一首詩為「斯人獨憔悴」鳴冤叫屈，反觀今世，一年前，「反右」一聲令下，文藝界「冠蓋滿京華」，（這本杜詩的編者也在其中），人人上陣，口誅筆伐「右派」詩人、作家，哪裏會有「乾坤一腐儒」說這樣的怪話：「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的至情與正氣可歌可泣，李白是有福了，社會主義勞改營中的囚徒也托福了。他生在「萬方多難」的時代，終生顛沛流離，偏偏還要「窮年憂黎元」，荷負天下眾生的苦難，把數十年家國之痛化為彪炳日月的詩篇。晚年漂泊湘、鄂一帶，「老病有孤舟」，途中以腐肉充饑，竟死於病毒性痢疾。一個不識時務的書生如我者，有幸來到北大荒廣闊天地，有萬千難友為伍，有杜詩一卷可讀，夫復何求！深夜捫心，我感到愧對千古一詩聖。

三年之後，由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語），神州大地上餓殍萬里，勞改營裏更是「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史聲啾啾」。我在清河勞改農場被餓得奄奄一息，終於感謝「革命人道主義」的寬大政策，奉准「保外就醫」，到妻子所在的安徽大學落腳。囚首垢面，回到妻孥身邊，此情此景仿佛早已寫在那本和我相依為命的杜詩裏了。「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只不過，居委會耳目眾多，自然不會有「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噓」。我離家時，丁兒還不到三歲，眼下已快六歲了。孩子雖然又黃又瘦，記性倒不錯，教給他幾首杜詩，他背得滾瓜爛熟，劫後餘生，這也可算作天倫之樂了。一年後，被安大雇用為臨時工，總算有飯

吃了。「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豈料紅色恐怖臨頭，這也成了罪名：宣揚「四舊」，腐蝕下一代，為資產階級復闢鳴鑼開道！.

一九六九年五月，我還關在「牛棚」，妻子作為「牛鬼」家屬，被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時，狠批「封、資、修」，橫掃「四舊」，已經搞了三年，不少「緊跟形勢」的大學教師們紛紛把存身書當廢紙賣掉，六分錢一斤。妻子「不識時務」，把我的兩、三百本舊書統統裝進舊紙板箱，連人帶書同乘一輛卡車下放和縣高莊。又過了一年，我被放出「牛棚」，爬上卡車，也到高莊和妻孥團圓。我的境況和杜甫從鳳翔回到羌村與家人重聚時差不多：「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這時我又成了無業游民，雖然沒有生活出路，倒是有時間看書了。一個大晴天，妻子和我把幾箱舊書抬到門前空地上，一箱箱打開。由於潮濕，許多書都發霉了。還有耗子在一個箱子裏做了窩，並且咬壞了一些書，其中被咬得最慘的要數那本《杜甫詩選》。我捧在手裏，彷佛見到了一個被「革命小將」橫掃得遍體鱗傷的敵人。為了不讓妻子難過，我故作鎮靜地說：「可憐的小耗子！牠們準是比我在六零年冬天還餓呢。」

我們一家五口住的是生產隊用公款蓋的一間茅草棚，黨員隊長偷工減料，不到一年就漏雨了。第二年夏天，我為瘧疾所苦，發高燒，說胡話，妻子冒雨趕到兩里外的公社衛生院去請醫生。這時風雨交加，屋頂上的草被刮走了不少，屋裏到處漏雨，唯一乾處是屋角裏女兒的小床，我躲在上面呻吟。魯醫生一進門，先忙著給我吊鹽水退燒，隨即去幫妻子掏水。魯醫生還不到三十歲，沒上過幾年學，好讀書，有空常來和我聊天兒，和我一起讀那本杜詩，全然不理會上級要他「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的警告。雨停之後，我的體溫下降，魯醫生來到我床前，笑著說：「巫老師，『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你和杜甫風雨同舟了。」

我指著床頭一本新書說：「北京的一個詩人朋友剛寄來的，那位翰林院院長的新著、《李白與杜甫》。他貶杜褒李，投當今之所好，並不奇怪。這位身居京城豪華官邸、養尊處優的大人物，竟然以『捲我屋上三重毛』為論據，一口咬定杜甫是殘酷剝農民的地主分子，也未免太離譜啦。」

魯醫生說：「恕我直言，巫老師，你真是書生氣十足，要不你今天就不會病臥這間破茅棚，小雨小漏，大雨大漏。人家

郭老識時務者為俊杰嘛。」

我說：「人各有志嘛。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他想的不是自己如何鑽營奔走，去搞一套豪華邸宅，而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皆歡顏。』雖然是書生的烏托邦夢想，仍不失為仁者之心，包容天下的胸懷。杜甫真不愧為千古一詩聖，知識分子的萬世師表！」

文革後期，我們全家回城，我和妻子到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工作。六年之後又「落實政策」，重返北京。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我和妻子帶著小兒子起程北上。一毛已在師大就讀，不能同行。分手前，牠要我留本書作個紀念。我想了一下，沒有比那本《杜甫詩選》更合適的了。它既是一毛名字的出處，也是我們一家人劫後餘生最好的見證。書的末頁已有我二十二年前流徙途中留下的小詩，現在又添上一段文字，大意說當年如何「以言禍獲罪，流放北大荒，囚車孤獨，但讀杜詩而已」等等。來年廈，一毛赴美求學，行囊中帶著這本杜詩，上面有我贈書時的祝福：「他日鸞鳳高翔，有厚望焉。」

九零年夏，我來美講學，先到一毛家小住，那本杜詩赫然在目。久別重逢，「舊書重讀似春潮」。一毛見我和它難舍難分就說：「爸爸，你帶在身邊翻翻吧，別搞丟了就行，這是咱家的傳家寶啊。」從此，當年的患難之交成了我形影不離的旅伴，每到以處，舊雨新交往往會問起我流放的往事，我也常常請他們一睹那本杜詩劫後餘生的風采，引起了聲聲感喟。

九四年夏，我結束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的訪問，道經東京返美，在荷蘭王國駐日本大使楊樂蘭夫婦家作客。他們輛都是漢學家，對中國人民和文化懷有深厚的感情。在談話中，他們特別提到杜甫「國破山河在」那首名著，於是我從手提箱裏取出那本《杜甫詩選》展示，並回顧了它的來龍去脈。楊樂蘭風趣地說：「小耗子口下留情，要不你就沒這個傳家寶啦。」七月三日，他們送我登機返美。十小時之後，安抵聖荷西國際機場，我興沖沖地提著手提箱奔向在迎候我的妻子和一毛，順手把小箱子往手推車上一放，三人站在行李運輸帶前等候大件行李。一轉眼間，一毛驚呼：「手提箱不見啦！」

劫後餘生，對身外之物早已感到無所謂了。這次丟了那本鼠口餘生的杜詩，多少天我都心神不安，夜夜輾轉反側，仿佛遺棄了一個久經喪亂的親人。楊樂蘭夫婦接到我的「報喪」信後，，安慰我說：「我們可否認為命運已划下一條分界線？過去到此為止-新生活從今開始？」

從加州回到一村兒在華府郊區的家中，過了幾天後硬著頭皮把這件事說出。一村也熟讀過這本杜詩，他沉吟了半晌後說：「怪不得你回來後悶悶不樂呢。丟了書還要生悶氣，那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有兩句杜詩我非常喜歡：『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你老人家『七十餘年如一夢』，平生蕭瑟也絕不下於庾信，如今四海為家，夕陽紅於二月花，何不來一個『敢有歌聲動地哀』，才真正不辜負老杜三十六年的患難之交。」

古今友情

年青時候讀唐詩，由於許多字不認識，許多典故不明白，往往一知半解，霧裏看花。但是，唐代詩人那些抒寫友情的詩篇，我卻心領神會。

記得當年初次讀李白贈別汪倫的那首七絕，明白如話，一下子就把我引進了一個詩情畫意的新世界。李白當時早已是名聞天下的詩仙，到了安徽偶然去遊涇縣的桃花源，村人汪倫相見恨晚，常釀美酒款待這位嗜酒如命的「謫仙人」。等到仙人又該到別處去雲遊了，登舟待發，卻見汪倫一路唱著歌到舟邊來送行，詩仙感動得留下了那流傳千古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丈，不及汪倫送我情。」

李白生性豪邁，廣交遊，朋友遍天下。所存千餘首詩中，有不少送別友人之作。《送友人》典型地抒發了對即將遠行的故人依依不舍的至情：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他與莫逆之交僬郡元參軍一別多年，從千里外寄去長詩《憶舊遊》，如泣如訴：「問余別恨知多少，落花春暮爭紛紛。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極。」

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詩仙和詩聖可說是忘年交。《沙丘城下寄杜甫》訴說了他無盡的相思：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後來永王璘造反失敗，李白受株連，關進潯陽大牢，長流夜郎。杜甫不但不懂得「站穩立場，劃清界限，揭發檢舉」，反而哀嘆「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一連三夜在夢中和李白相見，醒後作《夢李白二首》，為身系羅網的老大哥憂心如焚，不能自已，而且竟然為「現行反革命」鳴冤叫屈：「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後來李白遇赦放還，杜甫仍憤憤不平：「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同時，他又對「謫仙人」的曠世詩才贊嘆不已：「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在反復無常的政海波瀾中，兩位偉大詩人的生死患難之交巋然不動，與日月爭輝。

五十年代末期，我因言禍長流北大荒，隨身帶去的一本《杜甫詩選》成為冰天雪地中的患難之交。我曾尋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李白當年若果真魂斷南荒，有詩聖這樣為他樹碑立傳，也足可浩氣長存了。而我當年如葬身北荒，那些似曾相識的老朋友早已劃清界限，我只能是孤苦伶仃一遊魂而已。

杜甫死後出生的白居易（字樂天）與元稹（字微之）友誼至篤，詩亦齊名，世稱「元白」。兩位大詩人「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何等動人心魄的友情！無奈詩人都不是做官的材料，仕途坎坷，非貶即謫，離多會少，只得藉書信和唱和抒發別恨離愁：「念遠緣遷貶，驚時為別離。」那年代通訊困難，不但在戰時，「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就在和平時期，兩人書信往還也是「素書三往復，明月七盈虧。」

元稹恃才傲物，三十歲時因言禍謫戍江陵，奉旨倉皇離京就道，與白居易在大街上邂逅，只能在馬上匆匆話別。白居易回家後獨自傷心落淚，元稹則一去無消息。白居易朝思暮想，終如杜甫夢李白一般，在夢中與逐客相會：「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無人可寄書。」正在這時，聽到冬冬叩門聲：

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開緘見手札，一紙十三行。上論遷謫心，下說離別腸。

心腸都未盡，不暇敘炎涼。云作此書夜，夜宿商州東。獨對孤燈坐，陽城山館中。

夜深作書畢，山月向西斜。月下何所有，一樹紫桐花。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

殷勤書背後，兼作桐花詩。桐花詩八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憶君此夜心。

一章三遍讀，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

情深似海，催人淚下。元稹得書後有長詩酬答，一字一淚：

封題樂天字，未拆已沾裳。坼書八九讀，淚落千萬行。

中有酬我詩，句句截我腸。仍云得詩夜，夢我魂淒涼。

白居易在禁中值夜，五聲更漏，懷念遠方的謫客：「心緒萬端書兩紙，欲封重讀意遲遲。」

五年後，白居易因上疏請嚴緝刺殺宰相元武衡之凶手，觸犯當道，貶九江司馬。元稹在「殘燈無焰影幢幢」的貶所得訊：「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每得樂天書無不悲喜交集：「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兩位謫客「山水萬重書斷絕」，魂夢為勞。偶得詩書，百讀不厭。白居易泊舟夜讀元九詩：「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銘。

眼痛滅燈猶暗坐，逆風吹浪打船聲。」元九讀後有詩酬答：「知君暗泊西江岸，讀我閑詩欲到明。今夜通州還不睡，滿山風雨杜鵑聲。」他撫今追昔，更為剛正不阿的友人感到悲憤難平，魂牽夢繞：

閑夜思君坐到明，追尋往事倍傷神。同登科後心相合，初得官時髭未生。

二十年來諳世路，三千里外老江城。猶應更有前途在，知向人間何處行？

江州司馬終於熬出了頭，而元才子卻在四十二歲的盛年暴卒於武昌任所。時隔數年，樂天得讀盧子蒙舊詩，其中多與微之唱和，感今傷昔，寫下一首聲淚俱下的七律：「……相看掩淚情難禁，別有傷心事豈知。聞道咸陽墳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

晚年詩友劉夢得與他同齡，七十歲時他有《偶吟自慰兼呈夢得》之作：

且喜同年滿七旬，莫嫌衰病莫嫌貧。已為海內有名客，又占世間長命人。

耳裏聲聞新將相，眼前失盡故交親。……

不料次年又失去了夢得，情何以堪！他在悼詩中慨嘆兩人的生死之交，祝願死者在地下與微之同遊，聊以自慰：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閑日，一死一生臨老頭。

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碎歿英煽冢，应共徽之地下游。

四年之後，孑然一身的老詩人也追兩位古人於地下了。

緬懷古代詩人生死不渝的百年交分，反觀近數十年來中原知識分子之間司空見慣的「友誼」，不由得不令人悲從中來，同聲一哭。舉一個身邊的例子。半生坎坷的杰出現代詩人穆旦，一九七七年含恨而歿，在棄世前一年寫的《智慧之歌》中哀嘆：

另一種歡喜是喧騰的友誼，
茂盛的花不知還有秋季，
社會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騰，
生活的冷風把熱情鑄為實際。

一位熱愛故土的詩人五三年萬里回歸，蒙冤受難二十餘年，京華冠蓋中頗有幾個老朋友，沒有一個挺身而出為他講一句公道話，沒有一個過去的詩友為他的悲劇寫一行詩。二十多年的親身感受，無數耳熟能詳的真人真事，鑄成「智慧之樹」上一片可詛咒的綠葉。但是詩人並不因此忿世嫉俗，始終十分珍重友誼，在生活中一向急朋友之所急，我就在最困難的時刻得到過他慷慨的救援。

再舉一個例子吧。沈從文和丁玲當年在文藝界也算得上患難之交。後來丁玲去了「革命聖地」，「解放後」進城當上了文藝界的京官，手裏有一點權了。沈從文書生本色，不識時務，不會見風使舵，只能「斯人獨憔悴」，他的陋室也「門可羅雀」了。巴金是有點古風的，五二年秋蕭珊曾告訴我，他從上海來北京時找到了丁玲為沈從文說項，只不過希望能給老朋友安排一點適當的工作，不料這位紅彤彤的文藝官僚竟大言不慚地打官腔來：「人民不承認他嘛！」於是，一位才華蓋世的作家只得繼續埋首博物館，當一名沒沒無聞的解說員。

沈公也是有點古風的。他雖身處逆境，對朋友、對過去的學生還是滿腔赤誠。我在西南聯大時並沒上過沈老師的課，只不過是無數崇敬他的青年讀者中的一個，有幸在課室外得到他的教益。後來我去國多年，失去聯係，直到一九五一年從美國回來，才重新見面。幾年之後，我先在五七年被流放北大荒，到文革中又被關進「牛棚」，一別又是二十年，連音問也斷絕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們全家發配到安徽農村去落戶，在一個小村子過著無人問津的賤民生活。七三年底，忽然接到老師從北京的來信，用他那舉世無雙的章草密密麻麻寫了六張八行

書，一個月後又來了一封長達八張的八行書。他從穆旦處得知我的景況，勸我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他一生的經歷現身說法：「今年已七十二歲，工作中竟充滿童心。」我把信一遍又一遍地讀給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連十歲的小兒子都聽哭了。那當年令我心醉神迷、透明燭照的聲音又在我們風雨飄搖的茅屋中回蕩，「字字化為金」。

　　俱往矣！好不容易熬過「六親不認」的浩劫，又趕上認錢不認人的「大好形勢」，在茫茫錢海中重溫古今友情，「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

詩人穆旦的生與死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是詩人穆旦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還記得八七年在北京歐美同學會舉行過紀念詩人逝世十週年的「穆旦學術討論會」，會議是由我主持的。幾十位詩人、學者濟濟一堂，以研討其遺著的方式，為一位含恨而歿的當代詩人誌哀。一轉眼，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當年的與會者有的已垂垂老矣，穆旦的兩位清華大學同班同學周玨良和王佐良兩位教授已先後謝世，更令人黯然。略具諷刺意味的是，從「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間，「二良」都是英語界的泰斗，而穆旦卻「斯人獨憔悴」，直到死後多年方得重見天日。

一

詩人本名查良錚，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天津。一九三四年將「查」字一拆為二，「木」、「穆」諧音，開始用「穆旦」作筆名。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時，開始詩文創作，現共存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載《南開高中生》的詩八首。這些「少作」刻劃了流浪人、老木匠、繅絲工等勞苦大眾經受的「把人變成了爛泥」的煎熬，鞭撻了「另一個世界」窮奢極欲的生活。當時強寇侵凌，平、津首當其沖，年青的詩人熱心抗日救亡活動，又寫下了《哀國難》，「灑著一腔熱血」大聲疾呼：

眼看祖先們的血汗化成了輕煙，
鐵鳥擊碎了故去英雄們的笑臉！
眼看四十年的光輝一旦塌沉，
鐵蹄更翻起了敵人的凶焰！

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已經投身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洪流，開始唱起「追求進步」的序曲。

一九三五年秋，良錚入清華大學外文系，開始寫雪萊式的浪漫派的詩。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良錚隨校遷往昆明，清華與北大、南開合併，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在這片被稱為「振興並發展中國新詩的新墾地上」，穆旦得到著名的學者、詩人聞一多、燕卜遜等人的言傳身教，深受西方現代派詩歌的影響，逐漸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全面現代化的詩風。一九四二年寫的《詩八章》，次年即和另三首收入聞一多選編的《現代詩鈔》。這些情詩使人耳目一新，這裏沒有中國古典詩歌的風花雪月，也沒有現代詩歌中徐至摩那如火如荼的傾訴，卞之琳那欲語還休的獨白。請聽第一首：

你底眼睛看見這一場火災，
你看不見我，雖然我為你點燃；
唉，那燃燒著的不過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們相隔如重山！
從這自然底蛻變的程序，
我卻愛了一個暫時的你。
即使我哭泣，變灰，變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詩人自己說：「那是寫在我二十四歲的時候，那裏也充滿了愛情的絕望之感，」毫無纏綿悱惻的溫情。「九葉」詩友袁可嘉教授認為「穆旦的情詩是現代派的，熱情中多思辨，抽象中有肉感，有時還有冷酷的自嘲。」這樣的情詩，在中國幾千年的詩史上是前無古人的，在其後半個世紀中，也還是尚無來者的。

詩人無比敏感的心穀粡Ｈ為痛苦的愛情受難，為人世的萬千劫難受盡煎熬，更承載著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憂患。一九四一年，烽火連天，國土淪喪，悲壯滴血的六十行長詩《贊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難和血泊中的再生：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沉默的
是愛情，是在天空飛翔的鷹群，
是乾枯的眼睛期待著泉涌的眼淚，
當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遙遠的天空爬行；
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涼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騾子車，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陰雨的天氣，
我要以一切擁抱你，你，
我到處看見的人民呵，
在恥辱裏生活的人民，佝僂的人民，
我要以帶血的手和你們一一擁抱，
因為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這樣氣勢磅礴的亨德爾式的「聖樂」是那個大時代眾多的愛國主義詩篇中的絕響。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邊陲告急。中國遠征軍在昆明組建，二十四歲的愛國詩人走出學府，隨軍出征緬甸抗日戰場。他親歷了緬甸戰場與日軍的戰斗，隨後又在大撤退中從事自殺性的殿後戰。野人山重巒疊嶂，原始森林瘴癘橫行，官兵斷糧斷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過了三年，詩人才根據這段不堪

回首的經歷，寫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這首長詩是以《葬歌》終結的：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沖擊，
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週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在這裏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幹而滋生。

這首椎心泣血的長詩，它不僅是對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紀念千千萬萬為抗日而犧牲的將士的史詩。但是，愛國從軍並沒有給劫後餘生的詩人帶來英雄的光環，後來在新中國倒反而成為他的「歷史問題」。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畢業後，詩人又懷著一以貫之的愛國情操，一相情願地偕夫人周與良博士兼程回國。次年五月，他們倆同時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滿以為從此可以安心報效祖國了。良錚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義執言，在那「黃鐘毀棄，瓦斧雷鳴」的年頭，自然不能見容於那些為虎作倀的宵小。僅僅一年多之後，那被輕描淡寫地稱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的漫長歲月就開始了。

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詩人成為「肅反對象」，受到批斗審查，參加「遠征軍」的「問題」也被提了出來。一九五七年春「整風運動」開始，良錚接受回國後幾年來「禍從口出」的教訓，在「大鳴大放」中守口如瓶，總算逃過了言禍，在「反右運動」中幸免於一頂「右派」的棘冠。天真的詩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九五七年二月，發表長詩《葬歌》，真誠地抒寫「我們知識分子決心改造思想與舊我決裂」，卻受到「個人主義」的譏評。五月七日，在《人民

日報》發表諷刺詩《九十九家爭鳴記》，「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寫了檢討。這些只不過是他的厄運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憑空扣在了一位萬里來歸的愛國詩人的頭上，「機關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證」正是當年愛國從軍，參加抗戰！從此開始了二十年的賤民生涯，株連全家，「文革」期間又受盡折磨，親友回避，詩神無蹤。

二

一九七七年春節前，良錚因腿傷在天津重新入院手術。不料，還沒來得及動腿部手術，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臟病突發，二十六日凌晨病逝，這是多年來身心備受摧殘的必然後果。詩人享年僅五十八歲，與憂患餘生的詩聖杜甫同齡。人死了，但是長達二十年的「不公正對待」並沒到此為止。那些多年來落井下石的宵小，人還在，心不死，一口咬定死者是「反革命」，連遺體告別儀式也要干預。一九七八年，文藝界開始復蘇，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良錚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翻譯的拜倫的頂峰之作、兩萬行長的敘事詩《唐璜》，那些人又以「譯者有嚴重歷史問題」為藉口，跳出來橫加阻撓。與良為平反之事奔波，仍然遭到抵制。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平反冤假錯案已在全國落實，我在天津見到與良，才得知經過一言難盡的曲折，南開黨委迫於形勢終於勉強推翻「反革命」的誣陷。又等了整整兩年，南開才在天津烈士陵園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離詩人含恨棄世將近五年了。在他最後的日子裏，詩人曾對朋友說過：「歷史可能有這樣的誤會，才華橫溢的人也許終生默默無聞，一些不學無術的笨伯反而喧赫一時，而且顯得煞有介事似的。」穆旦的坎坷半生何止是默默無聞而已！

遺著的出版繼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所謂「歷史問題」被推翻之後，一九八零年七月，良錚當年在「監督勞動」之餘嘔心瀝血翻譯的《唐璜》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立即成為公認的文學翻譯的經典巨著。後來，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安葬時，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一九八一年，南京譯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錚死前精心修訂過的《普希金抒情詩集》兩大卷（一九五四年上海初版）。五年之後，一本《穆旦詩選》，幾經周折，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只選五十九首。如今，又過了十年，在詩人逝世二十週年前夕，一部《穆旦詩全集》終於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在北京發行了。這部詩集收錄詩人從中學時代的「少作」到悴然逝世前的殘稿，共

一百五十餘篇。正如編者所說：「正是這樣一部由『抹去詩與生命之界』的『殉道者』用超絕的詩藝與堅韌的生命熔鑄成的《詩全集》，在現代詩史上留下了一座卓異的里程碑。」

《全集》中最動人的是一九七六年寫的二十七首詩。澎湃的詩情在被迫噤若寒蟬二十年之後，竟又在短促的最後一年中再現輝煌，宛如漫天陰霾之後的晚霞夕照，令人為之目眩，幾乎是一個奇跡。穆旦的晚年是十分寂寞的，正如汪曾祺早在一九四七年讀過穆旦詩集後就慨乎言之的：「詩人是寂寞的，千古如斯！」半生的追求、無盡的苦難、深沉的幻滅，都升華為爐火純青的對生命的詠嘆。

《智慧之歌》哀嘆「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愛情消逝，友誼被「生活的冷風鑄為實際」，「迷人的理想終於成笑談」，剩下的只有日常生活的痛苦，詩人只能直面慘淡的人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
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
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

《沉沒》絕望地驚呼「身體一天天墜入物質的深淵」：

愛憎、情誼、職位、蛛網的勞作，
都曾使我堅強地生活於其中，
而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宮。

《全集》的壓卷之作是那年十二月寫的《冬》，四章六十四行，唱出了「人生本來是一個嚴酷的冬天」的哀歌，淒婉欲絕，仿佛是不幸的天才詩人為自己作的墓誌銘。

《穆旦詩全集》的出版，確是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遺憾的是，穆旦在十年浩劫期間，冒殺頭的危險寫下的敘事長詩《父與女》尚未收入。全詩八十一節，每節八行，共八千餘言，這是穆旦唯一的一首敘事詩，也是中國現代詩史上獨一無二的絕唱。故事的主人公王侖是北京一所中學的老師，他全心全意擁護黨，忘我地工作，虔誠地改造思想。他的女兒初中畢業時響應黨的號召，奔赴最艱苦的大西北，加入一個兵團建設邊疆，他也感到光榮。誰料到，天真幼稚的姑娘竟慘遭兵團的領導殺害，還被誣陷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王侖慘遭喪女之痛，上告伸冤又無人理會。文革中反因此受到殘酷迫害，被定為暗藏的特務。及至後來特嫌取消，他已神經失常，

當不了教師，只能在傳達室當一名勤務員，經常被學生戲弄。這樣的故事在那個紅彤彤的時代，一點也不特殊，卻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詩人立足現代歷史的高度，把父與女這兩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放在廣闊的社會和意識形態背景上，演出一場現實而荒誕的悲劇，從而以睿智的洞察和無情的嘲諷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譜寫了一曲嚴峻的挽歌。多麼希望這部發人深省的杰作早日「解除管制」，不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讓人們讀到一部更名副其實的《穆旦詩全集》。

後記：這篇舊作寫於五年前，《父與女》至今仍未與讀者見面，而穆旦夫人周與良教授已於今年五月在美病逝，不亦悲乎！

《邊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頂峰--紀念沈從文逝世十三週年

一九九八年，紐約藍燈書屋負責編選世界文學經典的「現代文庫」編委會選出二十世紀最佳英語小說一百部，高居榜首的是愛爾蘭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 （James_Joyce）的劃時代巨著 Ulysses（《尤里西斯》）,其次便是美國小說家弗?斯各脫?菲茨杰拉德（F._Scott_Fitzgerald）所著
The_Great_Gatsby_(《了不起的蓋茨比》）。在美國二十世紀小說中，《蓋茨比》自然就是首選了。《蓋茨比》篇幅不長，與《尤里西斯》相比，仿佛是個「侏儒」，膺此殊榮，自然引起評論界議論紛紛，為諸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叫屈。好在自由世界文學評論中，歷來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代文庫」的評論，並非「一花獨放」，從此確立了這一百部小說在文學史上的定位。但是，這至少不失為一家之言，而且也並非「空穴來風」。

《蓋茨比》一九二五年四月在紐約出版。那個期間，德萊塞已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長篇巨著，同年又推出了他的代表作《美國的悲劇》。著名詩人兼文學評論家艾略特卻立即宣稱《蓋茨比》為「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斯以來邁出的第一步」。海明威也給予極高的評價。但是，這部杰作並沒有給作者帶來他追求的名和利。直到一九四零年，他貧病交迫、溘然長逝後，《蓋茨比》才逐漸成為美國大學和中學英文課的必讀書，今日則更是家喻戶曉的美國文學經典了。

我不禁自問，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哪一部是和《蓋茨比》旗鼓相當的首選？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挑肥揀瘦，我就認定了沈從文的《邊城》。

《邊城》於一九三四年出版，篇幅不長，和同時代的長篇巨著諸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駱駝祥子》相比，也只能算個「侏儒」。這個「侏儒」卻激怒了一些搞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史的大人物。他們大張撻伐。怒斥《邊城》沒有寫階級斗爭，「掏空了人物的階級屬性」，它寫的是一個「世外桃源」，脫離現實生活。及至階級斗爭成為中國人民炫ｃ肉的主宰，《邊城》和它的作者也就都從中國文壇和現代中國文學史消失了。沈從文全部著作的紙型都被出

版社銷毀，存書也都化作了紙漿。

無獨有偶，《了不起的蓋茨比》受我連累在「新中國」竟也有類似的命運。一九五一年夏，我從美國應聘回國到燕京大學任教，行囊中有那部小說的一個簡裝本，到校後被班上一個學生借去了。時隔不久，趕上「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輪到我檢討挨批時，沒料到這竟成了我「販賣腐朽美帝黃色作品，腐蝕新中國青年」的罪行。這個黑鍋我背了整整三十年。

我是在六十年前初識《邊城》和它的作者的。當時抗日烽火連天，我作為流亡學生進入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沈老師是中文系教授，我是外文系的新生，從未上過他的課。也許是緣份吧，我們終究相識了。我愛上了《邊城》，也許真的是在其中找到了「世外桃源」，可以暫時逃避痛苦的現實吧。我愛上了它的作者，他那淳樸的湖南口音仿佛和那邊城的溪流一樣清澈見底。

可是，《邊城》真正進入我的人生卻是十多年以後的事，一九五八年我中了「陽謀」的暗算，遠戍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在眾多的難友之中，有一個姓鄧的青年人曾在北京師大受教於沈公，而且囚囊中還帶有幾本他的著作，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導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從文的作品，特別是《邊城》，有時竟然忘了飢餓和疲勞。每逢歇兩、三周一次的「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打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本又破又黑的《邊城》，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一章接一章朗讀。我終於明白了沈從文那淳樸的聲音為什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地，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一條小溪的渡口、一只方頭渡船、一座白色小塔、一間茅屋，這便是翠翠和爺爺的整個世界。這裏沒有「大觀園」令人眼花繚亂的榮華富貴、珠光寶氣，但有的是湘西的山光水色和大自然的兒女：

翠翠在風日裏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和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

這個無父無母的孤雛唯性靈是從，她的愛情像家門口溪水一樣的純淨，不含任何世俗利害的渣滓。小說寫的不僅是翠翠對二老的鍾情，也寫了翠翠和爺爺之間相依為命、生死不渝的愛心，寫了大老和二老兄弟倆對翠翠的情愛，寫了老船夫死後楊馬兵和船總順順不顧喪子之痛對孤苦伶仃的翠翠的關愛。貫穿小說的是這個小城的小人物對人、對生活、對美的淳樸的熱愛。

風雪北大荒，我更愛《邊城》了。它塑造的並不是一個「世外桃源」，它譜寫的並不是一篇牧歌式的「鄉土文學」。它寫的不過是幾個小而又小的人物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它那充滿人性溫暖的世界和眼前掏空了人性的荒原相比，何止天壤之別！

一九三四年一月湘行途中，沈從文在給年青的妻子的一封家書裏含淚寫道：

我因為天氣太好了一點，故站在船後艙看了許久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中得到了許多智慧。……我心中似乎毫無甚麼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麼愛著，十分溫暖地愛著！……我看了小小漁船，載了它的黑色鸕鶿向下流緩緩划去，看到石灘上拉船人的姿勢，我皆異常感動且異常愛他們。……我希望活得長一點，同時把生活完全發展到我這份工作上來。我會用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像看得太深太遠，對於我自己，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

《邊城》是在同年四月十九日完成的，作者對世界、對人類的無限深情正是這部小說的靈魂。

一九八零年，我作為「改正右派」重返京城任教，《邊城》和它的作者也成了「出土文物」。更令人啞然失笑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麾下的《世界文學》偏偏找到我翻譯《了不起的蓋茨比》！事隔多年，九八年秋回國，見到坊間竟有京、滬、寧三家出版社重印的我的舊譯！在沈師母家中，也見到台灣新出版的裝幀精美的《邊城》。看來偉大作品「涓涓細流」的聲音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

重讀《邊城》不禁驚嘆它的總體結構典範地實現了作者的

創作理想：

這世界上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的理想建築。這廟裏供奉的是「人性」。

《邊城》正是這樣一座希臘小廟，與《了不起的蓋茨比》不謀而合，不過《蓋茨比》歌唱的是「美國夢」經久不衰的魅力，而《邊城》最完整地體現了作者要表現的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所寫的那種生活並不是小說家的虛構，而是確確實實存在過，後來雖然幾乎不復存在，但是我們並沒有理由唾棄這種順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邊城》用牧歌式的素材譜寫了這一美好人生形式的《田園交響樂》，永遠以它那獨特的節奏和音樂激勵著一切善良的人們對美和愛的渴求。

著名文藝理論批評家朱光潛在一九八二年為沈從文選集《鳳凰》所作的序文中說：「從文不是一個平反的作家，在世界文學史上終會有他的一席地。」美國的沈從文研究專家金介甫（Jeffrey_C._Kinkley）在其所著《沈從文傳》中寫道：「總有一天會對沈從文作出公正評價：把沈從文、福樓拜、斯特恩、普魯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愛即受難：論《呼嘯山莊》

《呼嘯山莊》(Wuthering_Heights)是艾米莉?勃朗特唯一的小說，這本小說出版一年後她就死了，享年僅二十九歲。她短暫的一生跟她這本杰作一樣，被認為是個難解的謎。

艾米莉?勃朗特（Emily_Bronte）生於一八一八年，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她父親是一位愛爾蘭鄉村牧師，母親體弱多病。她兩歲時，全家搬遷到約克郡沼澤地，在豪渥斯村的牧師寓所居住，當時六個孩子之中最大的只有七歲。遷居後不久，母親就因癌症逝世。母親的妹妹伊莉莎白前來參與葬禮，從此留下來照看亡姐幼小的遺孤。但是孩子們並沒有從姨母或父親那里得到什麼親情。他們自成一個世界，為他們的玩具兵幻想各種冒險。於是艾米莉和妹妹安茵花了幾年時間，用蠅頭小字在小冊子上創造了一個有關岡達爾島的長篇傳奇故事。她們自己也在沼澤地裏進行真實的冒險，沼澤地圍繞著山村豪渥斯伸展開去，方圓二十英里，這些冒險無疑地也促進了她們編造故事。艾米莉當過短期的小學教師和家庭教師，一八四二年底回到豪渥斯家中，度過她短暫的一生的餘年。

一八四五年，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發現了她寫的詩，第二年就把這些詩連同她本人和安茵的詩結集出版，取名《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頓?貝爾詩集》，其中「埃利斯」（即艾米莉）的詩使作者躋身于十九世紀最具獨創性的詩人之列。

《呼嘯山莊》寫於一八四五年十月至一八四六年六月，一八四七年出版，受到批評界的冷嘲熱諷。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作者因久患肺結核不治而與世長辭。夏洛蒂回憶妹妹臨終前的情景：「日復一日，我看著她以何等的勇氣面對痛苦，滿心感到既驚異又憐愛的悲痛之情。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事情；確實，我從沒見過在任何方面可以與她比擬的人。比男人更堅強，比孩子更單純，她的性格是獨一無二的。」

正是她無可比擬的性格造就了一部無可比擬的小說。小說的中心情節圍繞著希刺克厲夫與凱瑟琳之間獨一無二的關係展開：從結合到分手，又從分手到在死亡中團圓。

故事從希刺克厲夫來到呼嘯山莊開始。他是個流浪兒，由恩蕭先生從利物浦街頭帶回家，並把他當做自家孩子一樣撫養。他和恩蕭的女兒凱蒂相好，而父親對那個棄兒的疼愛卻引

起他的兒子辛德雷的嫉妒。父親早死，辛德雷成了一家之主，便對希刺克厲夫百般凌辱，把他貶為農場苦工，然而凱瑟琳對希刺克厲夫仍一往情深。不料，她偶然結識了鄰近的畫眉山莊年輕的主人埃德加・林惇，為他的翩翩風度和社會地位所吸引。後來，希刺克厲夫無意中聽到她宣稱不可能下嫁給他，一怒之下便不告而別。一別三年，他不知怎的發了財回來，卻發現她已嫁給了埃德加，但並無生趣。凱蒂的變心使他怒火中燒，常常暴跳如雷，使得後悔莫及的凱蒂求生不能，傷心欲絕，抑鬱而終。塵世的分離既已完結，希刺克厲夫渴望報仇，一心要毀掉兩戶人家。然而惡魔般的復仇欲既沒有為他帶來滿足，也沒有為他帶來安寧。只有對死去的凱蒂的記憶驅使著他，他懷著要與死者的精神團圓的情結，最終以執意的絕食完成宿願。

這個奇異的故事無疑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悲劇愛情故事之一，堪與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雪芹的《紅樓夢》媲美。然而，也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差別。這兩部中、俄文學的經典都是以珠光寶氣、多姿多彩的上流社會生活作背景的，而希刺克厲夫和凱瑟琳的生死悲劇則是在英格蘭北部荒涼的沼澤地「大翻騰」的背景下上演的。這個「永恆」愛情的故事，剔除所有外在的裝飾，以它自身超越世俗的獨特感情力量和強度來震撼讀者的心灵，但是，它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它還是人類異化的一個悲劇。在希刺克厲夫的傳奇生涯開始時，他是「一個骯髒、衣衫襤褸的黑髮孩子，一個無家可歸的吉卜賽棄兒:一個最典型的自然之子」。一旦被塞進「人類」社會中，他那天真無邪的本性便開始被仇恨的力量所扭曲，而正是仇恨的力量將山莊變成一個「每個人的手都與他的鄰人為敵」的場所。盡管如此，他也許仍有可能忍受這一切並維持他做人的尊嚴，若不是他發現那跟自己生命一樣寶貴的唯一愛人變心拋棄了他。一旦這個愛情在今世無可挽救，希刺克厲夫的徹底異化過程便無可挽回地注定要走到天使般純潔無瑕的對立面才會收場，也即變成一個「撒謊的惡魔，一個鬼怪，而不是一個人。」

然而最重要的是，這部小說是一個無與倫比的最真實意義上的悲劇，因為他刻繪了一個高貴的人類心靈承受最深刻苦难的戲劇和景象。希刺克厲夫是一種特殊的「高貴的野蠻人」，而他作為一個悲劇男主角的高貴則來自他的心靈對痛苦的巨大承受力。林惇也受難（以世俗的觀點看是無辜的），凱瑟琳也

受難（主要是因為她背叛她真實的自己），但這部小說的情感焦點，卻是那把男主角的心靈變成一座活生生的地獄的漫長受難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則這部備受爭議的「神秘」小說的各方面和各部分就都一下子變得明白曉暢和令人贊嘆了。

為什麼小說以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開頭？無他，就是要從一開始就準確無誤地為男主角承受煎熬的心靈打下基調。希刺克厲夫那令人難以釋懷的呼喊聲「凱蒂，進來！凱蒂，進來啊！」回蕩在整個故事中。就連平庸的城市花花公子洛克烏德也受到震撼，「伴隨這語無倫次的狂呼涌來的悲傷包含著如此巨大的痛苦，惻隱之心使我寬容其中的愚蠢。」為一齣受盡苦難的心靈的感人悲劇，舞台布置好了。

有一個使某些批評家和讀者困惑不解甚至反感的情節，是希刺克厲夫「惡魔似的」復仇欲望，這種復仇欲使他墮入陰謀和凶殘的淵藪，坑害別人，而受害者多半是無辜的。連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也覺得需要為這種「不道德」道歉，並把「一意孤行，死不改悔的」希刺克厲夫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但是，對希刺克厲夫來說，自始至終愛就是受難。凱蒂死後發生的事情只是前面已發生的事情的繼續強化而已。因此，倘若我們站得比夏洛蒂的「基督教道德」或諸如此類的觀點高一些，我們也許可以看到並感到，希刺克厲夫的所有的暴虐行徑無非是他那飽受煎熬的心靈激蕩不安的恐怖徵兆。希刺克厲夫歸根到底是一個傲視侏儒世界的巨人，而他靈魂受難的悲劇則是對人類精神最崇高的敬意。

（黃燦然譯自英文原著）

《白鯨》的威力無窮

一百五十年前，美國小說家赫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一八一九年 - 一八九一年）的長篇小說《白鯨》(Moby_Dick)在倫敦和紐約出版，受到大西洋兩岸書評家們的冷嘲熱諷，到作者去世時已無人問津。直到二十世紀中葉，這部巨著才逐漸被公認為世界文學的經典。今年冬，美國各地舉行多種活動，隆重紀念《白鯨》問世一百五十週年。

十九世紀上半葉，美國是捕鯨大國，作為燃料的鯨油生產是主要企業之一。遠洋捕鯨也是充滿浪漫色彩的冒險活動。麥爾維爾二十歲開始航海生涯，先後在一艘又一艘捕鯨船上當水手，並走遍了南太平洋上諸島，寫出一部又一部富有異國風情的冒險記和小說，受到讀者歡迎。而這部出類拔萃的新著的遭遇卻適得其反，因而使作者的晚年生活抑鬱寡歡。

那末，《白鯨》到底是怎樣一部作品呢？

在捕鯨故事的層次上，《白鯨》寫的是一名年近花甲的船長追捕一頭碩大無朋的白鯨的戰斗。艾赫布船長在一次與「白鯨」的搏斗中被咬掉一條腿，便下定決心要追捕這頭海中怪獸。於是，在下一次出海時，雖然他的使命是去為船主捕殺鯨魚獲取魚油，艾赫布卻說服全體船員跟隨他飄洋過海，追捕這頭「白鯨」，不獲元凶，誓不罷休。在茫茫大海上經年累月聚集了大量鯨魚油之後，他仍拒絕返航，終于找到了那頭「白鯨」。在他的指揮下，三十名船員，經過三天的戰斗，濁浪滔天，船毀人亡，最後艾赫布也與「白鯨」同歸于盡。全船只有一人死裏逃生，才追敘了這個故事。

但是，不管這場追捕海中怪獸的戰斗如何離奇曲折、動魄驚心，它不過提供一個雄偉壯觀的舞台，在這個舞台上演出主人公旎畔茈ｙ的悲劇。艾赫布不是一名普通的船長，他是一個「不信神的、神一般的」偉大悲劇主角。他的一條腿被「白鯨」奪去固然使他感到無比的悲憤，但是他的追求並不僅是為了復仇，為了向一頭「不會說話的畜生」討還血債。

他認為他的對手不只是一條大鯨魚，而是一個龐大的「面具」，背後隱藏著高深莫測的神秘。為了探索這個神秘，他必須不顧一切去刺穿這個面具，挑戰宇宙中邪惡力量的源泉。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天地的不仁、邪惡的禍害、人世的無常、

真理的難以捉摸，如此等等，折磨著他的靈魂，日以繼夜，椎心泣血。悲愴的獨白傾訴他靈魂的受難，洶涌的海濤正是他靈魂受難的寫照。

在和「白鯨」殊死搏斗的前夕，艾赫布回顧四十年來的海上生涯，長年漂泊天涯海角，離群索居，不禁百感交集，撫心自問：是什麼無名的神秘力量驅使他違反自己的天性投入這場慘絕人寰的決斗？他領悟到：「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就像起錨機一樣被轉來轉去，命運就是那根推桿。」

那天太平洋上風和日麗，「空氣清新，仿佛是從一片遠方的草地上吹過來的；他們一直在安底斯山坡下什麼地方製乾草哩，割草的人們正在新割的乾草中睡覺。睡覺？是啊，不管我們如何苦幹，我們最後都得在地裏睡下。睡下？是啊，並在那碧綠中腐爛。」

《白鯨》是一部無與倫比的捕鯨故事，也幾乎是一部鯨類學的百科全書。作為一部震撼心靈的悲劇，《白鯨》又足可與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里爾王》媲美。不僅如此，深奧的哲學、神學論述和思辨俯拾皆是，既是主角悲劇性格的有機組成部份，又擴展全書的思想境界。內容如此豐富的一部奇書，當年曲高和寡，也就不足為奇了。

無獨有偶，《白鯨》出版前四年，英國作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_Bronte)的小說《呼嘯山莊》（Wuthering_Heights)也在倫敦問世，同樣受到批評界的冷落，後來也逐漸進入世界文學經典之列。

《草葉》常青-緬懷現代詩歌先驅惠特曼

一

今年四月，為了激發大眾對詩歌的興趣，美國詩人學院主辦「全國詩歌月」。提到美國詩歌，人們自然會緬懷新大陸現代詩歌的先驅、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惠特曼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生在紐約長島西山村。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兩人都是半文盲。他們共有九個子女，生活清苦。惠特曼四歲時，隨父母遷居紐約市布魯克林區。這個五方雜處、生機勃勃的社區，對他的成長和詩歌創作有深遠的影響。

小學畢業後，他就到印刷廠當學徒，四年期滿後當上印刷工人。後來當過小學教師、木匠、報刊編輯，自己也辦過小報，發表過詩文、小說。內戰期間，在華盛頓陸軍醫院當義工，熱情地投入救死扶傷。

戰後為了謀生，一八六五年起先後在聯邦政府內務部和司法部當一名小公務員。一八七三年中風，右臂右腿癱瘓。一八七四年退休後，遷居新澤西州坎姆敦市，在自置的簡陋小屋中度過貧病交迫的晚年，幸有兩位友人照顧。一八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棄世，結束了坎坷的一生，安葬在當地哈來公墓。

一八五五年，《草葉集》在紐約問世，這是惠特曼自己設計，自己印刷的。全書僅九十五頁，包括《自我之歌》等十二首詩，其後三、四十年間，經過不斷修訂、擴充，先後再版八次，到一八九二年「臨終版」面世，《草葉集》已經成為四百三十八頁的皇皇巨著。

《草葉集》初版問世後，當時美國文壇盟主愛默生，在寫給作者的信中，熱情贊揚這本小詩集是「美國至今所貢獻的最非凡的一部富有文才和智慧的作品」。《草葉集》吹響了新大陸詩歌新紀元的號角！它不是象牙之塔的產物，也不是舊大陸文藝經典的回響。

從內容到形式，《草葉集》都是一場革命、一部獨創的、地地道道的美國詩篇。它既有長島鄉村的土色土香，又有布魯克林五光十色的都市風情，它呼吸著一個嶄新的民主國家千千萬萬、普通男男女女的喜怒哀樂和嶄新的憧憬。它創造了不受格律約束的自由詩，和讓人耳目一新、變化多端的語言風格，揮灑自如地表達新現實、新思想、新感情。

一八六七年的第四版卷首新添了一首《題詞》，集中體現了《草葉集》的主題思想：

我歌唱一個人自己，一個平常的單個的人
可是說出「民主的」這個詞，「全體的」這個詞。

我歌唱他的身體從頭到腳，
我歌唱他的面貌和大腦，
我歌唱男的，同樣歌唱女的。

我歌唱激情、脈搏、力量中的生命，
興高彩烈，從事按神聖的法則采取的自由的行動，
我歌唱「現代人」。

詩人熱愛綠草，把自己的詩篇比作草葉，因為無邊無際的綠草象征著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綿延不絕的芸芸眾生。他與眾人同在，他與綠草同在：

我把自己遺留給塵土，從我所愛的草長出來，
如果你想再要我，到你的鞋底上去找我。

惠特曼給人世留下的是一首前無古人的抒情史詩、一首偉大的美國民族史詩。美國現代詩人龐德（Ezra_Pound）說：「惠特曼就是美國。」《草葉集》為美國詩歌開拓了廣闊的前景，不僅直接激發了二十世紀著名美國詩人休斯（Langston Hughes）、威廉斯（William_Carlos_Williams）、金斯堡（Allen_Ginsberg）等人的成長，而且對世界各國現代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二

《草葉集》的核心、五十二節的長詩《自我之歌》，是美國長詩的經典。惠特曼認為理想的詩人是自我的歌手。他是一個「我」詩人。他從這首長詩的第一行就直截了當地唱出：「我贊美我自己，也歌唱我自己。」他自己是怎樣一個人呢？請看他的自畫像：

沃爾特?惠特曼，一個宇宙，曼哈頓的兒子，
騷動不安、肉體發達、情欲旺盛，吃、喝、生殖，
決不是故作多情的人，也不是高人一等、獨往獨來的人……
我信奉肉體和欲望，
看、聽、觸是奇跡，我的每一部分和標記也都是奇跡。
我從裏到外都是神性的，
我祝聖凡是我觸過的或被觸過的東西，
這些腋窩的芳香比禱告還美，
這個腦袋勝過教堂、經典、和所有的信條。

他怎樣贊美、怎樣歌唱自己呢？他說：

我是肉體的詩人，我也是旎甑脑婬耍?BR>　　天堂的歡樂與我同在，地獄的痛苦也與我同在，
前者我在自己身上嫁接繁殖，而後者我譯成另一種語言。

但是詩人的「我」並不僅僅是惠特曼一個人，而是所有的「我」。他說：「我包含芸芸眾生。」因此，詩人從靈魂深處唱出無數個「我」的肉體和靈魂的歌唱：

通過我，許多久遠的喑啞的聲音，
一代又一代的囚犯和奴隸的聲音，
病重的和絕望的、小偷和侏儒的聲音，
周而復始的準備和增長的聲音，
那些連接星球的細線、那些子宮和父根，、
那些受人踐踏的人們的權利，
那些畸形的、委鎖的、呆板的、愚蠢的、受鄙視的人，
空中的霧、滾動糞球的甲蟲的聲音。

通過我，被禁止的聲音、
性欲和色情的聲音、蒙上面紗的聲音，
我撕下面紗，淫猥的聲音經我淨化而升華。
我不把我手指捂在嘴上，
我保持下身像頭和心一樣純淨，
交媾對於我並不比死亡更蕪穢。

作為一個舊時代的叛逆，《自我之歌》的作者無所畏懼地宣告：「我在全世界的屋頂上面發出我野蠻的號叫。」今天，《自我之歌》仍然是一切「被禁止的聲音」、「囚犯和奴隸的聲音」的戰斗旗幟。

菲茨杰拉德顯灵

弗朗西斯・斯各脫・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一八九六年 - 一九四零年)的一生是短暫的，他的創作生涯充其量不過二十年，但他卻留下了四部長篇小說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說，使他成為二十世紀一位十分杰出的美國小說家。

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是美國小說的黃金時代，群星燦爛，各放異彩。德萊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長篇巨著，並且在一九二五年又發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國的悲劇》。同年四月，《了不起的蓋茨比》（The_Great_Gatsby）在紐約問世，著名詩人兼文藝評論家艾略特立刻稱之為「美國小說自亨利?詹姆斯以來邁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憶菲氏時寫道：「既然他能夠寫出像《了不起的蓋茨比》這樣的好書，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寫出更好的書。」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聞名的批評家，因此我們就不難領會這些評價的份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元氣未傷的美國進入了歷史上一個短暫的空前繁榮的時代。「美國夢」像一個在半空游蕩的彩色斑爛的大氣球，使一代美國人眼花繚亂，神魂顛倒。菲氏說過：「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會縱樂、最炫麗的時代，關於這個時代將大有可寫的。」他所大寫特寫的正是這個時代，並且將它命名命名為「爵士樂時代」，因此人們往往稱他為「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菲氏並不是一個旁觀的歷史家，他縱情參與了這個時代的酒食徵逐，也完全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現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 、生活氣息和感情節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緬其中的同時，他又能冷眼旁觀，體味「燈火闌珊，酒醒人散」的悵惘，用嚴峻的道德標準衡量一切，用淒婉的筆調抒寫了戰後「迷惘的一代」對於「美國夢」感到幻滅的悲哀，不妨說，《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爵士樂時代」的一曲挽歌，一個與德萊塞的代表作異曲同工的美國的悲劇。直到今天，《了不起的蓋茨比》還是美國一部家喻戶曉的經典。

我對菲茨杰拉德和他的作品並無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蓋茨比》卻有過一段陰差陽錯的「因緣」。

一九五一年夏，我應北京燕京大學之聘，從芝加哥大學回國任教。行李裏除了幾件舊衣服，一架手提打字機，主要都是

從讀大學到研究院積累下來的幾百本英文書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課，我教的是英語專業四年級兩門課。當時正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高潮，班上有些學生對我這個不遠萬里從「美帝」來歸的青年教授感到好奇，不時來串門兒聊天兒，也有借書看的。我生就一張沒遮攔的大嘴巴，聊起天兒來，天南地北，文學、政治，無所不談。至於借書，學生肯讀我就高興，想看甚麼自己到書架上去挑選，連招呼也不用打。

　　那是我教學生涯的開端，幾個月下來，雖然感到政治氣氛惱人，教學和生活大體上還是正常的，可是，好景不常，十二月間，「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在全國高等學府鑼鼓開場了。燕京是一所美國教會學校，理所當然被封為「美帝文化侵略的堡壘」，校長和教授們也順理成章當上「文化侵略的工具」。運動一打響，全校停課，中共北京市委派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斗爭矛頭先指向校長、院長、系主任，然後是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當眾作「自我批評」，還要接受學生批判，搞「人人過關」。一時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西語系以「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聞名，系主任和幾位老教授當著全系師生作檢討，個個把自己罵得一無是處，痛哭流涕，仿佛犯了甚麼滔天大罪。我雖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國後短短幾個月裏犯過甚麼錯眨　劭粗　移饺站粗氐那拜庢兊陌駱櫻
　涝诮匐 y 逃。輪到我上場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罵了一番，無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長期受資產階級教育、迷戀西方文學等等，滿以為可以過關。不料我的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二年級姓李的男生跳了起來，一開口就給我當頭一棒，罵我的檢討「浮皮潦草，避重就輕，談遠不談近」，嚇了我一大跳。接著，他一手舉起一本書，一手指著書的封皮，義正辭嚴地質問我：「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在談話中經常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我伸頭仔細一看，書的封皮上畫著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袖珍本 The_Great_Gatsby,是我班上一個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涼氣，心裏想：「我承認我的思想落後，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進垃圾堆，那還辦不到呢。」

　　我的「思想改造」有如逆水行舟，外部壓力越大，我越要求獨立思考，終於中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陽謀」的

暗算，打入了另冊，從此多年與西方文學絕緣。妻子受株連，顛沛流離，不管有多艱難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幾箱舊書當廢紙賣掉。「文革」浩劫臨頭，全家流放安徽農村，書遭了澇災。天一放晴，我倆把紙板箱一個一個打開，把書攤在茅屋門口晾曬，發現那本破舊的 The Great Gatsby 雖久經患難，卻有點不服老的神態。

「文革」過後，我重返北京任教，時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學》月刊編輯來信，要我盡快將 The_Great_Gatsby 譯成中文。簡直不可思議！「腐蝕新中國青年」的黑鍋，我背了將近三十年，怎麼偏偏會找到我來翻譯這本「下流壞書」？莫不是命運的嘲弄，還是菲茨杰拉德顯靈，責成我為他「平反」，還他一個公道？思前想後，我雖自感譯筆粗拙，難以重現他那優美的風格，卻又也無法回避這道義的召喚。

十年以後，我用英文寫了一本回憶錄，自然把這段公案寫了進去。書於九三年在美國出版後，陸續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紐約舞台和好萊塢銀幕上活躍過的女明星，她在來信中特別提到這個情節，接著寫道：

我認識他。三十年代期間，我是個演員，住在好萊塢一家名叫「真主花園」的旅館，許多來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員住在那兒。斯各脫?菲茨杰拉德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僅見。他那悲慘的處境刻劃在他臉上，流露在他聲音裏。我是在餐廳裏結識他的。那天

我一個人正在看雷格蒙的小說《農民》，有個人在我身旁彎下身子說：「你幹麼要看這本波蘭式的《亂世佳人》？我回答說：因為是我的朋友納特?福柏推薦的，我也非常愛看。」他聽了嗤地一笑，又搖搖頭，仿佛我無可救藥了。我問他：「那你推薦甚麼呢？」他說：「哦，最優秀的作家斯各脫?菲茨杰拉德的任何東西。

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仿佛《蓋茨比》的作者又一次顯靈，可惜「蕭條異代不同時」，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並沒到此為止。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有一座聖瑪利天主教堂，離我們在維州的住處不遠，這座小教堂建於一八一七年，建築古樸莊嚴。每逢主日，一位中國神父在那裏為華人教友做彌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裏望主

日彌撒。我送妻子進堂以後，獨自出來在陽光下漫步，心曠神怡。不知不覺間，逛入了教堂邊上的墓園，心裏默頌起英國詩人格雷的《墓園挽歌》，又感到無端的惆悵，神思恍惚。突如其來地，一個高大的身影從一塊墓碑前面冒了出來，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聲：「誰？」定神一看，原來是一位衣著整齊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氣。他沒理會我的問題，卻指著墓碑說：「最優秀的美國作家！」我低頭一看，毫無雕飾的石碑上刻著：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September 24,1896 -December 21, 1940
Zelda Sayre
July 24,1896 -March 10, 1948

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奇緣！四十四年前，他在萬里之外的異國和我一道蒙冤受難。今天，我無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萬里他鄉邂逅他的陰靈。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菲氏家族的幾座墓佔了其中一小塊地方，沒有樹木，沒有花草。這裏既沒有倫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詩人墓地的莊嚴肅穆，也沒有米蘭大教堂的瑰麗堂皇。想當初，一個不甘寂寞的金髮少年，夢想憑自己的錦繡才華，營造一座金碧輝煌的地上天堂，享盡人間賞心樂事。曾幾何時，貧病交迫，夢碎酒醒，他身不由己來到這個角落安息，和他的紅粉佳人分享一杯黃土和永恆的寂寞。墓園幾步之外就是一條大路，日日夜夜奔馳著川流不息的車輛，萬萬千千的匆匆過客中有幾人曾在這裏「解鞍稍駐征程」，低徊憑吊一下這位「美國夢」的化身和「爵士樂時代」的史詩大師？也罷，永遠擺脫了名韁利鎖，超越了生與死的魔難，菲茨杰拉德有福了，他將以他的不朽詩篇彪炳千秋。

時已正午，彌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躑躅，遠遠地喊道：「你不怕中中暑嗎？」我指著墓碑說：「又踫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詫異，走到墓碑跟前一看，笑著說：「這大概可說是陰魂不散吧。我望了一臺彌撒，你竟然又有一次『幽會』。明年是他的百年誕辰，咱們帶一束鮮花，來安慰他的英靈吧。」我又指著墓碑前地面上一塊碑石，上面鐫刻著《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最後一句：

於是我們奮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

德萊塞的短篇小說藝術

德萊塞（Theodore_Dreiser)發表過共約 40 個頗具特色的短篇小說，可惜由于他的長篇巨著在美國小說史上具有如此令人矚目的地位，以致人們往往忽視了他在短篇創作中的成就。

德萊塞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自由及其它》于一九一八年問世，後來《鎖鏈》與《女群像》又相繼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九年出版。當時，歐?亨利式的小說仍風糜美國，而德萊塞卻另闢蹊徑，以嚴格的現實主義為圭杲，寫出了一個又一個深刻感人的短篇。德萊塞從不追求離奇的情節，他的素材總是來自美國日常生活中的真情實事：普普通通的男女老少，瑣瑣碎碎的生活細節，平平凡凡的喜怒哀樂。乍一看，這些樸實的人物和情節彷佛是從美國一般人生活中信手拈來的，既沒有什麼令人拍拍案叫絕的戲劇性，更談不上什麼「詩情畫意」。加以德萊塞的文筆往往失之于單調呆板，這些短篇就不免缺乏引人入勝的表面文章。

問題在于：德萊塞短篇小說的旎晔鞘颤 N？它不是巧妙的構思，不是撲朔迷離的情節，不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更不是絢麗多姿的文采。在作家那些最優秀的短篇中，彌漫著一種悲天憫人的悲劇意識。展現在平淡無奇的表面情節下面的，是一顆顆善良靈魂的受難，一齣齣心靈舞台上的悲劇。

不幸的婚姻造成的悲劇是德萊塞短篇一個主要的主題，而《自由》則是一篇頗具典型意義的代表作。一位才華出眾的建築師偏偏娶了一個俗不可耐的妻子，她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榮華富貴」完全建立在丈夫的社會地位上面，卻又事事獨斷專行，全然不理會丈夫的人生追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他作出讓步，作出犧牲，終于讓他的生活為她所主宰，成為以她為化身的社會習俗勢力的奴隸。在「白首偕老」的溫文爾雅的假象下面，一顆善良、敏感、被禁錮的靈魂在孤寂的地獄裏經受著烈火的煎熬，憧憬著藍天白雲般的自由。無奈自由來時，日色已昏，自由也只能是一杯「自由地去死」的苦酒了！

在《婚後》中，一位天性活潑、又交遊廣闊的青年鋼琴家偏偏娶了一個與藝術和藝術家格格不入的愚美人。新婚燕爾，妻子就吵吵鬧鬧，哭哭啼啼，發動了一場馴服丈夫的戰斗。等待著他們的只能是沒有愛情的婚姻：「他將總是在安慰和哄

勸，而她將總是在哭泣和懊惱。」雙方都「已經開始體會到人生的悲劇、人生的平常、人生的悲哀和傷痛。」

《自由》和《婚後》都是從故事主人公的角度來寫不幸的婚姻，展現了善良、敏感的靈魂如何在習慣勢力的重壓下受難。《禮教》則是從一個敏銳的局外人的角度來寫一齣不幸的婚姻悲劇。一個風流倜儻的青年記者偏偏娶了一個面目可憎的黃臉婆，於是他又愛上了一個年青美貌的姑娘。不料事情敗露，輿論大嘩，女的蒙冤下獄，男的倒被禮教嚇破了膽，迫不及待地背棄戀人，和那陷害無辜的老婆言歸於好。

《第二對象》從擇偶的角度挖掘了不幸婚姻的主題，也是作家的短篇代表作之一。一個小家碧玉，善良而熱情，面臨著選擇對象的痛苦困境：她愛輕浮孟浪的亞瑟，卻為他所拋棄；她不愛忠厚遲鈍的巴敦，卻不得不強作歡顏準備嫁給他。等待著她的是千篇一律的小市民生活的俗套：生男育女，操持家務，沒有愛情，沒有賞心樂事。思前想後使她飲泣吞聲，在絕望的深淵中哀吟。

德萊塞善於選擇故事情節發展中的關鍵時刻，作為挖掘人物內心世界的突破口，前後呼應，層層深入，從而展示出一顆善良靈魂受難的悲劇。《自由》一開場，正值主人公的妻子臥病垂危，這個戲劇性的時刻觸動了主人公的萬千思緒，在心靈的舞台上重演了漫長的婚姻悲劇。作家讓他的主人公回憶起幾年來家庭生活中一件又一件平淡而傷心的瑣事，翻來復去，不厭其煩，不知不覺之中刻劃出這個痛感此生虛度的老藝術家的無可奈何、千回百轉的悲哀。將大量毫無戲劇性的細節匯集成一齣動人的戲劇，將平淡點化為神奇，這正是德萊塞短篇創作藝術的獨到之處。

《第二對象》也是這種藝術的一個範例。不僅如此，作家又在廣闊的社會畫面上，以向往愛情和美好生活的女主人公為中心，塑造了亞瑟和巴敦兩種對比鮮明的性格，以對一去不復返的短暫歡樂的回憶襯托出眼前的悲哀和未來的黑暗，從而使一個情節簡單的小故事成為一個發人深省的悲劇。

海明威傳奇-紀念海明威逝世四十週年

海明威（Ernest_Hemingway）是二十世紀美國最杰出的小說家之一。他的一生富於傳奇色彩，長達四十年的寫作生涯為人類留下多姿多彩的文學遺產。

一

海明威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在芝加哥遠郊的小城橡樹園，是家中的長子。父親是醫生，母親愛好繪畫和音樂。父親希望他繼承父業，母親則鼓勵他學音樂。但兒子上中學後即熱中於球類和拳擊等劇烈運動，又從小跟父親學會釣魚和打獵，對醫學和音樂都不感興趣。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海明威渴望應征參軍，但因左眼殘障體檢不合格。一九一八年四月，參加紅十字會義大利救護車團，奔赴義大利戰場，擔任救護車駕駛員。七月八日夜間，頭部和雙腿中炮彈受重傷，仍奮力搶救義軍傷員，因此被授予義大利銀星勛章。在米蘭住院治療半年期間，曾與一名美國女護士熱戀。作為美國歐戰中第一名傷員，他的事跡在國內得到廣泛報道。停戰後，一九一九年一月回到橡樹園，鄉親們把他看作舍生忘死的戰斗英雄，給予熱烈歡迎。

海明威的寫作生涯是從當記者開始的。他在高中時即愛好寫作，擔任學生報的編輯。一九一七年夏，高中畢業後，父母希望他進大學，他卻到堪薩斯城《明星報》（Kansas_City_Star）當見習記者六個月，學會了「用短句，用短導語，用有活力的英語」。一九一九年回家後，開始寫短篇小說，指望靠寫作為生。一九二零年起，為加拿大《多倫多明星報周刊》（Toronto_Star_Weekly）寫有人情味的新聞故事，頗有好評。

一九二一年，攜新婚的妻子哈德利（Hadley）前往巴黎，擔任該報駐歐洲記者。他遍遊各國首都，為《明星報》作特寫。在這個期間，一九二二年到君士坦丁堡采訪希臘土耳其戰爭，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到西班牙見識了斗牛文化。他崇尚斗牛士與危險和死亡周旋的大無畏精神，這個情結反映在他的小說中。他還出版過一部關於斗牛藝術的美學論文，《下午的死亡》（Death_in_the_Afternoon）。他同時繼續寫小說，作品

得到流寓巴黎的美國作家格特魯德·斯坦（Gertrude_Stein）和斯各脫·菲茨杰拉德（F._Scott_Fitzgerald）等人的贊賞。一九二七年離婚，與保琳（Pauline）結婚。一九二八年返美，定居佛羅里達州西礁（Key_West）,專門從事小說創作。

一九三六年夏，西班牙內戰爆發。一九三七年，海明威接受北美報紙聯盟（North America_Newspaper_Alliance）新聞社聘請，前往馬德里，報道西班牙內戰。兩年間，他四次從美國奔赴戰場，以滿腔熱情的報道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一九四零年，定居古巴。

一九四一年初，海明威又偕新婚的第三任夫人瑪莎（Martha）經香港前往中國大陸，兩人分別為紐約的《下午報》（PM）和科利爾（Collier ‘s）雜誌報道中國的抗日戰爭。三月，海明威夫婦到達華南第七戰區，跋山涉水到前線采訪，對中國軍隊的士氣留下了深刻印象。四月到重慶采訪蔣介石夫婦和其他領導人後，又飛往成都，親眼目睹八萬中國民工幾乎徒手修建可供美軍巨型轟炸機「空中堡壘」起降的機場，對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精神嘆為觀止。

一九四四年五月接受《科利爾》雜誌聘請，到歐洲戰場采訪。六月六日，正趕上盟軍向大陸德軍發動反攻，海明威竟能從一艘登陸艇上觀看盟軍部隊在法國登陸。六月下旬，又在倫敦隨同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飛臨敵軍目標上空執行戰斗任務。八月參加了解放巴黎的戰斗，並率先進駐以豪華著稱的里茲（Ritz）大飯店。一九四五年返回古巴，與瑪莎離婚後，和在倫敦結識的美國記者瑪麗（Mary）結婚。一九六零年，古巴「解放」，海明威返美，定居愛達荷州。

二

海明威的記者工作和戰爭經歷促進了他的小說創作。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也升起》（The_Sun_Also_Rises）的男主角是一個歐戰後在巴黎工作的年青美國記者，在歐洲戰場上受過傷，喪失性功能。他在巴黎和一個風流不羈、已離婚的英國少婦陷入熱戀，卻又無法結婚，只能眼睜睜看著情人投入她並不愛的男人的懷抱，兩人身心都感到痛苦不堪。想當年，他滿懷理想與希望投入戰爭，結果卻成了一場空前殘暴的骯髒戰爭的犧牲品。他的厄運正是戰後那一代感到幻滅、迷惘、無所適

從的青年人的寫照。小說是題獻給這個「迷惘的一代」（a_lost_generation）的，一九二六年在紐約出版，風行一時。二十六歲的海明威一舉成名，「迷惘的一代」也從此成為三、四十年代英美文學創作的熱門話題。

海明威長篇小說中流傳最廣的，要數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告別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和一九四零年出版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先後翻譯成為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外國文。《告別武器》以歐戰為背景，通過一個年青的美國軍官在義大利戰場上和一個英國護士的愛情悲劇，寫出人在戰爭形形色色的殘酷和荒誕中的受難。《戰地鐘聲》寫一個年青的美國西班牙語教師，來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的戰斗。在執行一個十分危險的炸橋任務的過程中，他的理想主義情操受到冷酷現實的挑戰，同時，一個天真無邪的西班牙少女的戀情卻增強了他對人的愛心。在這兩部小說中，作者把本人在兩次戰爭中的親身經歷，升華為戰火烈焰中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

除了長篇小說外。海明威還擅長短篇小說，一九三八年集結出版的四十九個短篇多為經典之作。一九五二年九月，《生活》雜誌全文刊載了他的新作，中篇小說《老人與海》（The_Old_Man_and_the_Sea），兩天之內銷售了五百三十萬冊，一九五三年獲普利策獎（Pulitzer_Prize）。一九五四年冬，海明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的小說以「前無古人」的思想和感情境界，為美國文學開拓了新的天地。在他的壓卷之作《老人與海》中，一個古巴老漁民出海幾天追捕一條巨大的大馬林魚的驚心動魄的戰斗，被他譜寫成一首人與自然力抗爭的史詩。據作者自述，在這個中篇定稿以前，他通讀修改過兩百遍。他還說：「許多作家自己會感到滿意的大塊文章，我琢磨成一粒極小的寶石。」他對《老人與海》的成就感到十分自豪：「這是我畢生追求的散文，簡單明了，看來短小，卻有可見世界和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這是我目前所能寫出的最好的散文。」這種「海明威風格」，乾淨利落，雄健有力，對英語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海明威體格魁梧，一向標榜雄赳赳、氣昂昂的男子漢氣概，胡須滿面，豪飲無度。年方三十，自稱「老爹」（Papa）。一旦名利雙收，他就放手追求他歷來向往的捕魚打

獵的生活，一九二八年到佛羅里達州西礁定居後，開始海洋捕魚。後來在古巴定居多年，經常下海捕撈幾百斤重的大馬林魚，並有捕魚記問世。一九三三年，偕第二任夫人保琳到東非洲遊獵兩個月，追殺獅子、豹、犀牛等猛獸，一九三五年發表遊獵記、《非洲的青山》（The_Green_Hills_of_Africa）.一九五三年八月，又偕第四任夫人瑪麗重返東非遊獵，長達六個月。一九五四年一月下旬，兩天之內，所乘的小飛機兩次失事，海明威身受重傷，但幸免於難。國際媒體卻迫不及待已將「遇難」的快訊向全球廣播。海明威大難不死，從醫院病床上瀏覽了一篇篇悼念文章，引以為樂。

不幸七年之後，砉鞯呢　某烧妗？赡苡伸扼ｗ力消耗過度，並多次負傷，又常年酗酒，終於為自殺性抑鬱症所害。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一代文豪在愛達荷州凱村（Ketchum）家中用心愛的獵槍自殺身亡，步了父親和弟弟的後塵，享年僅六十一歲。

斯坦貝克：小人物的歌手-紀念斯坦貝克誕生一百周年-

一

今年是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一九零二年 - 一九六八年）誕生一百週年。全國三十九個州，自二月起開展一百七十五項紀念活動，重溫他的文學成就。

一九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斯坦貝克出生于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市（Monterey）的一個小城鎮薩里納斯（Salinas）的普通人家。他從小愛好文學，中學畢業後在斯坦福大學斷斷續續讀了五年，選修文學創作課程，並沒拿到學位。三十年代，大蕭條帶來的社會問題叢生，社會抗議文學盛極一時。斯坦貝克一向同情受剝削的工人和失去了土地的農民，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勝負未決》(In Dubious Battle)是一部同情工人運動的「罷工小說」，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人鼠之間》（Of_Mice_and_Men）寫的是兩個農業季節工共同追求一個安定的「家」以失敗告終的故事。

在大蕭條期間，斯坦貝克前後有四個星期與季節工人一道長途跋涉，同甘共苦，行程達三百英里。他真正體驗了這些人的苦難生活，感到無比憤怒，結果寫出了《憤怒的葡萄》（The_Grapes_of_Wrath），一九三九年出版。《憤怒的葡萄》寫的是俄克拉何馬州一家農戶在塵暴乾旱（Dust_Bowl）的年頭顛沛流離的故事。約德（Joad）家連年顆粒無收，土地被銀行和大公司收買，一家三代老小十口，只得擠上一輛破舊卡車，遠行到加州去謀生，還有一位牧師同行。

一路上，艱苦備嘗，兩位老人先後死去。約德爸媽領著四男二女先後來到兩個季節工營地，可找不到工作，只得繼續西行，另覓生計。到了加州，他們由警察押著，在一個桃園裏打工。因為桃園主要把工人的工資削減一半，與約德家同行的牧師領導工人罷工，被老闆派來的打手殺害。二兒子湯姆?約德在盛怒之下，也打死了對方的凶手。但他從此只敢露宿在野外，不能參加工作。罷工失敗，約德一家從桃園逃走，到一個棉花地裏幹摘棉花的活兒糊口。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湯姆最終告別了媽媽，並表示要繼承牧師的遺志，到工人中去開展工人運動。

棉花摘完後，暴雨下了起來。女兒羅撒香即將分娩，但生下的是個死胎。雨稍停，媽媽決定另找個乾地安家，在一個谷倉裏安頓下來。不料媽媽發現屋角躺著一個五十來歲的男人，餓淂奄奄一息，而且不能進食，她就毫不猶豫地要女兒敞開懷，以奶汁救活了這個垂死的人。

《憤怒的葡萄》出版後，轟動全國，銷售量超過紅極一時的小說《飄》（Gone With_the_Wind）。加利福尼亞和俄克拉何馬兩州的行政當局、銀行界和果園主，卻紛紛指責小說歪曲了事實，甚至向法院提出控告。好萊塢和《生活》雜誌都為此作了實地調查，結果證明實際情況比小說中描述的有過之無不及。

《憤怒的葡萄》喚醒了美國的良心，評論界一致認為這是一部社會現實主義杰作，一九四零年獲普利策獎。一九六二年，斯坦貝克獲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九八年春，紐約藍登書屋負責編選世界文學經典的「現代文庫」（Modern_Library）編委會選出二十世紀最佳英語小說一百部，其中就有《憤怒的葡萄》。

斯坦貝克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莊嚴宣告：「作家有責任揭露我們許多沉痛的錯误，打撈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利於改善。」《憤怒的葡萄》正是這樣一部作品，也是美國大蕭條時期的一部史詩。作家直面錯誤和失敗，但毫不悲觀失望，卻「滿懷激情，相信人有可能達到完善。」

二

除了多部長篇小說以外，斯坦貝克還創作了數十個精湛的中、短篇小說，其中以《月亮下去了》和《珍珠》兩個中篇格外扣人心弦。

近幾十年來，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的小說、劇本、影片不知有多少，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戰爭結束以後才問世的。斯坦貝克的《月亮下去了》（The Moon Is Down）卻是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出版的。當時，大半個歐洲已在希特勒所向披靡的「閃電戰」之下淪陷了；在亞洲，日本侵略者也霸佔了大半個中國。人類正經歷著一個最黑暗的時刻。多少人憂心忡忡：天還會亮嗎？

斯坦貝克既不是什麼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也不是什麼有雄

才大略的軍事統帥。一九四一年，年方三十九歲的斯坦貝克不過是歐洲戰場的一名戰地記者，在那以前他曾寫過幾部歌唱小人物的小說。但是，他卻以這部小小的中篇，對這個與人類命運攸關的問題，作出了聲震寰宇的回答：月亮已經落下去了！

斯坦貝克是在戰場上寫戰爭的。可是，《月亮下去了》並沒有炮火連天的場面，也沒有沖鋒陷陣的英雄，更沒有扭轉乾坤的帝王將相。一個北歐小國的和平小城被納粹侵略軍佔領、蹂躪，對戰爭一竅不通的市民在市長的領導下奮起反抗，又在反抗中迅速成長。敵人焦頭爛額，要求市長合作鎮壓反抗，並以死亡相威脅，遭到市長義正辭嚴的駁斥：

人民不喜歡被征服，也永遠征服不了。自由的人們不可能發動戰爭，戰爭一旦打起來， 他們在失敗的情況下也能打下去。盲從的人們跟著一個領袖，做不到這一點，所以事情永遠是，盲從的人贏得戰役，自由的人贏得戰爭。

敵人無可奈何，悍然殺害了市長，卻陷入了進退維谷的泥沼。在最黑暗的時刻，這位青年作家看到了光明，看到了熱愛生活、熱愛自由的小人物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征服的。

中篇小說《珍珠》發表于一九四七年，被譽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文學創作中一顆璀燦的明珠。」在墨西哥的采珠業中心拉巴斯港，印第安青年漁民奇諾以采珍珠為生，他和妻子胡安娜一貧如洗，但兩人善良純樸，相親相愛。一天清早，他們頭生的嬰兒小狗子偶然被蠍子螫傷，有致命的危險。夫妻倆抱著愛子到白人醫生家去求醫，因為沒有錢被冷酷地拒絕了。他們只得抱著孩子到港口去，希望能采到一顆大珍珠，賣些錢救孩子的命。沒想到奇諾果真采到了一顆「稀世寶珠」。這時，孩子的傷已經被胡安娜用土法治好了。但是，寶珠在奇諾心裏喚起了各種美好的希望，同時也招來了城里一些貪婪的人們的妒忌和暗算。在敵人詭計多端的迫害下，奇諾一家被迫走上逃亡的道路，在崇山峻嶺中受到敵人夜以繼日的追捕。奇諾在自衛中殺死了一個敵人，但是愛子也遭到敵人的殺害。最後，奇諾和妻子從逃亡中回到家鄉，把寶珠扔回了大海。

這場血的洗禮給奇諾帶來了覺醒和成長，他終於大徹大悟了：一切美好的幻想都是無謂的，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也不過是一個幻影。「他們航過苦海到達了彼岸」，他們失去了一個舊

世界，現在他們倆肩並肩面對著生活的海洋，去迎接新的挑戰。《珍珠》不僅是奇諾一家真切感人的故事，它也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寓言。奇諾的榜樣鼓舞著世界上一切被剝削被欺凌的小人物，去尋找那顆真正無價的明珠-人民解放的真理。

斯坦貝克是平凡的小人物的歌手。在一個小小的舞台上，無論是一部破舊的汽車，還是一個北歐的小城鎮，還是一個墨西哥的漁村，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泰山壓頂的絕境中，演出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悲壯戲劇。今天，斯坦貝克滿懷激情的歌唱仍然鼓舞著一切為自由奮戰的小人物，「宣示和稱頌人類既有的心靈和精神的偉大能力，面對失敗氣餒的能力，勇敢、憐憫和愛的能力。」

《麥田捕手》的今昔

一九五一年，美國小說家塞林格（J.D._Salinger）發表了長篇小說、《麥田捕手》（The_Catcher_in_the_Rye），轟動美國文壇。五十年來，作者這部唯一的長篇小說，不僅在美國家喻戶曉，而且列入世界文學經典。

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紐約。主人公是一個大律師的兒子、十六歲的中學生霍爾登，他上的是賓夕法尼亞州一所專門為富家子弟效勞的私立寄宿學校。他既純真，敏感，又具有叛逆精神，對學校當局的清規戒律和弄虛作假感到格格不入。父母和親友指望他在學校名列前茅，將來名利雙收。他卻鄙視上流社會的唯利是圖和爾虞我詐，一心想逃脫他們的羅網。聖誕節假期前期末考試，他四門課不及格，被學校開除，他便趁此機會出走。

霍爾登乘火車來到紐約。在這個「荒原王國」裏遊蕩了兩天兩夜，他初嘗了成人世界的禁果：抽煙、喝酒、狎妓等等。但是，他並沒從中得到任何樂趣，卻感到這種生活的空虛無聊。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丑惡現象，人在這個世界裏喪失了人性的純真，道德敗壞。這一切使他陷入空前的迷惘困惑。起初，他提出要和一個並不瞭解他的姑娘私奔，到北方農村去過純淨的田園生活，遭到斷然拒絕。後來，他又想遠走高飛，到西部荒野地區過一個聾啞人的生活，那樣他就不必和別人講話了。

霍爾登最愛他十歲的妹妹菲比，她既天真純潔，又善解人意。霍爾登在遊蕩途中偷偷回到家中，向妹妹傾訴他的煩惱，妹妹深表同情，又問他長大後想幹甚麼。他回答說，他可不要當甚麼科學家或沒良心的律師，只想當「一個麥田裏的捕手」，獨自站在一大片麥田裏的懸崖旁守望。要是在麥田裏做遊戲的成千上萬的小孩子中有哪個往懸崖下跳，他就把把他捉住。他說：「我知道這有點異想天開，可是我真正喜歡幹的就是這個。」

他無法逃避現實，卻擁有這個美好的夢。最後，他精疲力竭，回到家中，被送進精神病院。故事就是一年後他在病院寫的回憶錄。

霍爾登力圖掙脫資產階級家庭和社會的價值觀的桎梏，從

而造成他年青的旎甋氖茈 y。他不僅道出了美國四十年代一代青少年的心聲，而且喚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鳴。這個「反英雄」成為青少年效法的楷模，甚至他愛穿的風衣、倒戴的紅色鴨嘴帽、和不乾不淨的俚語，都風行一時。正因為如此，小說也不斷受到捍衛正統的家長和學校的抨擊，但作為高中生必讀書的地位並未動搖。

近年來，霍爾登又面臨新的挑戰。由於學校日益重視多元文化教育，有些教師認為霍爾登不過是一個「特權階層白種男子」，他的故事「不能反映多元文化主義」，於是塞林格的經典著作就從一些高中教學大綱中除名了。但是，他們發現想找一部小說頂替《麥田捕手》卻十分困難。新近的調查研究表明，在多元文化學校，少數族裔的學生也熱烈地和霍爾登認同，因為他那充滿矛盾、斗爭、痛苦、和夢幻的成長歷程具有普遍意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塞林格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了質疑。當年他一舉成名之後，就實踐了霍爾登的夢想，躲到一個人跡罕至的村莊，過著神秘的隱遁生活，外界對他的真實面貌一無所知。他的女兒瑪格麗特新近出版了一部回憶錄、《夢的捕手》（Dream_Catcher）其中對她在父母身邊度過的童年作了詳盡的敘述。原來塞林格比霍爾登的父親更加獨斷專橫，不僅強迫妻子和兒女跟他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不得越雷池一步，而且後來又把女兒送進他本人和霍爾登都痛恨的私人寄宿學校。瑪格麗特記憶中的童年是「一個介於夢和夢魘之間的世界，它懸晃在我父母所編織的游絲般的細線上，如果我掉下去，可沒有堅實的地面捉住我。」

在現實生活中，霍爾登的創造者顯然不是一個以拯救孩子為己任的「麥田捕手」。

《梅岡城故事》的歷史地位

今年二月是美國的「黑人歷史月」，全國上下舉辦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回顧幾百年來黑人在美國歷史上的命運，進一步促進民權運動。半個世紀以來，文藝界在這方面作出了引人矚目的貢獻。在眾多寫黑人歷史的小說中，有一部是家喻戶曉、影響深遠的。

一九六零年，南方女作家哈珀?李（Nelle_Harper_Lee）發表了第一部也是唯一的小說、《梅岡城故事》（To_Kill_a_Mockingbird）。故事發生在三十年代種族主義最嚴重的南方阿拉巴馬州一個小市鎮，中心情節是黑人男子魯賓遜被誣告打傷並奸污一個十九歲的白人女子，法官指派白人律師芬奇為被告人辯護。陪審團全部是白人，審判結果早在意料之中。但律師為人正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開庭前就挺身而出保護關在獄中的被告，免遭白人暴民的私刑。審判過程中，他又在法庭上擺事實，講道理，義正辭嚴地揭穿了原告的謊言。原來是女方勾搭被告遭到拒絕，為了保全名聲，在流氓父親的唆使下反咬一口。

黑人照例被判死刑，後來越獄逃跑未遂，又被黑人烏合之眾死刑處死。罪惡的種族主義殘害一個善良無辜的人，就如同有人無緣無故去殺死一只美國南方常見的模仿鳥，這種鳥模仿其它鳥類的鳴聲惟妙惟肖，給人以樂趣。

當地持種族主義偏見的白人居民占統治地位。他們不僅肆意殘害黑人，而且仇恨律師的正義斗爭。芬奇本人和他的兩個小女兒都隨時隨地受到謾罵、威嚇、甚至暗殺。律師的小女兒斯各脫是個「假小子」，幼年喪母，由一個慈愛的黑人保姆照料。她從小性格倔強，從不理會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清規戒律。

從六歲到九歲，斯各脫飽經了這件冤案的風風雨雨。小小年紀，她既無成人的偏見，又有一顆敏感而正直的心欤　蚨軌蚩陀^而全面地洞察種族主義的禍害。長大後記憶猶新，痛定思痛，她深情地追述了這個故事。

《梅岡城故事》一九六零年出版後，遭到南方種族主義媒體的抨擊和學校的抵制，但在全國其它地方不脛而走，促使南方黑人的悲慘處境引起全國上下的同情，一九六一年四月獲普

利策文學獎。五、六十年代，美國黑人領袖小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風起雲涌，這部震聾發聵的小說有力地擴大了民權運動的聲勢。根據統計，到一九八二年為止，這部小說已銷售了一千五百萬冊，並翻譯成多種文字，又先後搬上舞台、銀幕、和電視。直到現在，它仍然是大多數中學英文課的必讀書。

　　四十年來，這部小說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美國人改變過去對黑人的成見，認識種族主義的危害，從而繼續發展民權運動。想當年，林肯總統會見《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_Tom‘s_Cabin）的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_Beecher_Stowe）時，曾稱頌這位瘦小的老太太為美國黑奴解放戰爭的偉大旗手。《梅岡城故事》的作者再次證明，一部杰出的文學作品在推動歷史前進的過程中可能發揮的偉大作用，並承先啟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白人和黑人小說家，其中包括曾獲得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女小說家托妮?莫里遜（Toni_Morrison），把幾百年來美國黑人的苦難史升華為感人肺腑的文學作品。

　　幾百年來黑人遭受的苦難，自然是美國歷史上極不光彩的篇章，莫里遜的名著《心愛的》（Beloved）是題獻給「六千多萬人」的，這個數字指的是從白人殖民主義者開始從非洲販賣黑奴以來被殘害的黑人的總數，這豈止是驚心動魄！盡管還有頑固不化的種族主義者死不認帳，但歷史事實畢竟是歷史事實。

　　與此同時，美國的明智之士，尤其是眾多優秀作家，敢於正視歷史，去偽存真，促進全國上下檢討過去，面對現實，堅持不懈地推動歷史車輪滾滾向前，致力於建成一個種族平等的社會。

美國的「離經叛道」文學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上興起一股反對上層社會遵循的傳統文化和道德規範的潮流，產生了一批「離經叛道」的文學作品，在文壇上獨樹一幟。五十年代出現的所謂「垮了的一代」運動（Beat_Movement)是一種社會和文化潮流，以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地放浪形骸的藝術家聚居的社區為中心。他們倡導通過毒品、爵士音樂、色情、禪宗戒律等等，獲得高度的感官知覺，從而達到個性解放、精神淨化和醒悟。詩人金斯堡（Allen_Ginsberg,_1926_to_1997)力圖使詩歌擺脫學院式的矯揉造作，「回到大街上」。他的長詩《吼》（Howl,_1956)體現「垮了的一代」在生活和藝術方面的憧憬。

運動的領袖人物凱如瓦（Jack_Kerouac,_1922_to_1969)倡導一種隨心所欲的寫作方式，由作家信筆寫下思想和感情，既無計劃，又不修改，藉以表達經驗的直接性。一九四七年,二十五歲的凱如瓦克作了一次橫穿美國大陸的旅行後，寫下了小說《在路上》（On_the_Road)。三年後，他用三個星期的時間，在一長捲連續不斷的白紙上打字改寫了《在路上》。故事圍繞著兩個典型的「垮了的一代」的小伙子五年中五次横穿美國大陸、追求感官刺激和精神解放的冒險，時時處處挑戰中產階級的清規戒律。一九五七年出版後，《在路上》風靡一時，影響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一九九八年春，紐約藍登書屋負責編選世界文學經典的「現代文庫」（Modern_Library)）編委會選出二十世紀最佳英語小說一百部，其中就有《在路上》。作者本人長期酗酒、吸毒，年僅四十七歲即與世長辭。

但是，「垮了的一代」後繼有人，六十年代泛濫的「反文化」思潮進一步反對主流的價值觀念和道德風尚。「反文化」的主角基塞（Ken Kesey, 1935-2001)

上大學時在退伍軍人醫院自願參加過一項實驗，接受 LSD 麻醉劑，從此堅信 LSD 有改變人的感覺的作用，可以用來超越理性的意識，達到更高水平的意識。後來到一家精神病院工作，采訪病人時本人先服用 LSD，藉以洞察精神病患者的改變

的感覺，為他的小說《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積累素材。

《飛越杜鵑窩》的故事圍繞著一家精神病院內精神病人和病院領導之間的明爭暗斗。負責管理病人的女護士長是從軍隊退伍的護士，她要求病人絕對「服從命令聽指揮」，若有叻妇褪┭噪娠菘撕湍 X 白質切除術，強迫就範。她平日唆使病人互相監視，檢舉揭發，並利用小組討論會，挑動群眾斗群眾，鞏固自己的權威。有的病人相信，病院實際上是一間閹割工廠，護士長聽命于一個扼殺個性的龐大「聯合企業」。新病人麥克墨菲（Randall_Patrick_McMurphy），三十五歲，一向蔑視權威，我行我素。韓戰期間，他曾在海軍陸戰隊立過戰功，但因違抗軍令被開除。後來又因吵架斗毆、賭博酗酒等等，屢教不改，被強行送來病院管束。面對護士長的淫威，麥克墨菲以身作則，鼓舞全體病人挑戰強加于他們的種種禁忌，為個人的權利和尊嚴起而抗爭，再接再厲，終于犧牲自己，解救了病友。

一九六二年《飛越杜鵑窩》出版後，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基塞成為「反文化」的英雄。一九七五年，小說拍成電影，轟動一時，曾獲得五項奧斯卡金獎。基塞本人卻因大肆鼓吹服用 LSD 毒品，一度被捕入獄。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日，基塞病逝俄勒岡州家中。「垮了的一代」和「反文化」運動雖已成為歷史，卻在美國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旗：憶良錚

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聰明，
帶著清晨來，隨黑夜而受苦，
你最會說出自由的歡欣。

--《旗》

五月下旬，袁可嘉兄從北京來劍橋訪問，異國相逢，一見面自然就問他從故鄉帶來了甚麼「故鄉事」。不料他劈口就說：「明年是良錚去世十週年，北京的朋友們準備出個紀念文集，你也寫一篇，十月集稿。」十年了？我不禁一驚。可不是嗎？一轉眼就十年了。

那是一九七七年春節前夕，當時我還困在蕪湖，下午照例到系辦公室去取郵件。有一封是從熟悉的「東村七十號」寄來的，可是筆跡卻不是良錚的，我不禁一驚。急忙拆開一看，誰料到會是良錚的小兒子報喪的信。事情太突然了，我感到眼前發黑。急急忙忙回到家裏，把信遞給怡楷，剛要開口已忍不住哭了出來。怡楷大吃一驚，問我怎麼回事。我示意讓她看信，她邊看邊哭。一轉眼就整整十年了。

我和良錚相識是比較晚的，怡楷則更晚一些。我們不敢妄稱良錚的「知己」。他的詩我們讀過的有限，毫無研究，更不敢附庸風雅。可是我們共過患難，前後時間不短，這卻是難忘的經歷。

早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在冬青文藝社的活動中和良錚有過一面之緣，大概是一九四零年的事。真正相識則是十年之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同學，當時我們都在英文系讀學位。良錚對學院式的研究並不重視，卻花了很多時間搞俄語和俄國文學。一九五零年，他和與良結婚以後，在大學附近賃了一套房子，多一間臥室，約我去住，這樣我們在一起生活達一年之久。窮學生在一起，雖然生活清苦一些，但茶餘飯後，談詩論文，兼及天下大事，自有一番情趣。

次年，我應燕京大學電聘，兼程回國，滿以為從此可以為人民作一點事。一九五三年，良錚和與良也懷著同樣的心情回國了。當時我在天津南開大學任教，校方因師資頗缺，聳恿我約他們二位來任教，我私心也希望有老朋友來作伴，於是他們

倆就慨然應聘了。

一九五四年，良錚和與良搬進東村七十號新居之後，和我們住處相距咫尺，過從自然就多了。良錚十分勤奮，除教學外，還孜孜不倦地翻譯俄文和英文作品，因此暇日也無多。良錚愛喝一杯，但從不過量，有時他特地騎車到官銀號一家老店去買一些醬牛肉之類的酒菜，捎來我家小飲。三杯兩盞下肚，海闊天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良錚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義執言，自然觸犯了某些人。及至「肅反運動」的風一刮起來，我們二人都「順理成章」地當上了「肅反對象」，開始嘗到了「言禍」的滋味，我們之間的咫尺竟然也成了天涯。折騰了半年多之後，總算暫時風平浪靜。我又被調回北京，良錚卻被留下了，從此度過了二十多個抑鬱寡歡的年頭。若是當年沒有我的一點私心作祟，良錚回國後二、三十年的生活和事業會不會另有一番天地呢？我往往為此感到黯然。

一九五七年，北京的早春天氣刮來了「和風細雨」，於無聲處響起了「鳴放」之聲。五月，良錚來京，到西苑來看望我們。晚飯後，我約了一位同事、良錚多年前熟識的一位詩人，在我的陋室內閑聊了一個晚上。良錚聽說我已在會上「鳴放」過，很不以為然。後來果真氣候驟變，「和風細雨」變成了「狂風暴雨」，沒料到那一晚的閑聊，經那位詩人同事檢舉揭發加工，也成了我的罪行。更沒料到，那竟是我和良錚的最後一面。良錚總算逃過了「言禍」，幸免於「右派」的棘冠。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平空扣在了一位萬里來歸的愛國詩人的頭上！

一九五八年，我被流放到北大荒之後，怡楷也受株連被分配到安徽去「支內」。她每回天津去探親必去東村七十號看望良錚，他每次都要詳細探問我在勞改農場的情況。一九六一年夏，我因患嚴重浮腫，奄奄一息，獲準「保外就醫」。從農場去合肥，路過天津，身為「賤民」，也只好過其門而不入，錯過了最後一面的機會。一九六二年夏，我在安徽當上了「臨時工」，一貧如洗的生活開始有了一點轉機。沒料到，時隔不久，有一個月工資失福　15.探 o 全家老小的生活造成了困難。我一籌莫展，只好發了個電報給良錚告急。他立即匯來數倍於我失竊的錢數，因為他知道我的老母親身患重病，而怡楷不久又要生產。「文化大革命」一來，我連「臨時工」也當不成了，全家大小被遣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當上了「不給出路的政策」的典型。良錚不知怎麼知道了我一家無

以為生的苦況，又匯來一畢錢，幫我們度過了難關。

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幫」覆沒以後，良錚十分振奮，信也多了。次年春節前不久，他來信說因腿傷要重新入院手術，等體力恢復以後一定要來安徽和我們同遊黃山。他說是個小手術，沒有甚麼可慮的，可又說起「大丈夫視死如歸……」，棄料竟成讖語！

良錚死後，正值文藝界開始復蘇，出版社著手出版良錚生前翻譯的《唐璜》等名著，可是那些多年來加害過他的宵小竟然繼續落井下石，多方阻撓。好在時代不同了，良錚的眾多譯著和他自己那些獨特的詩篇陸續和讀者見面了。

一九八一年，出版社重新出版良錚自己修訂過的《普希金抒情詩集》兩大卷，當時與良正在美國講學，我應出版社之囑寫了一篇簡短的前言。為了讓讀者瞭解良錚是在怎樣的歷史條件下嘔心瀝血翻譯和修訂一首又一首瑰麗的詩篇的，我說他當時「置榮辱於度外，視讒佞如糞土，長夜孤燈，潛心譯述」。沒料到，編輯同志心有余悸，大筆一揮，把前兩句話刪掉了。我覺得這兩句話是符合歷史真實的，應當還歷史以它的真面目。

「十年生死兩茫茫！」其實又何止十年，我和良錚訣別轉眼就整整三十年了。也好吧，這樣良錚給我留下的最後的印象仍是那個短暫的春天的夜晚談笑風生、才華橫溢的詩人，仿佛一面旗，如同他的名詩《旗》所歌唱的旗幟一樣，在腥風血雨中，在和風麗日中，永遠飄揚。

懷念燕卜遜

和同輩的中國研究英語的人不同，我沒有機會受教于威廉・燕卜遜（William Empson)。他是一九三七年從英國來北京大學教書的。就在這一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北平。於是全體教職員和學生一起向內地撤退，先到長沙，然後又轉移到昆明，和清華、南開合併，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燕卜遜和他的中國同事與學生一起，徒步跋涉，一直走到昆明。

一九三九年什一月我進入西南聯大唸一年級時，燕卜遜已經離開中國了。那時我聽見外文系高年級的同學和助教們熱烈討論一本書，有時爭得面紅耳赤，那本書的名字是Seven_Types_of_Ambiguity_(《七種含混形態》）。我偷偷查我的袖珍英漢字典，看看‘ambiguity’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但是根本不敢碰這本天書。

抗戰勝利後燕卜遜重返北大執教，我已去了美國，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學習現代文學批評理論。芝加哥學派的教授們標榜「新亞里士多德主義」，把燕卜遜那本被「新批評派」奉為圭臬的天書批淂一無是處。

直到一九五一年，我離開芝加哥大學回國後才有機會和燕卜遜見面。我的教學生涯是在燕京大學開始的，當時我的一位美國同事、青年講師葉瑪西(Marcelia Yeh)經常問起我在芝大學習的情況。當我告訴她芝加哥學派的批評家們認為「新批評派」並不高明，才知道她是「新批評派」祖宗燕卜遜的朋友和崇拜者。當時燕卜遜仍在北大任教，但不久就要回國了。

過了幾星期，葉瑪西受燕卜遜之託邀請我到他市內的寓所吃晚飯。我覺得十分榮幸，但心里也準備來一次「唇槍舌戰」。後來事實證明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天晚上，這位名重一時的文藝批評大師對於談論文藝理論和批評毫無興趣，盡管我一而再試圖和他交鋒也白搭。最後，我帶著一個新近歸依「新亞里士多德主義」的信徒的熱情，直截了當地問他，對于我的老師埃爾德・奧爾遜(Elder_Olson)教授猛烈批評他的新論文有什麼意見。我以為他一定會起而自辯，不料他只淡淡地

說了一句：「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我無話可說了，談話便由葉瑪西和一位年青的美國藝術家布朗先生接了過去，布朗是特別來幫忙張羅這頓晚餐的。

吃完了飯就上茶，燕卜遜問我要不要加糖或牛奶或兩者都要。我說都不要，因為我從小到大喝的就是什麼都不加的中國茶。但是他堅持說，英國茶如果不加牛奶和糖，那是根本不能喝的。我只好讓步，不過我心里納悶兒，他在茶之故鄉耽了那這麼多年，在這里有千百種異國情調的品種可供他挑選，為什麼還堅持那老一套。我暗自解嘲道，人，顯然是各有所好的。喝茶如此，文藝批評也不例外。

我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一直到三十二年後，我應英國文化委員會的邀請到了英國。一九八三年九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我經巴黎抵達倫敦。英國文化協會已經替我安排好，次日中午和韓奇瑞(Keith_Hunt)先生吃午飯，下午去拜訪威廉·燕卜遜爵士。韓奇瑞直到一年前還在北京英國大使館任文化參贊。那是我們初會，但談話輕松愉快，從一個中國話題跳到下一個。我感到他對北京和中國懷有一種明顯而輕快的依戀之情。最後他看了看手錶，馬上站了起來，說我已過了和燕卜遜爵士約會的時間了。他匆忙地把我拉出那家法國餐廳的門口，送上一部出租汽車，然後再跑回餐廳打電話給威廉爵士，向他道歉說我來晚了。

我到達漢普斯達山花園一號，按了「寫作小樓」的門鈴，使我詫異的竟是爵士親自開門迎我進去。那是我頭一天到倫敦，燕卜遜也是我在平頭老百姓生活中見到的頭一位「爵士」。事先我曾想象他有身穿制服的男僕和屈膝行禮的女佣。我眼前看到的卻是一個樣子非常普通，中等身材，頭髮灰白的老頭儿。他穿著襯衣，領子敞開著，沒有任何虛飾。威廉爵士很愉快地歡迎我，根本不理會我有點尷尬的抱歉話，然後把我帶進他那間到處都是書的大寫作室。這時我才覺得隨便些。

「告訴你，今天是我的生日，」他帶著孩子氣的喜悅告訴我。

「哎呀，我來湃這麼巧太好了，祝您壽比南山，燕卜遜教授，或者我該說威廉爵士！」

「不過今晚上沒有生日會，」聽上去他有點失望。

「我太太說，不在周末請客簡直是開玩笑。客人很早就要走的。這樣只好改在星期六了。」

過了一會儿，他提議到花園去坐。那天下午有太陽，很熱，但坐在樹蔭下很舒服。談話一開始，我就說自從葉瑪西那天晚上帶我到他在北京的家裏去見他，許多年過去了。他立刻就問我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命運怎麼樣。我說，自從一九五八年我被從北京放逐之後，就和她失去了聯係。但我聽說她的中國丈夫、一位杰出的科學家，死於非命，而她也回美國去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以很柔和的聲調問我，在那些動亂的歲月我本人的遭遇怎麼樣、北京大學有哪些變化、他以前的某個同事或學生怎么樣了。他那壓抑的聲調使我想起那首著名的唐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燕卜遜懷念的是一片遙遠的國土，他在那里度過一生中的錦繡年華，他的思鄉情結是有節制的，但幾乎是絕望的。他不斷地往我的酒杯里添法國白蘭地（還是蘇格蘭威士基？），而他自己只是呷幾口葡萄酒。這使我有點詫異，因為我聽到過一些關於他豪飲的逸事。後來我才聽說他動了唇癌手術後就不再喝烈性酒了。那一天，我果真注意到他嘴唇的動作有時候不自然，使他說話時帶上一種抑制的嘟噥的聲調。

他的兒子捧茶到花園來，我們的談話中斷了一會兒。這一次，給我什麼我便喝什麼_加糖加奶的英國式茶。我利用這個機會給這位大師照了幾張相片，他抱著貓坐在花園椅子上。最後我暗地看了一下手錶，我差點儿嚇了一跳。「天哪！已經六點了！我淂立刻走啦！」

「有別的約會嗎？和誰約好吃晚飯嗎？」

「沒有，沒有，」我否認道。「但是我已經佔了您太多時間了。英國文化協會那位制訂日程的官員告訴我，訪問不能超過一小時。」

「瞎說，」威廉爵士嘟噥著說。「咱們看看該怎麼辦。你在這裏坐一坐，我去打個電話。」

過了幾分鐘，他回到園子裏來。白髮的老教授像小孩似的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告訴我另一位英國文學教授要來和我們

一道去吃晚飯。幾分鐘後，他給我介紹新來的客人約翰‧威烈（John_Willey)，是一位研究布萊希特的專家，最近去過香港參加一個布萊希特會議。他想知道，為什麼中國不願在北京召開一個布萊希特會議。我一時答不上來，有點窘。但是燕卜遜不費力氣地替我解了圍，他開始復述我剛才告訴他的我這幾十年來的許多荒唐遭遇，幾乎一字不漏。他的記憶力使我大吃一驚，於是我更加相信以前聽到的一個故事一定是真實的。聽說一九三七年他撤出北京後，在長途跋涉當中，在一塊簡陋的黑板上，憑記憶把《哈姆雷特》全部寫了出來，逐行逐字，全無遺漏。我一時沉緬於回憶和欽佩的心情中，這時兩位教授正商量去附近哪一家餐館吃飯好些。

　　我們去了附近一家中國餐館，燕卜遜說是開張不久的。叫了什麼菜吃已經記不得了，不過我記得那餐館靠一面牆有大玻璃缸，裏面游來游去的五顏六色、大大小小的金魚使燕卜遜看淂入迷。他回憶起北京那些千百種金魚，還說那些金魚是放在大缸裏在公園裏供遊人觀賞的。我再次感到他對北京有一種眷戀之情，於是我問他是否打算不久要去北京訪問。

　　「不成，不成，恐怕這兩年我哪兒都去不了啦。我正在整理我的文稿。我今天已經七十八歲啦，你要知道。」

　　「那麼好，等您把文稿整理好了以後，」我緊追不放。「您可以回北京來，和許許多多門生故舊一道慶祝您的八十大壽。完全是為了懷舊，連講學也免了。您願意來嗎，燕卜遜教授？」

　　「不過我喜歡講學啊，」他輕輕地說。

　　他那簡單、毫不做作的話，他雖然已經付出了許多，卻仍然願意與人分享他文學批評的智慧的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

　　「好極啦，那就請您講學吧，燕卜遜教授。」我笑著說。

　　吃完飯後，燕卜遜說我們一定要跟他回家喝杯睡前酒。這時天色已晚了，但我怎麼能說不呢？於是我們又回到他的寫作室，每人各飲一杯。我看看手錶，已經十一點半了。我起身告辭，燕卜遜看著我說：「我希望你能參加我的生日會，成吧？」

他的邀請使我深感榮幸。但是我知道英國文化協會已經替我訂了票，在那一天去埃馮河畔的斯特拉福特鎮去看一齣莎劇的演出。

「非常感謝，燕卜遜教授，我非常想來，」我答道。「但是我和另一位沒有爵位的威廉有約在先。我很晚才能從斯特拉福特回到倫敦。」

「有多晚？」他緊追不放。

「火車十點半才到倫敦。」

「那也不算晚啊，」他決斷地說。

「那末好吧，我一定來。」

他很高興，快步送我和威萊先生走出家門，站在人行道上。他想替我攔下一輛出租汽車，無奈經過的幾輛都下了旗。他看出我有點焦急，擔心搭不上最後一班地鐵，最後他只好和我道別，看著我一路向地鐵站跑去。

下一個星期六晚上，從斯特拉福特鎮到倫敦的火車拯c。我一到倫敦立刻跳上一輛出租汽車，手裏拿著從那位威廉的出生地帶來的一大束菊花，來祝賀這位威廉生日快樂。汽車司機花了好幾分鐘才找到目的地。到我按門鈴時，已過十一點了。我在樓上見到威廉爵士，周圍是一群崇拜他的年青客人。

「你果然趕到了，」他笑著說。

「可是這些菊花一路跟著我從另一位威廉的出生地過來，已經有點耷拉下來了。不管怎樣吧，教授，祝您生日快樂！」

記得只在幾天之前剛剛單獨和他呆了十個小時，我便讓他和別的客人交談，自己則下樓去，在那自助餐桌上找點剩菜吃。不久也就到我該走的時候，否則又坐不上最後一班地鐵了。於是我又上樓去，向他道晚安和告別，因為再過一個星期我就要乘飛機回國，行前不指望再見到他了。我再次對他表示我的心願，希望他能在北京歡慶八十大壽。但是時隔不久就證明這不過是個空想罷了。

（關品樞譯自英文原著）

再生的鳳凰：憶沈從文

好幾個月過去了，自從我把一朵潔白的玫瑰放在他腳下為他送別。沒有眼淚，沒有話，唯有一片無邊的悵惘。這個來自鳳凰之城的語言大師，難道他就這樣永遠沉默了嗎？

好幾個月過去了，一篇一篇重溫他的作品，我重新聽到了他那平和而動人的聲音。半個世紀以前，在昆明的西南聯大，當時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我是外文系的新生，沒有上過他的課。也許是緣份吧，我們終究相識了。我是剛從一個小縣城的中學裏出來的毛孩子，出身寒微，又沒有見過大世面，偶然在校園裏撞上鼎鼎大名的教授我是連頭也不敢抬的。可是，不論在文林街上沈公的陋室，還是呈貢縣他的鄉居，我都感到十分自在，後來甚至敢把我寫的幼稚的小詩小文拿去請他指點了。

起初，聽他那有濃重湘西口音的普通話感到很吃力，但日子一長就聽慣了，上癮了，像學著吃辣椒一樣。他從不作長篇大論，也不旁徵博引，更不擺出一副「大師」的架勢，卻彷彿有永遠講不完的小故事。講起來有說有笑，斷斷續續，一段段小故事平淡而新奇，為我幼稚的心畲蜷_了一片又一片如詩如畫的新世界。那些小故事我一個也不記得了，可是他那呼吸著鄉土氣息的聲音卻是「不思量，自難忘」，那麼平和，那麼深情，那麼動人。

無奈好景無常。隨著戰爭的風雲變幻，我先是走出了大學的校園，後來又遠戍異國，和沈公一別就是十年。中華大地上發生了振奮人心的變化，我這個童心未泯的遊子也萬里歸來了。一九五一年夏天，一到北京我就聽到一些關於他遭逢不幸的傳說，我就急匆匆摸到中老胡同三十二號去看望沈公和師母。他們住的兩三間小平房，和當年文林街上的陋室相比，當年的陋室四季如春，而這「長安居」雖在盛夏卻蕭瑟如三秋。先生和師母卻依然談笑自若，問長問短，言談之中，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怨艾。我從未忘過他那獨特的聲音，如今時隔十年，重新面對著他的童顏，傾聽著他那平靜如流水的聲音，聽他說道「門可羅雀」，真感到「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一位舉世聞名的作家，一位門生故舊遍天下的大師，難道就這樣從此塵封土埋了嗎？

豈料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後來聽說他那些名著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了，存書也都化作了紙漿，他的名字和作品也從

一部又一部現代文學史上消失了。為了扼殺他的聲音，「毀尸滅跡」，某些秦龍的傳人真是全心全意，做到了「堅決、乾淨、完全、徹底」，為後來大革文化之命樹立了一個紅彤彤的先例。五十年代中期，我又從外地回到北京工作，偶然相逢，看上去他還是那麼恬靜，音容笑貌之中竟沒有一絲受難的痕跡。我幾乎覺得他的性格太軟弱了。

一九五七年，在那個短暫的「北京之春」以後，我落進了預先撒下的大網，被流放到北大荒。在眾多的難友之中，有一個姓鄧的青年人曾在北京某大學受教於沈公，而且囚囊中還帶有他的幾本著作，我真是喜出望外。從此，在累得直不起腰來的修築倒流堤工程中，在攝氏零下四十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鄧邊幹活邊談論沈從文的作品，《邊城》啦、《從文自傳》啦、《湘行散記》啦，絮絮叨叨，沒完沒了，有時竟然忘掉了飢餓和疲勞。每逢歇「大禮拜」，難友們有的蒙頭大睡，有的打撲克，小鄧和我往往帶上他那幾本又破又舊的寶書，到小興凱湖畔找一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朗讀一些我們最喜愛的章節。小鄧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所以總是我選他讀。

我們倆都偏愛那些有「水氣」的段落，譬如：

貴生在溪溝邊磨他那把鐮刀，鋒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試一試刀鋒後，又向水裏砍了幾下。秋天裏溪水清個透亮活活地流，許多小蝦子腳攀著一根草，在淺水裏游蕩，有時又弓著身子一彈，遠遠地彈去，好像很快樂。貴生看到這個也很快樂。

興凱湖的水在秋天也清個透亮，並沒有因為被用作勞改農場而減色。我們在湖邊勞改幹活，幾乎也跟貴生一樣地快樂了。我們百讀不厭的一段是：

望著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澈悟了一點人生……。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後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拉船人和小小船只，一切都那麼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

我終於明白了他那樸實的聲音為甚麼那樣動人，此時此刻，他那透明燭照的聲音、溫存的節奏和音樂，使兩個家山萬里的囚徒時而樂而忘憂，時而「作橫海揚帆的美夢」，時而也免不了「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

一九六一年夏，我在勞改農場餓得奄奄一息，終於獲準「保外就醫」。道經京城，恨不能見沈公一面，聽一聽他的聲音，無奈身為「賤民」，豈敢造次！及至「十年浩劫」，人人自危，親友之間也音問斷絕，我們全家發配到安徽農村去落戶，更是無人問津了。一九七三年底，忽然接到沈公從北京的來信，用他那舉世無雙的章草密密麻麻寫了六張八行書，一個月後又來了一封長達八張的八行書。老師勉勵我不可因貧病交迫而自暴自棄，並以他自己的一生經歷現身說法：「今年已七十二歲，工作中竟充滿童心。」我把信一字一句讀給我受苦受難的妻子和三個小兒女聽，連十歲的小兒子也聽哭了。從此他就知道有個沈伯伯，幾年之後就一本接一本讀起他的書來了。

雨過天青。一九七九年春，我重返京城，辦理「錯划右派改正」，便摸到小羊宜賓胡同五號去拜見沈老師和師母，他住的是一座四合院裏朝西的小屋，除了放一張床之外就沒有多少餘地了。床上靠牆的一面堆滿了書，聽說師母還得到別處去「未晚先投宿」哩。比起五十年代的東堂子胡同的「格局」來，更是每下愈況了。我再看看他們二老身心交瘁的容顏，真不知言從何起。可是，「回也不改其樂」，沈從文之音依然那麼年青，仿佛「一派清波」，仿佛「生平在各個地方所見到的河流，皆似乎正一一從心上流過。河面還泊了灰色小船，漂浮了翠綠菜葉。」

時間是最好的見證：他那「涓涓細流」的聲音，「柔弱中有強韌」，是千軍萬馬也無法扼殺的。可是人總是要死的，沈從文永遠沉默了。那些「人還在，心不死」的秦龍傳人也可以休矣。他為之「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的農民、手工藝人和兵士是最好的見證：這個百劫成灰的鳳凰之城的兒子已經從灰中再生了，成為聲震寰宇的「萬古雲霄一羽毛」！

教授原來是草包

冒效魯，字叔子，晚清末年出生於江蘇如皋。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期間，由上海復旦大學奉調到合肥新建的安徽大學，任外語系俄語副教授。聽說他是明末清初大儒冒辟疆的後裔，家學淵源，工舊體詩，與錢鍾書唱和不絕。到安大後，他寫過一首七絕，歌頌魯迅精神，登在官方刊物《安徽文學》上。一開頭的兩句是：「身無媚骨奉公卿，筆駛風雷魍魎驚，」傳誦一時。不久之後，政治運動一來，系內的好事之徒便結合他平日的「反動言論」上綱上線批判，一口咬定這是一首「借古諷今」的反詩，以歌頌魯迅為名，行惡毒攻擊共產黨領導之實，斯可忍，孰不可忍。好在詩人腦勺後的小辮子大把抓，再添一條也無傷大雅。

時隔不久，陳毅元帥駕臨安大視察，指名要拜望詩人冒效魯。這可驚動了大學的黨政領導，由校長親自陪同元帥登門造訪，並派保衛科科長站崗放哨。原來陳毅當年任新四軍司令員時，司令部就設在如皋冒家的一座庭園，本人也寫舊體詩，遂趁便「禮賢下士」談詩論文。冒氏一向直言無忌，也就趁便翻出「反詩」來向元帥求教，陳毅連稱好詩。從此以後，領導和同仁對他都另眼相看。逢年過節，校長必首先登門祝賀。全校上下，人人尊稱冒老。

我是一九六二年才有幸結識冒老的。前一年，我在舉世聞名的清河農場勞改，餓得奄奄一息，經妻子從合肥趕到到北京奔走，終於得到「保外就醫」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到安大家中，由妻子撫養。六二年秋，我當上外語系「臨時工」，教高年級英語，並參加「統戰對象」的政治學習。我頭上戴著「極右分子」和「勞動教養分子」兩道緊箍咒，學習時除了檢討不離口，連口大氣兒也不敢出。而冒老哩，談笑風生，放言無忌，與我的寒酸相真有天壤之別。私下裏，我們倒是一見如故，加上我當年在北京也和錢鍾書先生有過一些交往，因而又多了一重關係。有一天，我盛贊他的兩句「反詩」音韻鏗鏘，氣勢磅礴，極之令人振奮。他呵呵一笑，說魯迅若是不死，五七年不打成「右派」才怪哩！又說，自己居然逃脫一頂「右派」帽子，可能是祖先積德吧。

無奈好景無常。文化大革命一聲炮響，冒老是全校首先拋出的頭號「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先是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

接著是批斗會、抄家、戴高帽子遊街示眾、勞改、等等、等等。我因為只是一名「臨時工」，雖是當然的「牛鬼蛇神」，畢竟也不過是一頭「死老虎」而已，因此，我竟然官封「牛鬼」學習小組長。外語系教授、老講師袞袞諸公，不下一打之眾，都歸我「領導」。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所謂學習就是人人交代、檢討，互相揭發、批判。聽冒效魯（已經無人稱他「冒老」了）檢討交代，幾乎是一種享受。他的開場白總是：「我姓冒，冒充的冒。我是一名死不改悔的反動知識分子，卻冒充甚麼教授、詩人，真是恬不知恥。」交代起歷史來，一口「京片子」，侃侃而談，毫無愧色。可是結尾一定加上：「我的罪行罄竹難書，一死不足以蔽其辜。」有一天，會下我問他：「老冒，你一死還不能贖罪，欠下的罪誰來還呢？」他一面抽煙，一面說：「唉，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嘛！還不完的債還可以一筆購銷吧。」隨即哈哈一笑。

一九六八年冬，我和他一起作為「校管專政對象」，由紅衛兵押送，隨全校三千「革命師生」到和縣（古和州）烏江參加「斗、批、改」，我們這號人就是「斗、批」的活靶子。經過半年的折騰之後，我們兩人被分配到南莊生產隊，按「物以類聚」的原則，住進富農金家大嫂家一間屋子裏，由紅衛兵陳宇負責監管。小陳是俄語專業學生，淮北農家子弟，粗眉大眼，秉性耿直，不時和工宣隊師傅發生頂撞，卻好與老「牛鬼」談詩論文。我和老冒，身困「牛棚」。居然可以放眼古今，與小牧童言笑無忌，也算人生一樂也。

一日，牛郎把兩頭老牛趕到霸王廟去放牧。老冒也不過六十來歲，卻故意擺出一副老態，步履蹣跚。恰好廟前路面年久失修，凹凸不平，他失足摔了一跤。小陳慌忙把老人家扶了起來。詩人脫口而出念道：「霸王廟前出洋相，教授原來是草包。」我也未加思索續了兩句：「牛鬼蛇神我不要，滾回人間去改造。」陳宇哈哈大笑，連聲說：「妙！妙！妙！」當天又到同學中去傳播，後來因不抓「牛鬼」思想改造、散布「反詩」而受到嚴厲批判。

一九八零年，事過境遷，我重返北京任教。一九八七年，應邀返安大講學，冒老攜陳宇來賓館訪談。冒老並不見老，談笑風生，豪情不減當年。小陳已成家立業，任職數學系，對冒老執禮甚恭。談話中提起霸王廟之行，陳宇一口氣背出了那首「反詩」，我們都禁不住放聲大笑。我因工作關係匆匆返京，行前到冒府向冒老和夫人告別。他說希望下次來多住幾天，好

好神聊一下。不料次年春，他就因心臟病遽發而棄世了。後來聽說他的子女已將他的詩集付梓，至今尚無緣拜讀，不知這首「反詩」收進去沒有。

狗叛徒

一九六二年九月，新學年開始，我在安徽大學外語系英語教研室當上了「臨時工」。沒想到，俄語教研室也有個「臨時工」，是一位姓吳的老先生。雖說二人都是「臨時工」，我和他的身份、地位卻有天壤之別。我是從勞改農場「保外就醫」的「極右分子」，他是從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榮休的高級俄語翻譯。外語系黨總支書記兼系主任是他在軍事學院的老上司，對他十分器重，轉業到安大就邀他同來執教。吳老師年逾花甲，鬢髮半白，瘦骨嶙峋，不苟言笑，人人尊稱「吳老」。「統戰對象」學習會上發起言來，一口江西官話，有理論，有實際，人人洗耳恭聽。每逢政治運動，吳老必作典型發言，作為大家學習的榜樣。「統戰對象」多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吳老卻是別有一番來歷的過來人。原來吳老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的，像他這樣老資格的黨員當然是鳳毛麟角，可惜後來不幸與「組織」失去聯係，在舊社會便不得不依附舊政權混一碗飯吃，於是只能委屈吳老當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和「統戰對象」了。好在吳老對黨的事業衷心耿耿，並不介意甚麼「政治待遇」，一心一意「發揮餘熱」。除去講授本行的俄語翻譯，他還主動為青年教師輔導中國古典文學。難怪大家提起這位老人來，無不肅然起敬。

沒想到，吳老奉若神明的那位「偉大領袖」鞭Ｃ一動，發動文化大革命，下令「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位老革命竟然也成了橫掃對象。曾幾何時，德高望重的吳老變成了人所不齒的「叛徒」。他胳臂上套著白布袖章，上面是他用工整的顏體寫的「叛徒」兩個大字。作為「摘帽右派」，我是當然「牛鬼」，有幸經常和老吳並肩勞改（「吳老」的稱號當然已作廢了）。這時青年學子都忙於「鬧革命」，大學的「工人階級」忙於「領導革命」，校園裏一切體力勞動，一切髒活、累活，統統成為一百多名「牛鬼」的專業，老吳年近七旬，是「牛鬼」中的元老，幹起活來可一本正經，從不含糊。

六八年夏，「牛鬼大隊」成立，集中「清理階級隊伍」，白天勞改，晚間接受批斗，交代罪行。大隊長姓王，化學系助教，身份是「摘帽右派」（後來證明他根本沒戴過「帽子」，受到「寬大處理」）。老吳榮任副大隊長，他執行「革命小將」下達的任務一絲不苟，由此不難想見他當年黨性之強。「牛鬼隊」有這麼一位一九二二年的老黨員當領導，我感到十

分榮幸，又十分滑稽。

這位老布爾什維克一再痛罵自己，數十年來對當年脫離革命的罪行毫無認識，一直輕描淡寫，認為是「失去組織聯係」。感謝這場觸及靈魂的大革命」，他才認清自己的「狗叛徒」的丑惡面目，從他歷次交代中，我從未聽到他提過任何叛黨罪行，他卻一口一個「狗叛徒」。每逢有人來「牛棚」內查外調，問他是何政治身份，我都可聽到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狗叛徒」！每填表格，他也照抄不誤。他發誓「在靈魂深處鬧革命，脫胎換骨」，否則將來有何面目去見馬克思。

勞改隊裏偷懶耍滑的大有人在，老吳可總是身先士卒`，手腳不停。我在北大荒服過三年苦役，勞動有基礎，是勞改隊的當然主要勞動力。這位皓首書生，怎能頂得住這無止無休的勞改呢？眼看這老人衣褲襤褄，光腳穿一雙支離破碎的塑料涼鞋，容顏枯槁，腿腳卻浮腫了。我在勞改營患過浮腫，差點兒送了命，怎能袖手旁觀？經我再三敦促，他才跑了一趟校醫室，校醫給他開了一盒維生素乙１針劑，也不知費了我多少唇舌，他才斷斷續續勉強做完了規定的療程。這位老布爾什維克活象一個苦行僧，他的靈魂深處到底鬧著甚麼樣的革命呢？

六八年十二月，安大三千師生，響應「偉大領袖」的「最新最高指示」，徒步長征三百里，前往霸王別姬的和縣烏江鎮，到貧下中農中去「搞教育革命」。老弱病殘按規定可搭乘校車，老吳浮腫新愈，卻堅持跟大隊步行。我走在他後面，一路看著他背包上貼的毛主席語錄：「假的就是假的，偽裝必須剝去。」老吳是毛澤東思想學習標兵，他選這一條語錄必有他的道理。他是夫子自道呢，還是「意在沛公」？一天下來，老吳顯然筋疲力盡。晚間紅衛兵組織全系十幾名「牛鬼」學習，談長征的心得體會。

老吳帶頭發言：「這次長征雖然與當年紅軍長征不可同日而語。但對我大有好處，對思想改造大有好處。不過，坦白說，我筋疲力盡了，腳底也長了幾個泡。到底年紀不饒人啊。」

紅衛兵問他：「你覺得明天還能繼續走嗎？」

老吳吞吞吐吐地說：「我可以試試看……」

沒等他把話說完，紅衛兵搶白說：「你不用試試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你當我們是甚麼人？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對你們牛鬼，我們也按革命人道主義辦事嘛。明早再看

吧。」

第二天開拔之前，紅衛兵到場，老吳奉命爬上校車。當晚，在下一站過夜，紅衛兵又來監督我們學習。

「你現在感覺怎樣？」 紅衛兵問老吳。

「好多啦。我衷心感激毛主席和紅衛兵小將對我如此寬大。我一定加倍努力，改造思想。」老吳滿臉堆笑說。

「很好嘛。你明天能走嗎？」紅衛兵問他。

「我很願意走。不過，我腳上的泡……」老吳說。

「那麼你還想搭校車嗎？」紅衛兵又問他。

「要是紅衛兵小將批准……」老吳陪著笑臉答道。

「你舒舒服服坐了一天校車，還想再享一天的福，」紅衛兵聲色俱厲地說。

「甚麼『感謝黨的寬大』，甚麼『加強思想改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想糊弄誰啊？你別倚老賣老，得寸進尺！好好反省一下，明早交份檢討。」

當晚，在我們借宿的小縣城中學禮堂講台上，老吳戴上老花眼鏡，在暗淡的燈光下寫了檢討。隨後三天，這位年已古稀的老黨員一瘸一拐地跟大隊一直走到烏江。

半年後，「清理階級隊伍」進入「落實政策」階段，老吳的政治結論仍是「與組織失去聯係」，不存在「狗叛徒」問題。但因全省取消臨時工，老吳只得遣返九江原籍，先回安大辦理各種手續。我的妻子兒女，作為「牛鬼」家屬，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本人繼續關「牛棚」，接受審查。時隔不久，滯留安大的女兒突患急症住院，妻子從下放的小村子趕回安大，住進招待所。對門住的正是吳老夫婦，他們還在辦理回鄉手續哩。彼此劫後重逢，同病相憐，分外親熱。妻子已是農村戶口，一切城市供應無從問津，日常生活所需多倚仗吳老夫婦。後來聽說他們就回了九江原籍，也不通音問，但「狗叛徒」的枯槁身影仍不時在我眼前浮現。我多麼希望有朝一日和他重聚一堂，聽聽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心聲
！

十年後，我已初步「落實政策」，在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任教。七九年暑假期間，江西省教育局在廬山為中學英語教師舉辦暑期英語講習班，我和另外三位老教師應約前往任教。妻子和我馬上想起吳老夫婦，急忙向安大熟人一打聽，才知道吳老不但健在，而且目前負責管理廬山植物園圖書館，真是大喜過望。如能和吳老一道「登高壯觀天地間」，再探一探這位剝去

「狗叛徒」偽裝的老革命的心路歷程，我將不虛此行了。

我們在山上的住處離植物園不遠，星期天上午信步閑逛，一路觀看山景，不知不覺就到了植物園。古書參天，綠蔭蔽日，好一個修行養性的所在！十年闊別，我和妻子見到吳老夫婦，真是恍若隔世。吳老依然瘦骨嶙峋，鬚髮全白，但雙目炯炯，眉宇之間仿佛有一股超凡脫俗之氣。他興沖沖地帶領我們參觀各種奇花異草，逐一介紹，如數家珍。那一份步履輕捷，談笑風生，哪里像劫後餘生、年逾八旬的老翁！

回到圖書館，我們瀏覽了一下藏書。有關植物的各種書刊琳瑯滿目，有一排書架上卻羅列著線裝的詩詞古籍，我感到十分詫異。吳師母仿佛猜到了我的心思，笑著說：「這些都是老吳一輩子存下的，文革時居然沒遭殃，我也沒舍得當廢紙賣掉。現在統統捐贈給圖書館，也算葉落歸根吧。」語氣之中仿佛有點了卻前緣的味道，我感到幾分寬慰，也不免有點黯然神傷。我正不知道說點甚麼，一抬頭，看到牆上掛著一張條幅，沒有裝裱過，一副漫不經心的神氣，是吳老用他那一筆不苟的顏體寫的十四個大字：

往事如煙俱忘卻
心底無私天地寬

那是「十年浩劫」期間，另一位老布爾什維克被迫害致死的訣別詩。我心底一亮，啊！老吳果真脫胎換骨啦！我也毋庸贅問他的如煙往事、心路歷程。那些他讀破的千百卷詩詞古籍和一架架的植物書誌相得益彰，他那仙風道骨也和廬山的蒼松翠柏融為一體了。

今古謫客知多少

流寓海外，喜得董樂山兄從北京寄來大型文學雙月刊《大家》創刊號（一九九四年第一期）。主編李巍宣告：這個新刊物「只呼喚精品。只呼喚敢於探索的大家之作！」在嚴肅文學備受冷落的今天，聞此豪言壯語，令人耳目一新。《大家》分長篇、短篇、戲劇、散文、詩歌、評論等六大欄目，散文欄由當代散文大師、老友汪曾祺主持，其中就有他本人的兩篇新作，萬里之外，如見故人，喜悅之中又添了幾分懷念。

同欄《謫客》一文，出自納西族作家楊世光手筆，與曾祺令人賞心悅目的小品大異其趣。《謫客》寫的是明代謫戍滇邊的才子楊升庵長達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涯。升庵名慎，四川新都人，一四八八年出生於北京，當時他父親在朝廷做官。明正德十六年（公元一五二一年）楊慎三十三歲中了狀元，授翰林院修撰。豈料好景無常，不到一年老皇就一命嗚呼，死者無嗣，堂弟登基，是為嘉靖新帝。這個暴發戶一旦皇權到手，硬要把自己的生父由皇叔改尊為皇考。於是，一批書生氣十足的朝臣哭廷諍諫，其中就有楊狀元。這一哭非同小可，新暴君暴跳如雷，一百八十多個哭諫者統統遭廷杖，十七人當場斃命。楊慎雖「斃而復蘇」，但兩年後又被謫配到萬里之外的雲南永昌（今保山縣），從此在三迤邊地輾轉流徙。好不容易熬到七十高齡，他滿以為按朝廷律例可以贖身，便回到四川瀘州，指望靠兒子度過餘年了。豈料「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嘉靖一聲令下，又把老人鋃鐺枷鎖押回戍所。次年七月六日，一代才子楊升庵含憤死於保山。

以流放或充軍的嚴刑鎮壓持不同政見者，這並不是嘉靖的天才創造，楊夫子也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謫客。上下古今五千年的華夏文明像一條銀河，閃爍著多少謫客的明星！屈原放逐三湘，自沉於汨羅。賈誼步其後塵：「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東漢末期，蔡邕因上書論政闕失流放朔方，次年遇赦，懾於宦官陷害，帶著女兒文姬亡命江湖十二年。

唐代詩人輩出，萬古流芳，其中謫宦卻大有人在。初唐四大詩人中，陳子昂急流勇退，辭官回鄉，卻被武三思誣陷下獄死。杜審言、宋之問、沈全期都沒逃脫謫戍邊陲的厄運。四人中以宋之問為最慘，武后時流放「林昏瘴不開」的嶺南，後逃

歸，寫下了那首著名的謫客詩：「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平反」之後，又一貶再貶，重謫嶺南，並被賜死。

玄宗朝的著名宰相張九齡晚年罷政事，貶荊州長史，抑鬱以終。「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作者王翰一貶再貶，死在道州司馬任上。以擅長七絕而名重一時的王昌齡先謫嶺南，後貶江寧丞，再貶龍標尉，安史亂起，流離途中死於非命。詩仙李白長流夜郎，若非次年遇赦得還，就難免「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了。

唐順宗時，改革派失勢，柳宗元等八人都被貶為州郡的司馬，柳謫永州，十年後又改為柳州刺史，「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劉禹錫與柳宗元同案，被貶為郎州司馬，「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白居易犯了「愛國罪」，貶江州司馬，把滿懷「遷謫意」譜進了催人淚下的《琵琶行》。武宗時，李德裕因中興有功封衛國公。及至宣宗上台，倒行逆施，中興之臣紛紛貶逐邊陲，李德裕也貶為潮州司馬。謫嶺南道中，他有詩抒憤：「愁沖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繼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不久死於貶所。唐朝號稱以詩賦取士，其實讀書人即便獲一官半職，仍不過是和「倡優同畜」。有膽敢直言犯上者，或幸免於一死，也難免發配充軍。

唐以下千餘年間，雖幾經改朝換代，謫戍之刑卻一以貫之。宋朝大文豪蘇軾因與新黨政見不合被貶謫惠州，並以六十三歲的高齡遠徙海南島，海口至今還有蘇公廟，附近有餐館名「謫客居」。江西派開山大師黃庭堅寫過一篇《承天院塔記》，朝廷指為「幸災謗國」，被押送宜州管制，時已貶謫十年，有詞抒懷：「平生個裏愿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晚年又因修神宗《實錄》失實的罪名，先後貶謫四川的黔州和戎州，五年後死於貶所。大詞人秦觀在哲宗朝作過太學博士，為蘇軾門下四學士之一，也因黨籍貶斥到西南，死於放還途中。高宗朝樞密院編修胡銓，因堅決反對與金國議和為主和派誣陷，押送廣東新州管制，後又遠徙海南島南部。

朱元璋當上了明太祖，先是大殺元功宿將；後又「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更大興文字獄，使無數文人遭殃，充軍發配更是家常便飯了。據明史專家吳焓的《朱元璋傳》所載：「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謫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繼位的孝子賢孫接過老祖宗的衣缽，貶謫官員何止萬千，楊慎案不過是其中一例。滿清同樣大興文字獄，重則殺

頭，輕則貶謫。至於林則徐焚鴉片，抗英帝，愛國有罪，充軍伊犁，更是近人耳熟能詳的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禮炮一響，送來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偉大領袖」繼承歷代暴君的光榮傳統，古為今用，發揚光大，把充軍發配制度化、現代化。勞改農場、工廠、礦山等等，遍布神州大地。每隔幾年，搞一次政治運動，抓成千上萬的「階級敵人」，優先發配到地廣人稀的大西北和北大荒。

一九五七年，五十五萬幾千名知識分子中了「陽謀」的暗算，戴上「資產階級右派」的棘冠，或判刑勞改，或不經審訊送「勞動教養」，美其名曰「行政處分」，實則是無期謫戍。「右派」棘冠一戴二十多年，多少家妻離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才志之士不堪凌辱，或含憤自裁，或死於非命。「偉大領袖」更洋為中用，虛心向老大哥學習。你有一個舉世聞名的西伯利亞，我就用成千上萬的勞改犯搞一個舉世無雙的興凱湖農場，和你一衣帶水，唇齒相依。同時在全國大力推廣，為源源而來的人民共和國萬千謫客設下一個天羅地網。在遠離世人耳目的青海，毛王朝從一坐天下就蓄意經營一個名符其實的「古拉格」，囚禁了從各大城市抓來的成千上萬名勞改犯，其中不乏像前滬江大學校長凌憲揚這樣的大知識分子。直到一九八九年，感謝卜寧根據一個劫後餘生的政治犯的親身經歷所寫的紀實小說《紅鯊》，這個人間地獄才被公諸於世，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謫戍體系樹立了一座紅彤彤的豐碑。

「文化大革命」平地一聲雷，無數知識分子和黨政官員成為「橫掃」對象，死於非命。即或幸存下來，也往往難逃勞改或變相勞改的厄運，家家戶戶扶老攜幼謫戍邊陲，美其名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或「五七幹校」。「偉大領袖」學習老暴君嘉靖的榜樣，早就罷了敢於說真話的彭大將軍的官，謫戍川邊，終於置之死地而後快。吳焓秉承他的旨意寫了歷史劇《海瑞罷官》，卻被誣為給彭德懷翻案，被整得死去活來，貶謫窮鄉僻壤，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只要毛皇帝一聲令下，上自國家主席，下至黎民百姓，都可掃地出門，永世不得翻身。四十多年來，赤色恐怖統治下，究竟有多少知識分子和黨政官員慘遭殺戮謫戍，還有待權威方面公布至今保密的精確數字。但可以斷言的是，「偉大領袖」集中外古今之大成而創立的謫戍制度絕對是史無前例的，也充分體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在這一方面，「偉大領袖」真不愧為「千

古一帝」，足可睥睨古今！

幾千年來，歷朝歷代有多少謫客的冤魂在神州大地上游蕩。其中還有幾個沒有完全被人們遺忘？真是「放眼古今多少恨」！楊升庵何幸，時隔三百餘年，當年的貶謫之鄉竟然出了個同姓的知己，把他可歌可泣的一生譜寫成一曲慷慨悲歌。楊世光寫楊夫子的謫客生涯，一擊三嘆，始而悲其不幸，繼而喜其大幸：「一到雲南，邊陲各民族同胞如親如友地把他擁入了懷抱。」天高皇帝遠，楊狀元不但悠遊林泉，而且與「滇南七子」唱酬詩文，研討金石，著作等身。若是他生逢社會主義昌明盛世，楊夫子就沒那麼便宜了。你頭上戴著偌大一頂「反革命」帽子，大家人人自危，揭發檢舉唯恐不及，甚焉者夫妻離異，兒女劃清界限，還有誰敢把你「擁入懷抱」？甚麼「唱酬詩文」，那更是天方夜譚了。作者終而禮贊曰：「一個被棄的謫客，……沒有折服，沒有沉淪，……。居然用心血澆鑄出一座高挺於天地之間的著作豐碑，用金果裝飾出一個發光的人生，是何等剛正的風骨，何等超脫的氣度，何等執定的精神！」

驚嘆之餘，我不禁自問：「這個三百年前的案例，對於今日劫後餘生的中國知識分子有甚麼啟發呢？」作者仿佛用他的結束語回答了我的問題。他打聽到昆明西山麓有座升庵祠，便專程前往拜謁他的遺風。瞻仰完畢，走出大門，他看到面前有一座闊葉樹，「高枝頭有條大毛蟲正霸氣地咬食葉緣，滇池那邊一輪紅陽恰好疊襯在樹緣下，仿佛那毛蟲咬嚙的是那輪紅陽。我忽發奇想：那條毛蟲是嘉靖皇帝，那輪紅陽是楊升庵。」

這真是神來之筆！古往今來歷代暴君，或以真龍天子自命，或以紅太陽自封，披上龍袍，爬上天安門，君臨天下，生殺予奪，便以為從此永垂不朽了。無奈經不起歷史的照妖鏡一照，一個個龐然大物原形畢露，不過是一條條大毛蟲而已！唯有楊升庵這樣的萬千謫客才是「士之杰矣國之魂」，才是彪炳千古的紅陽！

從回歸到不歸-李志綏的心路歷程

二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我從在維州的住處打電話到志綏在伊州的寓所，沒人接，我留了話。晚間他回了電話，說近來很忙，常常到各地演講，到書店去為讀者簽名。還說前不久還去過洛杉磯，和「米高梅」商談拍電影的事，感到有點應接不暇。我提醒他要注意「勞逸結合」。他說身體還不錯，只是為濕疹所苦，癢得難受。我說，那正是精神緊張的表徵，該剎車啦。他聽了直笑，笑得很爽朗，很輕松，我也感到放心了。怎麼也沒料到，那竟是最後一次聽他笑了。

我和志綏相識是很晚的事，雖然我們是近親。他的妻子吳慎嫺是我二舅的大女兒，只比我大幾個月，小時候在一起玩過，後來離多會少，五十年代以後，由於種種原因，連音訊也渺茫了。八零年三月，我因「落實政策」從蕪湖遷回北京。不久，另一位表姐捎話給我們，說慎嫺姐夫婦表示，多年來「伴君如伴虎」，搞得幾乎「六親不認」，請親友諒解。

沒過了幾天，他們倆就從西單的寓所驅車到西北郊來看我們了。我本以為這位當過「大御醫」的表姐夫多少會有點官架子，不料見到的卻是一個談笑自若的白衣書生。後來我得便進城，不時到他家串門兒，小飲兩盅，海闊天空地神聊一通。言談之中觸及「御醫」生涯，他往往流露出「往事不堪回首」，「覺今是而昨非」的感喟。

我愛管閑事，每逢親友有病，常去麻煩他，而他是從不推托的。八六年秋末，沈從文老師臥病在家，而上醫院看病又困難重重，我便自告奮勇去找志綏。師母
很猶豫，怕請不動這麼大的人物，白讓我受累。我從東城直奔西單，明知他早就不再行醫，開門見山就問他是否可以「御駕親征」一下，他二話沒說，拿起聽診器就跟我走了，哪里有一點「大御醫」的架子。給病人檢查時執禮甚恭，與時下有些醫生目無病人的作風大不一樣。回家的路上，他說沈老已經很虛弱，至多還能活上兩年，我不禁為之黯然，但願他判斷錯了。一年半以後，沈老師果然棄世。

此後不久，嫻姐腎臟衰竭加劇，志綏決定伴送她來美就醫，我曾去家中話別，豈料這竟是和她的最後一面。後來看到他寄回的嫻姐墓地的相片，赫然在目的是一座雙穴墓，我納悶兒難道志綏已走上不歸路了。

九零年九月，我從北京來美，重返母校芝加哥大學訪問。他住在郊區的小兒子家中，我打電話約他星期天上午見面，怎麼也沒想到他會說：「每星期日上午上教堂，雷打不動」，我們便改在中午見面。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長期耳濡目染、親聆「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金口玉言的「御醫」，原來是一位虔誠的路德教教徒，這是何等發人深省的諷刺！見面時，我發現他已戒煙戒酒，也減了肥，面目一新，談笑風生，充滿「覺今是而昨非」的喜悅。

李志綏從「回歸」到「不歸」的傳奇正是他半個世紀心路歷程的投影。他屬於在國難深重的三十年代成長的青年一代，飽經家國之痛，一心要為民族復興貢獻自己的一生。我和他是同代人，五十年代初期，受到同樣憧憬的鼓舞，他放棄在澳洲的外科醫生工作，我丟下半途而廢的芝大博士論文，應召兼程回國。隨後的二、三十年中，我因說了幾句真話便貶為「賤民」，流徙邊陲，幸免於一死；而他貴為大紅大紫的「御醫」，雨露承恩，在外人眼中也算得上「春風得意」啦。

殊不知，李志綏的專業是西醫外科，當年立志要當一名神經外科專家。無奈一入龍門，身不由己，淪為暴君的保健郎中兼夜話清客，虛耗了一生的黃金歲月。到頭來，也無非是暴君生殺予奪的另一類「賤民」而已。不出幾年，他已經對毛王朝感到幻滅。從此，骯髒險詐的宮廷政治，暴君的荒淫無恥，在在沖擊著他的良知。可是，「伴君如伴虎」，他只得戰戰兢兢，守口如瓶，直到暴君終於放手的那一剎那，他才初步得到解脫。

當時，志綏剛五十六歲，何去何從，頗有「回旋餘地」。憑他「御醫」的金字招牌，撈個一官半職，或「下海」撈錢，都足可「頤養天年」。找他寫回憶錄的也大有人在，但他還能昧著良心說假話嗎？生活在一個謊言王國裏，說真話又是罪不容誅的。他唯有「韜光養晦」，等到時機成熟，毅然奮筆直書，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一部前無古人的巨著。「天高皇帝遠」，他可以講真話了，把真人真事和盤托出，既不為尊者諱，也不誇大渲染，驅散了流言的迷霧，給世人留下一部翔實可信的史書。而且，書中有書，和令人髮指的毛史交織在一起的，是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杖彤位\廿二年」催人淚下的遭遇和心路歷程。官方斥之為「造謠污蔑」，無非因為它揭開了他們數十年來苦心經營的畫皮，倒是從反面證實了它的價值。

這樣一本書會引起爭議，這本是意料之中的事。遺憾的是，早在九三年十月，英國廣播公司的紀錄片《毛主席：中國的末代皇帝》播映之前，西方新聞媒體就搶先報道了其中李「御醫」有關毛皇帝性生活的透露，一時滿城風雨。其實，他接受采訪時談了幾個小時，而編導者偏偏只選用了那麼幾分鐘，志綏覺得是有欠公允的。這種誤導又招致一些人對《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的誤解。有人甚至指責他「集中火力大爆毛玩女人的陰私，走三級色情之路。」真是冤哉枉也！

一本六、七百頁的巨著，其中涉及這一方面的篇幅充其量不過二、三十頁，更無任何色情渲染，何「衰」之有？評論一本書的得失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抒己見，這是言論自由的好處。不過，若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書，就難免「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甚或「買櫝還珠」了。想當年，德萊塞的《嘉莉妹妹》、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喬伊斯的《尤里西斯》，都曾因莫須有的「色情」罪遭禁，現在則早已列入世界文學經典之林了。志綏的《回憶錄》的歷史地位，只能留待後人去評說，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絕非「三級色情」，而是作者飽經滄桑、大澈大悟之後的泣血椎心之作，是他留給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

志綏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來信，提到「報章、雜誌評論褒貶不一」，最後說「這都無所謂，總算了卻一件心事，略慰慎嫻於地下」。今天，他的遺體和他的書一起，與嫻姐合葬在芝加哥郊區一座墓園。志綏匆匆地走了，死得有點蹊蹺，但他的書一定會長存。

敬悼翻譯大師戴乃迭

去年十月回北京，曾專程前往友誼賓館探望楊憲益和戴乃迭夫婦。久別重逢，自然感到格外溫馨。可是看到乃迭病體支離，想到她多年來的慘痛遭遇，連一句安慰的話也說不出口。萬里之外聽到她於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在北京去世的惡耗，雖不完全意外，仍不禁悲從中來。

早在一九五二年夏，我就有幸和他們夫婦相識。當時我在北京西郊的燕京大學任教，奉派參加「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的英文翻譯工作。到北京飯店報到後，第一頓午飯是在附近的歐美同學會吃的，鄰座是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西洋女士，我自然地用英語和她攀談。不料她卻講起漢語來，字正腔圓，將了我一軍。我去國多年，回歸還不到一年，漢語講得還遠不如她，真感到汗顏。我對國內英語界的情況更不甚了了，有眼不識泰山，原來她就是楊憲益的英籍夫人戴乃迭，英語界泰斗級的大師。

後來才知道，抗日期間，楊憲益在天津高中畢業後游學英倫，在牛津大學和戴乃迭同窗。她的父親是一位漢學家。她出生在北京，五、六歲時才隨雙親離開中國去英國，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數年相交，她和憲益成為志同道合的情侶。牛津學成，新婚燕爾，她就隨同憲益兼程來到烽火連天的異國，和她鍾情已久的中國人民並肩戰斗。面對這位溫文爾雅的外國友人，她當年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人，把自己的青春和前途獻給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事業，十多年來，不管生活如何艱苦，始終不渝，怎不令我這名姍姍來遲的游子肅然起敬！

後來他們夫婦留在外文局工作，戴乃迭除了英譯大部頭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還主持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的編輯工作，向國外介紹現、當代中國文學，不但在首都聲望日隆，而且蜚聲國際了。而我從五十年代中期就入了「右派」另冊，流徙邊陲，和他們失去了聯係。

八十年代初期，我重返北京工作，才有幸和他們重逢。這時，我從友人處聽到他們全家在文革期間的浩劫，真是觸目驚心。兩位舉世聞名的翻譯家，不僅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掃帚橫掃的對象，而且戴上英國特務的高帽子，雙雙鋃鐺入獄，在半步橋監獄一蹲就是四年。家也封了，三個未成年的孩子，一男

兩女，無家可歸，還成了「革命小將」肆意凌辱的小「英國特務」。在紅色恐怖的無情摧殘之下，他們的獨子終於神經失常，被他們的一位英國友人帶到倫敦去治療。及至父母出獄還家，方得知愛子已在友人家縱火自焚。戴乃迭的喪子之痛，我簡直不敢想象。這是輕描淡寫的「平反」、「道歉」所能彌補於萬一的嗎？

乃迭和憲益好客善飲。百萬莊寓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我也不時應召敬陪末座。乃迭的話不多，但一開口就不乏機智與英國式的幽默。她總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酒，有時候沒等開飯她就醉倒了。可是，醉也罷，醒也罷，她在談話中從來沒提過他們在文革中的劫難，從來沒提過她的喪子之痛，從來沒有怨天尤人，顧影自憐。一杯在手，若無其事。面對如此堅強的女性，我怎能不肅然起敬！但是，我再麻木不仁也能痛感到，她的旎暝谑茈 y，在泣血。幾十年來，她和她熱愛的中華民族同命運，共呼吸，又一同度過了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她深情的靈魂能不為中華民族在受難，在泣血嗎？

戴乃迭是無比堅強的。劫後餘生，她並沒有一蹶不振，卻又重新投入中國文學的翻譯事業。她和憲益合作，終於完成了被「文革」打斷的《紅樓夢》的英譯，一九八七年出版，留下一座豐碑。又相繼譯出了沈從文的《邊城》、古華的《芙蓉鎮》等等一本又一本名著。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一向以散淡聞名的楊憲益，拍案而起，通過英國廣播公司，慷慨陳詞，聲震寰宇。英國駐華大使因此關心他們今後的處境，立即派官員到他們的寓所，表示如果他們願意去英國，使館可以馬上為憲益辦好簽證。戴乃迭馬上斬釘截鐵地答道：「憲益沒有犯甚麼錯。他不會走，我也不會走。」不過，憲益還是被文化部的新左王開除出黨。他是三年前才入黨的，當時我開玩笑用英語問過乃迭：「憲益入黨了，你有甚麼感受？」她用漢語慢條斯理地回答我說：「我們的朋友們說，憲益本來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現在沒有甚麼意思了。」我笑著說：「這是哪兒的話？楊憲益永遠是楊憲益。」憲益被革教門之後，我又跟乃迭說：「楊憲益現在不是更有意思了嗎？」它聽了哈哈大笑。

半個多世紀以來，戴乃迭和楊憲益合譯以及她獨譯的中國文學經典和現、當代名著，洋洋數千萬言，嘆觀止矣！但最難能可貴的卻是：雖然對共產中國存過幻想，經受過歷次政治運動的煎熬，直至身陷囹圄，家破人亡，但她畢生對中國人民和

文化的熱愛卻矢志不移，歷久彌堅。她非凡的成就和獨立的品格不是那些號稱中國人民的朋友的 3S（斯諾、斯沫特萊、斯特朗）之流所能企及的。這些美國記者當初也曾滿懷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熱情，無奈由於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沼，視野扭曲，長期用片面的報導給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斗爭幫了倒忙。戴乃迭在北京開始了她的人生歷程，又在北京結束了她獻給中國人民的一生，她才不愧為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

董樂山和《一九八四》

自從一九九零年夏天來美，身不由己一直有國難歸。去年十月，有友人約我從華盛頓回北京去講學，我一口就答應了。

八年中，多少至親好友一個接一個謝世了。遠一些的不說，前年六月，董樂山從北京寄來《汪曾祺悄然歸去》的剪報。曾祺和我相知六十多年，九零年夏我離京前曾到他家去告別，本以為不過是又一次小別，相約重見時一醉方休，誰料到竟成永訣。

我自忖，不知何年何月還鄉，「訪舊半為鬼」，禁不住黯然神傷。而當時樂山本人正為肝硬化所苦，更讓我揪心。後來得知他的肝硬化已惡化為肝癌，相隔萬里，除了不時打個電話慰問一聲，我痛感到一籌莫展的悲哀。

去年早些時候，他在紐約的哥哥鼎山告訴我，樂山的主治醫師向他的家屬透露，他已餘日無多了。我多麼想再見到他，重溫我倆一見如故的友情，盡管於事無補，也許可讓久別的知己暫一忘卻病痛。去年九月，我返京的行程確定後，就打電話告訴他，雖遠隔重洋，我也能聽出他的興奮是溢於言表的。

十月六日抵京，安頓下來，安排好有關講學的事宜後，十日就由老友、《英語世界》主編陳羽綸驅車陪我和怡楷一道去探望樂山。他還住在老地方，中國社科院在團結湖北里的宿舍。

八年不見，房子和主人都老了不少，但樂山還是那副溫文爾雅的老樣子。雖然面容清瞿，卻並無病入膏肓的跡象，說話仍是那麼平和喜人，談到自己的病情也毫無怨艾。我們沒有久坐，因為事前聽說他已尊醫囑謝客了。臨別前，他送我事前已簽好名的兩本譯著、《一九四八》和《奧威爾文集》，兩本散文集、《文化的兆 x》和《邊緣人語》。

我們久別重逢，又是他惡疾纏身的時刻，自然都感到依

依不舍。我說過幾天再來看他，他立即喜形於色。十五日上午，沒有安排講學。我又搭了計程車去他家，他和夫人都十分高興，談了一陣之後，他們冒著小雨請我到附近一家上海館子去吃飯。說是附近，走過去也花了十多分鐘，看著他若無其事地在泥濘、凹凸不平的便道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後來吃飯時看他胃口很好，我私心倒感到有點寬慰，也許那位主治醫師過分悲觀了吧。

月底離京返美前，我打電話和他告別，說明年打算再回來看他，他聽了很高興。返美後，十一月中去電話，聽他說患了感冒，有燒不退。十二月初，又去電話，聽他說話很吃力，嗓音嘶啞，他說周身疼痛，有腹水現象，我才感到事態嚴重。聖誕節和新年，我往常總打電話給他拜節。這一次我躊躇再三，幾次拿起話筒又放下了。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鼎山兄從電話中傳來了惡耗：樂山已於當晚北京時間八時十分去世。一代翻譯大師終於從肉體病痛的煎熬解脫了，但是縱觀他一生的追求、挫折和幻滅，樂山是雖死也難以瞑目的。

董樂山，一九二四年生，在上海上中學時就向往「社會主義革命」，參加「民先」，後入聖約翰大學英文系，一九四六年畢業。在此期間，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影響，對「社會主義革命」更充滿了憧憬。我不知道他是何年何月入黨的，只知道「解放」後他進入新華社國際部從事翻譯工作，頗受重用，不料五七年上了「陽謀」的圈套，被戴上「右派」的棘冠，從此打入了「賤民」的深淵。

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夾著尾巴做人」，又趕上「十年浩劫」，理所當然當上了「牛鬼蛇神」，批臭斗臭之餘，再次押送農村勞改。後來在勞動中摔斷了胳膊，奉命回京給一些幹部補習英語。塞翁失馬，他竟然能在家裏的劫灰中找到一本六十年代和別人合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的英文原著。

在久經劫難之後，重睹這部納粹極權主義滅絕人性的罪惡史，震聾發聵，更加深了他對現實痛定思痛的反思。於是，他發揮當年參加地下工作的本領。秘密地夜以繼日重新修訂這

部名符其實的近代史巨著。「文革」過後，他的譯稿終於付印，但僅限內部發行，供高幹參考。八十年代初，這部翻譯巨著終於公開發行，立即在全國不脛而走，給浩劫餘生的人們上了似曾相識的一課。

接著，他出了《西行漫記》的一個新譯本，銷了一百六十萬冊。這本當年名噪一時的書曾使他對社會主義心向往之，現在卻為人們三、四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提供了觸目驚心的強烈對照，也為他的譯事提供了新的動力。他接二連三譯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統治的《正午的黑暗》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政治恐怖預言小說《一九八四》，近年又出版了《奧威爾文集》。

從斯諾到奧威爾，從《西行漫記》到《一九八四》，這不是一個翻譯家無所謂的選擇，也不是甚麼思想的飛躍或突變，而是勾畫了一個始終關注中華民族和人類終極命運的智者曲折的心路歷程。

「一九九一年酷暑」，樂山抱病寫了《奧威爾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對奧威爾的一生和這部二十世紀政治預言經典作了精闢的論述：

奧威爾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謂反共作家，《一九四八》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作品。……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斗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一九四八》與其說是一部影
射蘇聯的反共小說，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才走到這一步的。

譯者本人何嘗不是如此！奧威爾的覺醒是從一九三六年參加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斗爭開始的。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大敵當前，打著社會主義幌子的極權主義霸主卻忙於千方百計地消滅有獨立思想的、不跟著指揮棒轉的異己。他傷透了心，但卻「堅定了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而且明確了是哪一種社會主義，那就是主張政治民主和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反對一切變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董樂山的覺醒較諸奧威爾是更加艱辛和來之不易的。歷經「反右」、「文革」、「六四」等等無止無休的血腥洗禮，他終於參透了極權主義的恐怖政治，在靈魂受難的「酷暑」寫下了他的政治遺囑：

二十世紀是個政治恐怖的世紀。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陰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價值。是否可以說，對我們來說，只有徹底否定了諸如「文化大革命」這類恐怖的極權主義，才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斗的人，帶來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會主義。

董樂山沒能看到畢生為之奮斗的理想成為現實，齎志而歿，抱恨終天，難怪他臨終囑咐要將他的骨灰安葬在異國他鄉一處乾淨的土地上。

紅色中國文學翻譯家的命運

「文革」後二十多年來，漢譯西方文學作品在中國大陸擁有相當廣大的市場，其中包括老一代的翻譯家的經典譯著。千千萬萬的讀者從長期文化禁錮中解放出來，如饑似渴地從禁果中吸取養分，但是有多少人會想到，在這些一部部精湛的譯著後面，掩藏著多少譯著者本人可歌可泣的故事。

「解放」初期，國事千頭萬緒，上面也許還顧不上來抓文學翻譯這般小事，文學作品翻譯工作一時還「放任自流」。久負盛名的法國文學翻譯家傅雷精心翻譯的巴爾扎克巨著《人間喜劇》選集一本接一本出版，也是出自他生花譯筆的羅曼‧羅蘭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成為大學生人手一冊的寶書。老作家蕭乾，四九年謝絕劍橋大學之聘，毅然從香港返京，先在英文《北京周報》工作，後來主持《譯文》月刊（後改稱《世界文學》）的編務，並親自動手翻譯了十八世紀英國小說家亨利‧菲爾丁的巨著《湯姆‧瓊斯》和捷克近代諷刺小說《好兵帥克》，這兩部譯著成為不同風格小說翻譯的典範。

五十年代初期涌現出一批優秀的青年文學翻譯家。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精通英文和俄文，一九五三年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成歸國，在南開大學外語系任教。他衷心希望「為祖國的文化繁榮多做貢獻」，利用全部假期和業餘時間，翻譯俄國和英國文學經典著作。在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八年底的短短五年中，他出版了直接從俄文翻譯的季摩菲耶夫著《文學原理》四卷、普希金的代表作《歐根‧奧涅金》等多部長篇敘事詩、普希金抒情詩五百首、《別林斯基論文學》等。在同一期間，還出版了英國詩人拜倫、布萊克、濟慈、雪萊等人的抒情詩選。

北京大學西語系年青的英語教授吳興華，才氣橫溢，學貫中西，十六歲時發表的新詩當即被譽為「中國新詩的轉折點」。「解放」後，「追求進步」，放棄寫詩，致力於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莎士比亞，深得黨組織的歡心。在五十年代中期，他用詩體翻譯的莎士比亞歷史劇《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先後問世，立即成為文學翻譯的經典。

一九五七年「北京之春」曇花一現，文學翻譯家也紛紛墮入偉大陰謀家精心策劃的「陽謀」陷阱。傅雷多年來「追求進步」，寫給遠在波蘭的長子傅聰的每封家書中對新中國都贊不絕口。「反右」一聲炮響，他在上海竟首當其沖，成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蕭乾自四九年歸國後也一直「追求進步」，這時已擔任《文藝報》副主編，「大鳴大放」期間奉命組織文藝界座談，不料竟犯了「扇風點火」罪，何況在舊社會還反對過左翼文學，理所當然戴上了「右派」帽子。吳興華從十六歲考上燕京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一直在燕園埋首學術，歷史一清二白，多年來更是「思想進步」的典型，這時已提升為北大西語系副系主任，「鳴放」時曾質疑在英語教學中也要向「老大哥」學習，犯了「反蘇反共」罪，也劃為「右派」。

穆旦在「鳴放」期間未發一言，幸免於「右派」之難。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憑空落在一位萬里回歸的愛國詩人和文學翻譯家的頭上！由於一伙為虎作倀的宵小的陷害，他竟然被法院判決「接受機關管制三年」，逐出講堂，到南開大學圖書館「監督勞動」。

西方文學名著也隨之遭殃。《約翰・克利斯朵夫》和女詩人楊苡翻譯的英國小說家埃米莉・布朗蒂的經典小說《呼嘯山莊》均被列入腐蝕青年思想的「大毒草」，因為有一些大學生被劃為「右派」，被迫檢討「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根源時，曾歸咎於這兩部小說的影響。一時間，紛紛揚揚，草木皆兵，北大文科學生竟然還煞有介事出版了批判小冊子，開「文革」期間無理可喻的「大批判」的先河。這兩棵「大毒草」和其它眾多「毒草」，從圖書館書架和新華書店貨架上消失，外國文學翻譯事業日漸蕭條。

更荒唐的是，一旦劃為「右派」或「歷反」，文學翻譯家不但從專業工作崗位上放逐，而且被剝奪發表譯著或任何其它作品的權利。然而，身為「賤民」，他們對文學翻譯仍然「從一而終」。傅雷閉門謝客，繼續不斷修訂《人間喜劇》選集的譯文，並完成了巴爾扎克巨著《幻滅》的翻譯。吳興華被

逐出課堂，閉門從義大利文翻譯但丁的《神曲》。據穆旦的子女回憶，他在三年管制期間「完全停止了譯著，中斷了與親友的書信往來，對厄運緘口不言。」六二年解除管制後，仍在圖書館「監督使用」。盡管環境如此惡劣，心情抑鬱，穆旦開始利用工餘時間，夜以繼日翻譯拜倫的頂峰之作、兩萬行的敘事詩《唐璜》。

董樂山是文學翻譯家中的後起之秀。他「解放」初期進入新華社國際部當一名普通英文翻譯，後主持翻譯工作，五七年被劃為「右派」，下放「監督勞動」。六零年「摘帽」後回到新華社工作，倡議並和李慎之等八位同仁利用業餘時間，合譯美國記者 William Shirer 的巨著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譯文《第三帝國興亡》長達二百六十萬言，由樂山統一校改。一九六三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作為「內部讀物」發行，不但無稿酬，而且譯者也不得署名。

及至「文革」浩劫來臨，連無償無名的文學翻譯也無從問津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聖旨一下，「有前科」的文學家，包括「摘帽右派」和解除管制的「歷反」，無一幸免。在上海，傅雷夫婦不堪「革命小將」的百般凌辱，忍無可忍，於九月三日夜間雙雙含恨自裁，遺囑中還留下現鈔五十三元五角作為火葬費，時傅雷年僅五十八歲。他的摯友周煦良教授也是著名文學翻譯家，當時也是「橫掃」對象，驚聞傅雷夫婦噩耗，於九月五日含淚寫下《吊傅雷》：「一街南北過從頻，倉促誰知共隔死生，未必精魂來入夢，擁衾黑坐苦思君。」

在北大風光旖旎的燕園，吳興華在烈日下勞改，口渴難堪，喝了監工的學生從未名湖中舀起的一碗濁水，數小時後倒斃，年方四十五歲。在北京市內，日本古典文學翻譯家錢稻孫被紅衛兵抄家，連床都抬走了。七十九歲的老人被打翻在地，沒多久就被迫害致死。

幸免於一死的，也逃不了掃地出門、長年批斗勞改。蕭乾是老北京，此時此際，在偌大的京城竟無立錐之地。董樂山在批臭斗臭之餘，再次押送農村勞改。以英譯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名著蜚聲國際的楊憲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以莫須有的「英帝特務」罪名，雙雙鋃鐺入獄，一關就是四年，出獄後方

得知他們無家可歸的獨子在紅色恐怖的無情摧殘之下，神經失常，已縱火自焚喪身。

　　「九葉派」詩人袁可嘉曾多年參加《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又為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翻譯當代詩歌和小說，後調入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一向兢兢業業。尼克松訪華之後，他當年在西南聯大的同學、美籍中國文學專家許芥煜教授來京訪問，準備用英文撰寫《中國文藝界》一書，不時向他瞭解國內文藝界的情況。九三年七月，許教授以「特嫌」罪名被驅逐出境，袁本人則被定為犯有「為美國間諜提供情報的反革命罪行」，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帽子抓在群眾手裏」，公開批判，展覽罪行圖片，在外文所接受監督勞動，直到「文革」結束後才平反。

　　在天津，穆旦在南開大學遭到沒完沒了的批斗和抄家。六六年八月一個夜晚，一伙紅衛兵在他家門前燃起一堆篝火，把他的書籍和文稿付之一炬。穆旦從早上就被抓走，被批斗了一整天，直到午夜才疲憊不堪地回家，頭髮已被剃成「陰陽頭」。他對身外之物並不介意，只怕他心血結晶的《唐璜》譯稿遭逢不幸。他在滿地凌亂的雜物中搜尋，竟然發現散亂的譯稿奇跡般地幸免於難。

　　六八年八月，穆旦全家六口人被掃地出門，擠在一間十七平方米的東屋裏。六九年至七一年，先後在農村和「五七幹校」勞改。七二年回圖書館勞動，無家可歸，借學生宿舍一間小屋子暫住。一天勞動後，長夜孤燈，繼續翻譯《唐璜》。七三年底整理、修改、注釋完畢，用牛皮紙將一千頁的譯稿包好，試探性地投寄給北京人民出版社，次年中接到覆信，稱「《唐璜》譯文很好，現尚無條件出版，原稿社存。」

　　七四年至七六年，穆旦翻譯英國現代派詩歌，修訂普希金抒情詩和《歐根・奧涅金》。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心臟病突發，二十六日凌晨逝世，享年僅五十八歲。人死了，迫害卻仍在繼續。次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出版《唐璜》，南開大學那一伙落井下石的讒佞之徒又以譯者「有嚴重歷史問題」為藉口，跳出來橫加阻撓。

莫須有的「歷史問題」解決以後，八零年七月，穆旦當年在「監督勞動」之餘嘔心瀝血翻譯的《唐璜》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立即成為公認的文學翻譯的經典。後來，他的骨灰在北京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安葬時，陪葬的正是一部《唐璜》。

董樂山在農村勞改中摔傷胳膊，奉命回北京給一些幹部補習英語。七二年夏得悉人民出版社決定再版《第三帝國興亡》，以三聯書店名義出版，仍是「內部讀物」，既無稿酬，也不署名。董樂山並不計較，又用一年時間對全書校訂了一遍，七三年出版。「文革」後，世界知識出版社復業，這部巨著得正式以該社名義出版，並對外公開發行，以董樂山為首的九位譯者的大名也都印在卷首。此書一經面世，立即在全國不脛而走，給浩劫餘生的人們上了似曾相識的一課，董樂山作為翻譯家的名聲也由此確立。

一九七九年，樂山應三聯書店之約，重譯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這本當年名噪一時的書曾使他對共產黨心向往之，現在卻為人們三、四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提供了觸目驚心的強烈對照。一九八四年，他出版了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政治恐怖預言小說《一九八四》，八八年又出版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統治的小說《正午的黑暗》。從《西行漫記》到《一九八四》和《正午的黑暗》，這恰恰勾畫出翻譯大師一生的心路歷程。

「文革」十年浩劫之後，幸存的老一輩翻譯家寥若晨星。他們以老耄之年的劫後餘生，重新投入熱愛的文學翻譯。在上海，巴金歷盡殘酷斗爭之苦和喪妻之痛，終於譯完了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他說：「我每天翻譯幾百字，我仿佛同赫爾岑一起在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暗夜裏行路，我像赫爾岑詛咒尼古拉一世那樣咒罵『四人幫』的法西斯專政。」

在北京，楊憲益夫婦，置多年的牢獄之災和喪子之痛於度外，完成了被「文革」腰斬的《紅樓夢》英譯。美國文學專家、北京大學教授趙蘿蕤，早在三十年代就翻譯過美國詩人艾略特劃時代的長詩《荒原》，她的丈夫、著名詩人和考古學家

陳夢家在「文革」中不堪紅衛兵輪番武斗，自殺身亡，蘿蕤本人的精神分裂症也隨之加劇。「文革」後，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竟在一間不到十平米的住房內，完成了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巨著《草葉集》的翻譯，《紐約時報》曾為此在頭版專題報導。

袁可嘉在七九年平反之後，除了出版《彭斯詩鈔》等三部譯詩外，又主編了《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多卷，對新一代作家的成長頗有影響。蕭乾在《翻譯—我最後的一根稻草》一文中，回憶「文革」期間身在困厄之中，唯有翻譯給了他一些有意義工作的機會。九十年代初期，他以近九十的高齡，和夫人文潔若合作，譯完了二十世紀英語小說的頂峰之作、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長篇巨著《尤里西斯》。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五十年來，多少鍾情文學翻譯的有志之士，不折不撓，前仆後繼，用自己瘡痍滿目的生命和錦繡才華編織成一件件彩色斑斕的翻譯藝術珍品。繼傅雷、吳興華、穆旦、錢稻孫等大師暴亡之後，近年來，趙蘿蕤、董樂山、蕭乾、戴乃迭等大師也先後謝世，文學翻譯史上一個血淚斑斑的時代即將結束，但這些「雖九死而不悔」的翻譯大師們留下的一座座豐碑將為中國大陸「人的現代化」繼續作出獨特的貢獻。

交響人生-紀念指揮大師李德倫逝世一周年

一九七七年三月下旬，我還在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任教。一天下午，閑來無聊，我遛到一位中學教師家去串門兒。和我一樣，他也是五七年「反右運動」的犧牲品。朱老師原是上海政法學院的專業教師，戴上「右派」帽子後流放到蕪湖，「摘帽」後服從分配留在當地，到一家中學教英語。我倆一見面就發起牢騷來，說「文革」雖已結束半年，文化生活仍然死氣沉沉。他家已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多少可以消遣，可是他說：「電視節目還是老一套，除了宣傳還是宣傳，也沒甚麼好看的。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是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紀念，世界各國都舉行紀念音樂會，咱們卻無聲無息。」我說：「『文革』期間，貝多芬受過批判，還沒平反哩。」不過，朱老師知道我下崗多年，家裏窮得連一臺收音機也沒有，更別提高檔商品電視機了。於是他打開了電視機，調到中央臺，也讓我消遣一下。怎麼也沒料到，我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的竟然是中央樂團演奏貝多芬的 C 小調第五交響曲《命運》，擔任指揮的是著名指揮李德倫。《命運》驚天動地的旋律震撼了我們久經禁錮的心灵，我们相顧無言，淚如雨下。

「文革」以前，李德倫曾多次指揮過《命運》交響曲，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演出。可是，這一次演奏卻是不同凡響。不僅十年浩劫期間，西方古典音樂被打入冷宮，而且這次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的演出，直到上演前夕才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多難啊，一部在文明世界家喻戶曉的經典交響曲，要在「撥亂反正」的中國大陸上演！年已花甲的李德倫，他打了多少報告，跑了多少趟衙門，費了多少唇舌，冒著多少挨批挨斗的風險，才為交響樂爭得了重返中國樂壇的權利。一曲《命運》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喪鐘，一曲《命運》喚醒了萬馬齊喑的文化沙漠，一曲《命運》也歌唱著李德倫的交響人生。

李德倫鍾情交響樂由來已久。早在他一九四零年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之後，一九四四年，音專還沒畢業，他就組建了「中國青年交響樂團」，當時就演奏過貝多芬的第五和第六交響曲。與此同時，他追求進步，早就加入了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李德倫帶著歐陽予倩捐贈的樂器和自己的大提琴、樂譜等搭乘一架「調處執行部」的美國 C47 型飛機飛往延安，樂譜中就有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總譜。在延安，

雖然一九四六年七月新建了中央管弦樂團，但是根本不可能搞甚麼西洋交響樂。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李德倫身穿解放軍的土布軍服，滿懷豪情，帶領中央管弦樂團隨大軍進入北平。解放以後，他認為可以踏踏實實地搞音樂了。他忍不住在心裏問：「難道貝多芬的作品裏有毒嗎？老百姓聽了會中毒？怎麼就不能演交響樂呢？」可是，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他的願望與現實格格不入。

一九五三年八月，李德倫奉派隨同第一批中國學生一千人到達蘇聯留學，在莫斯科音樂學院開始了研究生生涯，學習指揮，為期四年。在几位著名的蘇聯指揮教導下，他的指揮藝術突飛猛進。作為一名優秀研究生，在莫斯科多次舉行個人音樂會。一九五五年秋開始，由國家巡回演出局安排，他先後到一些大城市演出，曲目往往包括《命運交響曲》。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音樂大廳舉行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三十週年音樂會，由他指揮蘇聯第一流的國家樂團，演奏《埃格蒙德序曲》、《第五鋼琴協奏曲》和《命運交響曲》。

在莫斯科深造期間，李德倫深受俄羅斯人民對交響樂的熱愛感染，決心回國後大力推廣交響樂。誰料到，一九五七年九月，懷揣著滿腹的理想回到北京，正趕上「反右運動」高潮，有人檢舉他在蘇聯期間的「錯誤言論」，李德倫受到嚴厲批判，幸免於一頂「右派」帽子。一九五八年一月分配到中央樂團擔任指揮，在一次次政治運動和音樂界「土」與「洋」兩條路線斗爭中，想方設法促進交響事業的發展，先後在北京等大城市指揮過若干西方古典交響曲的演出，其中包括貝多芬的第五、第六、第九交響曲和蕭斯塔科維奇的第五、第六、第十一交響曲。每次正式演出前，李德倫為聽眾介紹交響樂和其中的各類樂器，深入淺出，十分風趣生動，這是他在普及交響樂過程中的一個創舉。

好景無常，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毛澤東接二連三對文藝界作了批示，痛斥「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藝術，卻不提倡社會主義藝術。」音樂界的左派便認定「交響樂是一個有史以來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頑固堡壘」，「洋、古、大」的交響樂立即銷聲匿跡。李德倫感到無所適從，憂心如焚，勇敢地提出「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把交響樂搞下去。」

他哪里料到，「文革」浩劫臨頭，不僅外國音樂一律禁演，交響樂成了「大毒草」，李德倫本人和中央樂團其他黨委

成員都成了「黑幫」分子、「牛鬼蛇神」，批斗、勞改、抄家、關「牛棚」是家常便飯。到了運動中期，江青為了「革命樣板戲」要搞「洋為中用」，便「解放」李德倫，交給他用交響樂為《紅燈記》、《沙家浜》等革命京劇伴奏的任務。李德倫苦心孤詣在夾縫中求生存，藉此為交響樂保存一線生機。一九七二年，基辛格訪問北京，中央下令要中央樂團為他舉行音樂會，李德倫明知樂團業務荒疏，但這是政治任務，他也不得不倉促從命。在選擇曲目時又踫上難題，李德倫提出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卻被江青否了，她認為《命運》是歌頌「宿命論」的。李德倫無可奈何，指揮中央樂團湊合著演奏了《田園交響曲》。他痛感到演奏質量不高，一九七三年，竟冒著重新挨批挨斗的風險，指揮樂團練了十個交響樂作品。

「改革開放」以後，李德倫不失時機，不顧來自「極左」的干擾，重新為普及交響樂奔波。一九七九年，他提出了一個交響樂工作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立一個專業的音樂廳；除排練規律化外演出也要規律化，要有一年一度的音樂季；普及工作以交響樂為主，不能改行；加強國際交流」等等。一九八零年，中央樂團一共排練演出了二十六套節目，超過了以往二十几年的總數。在對樂團提高的同時，他還在北京和全國其它大、中城市作交響樂欣賞講座，每年平均要講五十次。一九八六年一月四日，李德倫為之奮斗多年的北京音樂廳終於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從此交響樂在北京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德倫除了在北京市內和郊區指揮中央樂團演出，還到其它大、中城市指揮當地的樂團演出，而且率領中央樂團到台灣、香港和澳門訪問演出，曲目包括貝多芬的《A 大調第七交響曲》、柴可夫斯基的《降 b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鳥》等等。

國際交流方面，李德倫多次應邀分別到美國、加拿大和一些歐洲國家進行指揮演出。許多世界著名的音樂家相繼來北京訪問。一九七九年春，著名指揮小澤徵爾率領的波士頓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合作演奏了《命運交響曲》。隨後，美國著名的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與李德倫合作演出了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的兩個小提琴協奏曲。斯特恩還帶來了一個攝制組，把他的所有排練、演出、教學活動都拍攝了下來。這個紀錄片《從毛到莫扎特》在美國和中國都轟動一時，並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二十年後，斯特恩應北京國際音樂節的邀請再次訪華，並與李德倫合作演出當年他們曾經演出過的莫扎特

《G 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李德倫年逾八旬，體胖多病，又值肺炎大病初愈，坐在輪椅裏由四名弟子推上指揮臺，和白髮蒼蒼的斯特恩實現倆人二十年前的相約，共同奏響了一曲「世紀絕響」。

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九日，久病的李德倫在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聲中謝世。後來，一部《命運交響曲》的錄音伴隨他的骨灰下葬。他在病中對女兒說過：「我一生就做了一件事：發展中國交響樂。」他的交響人生是一次艱苦卓絕的長征，萬水千山，鞠躬盡瘁，李德倫無愧於中國大陸「交響樂之父」的稱號。

銀翘集—楊憲益從入黨到出黨的傳奇

一

楊憲益和英籍夫人戴乃迭是舉世聞名的翻譯大師，英譯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作品達數千萬言，其中尤以《老殘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經典著作的譯文蜚聲國際。而憲益也長於舊體詩，則是除至親好友外鮮為人知的事。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我就有幸在北京和他們夫婦結識，當時我們一道在一次國際會議中擔任翻譯工作。後來他們在首都聲望日隆，而我從五十年代中期就入了「右派」另冊，流徙邊陲了。八十年代初期，我重返北京工作，有幸又和他們重逢。憲益好客善飲，百萬莊寓所「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我也不時應召敬陪末座，仿佛從未聽說他也是詩人。九四年上半年，我從美國到香港中文大學作客，寄寓逸夫書院雅群樓客舍，沒料到二月憲益夫婦也來香港講學，正好住在我樓上，久別重逢，自然欣喜莫名。更沒料到的是，《銀翘集》打印稿竟得先睹為快。

雅群一別經年，時深馳念，上月中喜得逸夫書院左冠輝兄盛情寄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印行的《銀翘集》，其中較打印稿又增新作十二首，可見詩興不減當年。詩集裝幀設計雅致，封面有黃苗子題字，封底有「湘西老刁民」黃永玉為「憲益兄有詩成集賀之以畫」，並有題詩：「主席呼來不上車，醉稱生鄙歪作詩」，令人愛不釋手。楊憲益學貫中西，能文能詩，卻自稱「我不會寫詩」，又稱「學成半瓶醋，詩打半缸油」。這決非矯情，而是出自他謙和平易的本性。他的打油詩雖「多半是火氣發作時寫的」，卻蕭灑自如。宛若其人。或自嘲，或唱和，或譏刺時務，或詠古諷今，無不幽默機智，妙趣橫生。然而，從頭到尾通讀之餘，對照作者的半生坎坷，又不禁令人感慨系之。

楊詩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戀黨情結」分不開的。他出身於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後就自費游學牛津大學達六年之久，可謂得天獨厚，前程未可限量。當時正值抗日烽火連天，他學成之後立即兼程回國，與祖國人民共命運。

及至身臨大後方，耳聞目睹的卻是當道窳敗，國勢危殆，報國無門。不少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都寄希望於中共，或奔赴延安鬧革命，或「身在曹營心在漢」，暗中為「地下黨」奔走效命。楊氏交遊中不乏文化界「進步人士」，按照「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黨」結成了患難之交。

按照常理，「患難之交恩愛深」，解放後他的入黨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決沒料到這竟成了個「老大難」的問題。昨天的「同路人」成了今天的「統戰對象」，官封南京市政協副秘書長，為黨的「統戰工作」效命。一九五二年調京城工作，又當上全國政協委員。他服從命令聽指揮，處處聽黨的話，工作兢兢業業，蜚聲中外，但這個黨還是不得其門而入。好在楊憲益要求入黨並非圖升官發財，而是書生氣十足，一廂情願，要與一個心向往之的「理想」認同，衷心耿耿，歷久彌堅。

「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中，他都受到沖擊。五七年雖幸免一頂「右派」棘冠，卻眼睜睜看著知識界精英紛紛墮入「陽謀」的滅頂之災，其中不乏他的舊雨新知。一年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鑼鼓登場，其後果是廢鐵如山，餓殍載道，他豈能無動於衷。然而，凡此種種，都未動搖他要求入黨的夙願。

豈料「文革」浩劫臨頭，這位「統戰對象」不僅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鐵拳頭的橫掃對象，而且夫妻雙雙鋃鐺入獄，在半步橋監房一蹲就是四年。這場冤獄，他全記在「四人幫」的帳上，有詩為證：

老夫不怕重回獄，諸子何憂再變天。
好乘東風策全力，匪邦餘孽要全殲。

此時的楊詩人意氣風發，溢於言表：「興來縱酒發狂言，歷盡風霜鍔未殘。」他年逾花甲，居然慷慨激昂，要為「解放台灣」投筆從戎：「何日金門殲困虜，體衰猶愿請長纓。」倒是「老右派」詩人荒蕪給他的浪漫豪情潑了冷水：「弱冠終軍頭已白，望洋何苦請長纓。」楊詩人也不勝感喟：

作詩入黨兩無成，只合文壇作散兵。
卅載辛勤真譯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入黨無成已是他的心病，八一年《祝賀女作家諶容入黨戲作一律》中又嘆道：「人到中年才入黨，事非經過不知難。」切膚之痛，躍然紙上。「文革」結束十年後，他已年逾古稀，對「光榮、偉大、正確的黨」依然是一往情深，「高山仰止」。

一九八六年冬，北京刮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暴，不但劉賓雁等老黨員被革教門，連黨的總書記也被罷了官，不久之後的一天晚上，我去長城飯店出席《時代》周刊為歡迎新到任的北京分社社長舉行的酒會，憲益夫婦先我而至。一見面，憲益就笑呵呵地說：「祝賀我吧，我入黨啦！」我明知故問道：「哪個黨？」他說：「當然是共產黨嘍。」我又存心將他一軍，問道：「為甚麼？」他毫不介意我的玩笑，反而若有所悟地笑道：「你問得有道理。我是民革中央委員嘛。」我舉起手裏的杯酒和他踫杯，連聲說：「雙喜臨門，恭喜恭喜！」憲益人稱「酒仙」，又值老年入黨，夙願已償，「人逢喜事精神爽」，沒等我說聲「乾杯」，他的一杯威士忌就一飲而盡。我又問戴乃迭：「憲益入黨了，你有甚麼感受？」她用漢語慢條斯理地回答我說：「我們的朋友們說，憲益本來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現在沒有甚麼意思了。」我說：「這是哪兒的話？楊憲益永遠是楊憲益。」

大家都住在北京，不過他住市內，我住西北郊，難得見上一面，他入黨後有何作為，我一無所知。八九年春，北京民運如火如荼，知識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當時我因病住院，久未與憲益通音問，對他的「表現」一無所知。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天安門悲劇震驚全球，楊憲益拍案而起，慷慨陳詞，聲震寰宇。他知道這一下可犯了天條，這個來之不易的黨籍是保不住了，於是打報告申請退黨。他真不愧為書生氣十足，滿以為黨章上寫得一清二楚黨員有退黨的權利，實際上哪有那麼便宜的事，到頭來還是被惡狠狠地革了教門。事後我跟戴乃迭說：「楊憲益不是更有意思了嗎？」

二

大半生既為「戀黨情結」所苦，一葉障目，詩情枯竭。五十年代僅存七絕兩首，六十年代初中共發表「九評」討伐

「蘇修」，詩人不識時務，站在同情蘇共方面，寫過四首律詩，「文革」開始後被用作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現僅存頭兩句：「獵獵東風夜撼關，會看春色破層寒，」似乎有點未卜先知的弦外之音。六八年開始坐牢時作過一聯：「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對當代始皇帝焚書坑儒的豐功偉績有了親身體會。七二年出獄後，未見有詩作抒情。直到七六年「四人幫」覆沒之後，才有「興來縱酒發狂言」的豪言壯語，到八九年三月為止共存詩約六十首，其中偶見憂時諷世之作。八一年有《赴宴東城豆花飯莊》七律一首，前六行寫都中文士宴飲之樂，頗見雅興風流，末聯筆鋒一轉：「千金一擲豪門宴，川北江南正斷糧」，足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媲美。八九年春，北京陰霾逼人，新黨員楊憲益雖然「餘年尚喜身無恙，盛世何憂網更張」，卻不能不正視冷酷的現實：「特權壟斷都該死，萬馬齊喑究可哀」、「教授如今成餓殍，豪商多半靠高官。」

但是，《銀翘集》的主體，共一百餘首，佔總數過半，都是九十年代的新作。「六四」的震撼、「出黨」的沖擊，終於化解了他的「戀黨情結」。思想一旦解放，詩人的情懷境界也隨之升華。「出黨」後第一首詩作於一九九零年春節，事緣《許以祺兄邀宴以已故趙丹兄遺墨見示命題情意難辭愴然感賦》：

睹畫想風流，才高志未酬。
遺言見肝膽，即死亦千秋。

趙丹慘死使他愴然涕下，但此時此刻，惺惺惜惺惺，何嘗不是詩人自況。第二首、《無題》，作於同年三月：

母老妻衰畏遠行，劫灰飛盡古今平。
莫言天意憐幽草，幸喜人間重晚晴。
有酒有煙吾愿足，無官無黨一身輕。
是非論定他年事，臣腦如何早似冰。

則是新形勢下的「淡泊以明志」、「無求品自高」了。

縱然個人淡泊無求，「寂寞京華劫後身」，奈何國事日非，豈能視而不見，「飲酒莫談國家事」？詩人冷眼熱腸，憂心如焚，不得不「恃欲言無忌」了。九二年作《懷苗子郁風》，對「六四」以後的局面感到疾首痛心：

世事而今盡倒顛，羨君海外獲桃源。
迎來亞運強充胖，一見華僑便要淺。
人血饅頭難續命，狗皮膏藥豈延年。
會看三峽功成日，一片汪洋浪接天。

九三年秋有澳洲之行，返京後目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席卷神州大陸，錢海泛濫成災，生民涂炭，感慨益深。九三年有詩達五十首，時有椎心泣血之作。當時買賣外匯，下海混水摸魚，甚囂塵上，詩人痛加針貶，寓憤激於風趣之中：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銀元。
身無長物皮包骨，情有別鍾酒與煙。
沒有靠山難下海，行將就火快升天。
玉樓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錢。

七月所賦「銀行」則更進一步，矛頭直指貪得無厭、逍遙法外的權貴家族：

驚聞今日整銀行，兔死狐奔亦可傷。
自古有權方有勢，從來擒賊不擒王。
貪財終作喪家犬，獲利甘當替罪羊。
恨不生為太子黨，早攜巨款去留洋。

九月逢青海有水庫決堤，災民水深火熱，官府置若罔聞，詩人悲憤不能自已：

青海千村付濁流，官家只管蓋高樓。
江山今日歸屠狗，冠帶當朝笑沐猴。
舉世盡從愁裏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兒童不識民心苦，卻道天涼好個秋。

同時，權貴貪贓枉法，横行無忌，十月又賦《有感》再加鞭撻：

居然死水起微瀾，賠盡長城體未安。
自古貪污皆大款，而今調控靠宏觀。
早知肉腐蟲先在，誰道唇亡齒便寒。
總是自家妻女事，雷聲雖猛早收關。

放眼海內，但見官蝗肆虐，民不聊生，詩人四顧蒼茫，欲哭無淚：

美亞蘇歐一片糟，炎黃苗裔更無聊。
早知機遇遲難得，叵耐貪污膽更高。
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業換金條。
官蝗吃盡民膏脂，反道人民素質孬。

此時楊公已年近八旬，緬懷「過去所熟識的黨員馮雪峰等皆一時俊彥，多不得好死」，瞻念國將不國，情何以堪：

蹉跎歲月近黃昏，恃欲輕言無一能。
吶喊早成強弩末，離群猶念故人恩。
殘軀難見山河改，大廈將傾狐兔奔。
起應晚年餘涕淚，天涯尚有未招魂。

九四年新作中對古國與新邦作了沉痛的概括：「千年古國貧與弱，一代新邦假大空」，震聾發聵！而環顧左右，天下滔滔者皆是也，君子何以自處？詩人《自勉》曰：

每見是非當表態，偶遇得失莫關心。
百年恩怨須臾盡，作個堂堂正正人。

想當初一心一意要入黨，到如今夢碎酒醒，矢志不移要「作個堂堂正正人」，風雨悲歌長達半個世紀。這是詩酒風流的楊散人心路歷程的傳奇，也是《銀翅集》這本奇書所透露的「醒世恆言」。

「九死一生」話反右

一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反右運動」四十三週年。中共一貫用「反右擴大化」之類的謊言掩蓋事實真相，企圖讓人們忘記這段血腥的歷史。但是，已經覺醒的人們是決不會忘記的。近年來，記述這段歷史的著作開始出現，有宏觀的，有微觀的，頗值得關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狀的人們注意。在這些近著中，最動人心魄的一部要數戴煌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

戴煌，一九二八年出生於江蘇阜寧縣溝墩鎮，父親是中醫。少小時擔任過學校抗日兒童團團長。十六歲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共，隨軍轉戰蘇北，參加過白刃戰。一九四七年，開始任新華社隨軍記者。進城以後，他不過二十來歲，先後作為戰地記者被派往朝鮮和越南采訪，工作一再受到表彰。年青有為，「又紅又專」，戴煌在紅色中國前程似錦。

可是，滿懷革命豪情壯志，戴煌念念不忘的並不是個人前途，而是黨和國家的命運。一九五六年三月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不僅粉碎了他心目中斯大林這尊偶像，而且使他痛感到中國也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種現象「已對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有害的影響」。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的外事活動中，他親眼目睹了中共的「首長」們如何飛揚跋扈，享盡種種特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們又如何心安理得地乘機「海吃海喝」。而在蘇北故土，他卻看到這個飽經苦難的小鎮比當年更加荒涼破落，鎮內外鄉親們還有不少人貧苦不堪，受一群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新惡霸欺凌壓榨，有冤無處伸。

面對現實，戴煌憂心忡忡。回到北京不久，他大聲疾呼，無人理睬。一次，在家吃晚飯時，多喝了兩口酒，談起家鄉土皇帝、新惡霸，越說越憤慨，他就向妻子說：「如果我們黨內有個類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好了，專門來革黨內弊端的『命』就好了。」妻子隨即把他呲了一頓，說他想入非非。

同年十月，蘇軍鎮壓波蘭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他認為，發生這樣的流血悲劇，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蘇聯和本國的許多問題感到的不安和憤慨。他擔心，如果再不積極變革，中國也難免發生類似的悲劇。他「決心履行一名

共產黨員的義務，向黨的最高領導層敞露胸懷」，重點提出「神化與特權」的問題。於是，他著手給「毛主席並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寫一封長信。這時聽到了全黨即將整風的報告，他覺得「這封信沒有寫下去的必要，而把振興黨風的希望寄托在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上。」但是，這希望很快就完全破滅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整風運動」大張旗鼓開場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熱烈響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誰料到，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執筆的社論，公然背信棄義，吹響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正當戴煌感到惶惑時，中共領導人彭真給北京市黨員幹部做報告，說甚麼「『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他並代表黨中央保證，黨絕對不會把提意見的黨員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

戴煌深受鼓舞，於是在一次又一次鳴放會上「把一年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話與特權』。」當時他不可能知道，彭真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動員報告和保證，不過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他自投羅網，當上了新華社僅次於李慎之的「大右派」。「一夜之間，新華社大院裏就糊滿了五顏六色的檢舉、揭發和責罵我的大字報。我的妻子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要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大會小會批判。」戴煌不服，主動拿出了那封還沒寫完的給毛澤東的長信，「以昭心跡」。他再次自投羅網，這份「萬言書恰恰成了他「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他受到「二類處分」，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監督勞動；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剝奪軍銜。自五八年四月起，每月一五五.七五元的工資改為二十八元生活費。

這時，戴煌已是兩個小女兒的爸爸，大的才三歲半，小的剛滿十個月。妻子是十四歲就參軍入黨的戰友，現在提出離婚，小女兒歸她，大的歸爸爸。突然面臨妻離子散，戴煌也不得不同意，只待上級批准。小女兒隨外婆到大連去投親靠友，大的暫時跟媽媽。

四月中旬，戴煌和新華社另五位編輯難友到達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在農墾部王震將軍屬下的八五零農場云山畜牧場第三生產隊，和先頭到達的一些中央部門

的「右派」會合。這些「新相知」中，不乏知識界的精英和出生入死的革命軍人。其中有原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畫家楊角夫婦，《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漫畫家丁聰，美術評論家和書法家黃苗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卓如，老《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朱啟平，電影演員李景波、張瑩等。

戴煌用全書近一半的篇幅記敘了北大荒流放的全過程，字字血淚。「監督勞動」從一開始就是十分艱苦的。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風，樹枝編就的草炕擁擠不堪。吃的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麵饃，沒甚麼菜，甚至連鹽都缺少。最初的勞動，是在完達山腳下的田野上，十人一組，像牛馬一般拉拽二十四行播種小麥。隨後就修築名叫「五一水庫」的土壩。刨土、抬土、打夯，勞動強度很大，每天十幾個小時。負責監督的指導員朱大麻子蔑視和ムと说淖饑溃 _口閉口漫罵大家是「土匪」、「俘虜」，任意強迫大家餓著肚子延長勞動時間。耿直不改的戴煌建議停止強迫勞動和強制「放衛星」，朱麻子根本不理會，反而打擊報復。一天，由於凍土層太厚，五六個人一排猛打「排字鎬」，凍土也紋絲不動。眼看當天的土方任務無法完成，朱麻子決定爆破，匆匆派一人去給炸藥包安雷管，結果這個「右派」炸得粉身碎骨。

正當其時，北大荒的太上皇王震發出號召：「進軍完達山，拿下二十萬方優等木材，保證首都十大建築的需要，向新中國建國十週年獻厚禮！」各大農場立即組織起三千多名復員專業官兵，挺進完達山林區。云山畜牧場也派出一支由一百多名「右派」組成的伐木隊，深入完達山南麓的原始森林進行伐木大戰。「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沒見過原始森林啥模樣，更甭說對又高又粗的大樹拉大鋸劈大斧了。」「黨的領導」根本不顧「右派」的死活，倉促上馬，一味蠻幹，幾天之內就砸死了四個人，其中包括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經理劉琛，他是一九三六年東征中參加革命的。死者一律草草掩埋了事。

在朱麻子之類「黨的領導」下，戴煌和「右派」難友們成了地地道道的奴隸。口糧越來越少，勞動時間越來越長。耳邊聽到的是：「完不成定額，就不準吃飯，不準收工！」「就是天上下錐子，你們死也得死在這裏！」奴隸們被迫豁出命地從事力不勝任的勞動。戴煌常常仗義執言，頂撞「領導」，又對「三面紅旗」等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方針政策有所非議。他「強烈憎恨那些殘酷無情地強迫我們這些人以垂危之身『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農場奴隸主式的人們，也同樣憎恨我們這支魚龍混

雜的隊伍中出賣人性助紂為虐的鷹犬們！」他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多次受工傷，照樣強迫勞動。他們還一再組織批判會對他進行圍剿，威脅要送他去勞改，永遠不給摘「右派」帽子，等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山畜牧場集中全場三四百名「右派」，開第一次摘帽大會。被摘帽的約佔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戴煌得到的卻是對他最徹底的否定：「黨把他培養了這麼多年，可是他從戰爭到和平，從國內到國外，沒給黨幹過一件好事，反而練出了一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

這時每月的口糧已降到三十斤，人人不是苦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薰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奴隸！」他本人也得了浮腫病。有一次大便後，他就暈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蓋滿了鮮血的糞便旁，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才沒有被凍成「冰乃伊」。但他還得照樣參加燒炭「搶窯」的危險勞動，一次次被薰倒在窯內還在冒煙的木炭旁。若不是同窯的難友急救，他「也許在昏厥中就離開這個『悲慘世界』了。」

一九六零年五月，他們這幫一陣大風就能吹倒的人，又挑著沉重的行李和勞動工具轉移，途中由於不堪忍受的殘酷虐待又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佟藹成，原一機部子弟學校校長。妻子和他離了婚，給他丟下幾個孩子在北京，他根本養活不了他們。他極為愧咎與哀傷，曾在一座空炭窯裏自殺未遂。這次，他是用自己的褲腰帶，在一棵小樹上吊死的。第二位叫趙琪，也是四十來歲，原交通部幹部、共產黨員，也是被妻子所拋棄的人。他倒在半路上的水窪地中，「領導」拒絕救援，他就死在風雨地裏了。

其後一個多月，陰雨連綿。奴隸們淋著雨，在稀巴爛的地裏搶挖排水溝，每天定額二十立方米。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帶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為「泡將」，剝奪吃飯權，甚至捆罰打罵。戴煌不顧一切在會議上公開反對，爭取改善全體奴隸的命運。這時他本人沒有拐杖就不能挪步，每走一步，全身的骨節縫都痛如錐挖針刺。他悲觀絕望，疼得實在沒法忍受了，突然高舉起雙臂，瘋狂般地呼喊：「請黨來槍斃我吧！……黨如能早日結束我的生命，我將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笑三聲……」

一九六零年六月上旬，他應妻子的要求，辦了離婚手續，

反倒感到平靜一些。七月又患起了痢疾，還拉血，「魁偉壯實的大漢成了一根細長桿兒，體重由一百九十六斤銳減到九十二斤」。醫生著急要他立即住院治病，奴隸主們就是不批，他也不能歇。這時，每天的口糧定量只有七兩帶皮的原糧了，到了見吃如命的地步。晚上一下了工，四處找野菜，挖蘆根，掏鼠窩。

國慶過後，云山畜牧場場部決定在大雪封地之前，發起一場突擊收割大豆的「大會戰」，這種玩命的任務照例落在一百多名「老右」身上。飢餓浮腫的奴隸們挑著行李，踉踉蹌蹌地趕向小雲山，深夜才到達。十月三號這天是大會戰中的「大突擊日」，一天下來，「突擊隊」根本無力完成每人必須割完五畝大豆的「決死」令。直到天黑才收工，在風雪中東倒西歪地往回挪，一路上倒斃了七個人。其中有當年負責保衛天安門的高射炮營代理營長兼營參謀長孔祥忠上尉，還有在朝鮮戰場上立過戰功的馬競亮。七個「老右」的遺體捆在一輛平板馬車上，就拉到小平山的後坡去了，連張裹一裹尸體的草席都不給。

美麗的北大荒，一夜之間，成了慘無人道的死亡場。奴隸主們非但沒有從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訓，反而搬出老祖宗的家訓告誡奴隸們：「要斗爭，就得有犧牲！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會經常發生的！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壞人煽動！」他們繼續人性滅絕地作踐奴隸。與戴煌同屬一個班的共青團員羅相成已「三度浮腫」，醫生給開了病假條，排長卻逼迫他出工。小羅手裏拄根棍，在鵝毛大雪中慢慢向前挪。等他到達工地，已是開午飯的時間，排長破口大罵，不許他打飯。戴煌把自己少得可憐的口糧分給他一半，小羅還是奄奄一息，兩天以後「就長離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懷著他時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親」。

小羅死後不久，雲山畜牧場許多「老右」相繼成為餓殍。有的倒斃在路上，有的活活地餓死在集體宿舍的大通炕上。其中有解放軍軍官，有歸國華僑。除了餓死的和因餓而病死的，還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死亡場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農場始終沒有公布過。僅據一個隊的統計員、「摘帽右派」楊崇道中尉說，光是在他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底，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共決定中央各部門的「右派」，不論摘帽與否，一律離開距烏蘇里江太近的農場。其中回北京原機關的人，表現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現特別不好的，將由原機關加重處罰。戴煌屬於後者，但是他畢竟死裏逃生，離開了這死亡之海。他的一些難友，本來已全身「三度浮腫」，有的在回北京途中就死在火車上，有的「摘帽」以後也一個接一個死去了。

二

戴煌回到北京之後，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間，被派到新華社國際部搞資料工作。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破天荒做檢討，承認這些年「幹了一些蠢事」，還說甚麼「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於是，黨中央重新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時對黨內部份「右派」進行甄別平反。新華社黨組織動員戴煌寫材料，爭取甄別平反，作為對新華社總社近百名「右派」進行甄別平反的第一個「試點」。

戴煌深受鼓舞，懷著「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的決心，寫出了《回顧我這幾年所走過的道路》的材料，洋洋十萬言，重申了反對「神化與特權」的觀點，匯報了北大荒的遭遇與思考，並大膽闡述了對當前國內外主要問題的觀點。他相信毛主席和黨中央會「從善如流」，從此「改弦易轍」。黨組織對他慰勉有加，不久就通知他黨已決定對他進行甄別。國慶在天安門廣場上，他高舉紅旗，走在新華社隊伍的最前列，使他感到「無比興奮，無比溫暖」。誰料到，事隔僅僅一個月，毛澤東就再次背信棄義，徹底推翻了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檢討，聲嘶力竭地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打退翻案風」！戴煌再次自投羅網，他的「十萬言書」成了「翻案風」的典型罪證。經過六個月的準備之後，新華社從一九六三年「五一」到「七一」，舉行了一系列的大會小會，對戴煌進行了「再批判」。

在甄別平反有望的時刻，戴煌選中了一個出身貧寒、比他小十二歲的女工潘雪媛，準備重建小家庭。這個小有文化的姑娘當年曾從大字報上讀到過他關於「神化與特權」的論述，

認為他並沒有錯，因此對他目前的境況並不計較，「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再批判」之後，他倆都感到大難即將臨頭，在前妻拒絕復婚後，她決定與他立即成家，以備在必要時能夠正式以繼母的身份撫養這時已讀小學二年級的他的大女兒。一個街道工廠的卑微小女工，竟敢冒黨天下之大不韙，以自己的青春與前途去和一個政治「賤民」同命運，共患難，不計得失，不顧後果，這是怎樣的道德勇氣，怎樣的愛心！新華社的某些人卻認為小潘「思想反動，硬要嫁給一個『老右派』」，便唆使二龍路噴漆廠解除了她的出納兼會計職務，強迫她到那個素來不讓孕婦沾邊的噴漆車間去「勞改」。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這是戴煌參加新四軍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再過一個來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就在這一天上午十時半，戴煌接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兩年」的處分，並立即被押送德勝門外土城子監獄。妻子得到通知後，沖破新華社官方的阻撓刁難，帶著他的大女兒去探監，給他送行李，叮囑他「不要想不開。我和孩子等著你！」

兩年勞教期間，勞教所一再遷移。六五年五月，戴煌患急性胰腺炎，經搶救再次死裏逃生。六六年五月，在團河勞改農場解除教養，聽候處理。一個月後，「文革」爆發，新華社領導癱瘓，他的問題無人過問，於是他便成了一個「二勞改」的「留場就業人員」。六六年冬，又調到北京市管轄的清河農場，先在五八一分場勞動兩年。每天面對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三呼「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戴煌感到痛心疾首：「我們這個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政黨，迷信墮落到如此地步！」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達。北京的大批幹部被驅趕到「五七幹校」，戴煌隨同其它「政治犯」，則被上面架著機關槍的一列列火車，送進了漫長而更加黑暗的隧道。

這隧道在山西。不是在監獄裏推土燒磚，就是在勞改工程隊當小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發生後，又被調到太原城內同一個工程隊的二隊，仍然做木工，又兩次負傷，在進入漫長的隧道之後，第一次正式得到工傷假條。「實

際上，我們遠未能獲得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權利，而只能在黑越越的似無盡頭的隧道中磕磕踫踫地向前摸。」他通過勞改系統上轉的申訴材料均石沉大海。一九七八年在快速推土燒磚時，他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斷。

這十幾年中，在共和國的首都，在另一條暗無天日的隧道中，新婚的妻子潘雪媛帶著孩子經受了人間罕見的磨難。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戴煌被關進監獄的第五天，她為了省住院費，一直拖到最後一刻才去產科醫院。「她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劇烈的疼痛。」她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候孩子已經出世了，是一個早產一個半月、極度瘦弱的女嬰。

子宮頸的血管在擠壓衣胞時斷裂，產床對面兩米多遠的白牆上已被噴射了一片鮮紅的血。她剛出院，新華社房管組就強迫她搬家，她和新生兒「為偉」就搬到一間九平方米的西曬的小屋，用磚頭支撐起幾塊長木板當床。

有一個月，孩子生病，雪媛陸續請了十幾天假，所以只領到十天的工資。她還去向同事們的借款，再繳新華社的一元零八分錢的房租和水電費，只剩下一塊六角二分錢了。靠這點錢，母女倆苦度了半個月。為了讓為偉每天還能喝飽棒子麵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廠食堂光喝那不要錢的米湯或麵湯，餓得臥床不起。這個小女工很要強，「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個人樣，決不讓貧窮壓垮，決不給戴煌丟臉。」幸虧戴煌從勞教所休假回家，帶回了三個月積攢的工資，才度過危機。盡管這筆錢為數不多，這位富有愛心的妻子還從中拿出十元，匯給戴煌在家鄉的老母，幫老人家度過中秋節和自己的生日。

「文革」浩劫來臨，「大右派」家屬潘雪媛在工廠受到圍攻，「監督勞動」，她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她已二次懷孕，「照樣還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醫用大洗衣機腿上的銹，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雙膝跪著。」一位老師傅實在看不下去，讓組長把她調進車間搖臂鑽上幹活，偏偏又給一個小伙子冒失鬼拿著調動火車的大手閘耍弄時打在肚子上，第二個女孩子就早產了，又一次危險地大出血。這時，戴煌還在太原勞改，便給孩子取名「晉京」。

小晉京一天天地大了，在這恐怖又貧病交迫的歲月，雪媛的身體卻越來越不行了。她在搖臂鑽上打眼時，經常暈倒。一九七八年春節臨近，戴煌得知妻子病重，便請準了假趕回北京。回到家中，他發現妻子已有些神志不清，而兩個孩子在學校學習都名列前茅，卻因為父親是「大右派」受到歧視。同時，又得知家鄉的親人也受株連，慘遭涂毒。母親不勝悲憤而死，二哥也被人活活整死。戴煌不得不「一邊照料病重的妻子和兩個上小學的孩子，一邊到處上訪，力求盡快結束我在漫長隧道的歲月以回到妻兒的身邊」，卻到處踫壁。

一九七八年九月，感謝胡耀邦討回歷史的公正，中共中央發布了「右派」改正的文件，十二月新華社才做了戴煌「被錯劃為右派的改正決定」，他從二十九歲到五十歲的長達二十一年的黃金歲月煙飛灰滅。

戴煌不是甚麼「階級敵人」，而是「雖九死而不悔的」忠貞不二的共產黨員。「九死一生」也決不是文學語言的誇張，而是這一苦難歷程的真實寫照。出版者不是甚麼「離經叛道」的小出版社，而是堂堂的中央編譯出版社。這部紀實文學的可信性是官方的宣傳部門也不可能質疑的。

《九死一生》不僅是戴煌個人和難友們錐心泣血的苦難史，而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間地獄的全景。戴煌所熟悉的但丁的地獄固然觸目驚心。但畢竟是詩人想象的幻景。戴煌在其中長年受難的死亡場和漫長的、暗無天日的隧道，卻是現世不折不扣的赤色人間地獄。這也不是唯一的一座地獄，而是遍布中華大地的連鎖地獄的一環。回顧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殘酷流放，他感到「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動的小說家，恐怕也很難想象出在我們這個又進行了整整十個年頭『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國家裏，會發生如此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黑暗與恐怖。」

當年左拉的《我控訴》勇敢地仗義執言，譴責一個製造德萊弗斯冤案的法國軍事當局，從而贏得了整個文明世界的崇敬。《九死一生》控訴的是一個刻意製造了千百萬件冤假錯案、置千千萬萬人於死地的專橫暴虐的極權體制。作者為當代

中國歷史所作的血與淚的見證，其意義遠勝於《我控訴》，而足與司馬遷的巨著《史記》媲美，永為世世代代鑒戒！戴煌和潘雪媛，這對患難夫妻，是一個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扼殺人性的年代稀有的頂天立地的異物，不愧為「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光輝典範。

「五.七道路」的反思

「文革」十年浩劫，「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無不是「最高指示」的產物。「五?七指示」導致了「五?七幹校」的產生。所謂「五・七指示」原本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在軍委一份報告上的批示，他要求把軍隊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

兩年以後，「五・七指示」重新發表，又加上一條「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全國各地照例敲鑼打鼓，熱烈響應。黨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各省自治區、各高等院校，紛紛辦起了「五・七幹校」，遍及十八個省、區。從六九年秋冬之間鑼鼓開場，直到七六年才偃旗息鼓。走過這條不堪回首的「五・七道路」的多達百萬人次，其中不乏享譽中外的文化界精英，諸如：冰心、巴金、沈從文、俞平伯、錢鍾書、楊絳、吳祖光、夏衍、張光年、鍾惦棐、韋君宜、趙丹、黃宗英、焦菊隱、曹禺、等等、等等，真是琳瑯滿目，觸目驚心。

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五・七指示」時，曾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發展。」「五・七幹校」在全國上馬之後，江青等人為「五・七道路」大唱頌歌，鼓吹「五・七道路」是必由之路，幹校這一「新生事物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實際情況如何，《無罪流放：66 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一書（北京光明日報社，一九九八）提供了歷史的見證。這是「幹校人」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心路歷程為這些高論所作的血與淚的見證。這份珍貴的史料是由北京的兩位作者，賀黎和楊健，以口述實錄的方式采寫的。

首先，在遼闊的中華大地上，「五・七幹校」的校址卻往往選在土地貧瘠、交通困難的窮鄉僻壤，與勞改農場的選址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文化部的一個幹校乾脆就設在天津靜海團泊窪勞改農場，「五・七戰士勞動時「能見到勞改犯們穿著一色的衣服也在地裏勞動」。國務院直屬機關「五・七幹校」的校址原是賀蘭山下寧夏平羅縣「一所關勞改犯的監獄」，「女戰士住女監，男戰士住男監」。一機部幹校在江西奉新，「利用一個勞改農場，把勞改犯都弄走了」。外經部幹校在河

南羅山，校址「原是公安系統的一個勞改農場」。北京人藝幹校在團河勞改農場，北影幹校在大興縣天堂河勞改農場，浙江省委幹校在喬司勞改農場，如此等等。更荒唐的是，有的幹校被有意識地建在血吸蟲病流行地區。內務部的幹校在湖北江陵岑河口，建在原是該部游民安置農場，「是一個血吸蟲窩子」。江西余江鯉魚洲勞改農場，因為「那一帶是血吸蟲病重疫區」，勞改犯搬走了，清華大學卻選了它作幹校校址。無獨有偶，北京大學幹校竟然也選在同一地區。其結果，許多人得了血吸蟲病，有些人還送了命。

幹校是按軍隊編制的，分成連、排、班，與勞改農場大同小異。領導是軍宣隊，解放軍小戰士管教大知識分子。舞蹈家王克芬回憶道：「軍宣隊根本不尊重知識分子，動不動就訓人。著名舞蹈家戴愛蓮下在天津葛沽農場，中央芭蕾舞團黨委副書記回憶道：「軍代表訓斥她隨時都可以，也訓斥我們，根本不把我們當人，我們受到的人格侮辱可說是無以復加的。我沒住過集中營，但我們的那個地方與集中營毫無二致。」

幹校勞動經常是超負荷的。可以與勞改農場媲美。北影幹校的一位大夫「親眼看見很多同志超負荷勞動，身體完全承受不了，給軍宣隊貼了一張大字報。軍宣隊說他立場不正確，把他批了一通。」在浙江省委幹校，「由於超極限勞動，身體就腫起來了。連手指頭都腫了，腫得人躺不下來，只能坐在床上。」有些地方，「女同志月經期間，也照樣出工，照樣勞動，照樣下水田，好幾個都長了子宮肌瘤。」

老弱病殘並不能幸免。在文化部幹校，「老右派」吳祖光成了幹校的掏廁所專家：「幹校的露天廁所、室內廁所、深坑、淺坑、不深不淺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過。」「老右派」電影評論家鍾惦斐已五十多歲，「那時他肝病很重，轉氨黴高達四百多，可是還讓他積肥。他的任務是掏廁所。每天掏完廁所，他還要挑著糞擔至地裏漚肥。」

在內務部幹校，「參事室主任王紀新，是民主人士，他說：『我六十八歲了，還拔秧啊？』就有人批判他不老實，逃避勞動。他哪裏不老實？一手拄著拐杖，一手還在拔秧。」雙目失明的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兩位副主席、黃乃和孟靜之，

「也無例外地倒到幹校勞動。他們下到幹校就在磨坊推磨，給大家磨豆腐。」

在上海奉賢的上海「文化五・七幹校」，「在下幹校的人員中，巴金年近七旬，屬於最老弱的。長期肉體折磨、精神打

擊，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幹校屬他摔交最多。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糞倒入化糞池，濺起老高的糞水，巴金的臉孔就成了『花貓』了 。」他的愛妻患癌症垂危，還不準他去探視。老編輯康嗣群「患有高血壓，插秧時栽倒在水稻田裏」。

《新兒女英雄傳》作者袁靜，十六歲參加革命，這時戴著「叛徒」帽子下到天津市文聯幹校。她已五十四歲，又有關節炎，到市里拉肥，一車肥八百斤，三個人拉著一個小車。來回也要走幾十里地。下坡的時候，滑得很快，她摔倒在地，頭磕在地上，險些給一輛過路的汽車壓死。在浙江省委幹校，「金玲是延安時期的幹部。當時，金玲老太太也拉板車。在連隊有患肝硬化的，照樣挑預制板上二樓。」全國各幹校累病累死的人為數不少。

除了勞動強度大，還有精神上的折磨也很厲害。勞動回來不能休息，馬上接著開會，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搞逼、供、信，挑動群眾斗群眾。中央戲劇學院幹校被打擊面幾乎百分之百。一位布萊希特專家，「被連續審訊批斗三個月。召集全校開他的斗爭大會。在台上彎幾個小時的腰，會後見他弓著腰走道，一下直不起來了。全校三百多人的糞便讓他一個人掏。一掏三個小時，還要在曬糞場攤曬，臭氣薰天。」社科院歷史所二百六十人左右，幾乎全都是「五・一六」。北影廠也打了好幾百人 「五?一六」。

瞎折騰了兩三年，一個「五・一六」也沒抓到，被逼死逼瘋的倒不少。上海電影幹校，著名導演顧而已被迫上吊自殺。文化幹校，詩人聞捷用煤氣自殺。北影總工程師羅靜宇，在幹校被斗得死去活來，「在新影院子裏，垃圾池旁邊，上吊自殺了。」在遼寧省委機關幹校，共產黨員張志新，經過深入思考，對「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強烈德質疑。她追求真理，雖失去人身自由，仍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一九七五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刑前被慘無人道地割斷了氣管。

上海一位老作家說：「我在幹校的六年是一場大惡夢。」這也是身心備受摧殘的「五・七戰士」百萬大軍的共同感受。批判「四人幫」，吐吐苦水，無可非議。「無罪流放」生還者，尤其是黨員，歡呼「撥亂反正」，慶幸重新回到黨的懷抱，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痛定思痛，若不對毀國毀人的「五・七道路」作深刻的歷史性反思，探索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汲取教訓，則知識分子的前途仍然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經過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整肅，特別是「反胡風」和「反右」，數以百萬計的「胡風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慘遭整肅，或鋃鐺入獄，或流徙邊陲，家破人亡，死傷整藉。整個知識分子群落俯首貼耳，萬馬齊喑。「文革」初期，經過兩年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血腥清洗，毛家王朝已樹立了「絕對權威」，但仍念念不忘徹底奴化知識分子和幹部隊伍，強化絕對獨裁政權。於是，藉口「清理階級隊伍」，把大批中、老年知識分子和幹部發配農村「安家落戶」。同時，以「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為號召，強迫千百萬中學生「上山下鄉」。對廣大知識分子和幹部隊伍則巧立名目，以「五・七幹校」為幌子，進行赤裸裸的軍事專政。「五・七道路」並不是甚麼「新生事物」，而是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整肅的「偉大戰略部署」的延續和擴展。

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過去是怎樣認識的？現在又是怎樣認識？幾十年來，個人在歷次運動中是怎樣表現的？這些是生還的「五・七戰士」不得不「觸及灵魂进行反思的問題。

著名演員鳳子，從十四五歲就「追求進步」，五十八歲下幹校，苦頭也沒少吃。但是，事過境遷，她卻自豪地說：「我一直向往加入共產黨。直到一九八零年，我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這為我一生理想的追求打了一個完整的句號。」可憐的鳳子！

著名演員、作家黃宗英卻說得很沉痛：「『文革』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封建主義病灶的大潰瘍。作為高級知識分子_社會中堅，我們在建國以來，發揮了多少有氧細胞的作用去制止這場浩劫呢？我們都是進步的藝術家、黨員，有專業成就，有社會地位。長期以來，我們沒有一個人親耳聽見過少奇同志對文藝有甚麼具體指示，可我們無一例外地都承認自己是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黑幹將。這是黨性失去貞操，藝人缺了藝德。都這樣，國家要亡的。」

文藝理論家雷達，當時剛從大學畢業，下到文化部幹校，和許多知名的文藝家一起熬過了「荒廢與荒誕」的歲月。但是，他認為「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歸罪於外在原因。每個人今天都需要一種『懺悔意識』。要反思自己靈魂中深藏的東西。」

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欒勛，在題為《人事與狗事》的告白

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自己走過的從五七年「反右」到「五・七幹校」的可恥的道路：「我說，我們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們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時，我們也做過狗。說人家是右派，一聲召喚，我們就上去斗。這些右派都是我們身邊的人啊！這輩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從領導布置跟幾個人把別人的日記翻出來，查證據。這是狗事。我對林彪的做法有察覺，說過林彪沒好下場，但是還是天天念念叨叨地祝健康。這是狗事。清查「五・一六」也是如此。比如在北大，評我『五好學生』上光榮榜的，是他們，批判我的也是他們，這就是這一代人做的狗事。」

放眼幹校的百萬「五・七戰士」大軍，其中幹過「狗事」的一定大有人在。可是有多少人敢於面對自己的過去呢？有多少人認識到，當年慷慨激昂，聲討「胡風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等等，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無罪的同志，又流放荒原，正是為自己日後的「無罪流放」鋪平道路？回首前塵，久經劫難的中國知識分子，唯有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盲從權勢，不曲學阿世，才有可能蕩滌靈魂中的污泥濁水，做堂堂正正的人，永遠不做狗事，永遠不當狗腿子。也許只有這樣，才能不辜負「五・七道路」椎心泣血的苦難歷程。

新「三家村」的盛世危言

一九九四年春，我從華盛頓到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作客，喜逢英語翻譯大師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也從北京來講學，同住雅群樓客舍，朝夕過從，更有幸先睹憲益的舊體詩《銀翘集》打印稿，其中多憂時諷世近作，深得我心。

香港一別四年餘，去年十月我一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直奔西郊誼園公寓探望這對患難夫妻。一見面，憲益就遞給我一本簽名題贈的《三家詩》，這是他和黃苗子、邵燕祥三家舊體詩近作的選集，書前插有漫畫大家丁聰的三大家《吟月圖》，兩年前由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看書名，我立即聯想到那個在「文革」期間被「打翻在地，還踏上一只腳」的「三家村」。三位忠誠的共產黨人，鄧拓、吳焓、廖沫沙，由於合著雜文針貶時政，觸犯龍顏，引來殺身之禍。這本詩集的取名，是無意，還是有心呢？正納悶間，翻到編者如水的「編後記」一看，他寫得一清二楚：「三家詩，讓人想到『三家村』，」看來果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三位老耄之年的詩翁是中國文化界久負盛名的大家。黃氏的書藝、楊氏的中國文學名著英譯、邵氏的新詩，都蜚聲國內外文壇。當年風華正茂，三人都誠心誠意「追求進步」，為「戀黨情結」所苦。後來又都經歷了「反右」、「文革」、「六四」等等劫難的煎熬，輕則無罪流放，重則鋃鐺入獄，家破人亡。

五十年來家國之痛，泣血椎心，化為一首首感人的詩篇。黃詩云：「思到無邪合打油」。楊則自稱：「學成半瓶醋，詩打一缸油」。邵也自謙「降格以打油」。三百餘篇佳作，或自嘲，或唱和，或譏刺時務，或詠古諷今，無不幽默機智，妙趣橫生。

楊憲益精通中西文化，《感語言之洋化》對風糜社會的崇洋媚外之風嗤之以鼻，令人捧腹，又發人深省：

語效鮮卑竟入迷，世衰何怪變華夷。
卡拉歐咳窮裝蒜，品特扎啤亂扯皮。
氣死無非洋豆腐，屁渣算個啥東西。

手提 BP 多瀟灑，擺擺一聲便打的。

但是，三大家最難忘情的始終是國運民艱。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覆沒，三位詩人額手稱慶，均有詩詞抒懷，歡呼「歷史又新章」（邵句）。豈料「改革開放」曾幾何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迅速蛻變為豪門經濟：「霄殿九重窺喜怒，豪門千手攫金錢」（黄詩）。眼看暴發戶紙醉金迷，無法無天，小百姓水深火熱，邵燕祥通加針貶：

中原外海兔三窟，權倒官僚貉一丘。
忍見青春陳陋俎，卻聞筵席運新籌。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言九鼎，黄苗子卻提供了觸目驚心的現實見證：

先富盡多無賴子，後門爭走富平侯。
萬家樓館銷金窟，三峽星河泣亂流。

貪污腐化上行下效，勢如燎原，國將不國，詩人不禁憂心忡忡：

撥亂當年勢莫當，豔陽天氣伏秋霜。
諸郎斗富誇金谷，詫女求錢下教坊。
大腕發財憑蓋印，白條無據卻徵糧。
茫茫來日愁如海，改革當真是妙方？

如此「改革」自然導致社會動蕩，群情激憤：「吶喊如雷大道連，國門人海沸於天」（黄詩）。當政者充耳不聞，卻祭起老祖宗「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法寶，冒天下之大不韙，午夜屠城，舉世震驚。楊憲益自許「亂世甘為散淡人」，卻又「從來大事不糊涂」。面對大是大非，楊散人拍案而起，慷慨陳詞，聲震寰宇。「六四」的震撼，隨之而來的「出黨」的沖擊，終於化解了他的「戀黨情結」。思想一朝解放，詩人的情懷境界也隨之升華。他對屠城以後的政局不存任何幻想：

人血饅頭難續命，狗皮膏藥豈延年？
會看三峽功成日，一片汪洋浪接天。

更毫不含糊地把矛頭直指屠城元凶：

中原逐鹿几浮沉，欲懲東吳未遂心。
孟德至今勾白臉，只緣枉殺許多人。

屠城前數日，邵燕祥已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對大軍壓境、師出無名已感到疾首痛心：

萬里兵符出四川，合當功業勒燕然。
雷車初軋柏油路，鳳鶴長驅石景山。
瓦石昔曾干日寇，壺簞不復似當年。
京華此夜無蘆管，曉月盧溝聽杜鵑。

三年之後，黃苗子滿腔悲憤控訴以人民為敵的屠城暴行，字字滴血：

一夕天威殺戒開，國門骨肉拌塵埃。
九洲震蕩攤牌笑。四海翻騰祭燭哀。
曾聞社稷民為貴，何事斯民視寇仇？
闕下坑儒新學士，門前功狗竟封侯。

且看今日神州，又是何種氣象？楊詩人嘆曰：「可憐治國安邦策，不及還陽補氣丹。」眼見五十年沉痾，積重難返，詩人又對歷史和現實作了沉痛的概括：「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震聾發聵！而環顧左右，天下滔滔者皆是也。君子何以自處？詩人《自勉》曰：

每見是非當表態，偶遭得失莫關心。
百年恩怨須臾盡，做個堂堂正正人。

三位詩翁，畢生憂國憂民，不折不撓，「歷經風霜鍔未殘」（楊句）。《三家詩》以犀利的「打油」繼承了「三家村」的批判精神，加以發揚光大，敲響了沖破黑夜沉寂的警鐘，在一個萬馬齊喑的時刻，獨步大陸詩壇。已故詩人冒叔子有兩句贊魯迅的詩：「身無媚骨奉公卿，筆駛風雷魍魎驚」，也正是三位詩翁的寫照。三大家何止是堂堂正正人，他們不愧為高山仰止的民族良心！

評哈金的小說《等待》

留美中國作家哈金用英文寫的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獲得了 1999 年美國「全國書卷獎」。這是華裔作家第一次獲此殊榮，而且錦上添花，作者又榮獲 2000 年的「福克納筆會獎」。

這部轟動美國文壇的《等待》到底是怎樣一部小說呢？

從故事的層次說起吧。《等待》的主人公孔林是一個東北農家出身的軍醫。1962 年，他還在軍醫學院學習時，為了有人侍候病重的母親，幫助父親務農管家，他被迫遵父母之命和一個未老先衰的小腳文盲結婚，一年後生了一個女兒。妻子孝敬公婆，體貼丈夫，獨自撫養女兒，任勞任怨。無奈丈夫和她並無共同語言，更說不上有愛情。女兒出生之後，他每年暑期休假回家時就和妻子分居，妻子也無怨言。不過她仍希望給他生個兒子，也遭到丈夫拒絕。從醫學院畢業之後，他被分配到中蘇邊境一個小城的軍醫院工作。在這裏，他看上了一個年青活潑的女護士，而女方新近被男朋友遺棄，也正在找對象。於是，兩人就談起戀愛來了。孔林答應娶她，但必須先和妻子離婚。女方為了促成婚事，要求先發生性關係，卻遭到男方拒絕。他每年休假回家，都向妻子提出離婚。年復一年，妻子每次起初總答應，而最後總是反悔，並且得到當地父老鄉親的支持。一直等到分居十八年後，他的離婚要求才符合軍醫院的規定。他終於如願以償，和護士結了婚。新婚燕爾，他卻發現自己並不愛她，而且時隔不久，護士妻子就患了不治之症，唯有等待死亡了。

這個故事發生在六、七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席卷中華大地的大時代。《等待》沒有涉及那場腥風血雨造成的無數悲劇。它寫的是一個善良的小人物執意擺脫封建婚姻的羈絆，追求一種有愛情的幸福生活，到頭來卻陷入了遷延不決的「三角關係」。但這並不是一般言情小說中的「三角戀愛」。男的要找一個代替小腳妻子的對象，女的要找一個條件好的對象。為了不讓女方遙遙無期地等下去，男的甚至主動給她介紹對象，又支持她和一個首長搞對象。《等待》與其說是一個愛情故事，還不如說是一個沒有愛情的故事，一個善良的小人物

在那個大時代的可悲的命運。在那個遠離革命中心的邊城和小村，他既無法擺脫源遠流長的封建意識的束湲　　硬怀鳇ｈ紀軍規的天羅地網，在荒誕的身不由主的等待中無聲無息地喪失了自我，虛度了大好年華，也害了他的護士情人。

在整個等待過程中，孔林不斷進行反思，結果總是不了了之。最後，通過內心的對白，他終於直面自己慘淡的人生：

那個聲音接著說，是啊，你等待這多年，可是等的甚麼？

這個問題使他感到害怕，因為它意味著那多年他等的是錯誤的東西。

讓我告訴你真正發生了些甚麼，那個聲音說。那多年你麻木不仁地等待，好

像一個夢遊者，左右著你的是別人的意見、外部的壓力、自己的幻想、你完全認

同的官方的清規戒律。你被自己的挫折和消極所誤導，以為你被禁止得到的就是

你的心注定要擁抱的。

林感到驚惶。一時間他不知道說甚麼是好，隨即他咒罵起自己來：白痴，你

等待了十八年，卻不知道等甚麼！十八年，你一生最好的年華，過去了，浪費了，

卻給你帶來了這倒霉的婚姻。你真是個大白痴！

…………

他恍然大悟，他從來沒有全心全意愛過一個女人，而總是被人愛的。……

他的本能和熱戀的能力早在它們有機會開花以前就枯萎了。要是他一生中僅僅

深情地愛過一次就好了，哪怕它也許會讓他心碎，讓他腦痴，讓他神魂顛倒！

這是甚麼聲音？

這是一個真實的善良的小人物的靈魂的受難。哈金讓他的主人公歷盡了漫長的「為等待而等待」的自我毀滅過程，終於面對青春和生活的廢墟，展示了他靈魂深處的痛苦、悲哀和絕望。他的靈魂在泣血，千回百轉，無可奈何。哈金將一個毫無羅曼蒂克色彩的「三角關係」點化為感人肺腑的悲劇，一個發人深省的寓言。這個等待的悲劇何嘗不是那個時代千百萬人的

命運，盡管他們等待的也許是其它的幻景！這又何嘗不是世人普遍的命運！

故事雖然發生在邊遠的東北農村和小城，哈金用仿佛信手拈來的真實細節展現的社會景觀，那富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貧困、落後、單調、無聊、壓抑的生活，卻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都感到熟悉甚至親切的。

個別的細節更是引人矚目。一雙小腳出現在一個六十年代的少婦身上或許是有點出人意外的。其實，在落後、保守的邊遠地區，三十年代出生的姑娘確有一些裹小腳的。《等待》的作者並沒有在這上面做甚麼文章，投合某些洋人的胃口，而只是用個別的現象來象徵陰魂不散、繼續作祟的封建餘毒。

另一個引人矚目的細節是孔林新婚的護士妻子珍藏的毛澤東像章。二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像章，鄭重其事地保存在一個上了鎖的檀香盒裏，引起了孔林的深思：「有朝一日這些小玩意確實會很有價值，可以提醒人們文革中那些瘋狂的歲月和浪費的、喪失的生命。」這時毛澤東已經死了十年，但有些人還繼續供奉著他的幽靈。作者用這個俯拾即是的細節點出了那個時代的痼疾，舉重若輕，見微知著。這些像章，和那雙小腳，形象地界定了小說人物生活的天地，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哈金用十分流暢平實的英語，妥帖地抒寫了家鄉樸實善良的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毋庸諱言，《等待》的語言，在遣詞造句方面，難免還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和瑕疵。令人感到驚喜的倒是，十年前才開始用英語寫作，哈金現在已經登堂入室了。然而，卻也有人聲言：「被他小說語言的低劣和粗俗嚇了一跳，」這不免令人猜疑，是否兩項文學大獎的評委個個都是文盲，還是這位高人讀的是另一部小說？

哈金去國十五年了，十年來用英語寫了許多詩集和中、短篇小說。貫穿這些優秀作品的是作者熱愛故土和父老鄉親的情懷。《等待》則是他不負養育之恩的奉獻。他老老實實地重現了他們不怎麼美好的生活，既沒有丑化，更沒有美化，深情地為他們無名的期待和幻滅譜寫了一曲感人的挽歌。因此，人們不用擔心哈金會「拿誠實作交易」，「充當美國傳媒丑化中國的工具」。好在《等待》已經以十七種文字在全球發行，沒有政治偏見的廣大讀者自會作出公正的評論。

兩部童年回憶錄的啟示

近年來，回憶錄在美國文壇盛極一時。其中最為噲炙人口的卻是一個小人物的童年回憶錄。《安琪拉的骨灰》（Angela‘s_Ashes）一九九六年在紐約出版，曾獲得普立茲等三項大獎。作者弗蘭克・麥考特（Frank_McCourt）,一九三一年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區，父母都是來自愛爾蘭的新移民。正趕上美國經濟大蕭條，父親又一味酗酒，全家生計無著，一九三五年又回愛爾蘭去謀生。

小弗蘭克四歲，隨著父母和三個小兄弟前往母親家鄉，在南愛爾蘭江上小城利莫瑞克（Limerick）貧民窟度過了整整十四個窮困和屈辱的年頭。

愛爾蘭同樣經濟蕭條，謀生更難。父親酗酒成癖，難得找到一份苦力活兒。多半時間，一家六口靠他微薄的失業救濟金糊口。可是，酒鬼一拿到錢馬上就鑽進酒店，一杯接一杯喝到酩酊大醉，最後一路高唱愛爾蘭愛國歌曲，回到饑寒交迫的妻子和幼兒身邊。母親安琪拉經常坐在壁爐旁邊，盯著爐灰和廉價香煙的灰燼，一籌莫展。她向天主教的諸多聖徒禱告也是徒勞，只得含垢忍辱向教會的慈善機關乞求衣食施舍。

江上小城陰雨延綿，疫病流行，一家人輪流病倒。弗蘭克的一對雙胞小弟弟相繼病死。孩子死後，尸體停在床上，等做父親的去領施舍薄皮材，同時領一周的失業救濟金，回來辦喪事。錢一到手，父親卻抱著小棺材，和送葬的馬車夫一起到酒店喝起黑啤酒來，白色小棺材上擱著兩大杯黑啤酒。

聖誕節來了，這個篤信天主教的人家卻連節日的晚餐也無著落。母親領著兩個孩子討到一個豬頭，可是家裏又沒燃料，只得由七、八歲的小弗蘭克領著弟弟跑到老遠的大路上，撿過路的卡車掉下的煤塊。

父親既不顧全家人的死活，卻又給弗蘭克添了兩個小弟弟，更增加了母親的沉重負擔。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父親應徵去英國一家兵工廠當工人，眼看可以掙錢養家了。母子四人擠在污穢寒冷的屋子裏，忍飢挨餓，眼巴巴地等他匯錢回來，卻音訊全無。長期拖欠房租，一家人又被房東趕了出來，只得投親靠友，任人凌辱。

父親的荒唐、教會的偽善、社會的冷酷無情，逼得弗蘭克

小小年級就得自力更生。他首先從酒店和富戶偷甘澄鑣Ｂ活母親和弟弟。小學還沒畢業，他就開始打工，逐漸承擔起養家活口的重擔。眼看自己在愛爾蘭毫無前途，他便開始慢慢攢錢，夢想湊足路費就回美國去闖蕩。十九歲生日前夕，他去給一個有錢的老婦人幹活，沒料到她已坐在椅子上死去。弗蘭克毫不猶豫，立即從死者那裏偷走五十七鎊現款。有了船費，弗蘭克就如願以償只身回歸美國，開拓新的生活了。

歷盡人間地獄漫長的水深火熱的煎熬，小弗蘭克居然活了下來，這真是個奇跡。更大的奇跡卻是，不論往事如何不堪回首，作者卻無怨無尤，滿懷對生活的熱愛，對家人和苦難同胞的至情，對人性軟弱的寬容悲憫，以昂揚的語言，含淚的幽默，將一個愛爾蘭少年瘡痍滿目的成長歷程凝鑄為一部紀念碑式的文學經典。

無獨有偶，一部用英文寫的中國童年回憶錄《山色》（Colors of the Mountain）今年在紐約由蘭登書屋出版，頗有佳評，和麥考特的愛爾蘭童年回憶錄先後輝映。

作者陳達，一九六二年大饑荒時期出生於福建沿海的蒲田縣黃石鎮。祖父當年是地主，於是祖孫三代都是「黑五類」。「文革」浩劫光臨這個小鎮，陳家自然首當其沖。祖父關進公社的牢房，隨時拉出去接受拳打腳踢的批斗。有一天，老祖父在鎮上遭到一名公社幹部無故當眾毒打，小孫兒親眼看著父親把重傷的祖父背回家來。兩周後，老人還沒復元，公社卻勒令他夜晚去建築工地看木料。後來又派他去稻田轟麻雀，這時老人已病體支離，幹部竟然下令派七歲的孫子代替七十歲的爺爺去勞改。不久之後，老人就含恨去世了。

陳達的父親本來是一位教師，「文革」中飯碗被「革」掉，全家跟著挨餓，經常靠半霉爛的山芋充饑，本人還得去勞改。小陳達到工地去送飯，親眼看到父親服苦役。在自己家裏，他又親眼看著母親被公社幹部猛打嘴巴，摔倒在地。

陳達和他的哥哥與三個姐姐，不管是在大街上，還是在學校，隨時隨地會受到「紅五類」子女的凌辱。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讀完初中或小學後被迫退學，到生產隊幹艱苦的農活。一九六九年，陳達總算進了小學，品學兼優，但仍逃不出校長、教師、和某些壞同學的凌辱。陳達小小年紀，卻從不示弱，一再奮起反抗。

紅色恐怖肆虐，一家人頑強地活著，以至親骨肉之愛抵擋無產階級專政的怨毒，憧憬於一個美好的明天。母親信佛，每

逢大災小難必叩求各位菩薩保佑，小陳達也跟著母親磕頭，甚至磕得頭破血流。這個生動的細節貫穿全書，既烘托出這家人走投無路的困境，又是對那個時代喧囂一時的惡魔崇拜的絕妙諷刺。幸而父親勞改之餘自學針灸，給鎮上的頭面人物治病有功，從而改善了本人和全家的處境，聰明過人的小兒子也得以順利地讀完小學又升入中學。陳達不但學習成績優異，而且既參加乒乓球比賽，為校爭光，又學會吹笛子，拉自制的小提琴，參加演出，令人刮目相看。但是，階級出身的烙印仍是他前進道路上的一座大山。

「文革」浩劫結束後恢復「高考」，陳達的前途出現了一線光明。他決心中學畢業後參加高考，並鼓勵他失學多年的哥哥也一同報考。弟兄倆沒日沒夜地苦讀，忍受著身心的煎熬。也是「善有善報」吧，一位經他父親針灸治愈的病人的姐姐是一位當過英語教授的虔誠基督徒，她專門給陳達補習英語。一九七八年高考，他報考北京英語學院英語系，以高分錄取，哥哥也考取進廈門大學，告別了「共產主義奴隸勞動」。

陳達並沒指望從此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大學畢業後，他並沒留在京城走「學而優則仕」的老路，而是憑自己的才華，取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獎學金，學成後在紐約當律師。

陳達和麥考特一樣，終於擺脫了悲慘童年的夢魘，在自由天地裏振翅翱翔。可是他們並不滿足於慶幸自己的解脫，卻以椎心泣血的回憶為歷史作見證：不管是在三、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和天主教會統治下的愛爾蘭，還是在六、七十年代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青少年所遭受的慘無人道的身心摧殘，都應該受到全體文明人類的譴責。

和麥考特一樣，陳達對於與自己共過命運的故人故里一往情深。黃石小鎮，山青水秀，河邊一叢叢荔枝樹結實累累，海上蕩漾著漁舟點點。大自然優美的風光，和小鎮上人為的殘暴形成鮮明的對比，撫慰了小陳達備受傷害的身心，也滋養了他出污泥而不染的性靈，陳達用自己堅苦卓絕的成長歷程又見證了一條發人深省的真理：青山永在，碧水常流，任何殘暴邪惡的勢力都永遠不可能扼殺熠熠生輝的人性。

湊合活著-評哈金新著《新郎》-

哈金用英文撰寫的長篇小說《等待》曾獲得一九九九年美國「全國書卷獎」。英文新著《新郎》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其中十二個故事都發生在中蘇邊境一個名叫木集（Muji）的中小城市，和《等待》相同。

作為書名的《新郎》篇涉及一個大陸作家回避的主題。一個人見人愛的小青年有同性戀傾向，結婚後並未完婚，卻得到妻子的諒解，夫妻感情極好。由於參加同性戀者的文娛活動，他被警方送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醫生明知同性戀不是病，卻不得不按規章給他進行懲罰性「電療」，結果他倒與一名男護士發生了性關係，被判三年半徒刑。他的岳父要求女兒和他離婚，卻遭到女兒拒絕。女兒聲淚俱下地說：「他是我丈夫，我是他妻子。如果我死掉，我们发發過誓永不分離。人家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我知道他是個好人。」通過這個好人如何轉化成罪犯，作者揭示一個壓抑人性的社會的荒誕。

在第一篇故事《壞分子》中，主人公、哈爾濱大學邱講師既是共產黨員，又是辯證唯物主義專家。他偕新婚的夫人在木集度完蜜月，準備乘火車返校。在火車站的小飯鋪吃飯時，踫到鄰座兩名公安人員耍流氓。邱講師與之理論，發生爭吵，反被誣為「破壞公共秩序的壞分子」，戴上手銬，拘回車站公安派出所審訊，又飽受凌辱，到頭來還得在認罪書上簽字後方才獲釋。邱講師腦羞成怒，急性肝炎復發。這位共產黨理論家竟故意先後在四家飯鋪就餐，散布病毒，藉以泄憤。一個月內，全市八百人感染急性肝炎，六人死亡，包括兩名兒童在內。這個故事，短小精悍，著眼於「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卻折射一個時代的風貌，為全集奠定「荒誕」和「人的異化」的基調。

《壞分子》寫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插曲，第二篇故事《活著》卻是這同一生存環境中一個小人物一生的挽歌。童某是市內一家罐頭工廠的普通幹部，奉菮前往省內一座煤礦討一筆久欠不還的債。若能完成任務，他就可提升為副廠長。一旦當上領導，工廠新蓋的公寓樓裏一套住房就唾手可得。住了多年的小一居室就可供兒子成婚之用。那下放在農村的女兒也可上調回城。他滿懷希望上路，到了煤礦才發現討債毫無希望，眼看升官夢也泡湯。誰料到半夜發生大地震，死傷枕藉。他倒

是活了下來，不幸卻喪失了記憶，連自己姓甚名誰也不清楚。地方上料理善後，鼓勵幸存的鰥夫寡婦們組織新家庭。於是他也成了家，分到住房，還領養了一個孤兒，每天到自來水廠當臨時工，抄抄寫寫，打發了幾個月。一晚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恢復了記憶，第二天就不辭而別回老家去了。他滿以為家人一定會感到意外的驚喜。萬萬沒料到，半年前工廠已為他舉行過追悼會，兒子已在他的舊居成婚，女兒也頂替他的名額調入工廠，妻子回了娘家。他成了個無家可歸的多餘的人，卻還對家人說：「我給他們幹了二十多年，所以我屬於罐頭廠。活著，我是他們的人；死了，我是他們的鬼。他們一定得要我。別太著急啊。單單活著就很好嘛。」可憐他完全錯了，工廠沒法要他。一場意外已經把他從人變成「非人」，他只能湊合活著了，半人半鬼。這正是那個荒誕的年代千千萬萬幸存者的命運。

和《活著》同樣耐人尋味的是《一個打虎好漢難得》。木集電視台拍攝的《武松打虎》贏得了省長的好評，同時他又指出劇中的假老虎有損效果。為了討好上級，並爭取得獎，電視台領導搞來一頭真老虎，扮演武松的青年演員奉命重拍打虎的場面。威武英俊的演員冒著生命的危險與老虎搏斗，不料老虎因麻醉藥的作用過早倒下，武松騎在馬背上赤手空拳打死老虎的戲沒有拍成。演員倒因驚恐過度而出現精神分裂，住進醫院。領導決定重拍，演員抱病上場。老虎格外凶猛，演員被它咬傷後嚇得爬上一顆大樹逃命，獲救後又被送進醫院精神科病房。領導卻決不罷休，下令槍殺老虎，仍由演員與披著死虎皮的汽車司機搏斗。他卻進入「打虎英雄」的角色，猛打假老虎。司機受傷，《武松打虎》卻大功告成。一個有「王子」美名的演員成了口口聲聲自稱「打虎好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只得在精神病院湊合活著吧。

通過同一個生存環境中一些個普通人的遭遇，《新郎》的十二個短篇從不同的側面展現出那個邊城的社會心理全景，不妨看作「改革開放」初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縮影。

新《西游記》

《西游記》在中國是一部家喻戶曉的文學經典。唐僧玄奘到西天朝聖取經，數萬里長征，歷時十七年，身經九九八十一難，終于功德圓滿，這是人們從小就耳熟能詳、百聽不厭的傳奇。可是，千百年來，還沒聽說過中華大地上有人會踏著玄奘的足跡，重演這一朝聖的壯舉。

誰料到，千禧之年，距玄奘取經一千三百餘年，卻有一名美國新聞記者，匹馬單槍，沿著玄奘當年行經的路線，從唐都西安出發，歷時數月，又回到西安。玄奘從印度回國之後，寫了一部《大唐西域記》，記敘旅途中所見所聞，至今噲炙人口。這位記者，白禮博 （Richard Bernstein），回國之後， 也寫了一部不同凡響的旅途見聞錄，書名《終極的旅程》（Ultimate Journey)。

這部新《西游記》的作者曾在哈佛大學受教于中國現代史專家費正清（John King_Fairbank)教授，傾心中國文化，八十年代初期曾任《時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長。近年專職為《紐約時報》撰寫書評，本人也一再有新書問世。

白禮博出身于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家庭，受過正統的猶太教教育，但並非虔誠的教徒。年過五十，慣于過自由自在的單身生活，害怕家庭生活的牢籠，一直沒有結婚。近年結識來自北京的舞蹈家李忠梅，一見鍾情，但仍然「欲說還休」。這位單身貴族，名利雙收，生活優裕，卻感到人到中年的精神苦悶，不安于現狀：

如同許多我這個年紀的人一樣，我正體驗著一種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爭吵。縱情享受著它的舒適和樂趣，卻又意識到它既渺小又平凡，缺少真正激動人心的東西。

他考慮過躲到偏僻的鄉下，自學製作鑲榫接頭的家具，在窮居獨處中求淂精神的舒暢。但是，他從年青時就熱愛旅行，遊歷過許多國家，包括印度在內，對玄奘不畏千難萬險到西天朝聖取經更是心嚮往之。面對自己的精神危機，深受玄奘追求終極真理的精神的鼓舞，他毅然走上尋求自我解脫的「終極的旅程」：

我要去我的朝聖者去過的那些地方，站在他站過的地方，

面對沙漠諦聽他的腳步

聲在時間的回廊裏回響。這是個浪漫的想法，但是觸及精神的歷史，我是個浪漫主義者。我衷心相信對過去那些構想過歷久不衰的思想的人物致以崇高的敬禮，而玄奘正是這樣一個人。重現他的朝聖之旅會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

玄奘在公元 629 年，不顧朝庭禁令，甘冒殺身之禍，偷越國境，前往印度取經。千載之下，一個美國記者並不信佛教，也無經可取，卻也甘願冒著隨時會從中國大陸被驅逐出境的風險，讓他的「終極旅程」泡湯。

千百年前，關山間阻，交通困難，唐僧飽嘗了跋山涉水的千辛萬苦。二十世紀末年，雖有火車、長途汽車、出租車可乘，穿越無垠荒漠，翻越崇山峻嶺，仍然苦不堪言，更讓旅人頭痛的是出入各國國境的現代困擾。由于他的一部探討中美關係的近著觸犯了北京當局，作為新聞記者，白禮博無法從官方渠道取淂中國簽證，幸好香港一家旅行社給他辦了旅游簽證，使他能從西安入境，開始長征。雖然沒有孫悟空保駕，卻有李忠梅不遠萬里從紐約飛抵西安，護送他到新疆，一路上為他排難解紛，兩情相悅，也使他深感無私的愛情之可貴。古今中外兩位長征者都如願以償，並先後為歷史留下了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的證言。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下了沿途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各國不同的宗教信仰、形形色色的寺廟。白禮博根據精心搜集的史料，一一瞻仰了玄奘當年朝拜過的石窟佛寺、潛心學習過的佛教最高學府、眾多的釋迦牟尼聖地。與此同時，他藉具體生動的細節反映了中國西部和中亞國家的現狀，以及沿途接觸過的三教九流所關注的歷史、政治、經濟、宗教方面的各種問題。作者深情地重現這一「終極旅程」的艱難險阻和無限風光，古今對比，相映成趣。

與此同時，這部新西游記的作者還不斷探索玄奘和他本人的心路歷程。他反復思考這位青年聖僧苦心孤詣圍繞著小乘大乘教理的思辨，甚至在邊城小旅店，長夜孤燈，也孜孜不倦地鑽研佛教經典。至于「那不能用言語表達的真理」，他卻只能心嚮往之。

但是，這位卓有成就的現代西方知識份子也剖析了自己的成長過程、他的憧憬與幻滅、他對猶太教義若即若離的信奉、他在精神境界方面「更上一層樓」的追求。他不可能獲得玄奘那種「四大皆空」的大徹大悟。不過，經過好幾個月不折不撓

的身心之旅的洗禮，他也參悟了一點平凡的真理：既然無常的人生是人們與生俱來的命運，他唯有以入世的熱情擁抱生活。於是，他也不再逃避多年來視為畏途的家庭生活的羈絆，回到家園，和他熱愛的華裔舞蹈家李忠梅結婚，歡慶新《西游記》問世。

滿懷對一位中國文化巨人的衷心崇敬，白禮博亦步亦趨地重現了玄奘追求終極真理的千古壯舉，嚴絲合縫宛如精心製作的鑲榫接頭的家具，同時也真誠地抒寫了重新認識自己和生活的終極旅程，相得益彰，這在古今中外的遊歷記中是聞所未聞的。

再會吧，江城！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美國記者、學者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者絡繹不絕。其中不少人回國以後，將見聞觀感寫成回憶錄出版，為數可觀。這些游歷者往往根據自己在北京等政治、文化中心駐訪的經歷作出對當代中國政治、社會宏觀的觀察。何偉（Peter Hessler) 的新著《江城》（River Town）卻是一本別具一格的新中國回憶錄。

何偉不是老練的「中國通」，也不是哪家美國大報社派駐北京的資深記者，而是美國和平隊(Peace_Corps)一九九六年派遣前往四川服務的隊員。當時他二十七歲,。和他同行的梅志遠（Adam_Meier）才二十二歲。他們的身份是「美中友好志願者」（因為大陸官方忌諱「和平隊」的名稱）。他們提供的無償服務是在長江上的涪陵師範學院教授英語課程，為期兩年。

涪陵師院是一所三年制的師專，學生不到一千人，來自本地區各鄉鎮，畢業後絕大多數回家鄉當中小學教師。何偉主要給三年級兩個班教授英美文學。他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專修英美文學，畢業後又到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兩年，身價不菲。如今既無專家、教授的頭銜，也無優厚的待遇。他住在學院的教職員宿舍，每月由和平隊發給生活費人民幣一千元，還不如他的中國同事的收入。但是，面對每班四十名在農村長大、英文程度有限的男女小青年，他絲毫不感到大材小用，「對牛彈琴」。

學生熱愛英美文學，學習熱情高漲，給予他極大的鼓舞。在一年的課程中，他從英國文學的經典著作一直教到現代美國小說和詩歌。遠離那些在西方高等學府里流行的「解構主義」、「新馬克思主義」之類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干擾，這些四川鄉下的娃娃們結合自己的生活實際欣賞英美文學作品。讀完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他們又分小組在教室里演出不同的場景，有聲有色。學生們演出的「有中國特色的莎士比亞」給何偉老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

表演完全改變了他們-在課堂上他們會羞澀得難堪，戲劇卻改變了那一切。

每個手勢都是誇張的，每個感情都是過火的。我本來已經習慣於他們的羞澀，眼 前看著他們在教室這空蕩蕩的舞台上大喊大叫，真是奇怪。很可能，在一個個人感情受壓抑的社會，這純粹是一種宣泄。盡管如此，觀看他們演出確是一種奇特的經驗；他們只是似曾相識，像這齣戲一樣，而這些學生和《哈姆雷特》在我眼中便都成了新知。

秋去冬來，「學生們開始穿棉衣，戴圍巾和手套；他們的手指生凍瘡，耳朵凍得通紅。我們讀斯威夫特、華茲華斯、拜倫。我們大聲朗讀，那些詩行一板一眼地回響著-一口口吐出的氣抑揚頓挫地升向頂板。外面，沒有韻律的風從長江上猛刮過來。在課桌下面，學生們在寒冷中跺腳。」

通過教學，何偉深感這些純樸的農村青年真心喜愛他們讀的作品，這和西方那些肢解文學作品為各自的文學理論墊背的泰斗們大不一樣。他說：「我很難想象一份更好的工作。我的學生們都聰明好學，尊敬老師。」他認識到：「從今以後，我一定會從他們的角度看待文學。有時候，我暗自好笑，心想：我們在這里都是避難者。他們逃避了他們那些『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課，我也逃避了『解構主義』。我們很快樂，一起讀詩，外面大江上整個涪陵忙忙碌碌。」

涪陵是一座二十萬人口的小城，以生產榨菜聞名。大街上吵鬧、擁擠、骯髒，汽車不停地按喇叭，與普林斯頓和牛津有天壤之別。但是，來自美國的何偉逐漸習慣了，把這座江上的山城看作自己的第二故鄉。

初到涪陵，一上街就有人圍觀，指手畫腳，唧唧喳喳，因為他是五十年來第一次出現的美國人。何偉當然感到很不自在，但是並沒有被嚇倒。他認真學習漢語和本地方言，逐漸可以和當地的老百姓交談。他自稱「洋鬼子」，開玩笑，交朋友，身心投入老百姓的生活。他參加全市的長跑比賽，獲得冠軍。走在大街上，大人孩子都親熱地大聲招呼「哈囉，何偉！」偶然踫上個別的好事之徒找「洋鬼子」麻煩， 總會有人挺身而出為他解圍。

何偉走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爬那些小巷建在山坡上的石階，熟悉石階兩旁五顏六色的店鋪和攤販。本地人司空見慣的、遍布全城的「棒棒軍」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在這個辛苦的城市，沒有比這些搬運工人幹的更辛苦的工作：

他們經常挑著上百斤重的擔子爬著石階上山，辛苦一趟才掙一、兩塊錢。他們身材短粗，他們的身體是由這座多山的城和他們工作的性質定形的。熱天，他們汗流浹背；冬天，他們的身子熱氣騰騰。捲起的褲腳管下面，他們的小腿肚子鼓起，彷彿有棒球綁在他們腿後面。

何偉接觸了涪陵的「三教九流」，從天主堂八十高齡的神甫到跟他糾纏不清的髮廊「小姐」。他是學院對門小麵鋪「學生之家」的常客，和學生們一起邊吃「抄手」邊談心。黃老闆包抄手的每一個動作讓他看得入神。何偉和黃家三代人交上了朋友，春節還應邀到黃家吃年夜飯，主人的慷慨好客使他深為感動。一家建築公司老闆托「改革開放」的福發財致富，清明節帶領全家族三代十五人到長江對岸的白山坪去為父母上墳，點蠟燭，燒冥鈔，何偉也興致勃勃地陪同前往，體驗舊傳統和新時代的結合。盡管學院領導阻攔師生和他課外交往，有些師生和市民逐漸向他吐露心聲，講述各自在新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坎坷家史，從而為他本人兩年的經歷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宏觀背景。

何偉愛上涪陵的山山水水。從白山坪的一個頂峰，他可以飽覽他所喜愛的江城景色：

在他們腳下展開著山坪有層次的景色：：梯田上碧綠的小麥，排列得整整齊齊；一片片油菜，黃色的花蕾如火如荼；花色柔美的泡桐樹，高聳于灰頂的房屋之上； 宏偉的長江在日光下銀光粼粼；對岸，依稀如畫的寶塔在遠方閃爍，白淨細長。一 陣微風吹拂近處一行行幼嫩的小麥。

何偉遊覽了白鶴梁。這是涪陵港口一條不到八十米長的沙岩，一年最多在秋、冬季才露出水面五個月，展示它絕無僅有的寶藏。一千二百多年前，唐朝巧妙的工匠在沙岩的水線刻下了兩條兩尺長的大鯉魚，從此成為長江水位的標識，歷朝歷代又在岩面上鐫刻了二十二幅畫和三十萬字的詩文，記載了千百年來因水位漲落引發的國泰民安或天災人禍。可是，眼看三峽工程搞得熱火朝天，何偉知道幾年之內，他所熟悉的涪陵的一部分將被淹沒，白鶴梁歷史悠久的國寶也將葬身江底，感到十分痛心。

何偉依依不舍地告別了江城。這個有心的「洋鬼子」，以

「旁觀者清」的慧眼，觀察第二故鄉的山山水水，風土人情，以平實、細膩的筆觸，勾畫出一幅幅《清明上河圖》，抒寫出一個急劇變化的新時代的《馬可孛羅游記》，為未來世代的有心人留下一份獨特的歷史見證。

2001 年秋於維州獵人森林客寓

評韓秀新著《團扇》

韓秀的新著《團扇》出版了。這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由台北未來書城發行。

韓秀是一位美國駐華武官的女兒，一九四六年秋在紐約出世，兩年後被中國母親送往南京，從此在大陸走過二十八年坎坷的道路。一九七八年回到美國，開始用中文寫作。自從一九九零年以自傳《折射》躍上文壇，十二年來，每年都有一、兩部新書問世，數量與品種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短篇小說、散文、文學評論、遊記、食經等等，應有盡有，各具「只此一家，並無分鋪」的獨特風格。

《團扇》又是一部不同凡響的小說。故事的肇因是台灣海峽兩岸政治斗爭中的一個插曲。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一個風狂雨猛的夜晚，兩艘台灣的海軍軍艦執行「送人」到對岸的任務，由于內奸與敵方里應外合，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奉命「親自坐鎮」的部隊長胡嵩詮海軍少將被俘。台灣方面宣布他已「壯烈殉國」，並在海軍營地為他樹立烈士紀念碑。

將軍被俘之後，拒絕與敵人合作，寧願坐穿牢底，也不坐「政協」的交椅，出賣祖國。繼之而來的是骨碎筋折的酷刑、煉鋼爐前的煎熬、荒漠勞改。十年之後，被「寬大釋放」，繼續受到嚴密監控。妻子秦淑娉是海軍將領的夫人里面數一數二的美人。根據直覺，她從來不相信她至親至愛的人已經為國捐軀的「事實」，「卻相信他的的確確為了他的國家，為了他的信仰在付出，付出自由，付出健康，付出和妻女生離的千般苦楚。」她棲身異國，通過各種渠道，探尋他的下落，等待他歸來。他們之間的信任是生死不渝的，歷久而彌堅。「他們知道他們必然要團聚，在這個世界或另外一個世界都沒有甚麼要緊。要緊的是他們堅守了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原則。」

小說寫的正是這樣的「尋常人的感情」，不是政治，不是軍國大事。圍繞著這對患難夫妻的「生離死別」，展開了一個又一個可歌可泣的尋常人的故事。青年尉官、部隊長夫人的

表弟「老七」，對表姐和姐夫一片深情，忠心耿耿，從炮毀的軍艦落水獲救之後，不回台灣，反而深入虎穴，追尋姐夫的下落，千辛萬苦，十七年如一日。大陸海軍軍官文泰持正不阿，在「文革」浩劫中，落得與老七一起勞改，成了患難之交。他和青梅竹馬的情人小倩的恩愛也是生死不渝的。

從「生離死別」到異國團圓，整整二十七年，跨洲過洋，給予故事廣闊的時空背景。那個期間發生在大陸的荒誕離奇的現實更為善良、堅貞不屈的「尋常人」的受難提供了強烈的對比。「文革」浩劫中，北京一家鋼鐵廠煉鋼爐前的煉獄是現代化的但丁的煉獄。戈壁灘上的「兵團」又是另一番煉獄景象，這是韓秀親身經歷過的，一沙一石都染上她的血淚。

最令人不忍卒讀的，是老七在追尋姐夫下落的顛沛流離途中「攪和進中國大陸的地面上最慘烈的一群人里面」的經歷。一九五六年，中共開始建設三門峽水庫，三十萬移民從肥沃的八百里秦川被騙至風沙蔽日的苦荒之地。移民們在「安置區」毫無生路，走上了大規模「返回庫區」的征程，不顧政府的圍追堵截，前赴後繼。老七在寧夏南端遇到的這批移民正是無法忍受陝北「新安置區」的貧困，迂回數千里，撲回家園的許多小部落里的一支。面對絕對的貧窮、荒涼和淒慘，他感到椎心泣血的震撼，和他們在一起度過一段患難與共的時光。「自從猶太人出埃及以來，人類歷史上何曾有過如此慘烈的大遷徙！」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俄克拉何馬州「塵暴區」的農民失去了土地，無以為生，紛紛走上前往加州當季節工人的艱辛征程。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根據這樣一戶人家的悲慘經歷，寫成了長篇巨著《憤怒的葡萄》，喚醒了美國人的良知，聲震寰宇。他們的遭遇，和不顧一切從千里之外「返回庫區的移民」的苦難，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幾十年來，何曾有過一位中國大陸的作家為這段驚天動地的慘史，為這片飽受蹂躪的土地和三十萬同胞，耗費一點筆墨！《團扇》書中有書，為歷史作了見證，為中華兒女的受難作了見證。

韓秀煞費苦心，「尋找那一些碎片」，終于完成了這張

拼圖。與此同時，她也用一幅幅血肉模糊、撕心裂肺的畫面，勾畫出紅色中國的歷史地圖，在這慘不忍睹的背景上矗立著一群驚天地、泣鬼神的「尋常人」。

在面對強權與殘暴的青春歲月中，經過千錘百煉，韓秀已經成為決不妥協、決不氣餒的強者。她把一柄團扇放在女主角手中，「她手裏那柄團扇隨著她心境的起落而變化。」一張薄絹，輕如蟬翼，然而柔弱中有強韌，像一面旗幟在腥風血雨中自在地飄揚，昭示著畫扇人和持扇人的心跡和未來。「生離死別」二十七年之後，站在泰國的一座橋上，等待著被救出牢籠的親人團圓，「夫人手舉一面團扇，上面疏疏朗朗的一叢蘭草，小小一朵蘭花。夕照之下，竟然嬌艷得很。」你能不流淚嗎？

在韓秀的短篇小說《生命之歌》中，戈壁灘上兵團裏一位年青的母親曾在北京一家醫院生產，由于她本人是中美混血兒，她又拒絕與自己的祖國「劃清界限」，接生的大夫便根據「文革」中階級斗爭的需要，活活殺害了她新生的女兒。現在，眼看又要生第二胎，就在臨產前跨上馬奔赴師部醫院，請本地可靠的醫生接生。與此同時，她那學水利的丈夫因反對亂坎原始森林、破壞生態環境被判死刑。她在一張卷煙紙上寫下「女兒健康美麗」幾個字，請趕大車的帶給丈夫。這該是悲觀絕望的時刻吧。韓秀卻寫道：

天真大，藍得耀眼，陽光晒熱了靠著手術室後牆坐著的一溜兒維族婦
女。她們哼唱起一個悠悠的長調，舒緩而溫柔，悠悠然。她們手遮陽棚，對
她微笑著。
「她們在為一個新生命吟唱。」王大夫看著她。
…………
忽然響板聲大作，牆根下的婦女放聲高歌了。昂揚的聲音，激越的和聲
在大戈壁上回蕩。

聽著「生命之歌」，她輕輕地高舉起女兒，發誓要「好好兒地跟這該詛咒的命爭一爭！」

久經劫難的韓秀，她從來沒向「這該詛咒的命」低過頭。《團扇》是她譜寫的又一曲昂揚的「生命之歌」，激越的和聲在你心里回蕩。走出了仇恨和死亡的陰影，她無限深情地歌唱生命，歌唱堅貞的愛情，歌唱「字、畫、音樂」。你說，韓秀，這個唯一用中文寫作的美國作家，不是個異數嗎？

一本奇書：詩體小說《達祛 D 的墜落》

美國每年出版的小說何止千百種，琳瑯滿目，詩體小說卻是絕無僅有。今年問世的《達祛 D 的墜落》（Darlington ‘s_Fall)_正是這樣一部不同凡響的異數。作者雷特哈塞（Brad_Leithauser)_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資深文學教授，也是一位久負盛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他的著作曾獲多種獎項。

這部詩體小說的主人公羅素・達靈頓一八八八年出生於印第安納州一個小城的全郡首富之家。他幼年喪母，父親約翰痛不欲生，從此對幼子百般憐愛。達靈頓早在童年就熱愛採集各種昆蟲，格外偏愛蝴蝶，在當地贏得了「小小博物學家」的稱號。

十歲那年，為了弄清他捉到的一個稀奇的昆蟲的家世，父親領著愛子到他的母校、三十英里外雷明頓市的「老大學」，去向昆蟲學專家西洛克(Schrock)教授請教。這位教授是奧地利人，年少時被一只馬蹄踐踏毀了容，面目可怖，性情怪僻，但精通昆蟲學。達靈頓和他相見恨晚，不久便成了他的私淑弟子，經常登門受教，七年如一日。師生之間的忘年之交甚至在學生父親的心中引起了嫉妒。

一九零六年，達靈頓十八歲，進入「老大學」，正式成為西洛克的學生。他夜以繼日鑽研昆蟲學，被公認為學子精英，學術前途不可限量。一九零九年二月，他在一次學生舞會上和同年級的大美人葆琳(Pauline)一見傾心。一九一零年六月大學畢業後，兩人結為夫妻。

一對新人兩情相悅，彼此的性格卻發生了矛盾。達靈頓繼續一心撲在蝴蝶和昆蟲學上，夢想著攀登學術高峰，對社交生活毫無興趣。而葆琳活潑伶俐，愛跳舞，愛交際，感到新婚生活枯燥無聊。葆琳渴望到歐洲去度蜜月，而達靈頓卻執意拋下新婚的妻子，單人匹馬，遠渡重洋，前往蝴蝶王國馬來亞叢林，實現他計劃已久的、長達九個月的探險，從事他平生第一次真正的野外調查，採集聞所未聞的蝴蝶標本。

一九一二年，二十四歲的博物學家在舊金山告別了愛

妻，登上前往夢魂縈繞的赤道叢林的征途。作為前往馬來亞探險的準備，他首先在加羅林群島中一座植物繁茂的小島朋納普（Ponape)作試驗性的探索。一路上險象叢生。他突然看到一只耀眼的藍蝴蝶，是美洲才有的品種，這可是個重大的發現。他感到十分激動，迫不及待地舉起網去捕捉。誰料到，一失足，從一塊大鵝卵石上滑倒，他摔得身負重傷。

傷員回到家鄉，由慈父從全國各地請來名醫診治，終于靠雙拐才能勉強走動。這樣一個殘疾人怎能拖累一個年青美貌的妻子？達靈頓堅持離了婚。父親把家搬到大學附近新買的房子，便於兒子就近在大學繼續科研工作，父子相依為命。不料禍不單行，父親又患了舌癌，不久於人世。為了給愛子留下一個理想的科研環境，老父抱病奔波，捐資募款，在大學校園興建一座傲視全州的自然科學館。父親病故後，科學館的建設工作由兒子繼承。

科學館的主體建築是宏大的圓頂圓形大廳，圓頂下面展示一套由四幅巨型壁畫組成的「生命之進化」環形圖景。負責壁畫工作的藝術家是一個由達靈頓看中的瑞典農家青年。「小伙子」性情孤僻，不修邊幅，繪畫技術並不杰出，進度又緩慢。但是他以大廳為家，夜以繼日，鍥而不舍，「一心一意要把一片白牆轉化為光彩奪目、廣闊無垠的景象」。青年畫家的崇高志願和超凡脫俗的憧憬，使達靈頓深為感動。他不顧大學領導人的反對，堅持讓身患肺結核的瑞典鄉巴佬繼續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殘疾的博物學家科研、著述之餘，坐在輪椅上仰望壁畫的進展，驚嘆畫家如何一絲不苟地重現千百萬年前生物演化的過程，直到他因病情惡化而被迫放棄他未完成的事業。

達靈頓生命中的藝術家一旦消逝，他孤獨的生活就格外淒涼。一天工作下來，只有饕餮貪杯的恩師坐在他亡父的座位上陪他就餐。如同他半生鑽研的昆蟲一樣，他也渴求配偶了。恩師一死，他便請波蘭裔女佣和她的孫女瑪雅陪他吃晚飯了。四十三歲的殘疾人瘋狂地愛上了十九歲的瑪雅。絕望的愛情使他神魂顛倒，卻也無可奈何。不料兩年之後，瑪雅被她愛過的小伙子遺棄，被迫打胎，悔恨交加，走投無路。達靈頓發現後，當機立斷，迎娶痛不欲生的瑪雅為妻。

《達靈頓的墜落》是一個愛情故事，但不是單一的男歡女愛。小說主人公的墜落是故事情節發展的關鍵。一失足毀滅了他的燕爾新婚，二十年後卻又成全了他的好事。一失足使得慈父對愛子更加無微不至地憐愛，身患絕症還為他的科研生活作出周詳的部署。一失足使他和恩師的忘年交終生不渝。一失足導致科學館的建立，才有一個不同流俗的藝術家進入他的生命，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得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一個從小醉心博物學，在追求科學真理的征途上毀掉了年青的身體和婚姻，從此靈與肉長年受難，然而身殘志不殘，長夜孤燈，探索「生命進化」的真理。一個以藝術為生命，全身心投入刻劃「生命進化」的圖景，貧病交迫，鞠躬盡瘁。一部不到五萬字的小說，竟是一個如此彩色繽紛、錯綜複雜的情愛的悲喜劇。

不僅如此，《達靈頓的墜落》將科學探索引入文學天地，實現了十九世紀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_Wordsworth)的期望。這位浪漫主義大師預言：有朝一日，詩人的藝術將用於化學家、植物學家、或礦物學家最冷僻的發現，詩人將用他的靈感賦予「科學」以血與肉的形體。大叢林的蔥蘢繁茂、萬態千姿，使小說的博物學家主人公心醉神迷。而天地的不仁、生存競爭的殘酷，又使他身心受難。他不僅立志要編著最完備的蝴蝶目錄學。他潛心探索生物演化的進程、整個大自然的奧秘，竭力去超越達爾文的進化論。作者寫道：

> 這是達靈頓的夢想、他最博大的希望：
> 不再僅僅是孤立的細節、
> 靠顯微鏡和手術刀才弄到的
> 資料，永遠零星不全……
> 而是現在終於觀測「物」的整體，
> 矚目「生命」本身、「生命的本質」……

達靈頓並未如願以償，但是他在科學領域中艱苦卓絕的追求構成這部詩體小說的靈魂。

為了確保故事的科學內容準確無誤，作者花了十幾年功夫從事科研。他不但閱讀一部又一部自然科學史和無數有關報刊，訪問一家又一家博物館，而且兩次遠渡重洋，冒著風險實地考察達靈頓「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朋納普小島。作者強調重

現自然界細節的「特異性」，一花一草，一蟲一鳥，無不真切可信。各種景色的描繪，不論是世紀之交美國中西部林木茂密的大平原，朋納普島上的叢林，還是想象中的恐龍時代的大地，無不細致入微。

這部小說是一首長達五千七百行的長詩，詩人獨創的十行一節的格律自然流暢，讀起來瑯瑯上口，宛如行雲流水，和故事的詩情畫意融為一體。作者的哥哥馬克(Mark)_是一位杰出的畫家，他又錦上添花，為全書十二章的每一章繪制了一幅精美獨特的插圖。冷僻的科學探索升華為動人心魄的詩篇，詩與畫又交相輝映，真是一本奇書。

劍橋的灵性

一九八三年九月，我偶然有機會參加在漢堡舉行的國際大學英語教授學會為期一周的大會。在國內久經身心禁錮，驀然置身國際學術交流的自由天地，恍若隔世。一天，大會發言休息時間，著名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專家戴瑞克?布魯厄（Derek Brewer）博士和我攀談，當時他任劍橋大學英語教授會主席兼伊曼紐爾（Emmanuel_College)學院院長。十分鐘泛泛的交談，我並沒留下甚麼印象。十月底回到北京，十一月就接到布魯厄教授的長函，熱情洋溢地邀請我作為四九年以來第一位中國人文學者到劍橋大學作為期一年的訪問。簡直不可思議！

我和劍橋的「神交」是早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前開始的。三九年冬天，從西南聯大《大一國文》課本裏，我第一次讀到徐志摩的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橋》。詩人一往情深的散文，魔術般地把一個流亡青年從瘡痍滿目的本土，引進了一個如詩如話的異域、一個虛無縹渺而又永遠不可企及的空焓瀾纭Ｕｌ會料到呢，在半個世紀的顛沛流離之後，我竟然要到這座海市蜃樓去遨遊了。

八六年一月初，我和妻子來到徐志摩的奇境。雖然英國特有的冬霧障目，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那些當年曾使年青的詩人心醉神迷的景色：那被他稱為「康橋的靈性」的康河，波平如鏡的河上一如當年蕩漾著各色游船；那上下河分界處水流湍急的「壩筑」，那是詩人在星光下聽水聲的幻境，河身兩旁綿延不絕、雖在隆冬也蔥翠欲滴的草坪，那是年青的夢想家看雲晝夢的魔毯；還有那從「後院」望過去几座最有名的學院奇跡般的樓宇「清澈秀逸的意境」。

但是，小住八個月，我也發現了另一個劍橋。我的足跡踏遍了劍橋的三十個學院，一股濃烈的傳統感和歷史感時時縈繞在我的心頭。有一些學院是早在中世紀建立的，哥特式建築一派古色古香，也有一兩座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興建的。每個學院，中世紀的也好，現代的也好，無不有一個芳草如茵的庭院、一座英國國教的教堂、一座掛滿了英國歷代國王和杰出校友畫像的大餐廳，還有一座滿藏古籍和手寫本的圖書館。一切活動彷佛都遵循著古老的規矩和古老的洪鐘的節奏在運行。那鐘聲裏彷佛還回蕩著多少個世紀的回響。每一件事物都是一片活的化石，一個至今綿延不絕的過去的見證。就拿最蜚聲的

三一（Trinity）學院來說吧。古老莊嚴的校門外面，一個牆角裏孤零零地立著一株又小又瘦的樹，傳說它的祖先是那株歷史上最有名的蘋果樹:_正是它落下的一個蘋果導致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院門裏面是全大學最大的一座庭院，當年詩人拜倫在這裏就讀時每常用一條鐵鏈領著一頭小熊在院子裏漫步。右手的教堂裏，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牛頓的一座全身塑像，他面前坐著其它几位名垂史冊的校友，其中有哲學家培根、史學家麥考利、桂冠詩人丁尼生。多少遊人在這裏流連忘返。

「三一」是劍橋最大的學院，本科生也不過八百人，幾百年來也不知造就了多少風流人物。一位劍橋人告訴我，三一學院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超過整個法國。但即使最小的學院，只有一、二百學生的，也有其引以自豪的特色和傳統。四月的一天，我應邀到「三一」緊鄰的小小凱斯（Gonville_Keyes）學院去進晚餐。按照劍橋和牛津的傳統，師生在大餐廳裏共進午、晚餐。餐廳的一端為院長和院士們安置了一張長餐桌，叫做「高桌」（high_table），放在比餐廳地面略高一點的臺子上，就算上席吧。作為那一晚的「貴賓」，我的座位恰巧被安排在兩位舉世公認的科學巨人中間。在我的右邊，坐在「高桌」的上端主持晚餐的是李約瑟（Joseph_Needham）教授，他的巨著《中國科技史》早已名垂青史了。他已是八十六歲的高齡，背雖微駝，但看上去仍是一位魁偉的巨人，雙目炯炯，閃爍著獻身的神采。我怯生生地問他：「您的巨著還有多少卷要寫？」他微笑著答道：「我自己也不準知道，因為這部著作一直不斷地擴展。」他的一位較年青的同仁插話說：「約瑟就是這個樣子。他只管一個勁兒地幹，約瑟和他的書一樣是沒完沒了的。」

在我左首的是一位坐在電動輪椅上的中年男子。他滿面病容，飯食由一位女護士慢慢地喂著。原來他是斯蒂芬?霍金（Stephen_Hawkin），劍橋大學歷史悠久的盧卡斯（Lucacian）數學講座教授。這也是三百年前牛頓擔任過的教職。霍金因為提出過關於太陽上「黑洞」的新學說和關於宇宙起源的新理論而名揚世界。他這時才四十四歲，可惜由於二十年來受到肌萎縮性惻索硬化症的摧殘，他已幾乎全身癱瘓，並喪失了說話的能力。他只能通過一個安放在喉腔裏的微型麥克風「說話」，然後他的話語經過聲音合成器加工，顯示在他面前的電腦熒光屏上。他告訴我他不久前訪問過中國，四個結壯的小伙子連人帶輪椅把他抬上了長城，這時他臉上綻開了一個

無憂無慮的青年人爽朗的笑容。一位同事問他是否仍在研究「黑洞」，他又一次露出了那青春的笑顏，回答說，他好多年沒想過那方面的問題了。近年來，他忙於研究一種新學說：如果現在還在擴張的宇宙停止發展而開始萎縮，那麼時間的方向就會倒轉。這個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的殘疾人又一次震撼了全世界的理論物理學家！盡管禁錮在不治之症的「黑洞」之中，霍金那非凡的才智和生命的火焰卻熾烈地燃燒著。

　　那個深夜，沿著徐志摩所熱愛的康河走回學院公寓，我仿佛對劍橋有了新的體會。請看這兩個人：一個年邁體衰，一個久患絕症，但兩個人都頑強地堅持著對真理的追求。論年紀，李約瑟和霍金相差整整兩代，是甚麼共同的東西把他們牢牢聯係在一起？是一種無形的紐帶，也許「高桌」或康河就是它的象徵？人們說霍金是天才，是奇才。但是，若不是有一種光輝的傳統孕育他、支持他、愛護他，他會有甚麼作為嗎？今天，每當霍金坐著輪椅出現在劍橋學院集中的皇家大道時，行人都親切地招呼他：「你好，斯蒂芬！」開車的人會放慢速度，有些人還會向這位最受人愛戴的市民鳴笛致敬。你能想象劍橋大學的學生給霍金、李約瑟和其他「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戴上高帽子，再掛上几十磅重的大牌子，押解到皇家大道來游街示眾，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嗎？

　　四月的又一個夜晚，我的東道主布魯厄教授邀我到伊曼紐爾學院的「高桌」上去作客。餐後移座院士休息室，邊呷酒邊交談時，他問起我多年來在中國的經歷。我說：「說來話長。長話短說吧：五一年告別金門大橋回國；五八年犯思想言論自由罪押送半步橋，開始了漫長的賤民生涯；『文革』十年，關『牛棚』，全家流放；八六年到了劍橋。三十餘年如一夢，一事無成兩鬢霜。」他聽了連聲說：「不可思議！不可思議！」接著說：「你應當，你務必把這不可思議的經歷寫下來，交給我主編的《劍橋評論》發表，幫助世人瞭解這一段密封的歷史。」情不可卻，我雖多年未用英文寫作，也只得勉為其難。從友人處借來一臺古老的打字機，敲敲打打，寫成了《從半步橋到劍橋》一文。《劍橋評論》六月號的主題是「中國和英國的高等教育」，我這篇長達萬言的回憶錄破例佔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刊物封面還選用了當時正在劍橋展覽的清代名畫家石濤的一幅畫。「竹光園野色，合影漾江流」的幽美意境和中國高等學府紅色恐怖肆虐的景象形成觸目驚心的對比。九三年六

月，我以此文為提綱撰寫的英文回憶錄 A_Single_Tear_(《一滴淚》）英國版問世，我和妻子從華盛頓前往倫敦接受了媒體的采訪後，重返一別七年的劍橋，在布魯厄教授家作客。他又邀我們重上學院的「高桌」，並在晚宴上興奮地告訴在座的院士們：《一滴淚》是在劍橋催生的，它是自由思想交流的產兒。

幾百年來，劍橋是舉世矚目的學術重鎮，它憑藉的到底是甚麼？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以所向披靡的「閃電戰」霸佔了大半個歐洲，並妄想征服英國本土。勝利沖昏了頭腦，他甚至一廂情願決定把第三帝國佔領軍總部設在劍橋大學，本人則駐畢舉世聞名的皇家學院，因此還命令對英倫三島狂轟濫炸的德國空軍不得轟炸劍橋。倒不是這個殺人魔王鍾情劍橋的哥特式建築，而是他妄想以此向全世界炫耀納粹主義摧毀自由民主的勝利。

早在他自取滅亡之前，希特勒的白日夢就化為泡影了。然而，劍橋大學卻在戰火中獲得了新的活力，繼續發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傳統，造就了李約瑟和霍金這樣一代又一代的精英，激勵著世界各國具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學人百折不撓地追求真理。

七十年前，以倡導學術思想「兼容並蓄」而成為一代宗師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曾由徐志摩陪同，不遠萬里親自來到劍橋大學考察，也可以說是「取經」吧。今天，面臨新的千禧年的挑戰，對於經過五十年水深火熱的錘煉的中國學人，劍橋的靈性會有甚麼啟示呢？

羅馬的瑰寶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從美國回大陸「報效祖國」，不料卻從此陷入身心禁錮，長達三十一年。八二年夏天才第一次有機會出來，舊地重游，重新呼吸到一點自由的空氣，感受一點正常的人情，又到加州大學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研究方面補了一年的課。八三年暑期，應邀到西北大學參加一個文藝理論研討會，為期一個月，與會的是數十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和青年學者。西爾維亞‧羅索太太是來自羅馬的女博士生，她的先生正在撰寫另一學科的博士論文，我們認識後很談得來。研討會結業前不久，她邀我到他們住處去吃晚飯。飯後我說起我從未去過歐洲，九月初要去漢堡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會後打算到歐洲幾個國家，包括意大利，去觀光。他們聽了很高興，當場邀請我到羅馬後在她父母家作客，我自然喜出望外。

九月中到羅馬後，我在中國大使館客舍住下，當晚打電話給從未見過面的羅索老先生。他接電話後十分興奮，說明天一早開車來陪我游羅馬。果然，早飯後，他就來了。他身材不高，胖胖的，一臉樸實的神情；年紀約莫五、六十歲，比我小些。見面後，他就問：「你的行李呢？」我說在房間裏。他說：「你住我家啊！」

我支支吾吾地說怎能去打擾呢。他有點急了：「這怎麼能行呢？我太太給你把睡衣都收拾好了，放在你的床上。」多年來在自己的祖國身為政治賤民，不知遭過多少人的白眼，記憶猶新，此時此刻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羅索先生幫我把兩大件行李搬上他的轎車，上車後告訴我他住在羅馬郊區 Monterotono 鎮上，開車要走個把小時。一路上，他不厭其煩地為我指點一處處名勝古跡，隨時流露出他對這座不朽的古城的摯愛。他的家在一幢典雅的三層公寓樓內，馬路對面開設著一家以「天堂」命名的咖啡室，不由讓人想到但丁的《神曲》。他家在二樓，三室二廳，沿著一個回廊展開，花木扶疏。雖在盛夏，毫無暑意。

他領我到為我準備的客房，一張雪亮的銅床上放著一套光潔的睡衣。他太太也樸實無華，跟他好像是天生的一對。她

不會英語，我請她先生當翻譯，表達我的謝意。她笑著說，不用謝，我是她家第一位中國客人，希望我不要見外，多住些時。羅索先生拉著我的手走進客廳，一張古色古香的大桌上擺著許多瓶各式各樣的酒。羅索先生說，羅馬人在家中歡迎首次光臨的貴賓要敬十杯不同的酒。我嚇了一跳，受寵若驚。好吧，恭敬不如從命，十杯下肚話匣子就關不住了。仿佛一個從煉獄歸來的亡魂來到天堂門口，忍不住要訴說一些並不新鮮的往事，老夫婦聽了卻熱淚盈眶。午飯後，羅索先生又駕車陪我遊覽了几處勝地。他注意到我常擤鼻涕，回家的路上還在一家藥房為我買了一瓶治鼻炎的滴劑，又囑咐我一天三次點滴。回到家中，羅索太太已做好了一頓豐盛的意大利晚餐，自然還有意大利紅酒佐餐。

第二天早餐後，羅索先生又駕車帶我進城。他太太在市內有事要處理，也同車前往。分手時約定中午在市內某處會合，然後一道去餐館午餐。羅索先生陪我又逛了幾個景點，雖是走馬看花，他講得如數家珍，我不免眼花繚亂。中午到了約定的地點，他太太已經先到了。她把手中的東西放進車內，然後我們就走進附近一家意大利餐館。逛了一上午，大家的胃口都不錯。我要會帳，他倆說甚麼也不答應。飯後走回車子旁邊，羅索先生「哎喲！」一聲：「不好啦！車鑰匙丟在車裏啦！」他掉轉身子問太太：「你的鑰匙呢？」太太指著車子的後座說：「在我手提包裏，手提包在車上。」羅索先生繞車轉了一圈，只見車的門窗都關得嚴嚴實實，無空可鑽。他兩手一攤說：「這可抓瞎啦！我怎麼領客人去遊覽凡蒂岡呢？」我突然發覺，也不知是甚麼時候，已經在我們和車子四周聚集了十幾個路人，人人都在熱心地出主意，跑來跑去，有人很快就找來一些工具，在車窗車門上找空子鑽。群眾的智慧果然驚人，不知甚麼時候，一個小青年用一根鐵絲穿進前座小三角窗旁的縫隙，撬開了小窗，伸手進去開了車門。大家一陣歡呼，把羅索先生抱了起來。他下地一站穩，就急忙跑到附近小酒店買來十几瓶啤酒，舉瓶向大家致謝。也許只不過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事隔十餘年，羅馬人這一番自發的助人為樂的景象卻至今難忘。羅索夫婦又陪我去凡蒂岡一游，領我觀賞了一些主要的藝術珍品。晚間又在一家餐館為我餞行。

次日早餐後，羅索先生開車送我去火車站，搭乘去巴黎

的火車。路上他問起我治鼻炎的滴劑效果怎樣，我說很見效。他說，那麼得再去買一瓶給我。那天是星期天，市內藥房都關門，只有火車站商場有得賣。我說，不用啦，到巴黎也能買到。他有點急了：「這怎麼能行呢？你到巴黎，人生地不熟，到哪兒找藥房去？」他在火車站停車場停好了車，要我在車旁等他，他去商場買藥。不多久，他就邁著大步回來了，一面把藥遞給我，一面喘吁吁地說：「這我就放心了。」他隨即找來一輛手推車，幫我把行李推到站臺，又把行李送到我的車廂。告別的時刻到了，他說：「羅馬處處是珍寶，三年也看不完的，你才呆了三天。一定要再來，還住我家，陪你好好玩玩……」話沒說完，這個已經當了爺爺的羅馬人摟著我哭了，我在心裏壓了幾天的激情也化成了奪眶而出的淚水。

沒想到，三年之後。果真又重訪羅馬。西爾維亞得訊後，立即來信說，她公公有事在 Trieste 逗留，她和先生帶著八歲的女兒陪婆婆和奶奶在羅馬以北几十英里的 Terni 小城消夏，我和太太正好就住在她公婆家。我們旅囊羞澀，自然喜出望外。八六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我和妻子從巴黎乘火車到達羅馬。西爾維亞帶著她可愛的小女兒到車站接我們，再開車把我們送到她公婆家中。我們住的還是那間有大銅床的客房。她領我們到廚房，打開冰箱，裏面滿滿當當的裝滿了食品。她說：「這點東西只夠你們吃幾天的，以後就得委屈你們到附近的小鎮上去買了。」午飯後，她又陪我們到小鎮上轉了一圈，一一指點食品商場、前往市區的公車車站、郵局等等，然後帶著女兒走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要在十點鐘以前趕到聖彼得廣場，參加教宗每周一次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友舉行的公接見，事先還要到市內羅馬大學英文系 Pufinix 教授家取凡蒂岡於前一天才派人送來的兩張「在前排按號就座」的入場券。西爾維亞一清早就開車來了，先送我們去取入場券，然後為我們雇了一輛計程車送我們上路。分手前，又約定下星期日來家接我們去遊覽。隨後三天，我們上午搭公車去市內觀光，晚間回來認定在「天堂咖啡室門前下車。

星期天上午，小羅索先生開車，一家三口來接我倆。我們先遊覽了一處瀑布，然後到 Terni，在他們的夏居吃午飯，

分享他們四代同堂的天倫之樂。我從未見過祖父母，更甭提曾祖了，几十年來和妻子兒女也是離多會少。苟全性命於亂世，眼看這家人几代同堂，其樂融融，真從心底感到溫馨和艷羡。飯後羅索夫婦陪我倆去 Assisi，瞻仰方濟各會創始人八百年前所在的修道院和大教堂，晚間又應邀一道去他們的朋友家吃晚飯，送我倆回到家中已是午夜時分了。

那晚分手前，他們說父親來過電話，說他很抱歉趕不回來陪我們游羅馬，要我們盡可能多住幾天。真的賓至如歸，「樂不思蜀」，又住了一個星期才搭火車去瑞士。行前給主人們留言，實在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倆的謝忱，只能希望他們有朝一日到北京觀光，給我倆一個機會盡地主之誼。然後，我們把大門鑰匙擱在桌上，帶上門就依依不舍地下樓了。

我這個外邦人和這家人萍水相逢，兩次受到這般深情而無微不至的接待，不禁回想起在自己國家多少備受凌辱的歲月，恍若隔世。我多麼希望，有一天，他們來北京遊歷，也肯在我家下榻，不管我們的寒舍多麼寒磣。沒想到，我這點卑微的心願也落空了，因為四年以後，我再次入了另冊，連寒舍也沒了。

十年來，流寓海外，居無定所，早已和羅索一家失去聯係。天涯懷人，每感惻惻。熱情好客的羅馬人啊，我永遠懷念你們，你們感人肺腑的愛心真情是不朽之城最璀璨的瑰寶！

野花野貓

四、五年來，「四海無家一滴淚」，生存方式只能是「強移棲息一枝安」。好在劫後餘生，早已懂得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妻子久經考驗，每常說：「刀山火海都過來了，還用得著為住哪兒發愁嗎？」兒女都成家立業啦，各忙各的，千萬別去給他們添麻煩，孩子們不是常說二老要培養獨立性嘛。有個几角旮旯睏覺，有碗飯吃，不就行了嗎？天上的飛鳥，地裏的野花，都活得那麼自在，咱們萬物之祀ｙ道還不如小鳥小花嗎？」當然言之有理，可一旦遇上住房危機，往往還是一籌莫展，走投無路。

去年九、十月間，一次新的危機又露頭了。形勢逼人，看樣子我們到年初又得另找個几角旮旯暫棲身啦。一連幾天，買了一份又一份大報小報，戴上老花眼鏡埋頭細看房屋招租的小字廣告，看得頭昏眼花。租金貴的我們自然無從問津，比較低檔的小公寓房間也要六、七百美元一個月。妻子說：「得啦，老先生，收起您的老花眼鏡吧。聽說有公家津貼的老人公寓很便宜，何妨問一問呢？」我不是不知道這條路子，可一想到七老八十的成堆，在回憶與死亡的夾縫裏消磨有限的時光，我就發怵。現在逼上梁山，也只好四處打電話去打聽了。

沒過了幾天，好几家老人公寓都寄來一疊材料和申請表格，每份材料都詳細羅列公寓各項設施和服務，並配有彩色圖片，有一家還特地說明「天堂殯儀館近在咫尺，設備一流，服務周到，本公寓住戶可享受優惠。」每份材料內都有熱情洋溢的歡迎信，同時每封也都表示，由於申請的老人為數眾多，等候期至少一年。我跟妻子說：「看來你的如意算盤又落空了。」她說：「嘿，我總說天無絕人之路嘛。冬天快到啦，有些人家要去南方避寒，勢必要請人看房子。你瞧這小報上就有一條廣告，何妨一試呢？」我立刻按廣告上的電話號碼撥通了電話，一談之下才知道原來對方也是冬天無處安身，正自告奮勇要代人家看房子的，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吧。我又問妻子：「『智多星』，你還有何錦囊妙計？」她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別著慌嘛。我經常在超級市場的布告牌上看到各式各樣的招貼，五花八門，賽過報紙上的分類廣告，何妨一試呢？」我別無良策，當然樂於一試，隨即到兒子的電腦上編出一條廣告：「冬天在即，府上南下避寒期間定需妥人照看寶

宅，有意者請與退休教師夫婦電話聯係。」下面加上電話號碼，一口氣寫了十遍，又用杭州張小泉的小剪刀一條一條剪開，成了十條小穗子，好似當年上初小時在手工課上搞剪貼。下午趁著每日例行的散步之便，到附近几家超級市場，在琳瑯滿目的布告牌上為精心炮制的小廣告找到一席安身之地。

一周過去了，眼看電話條子快撕完了，可就不見有人打電話來。下午散步回家，一路上秋色斑爛，天高氣爽，真教人心曠神怡。我跟妻子說：「維也納森林這個小鎮的秋色多醉人，若是咱倆能比翼雙飛，萬里晴空任翱翔，那多好。」妻子說：「你也不害臊，老頭子，沒錯兒你又犯嘀咕啦。咱們沒長翅膀，飛不了，還是腳踏黃土地吧。你的廣告光貼了超級市場，何妨擴大範圍，試試教堂呢？」我一進家門就忙不迭地打開電腦，重印了几張小廣告，又急著要拉她一道到鎮上的几座教堂去張貼。她不動聲色地說：「你怎麼沉不住氣呢！鳥兒都回巢了，您老人家也該歇息啦。明天去也來得及啊！」

次日清早，風和日暖，儼然秋天裏的春天。我倆帶著小廣告，先去三座教堂張貼。然後悠哉游哉去飽餐秋色，半醉半痴，把住房危機拋到九霄雲外了。直到中午，肚子餓了方才回家。剛進門就聽見電話鈴響，二人同時拿起電話，頗有點「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味道。原來是一位姓伊萊的老太太在教堂看到我們的小廣告了。她老兩口子要回南方喬治亞州老家去過冬，在麥克蘭鎮的家要請人照管，家里裏還養了三只大貓，不知我們是否也願意幫助照看一下。妻子說她很愛貓，一口應承了下來，老太太大喜，立即約我們面談。我倆都不會開車，老兩口子當天下午便開車來接我們去現場察看。

伊萊夫婦白髮紅顏，樸實無華，溫文爾雅。白色小樓不僅年紀和主人相若。連神態仿佛也一般。屋前屋後有几棵老樹，瘦骨嶙峋，儼然超現實主義大師達利的手筆。屋內一應陳設家具也都上了年紀，正合我們的口味。地下室內，除去陳舊的水泵和燒暖氣的設備之外，還有一個釀葡萄酒的大木桶。老先生擰開龍頭，倒出一小盅，讓我品嘗，我連聲贊好。老人家喜形于色，笑呵呵地說：「你知味，這桶酒伴你過冬啦。」地下室也是三只大貓坐臥和方便之所。老太太像喚孫子似的把她們喚出來，一一作了介紹。「這是『黎明』，年輕時和野貓打架，尾巴給咬掉了。今年十七歲，太老了。」她確實老態龍鐘，一身蓬松灰暗的毛，叫她「黃昏」也許更恰當一些。另兩只貓都是她的女兒。一只叫「大莉」，長了一身不起眼的黑毛。另一

只也是灰色的，不幸得了一種皮膚病，久治不愈，落掉了不少毛，露出一片片的皮，實在其貌不揚，取的名字卻是「俏姑娘」。除了三只家貓，還有五只無家可歸的野貓，也請我們一併喂水喂食。

新年，天下起了小雪，一清早就接到老夫婦的電話。趁著雪還沒下大，他們決定立即上路，家和貓都托付我倆了。寒冬臘月，異國他鄉，忽然間有了個家，心裏感到熱乎乎的。養貓卻是個嶄新的課題，我倆大半生自顧不暇，好不容易把三個兒女拉扯大了，哪還有閑情逸致養貓玩狗，現在受人之托就不免有點戰戰兢兢了。妻子劫後餘生，幾乎雙目失明，出門走路已經離不開盲人白杖，小孫男孫女都管不了，哪還能應付八只貓的吃喝拉尿？

這個貓總管我當仁不讓了。誰知道，我頭一天上任就砸鍋了。清早一起來，按房東交代的，我就踩著咳咳嗆嗆的老邁的小木梯到地下室去，千呼萬喚，也瞅不見一只貓的蹤影。無可奈何，只得移尊就教，把貓食和飲水送到地下室去。從此三只貓都深居簡出，偶爾出來放風，也是來去一溜煙，對我們各種友好的表示概不理會。我們不免覺得有點難過，幸好那五只無家可歸的野貓卻毫不見外，每天一早就在前後門口嬉遊，等候開飯。貓媽媽一身玳瑁色的毛，連妻子准盲人也感到光澤奪目，贊不絕口。四位千金一色油光雪亮的灰毛，顯然與貓爸爸的基因有關。看著她們一家五口圍著食盤水碗大吃大喝，大享天倫之樂，在「終日誰來」的生活中倒也不亦樂乎。我坐在電腦面前工作時，玳瑁貓往往坐在室外的窗台上，和我隔窗對望。雖然相顧無言，倒也相看兩不厭。下午，有時我心不在焉，過了開飯時間還不開飯，她就會舉起一只前爪，很斯文地在窗玻璃上敲打。等我開門去喂食時，她往往擠進半個身子，在我小腿上揉蹭，卻從不進來。

有一天早晨，雪下得很大。前後門外都是几寸深的雪。家貓反正足不出戶，五位無家可歸的野客咋辦呢？我想起在北大荒勞改農場冰天雪地中啃窩窩頭的滋味，怎忍讓她們在風雪中進餐？我先在廚房地上放好一盤食、一碗水，然後把後門開了個大縫，自己藏在門背後，隔窗觀看動靜。不一會，只見貓媽媽從門外一棵老樹幹上的大洞裏爬出來，身後緊跟著她的四個小寶貝，一家五口都溜了進來，直奔食盤。趁著她們吃得津津有味，我悄悄地把門推上，又順手照了几張相片，她們全然沒理會。我回到一盆盆鮮花悅目的客廳，刮根火柴點著了壁爐。

原來主人在行前不但為我們準備了几大堆木柴，而且在壁爐裏堆好了木柴和引火的小樹枝和舊報紙備用。我給自己斟了一杯主人家釀的紅酒，在壁爐前就地坐下，面對熊熊烈火，雖然滿室生春，仍不免「獨釣寒江雪」的惆悵。忽然想起這五只貓還都沒名字，便伸手拿來大兒媳婦送我的聖誕節禮物、詩人艾略特寫貓的遊戲之作，翻來翻去也找不到一個上口的名字，我自言自語道：「乾脆就叫『五朵金花』吧。」自斟自酌，神思恍惚，也不知過了多久，我忽然發現五只野貓也都圍在爐前，或坐或臥，怡然自得。我又順手拍了几張「五朵金花烤火圖」。我想，既然她們和我相依為命，我也當和她們親熱親熱，便伸手去抱貓媽媽。沒料到，她卻站起身來，揚長而去，一派「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神氣。可是，從那以後，每逢我倆外出，她們母女都要或前或後送我們一程。等我們回來，她們老遠地就飛奔到我們跟前，把尾巴搖得像撥浪鼓，把我們送到門口，然後再回她們的自由天地去尋歡作樂。

　　几場風雪過後，院子裏似乎已有春天的氣息，花木開始綻出蓓蕾。一個傍晚，夕陽彷彿也映得滿天春意，我站在後門口看著野貓一家五口吃得津津有味，滿心感到生命的喜悅。突然之間，五只貓一溜煙都跑得無影無蹤。我抬頭望去，只見一只大灰貓立在花叢下面，虎視眈眈。我以為牠是來偷食的，跑過去把牠趕走，但是仍不見我的小貓回來。接著一連幾天，大灰貓又竄來竄去，窮凶極惡，攪亂了小貓一家與世無爭的生活。過了一陣，大灰貓不見了，生活又恢復正常。四月初，主人從南方回來之前，我們就搬到另一戶人家去暫棲身了。臨行之前，我最後一次喂了「五朵金花」，看著她們進食，然後才上車。這時，忽然發覺貓媽媽的肚子彷佛鼓了起來，我這才恍然大悟。放眼望去，只見院子裏春光明媚，百年老屋也憑添了生機。

　　過了幾天，伊萊太太來電話，感謝我們看家又看貓。我怪不好意思地說：「很抱歉沒能跟老貓交上朋友，小野貓倒都喂胖了，可又沒看好。我懷疑貓媽媽是不是……給大野貓欺侮啦。」伊萊太太當年是老護士，她聽了我的話後大笑說：「那不是你看得了的事啊！不光是貓媽媽，她的女兒們也都胖啦！」我說：「那你們家要成貓城啦！恭喜！恭喜！」她說：「可惜我們養不起啊，得想辦法啦。」我納悶兒不知她想甚麼辦法，過了幾天打電話去問，才聽她說：「我們請了動物管理處的人來啦，他們認定三只老貓的皮膚病都是不治之症，該給

她們解除痛苦了。五只野貓嘛，由他們帶走，找人領養。」我聽了感到惘然若失，隨後把剛洗印好的「五朵金花進食圖」寄去。伊萊太太收到相片後來電話致謝，還說：「現在一只貓也沒了，有時感到怪冷清的。你的相片給我們填補了一個空缺，留作長遠的紀念吧。」

我呢，我怎能忘記那五只野貓！她們無家可歸，卻活得那麼悠然自得，不僅為我天涯慰寂寥，還讓我更加體味「知足常樂」的道理，且留下打油詩一首，作為人貓因緣一線牽的紀念吧：

四海無家且叩門，老屋溫馨如主人。
野貓飛禽無掛慮，白雲紅日自怡神。
好花滿室春常在，枯樹有洞貓臥身。
喜染衰顏爐火色，漫天風雪洗征塵。

棄犬野鴿

几年來流寓海外，也不知遷徙了多少次。對於在七老八十成堆的地方消磨無多的來日，我一直感到發怵。終於身不由己，還是搬進了老人公寓。我跟妻子說：「地方偏僻，咱倆又不會開車，親友也懶得問津，豈不是從此與世隔絕嗎？」妻子說：「我看也不完全是壞事，何況壞事還可變好事。咱住八樓，站在陽臺上，高瞻遠矚，獵人森林滿目蒼翠，真是修身養性的好所在。再過幾個月，層林盡染，坐在屋子裏就可飽餐維州秋色啦，夫復何求！」我答道：「聽你一說，好似世外桃源。不過屋子這麼小，來個親友都沒處落腳。」她又說：「自顧不暇，還要杞人憂天，難怪人家說你書生氣十足哩。大有大的難處，小有小的好處，寧小毋大嘛！」

果然，一室一廳，小巧玲瓏，放上几件親友送的半舊不新的家具，一盆草花，真想不出「夫復何求」。陽臺上還擺了兩張白塑料椅子，妻子說：「等晴日，你往這兒一坐，一卷在手，就會不知身在客中，更不知階級斗爭為何物啦。」一張配套的圜桌面大了一些，就隨手先靠牆撂著。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倆就下樓去散步了。獵人森林樹木參天，濃蔭蔽日，小橋流水，不見人家。一條條曲徑通向四面八方，我倆信步漫遊，覺得暑意全消，神清氣爽，不禁流連忘返。等到該回去吃早飯了，轉來轉去，又仿佛入了迷宮，怎麼也找不著歸路。正躊躇間，迎面過來一位黑人老太太，手裏牽著一只淺棕色的微型狗，只有三條腿。我倆立即上前寒喧問路。老人家笑盈盈地說：「你們新搬來的，難怪。我姑娘一死，我孤零零一個人怎麼過日子呢，就領著這小東西搬進公寓，一住五年多了。」我說：「這小東西好可愛，我從沒見過這麼小巧玲瓏的狗。」老人家動情地說：「這是墨西哥種的孓娃娃，當初是我姑娘撿來的，天生少條腿，被人家遺棄了。我再三讓她扔掉，她卻當寶貝養著。如今她就是我女兒，咱倆相依為命啦。寒來暑往，每天都來林子裏遛一遛，日子不知不覺就打發掉了。要是沒有這小寶貝。我還真不知道這日子怎麼過呢。」一回到公寓，老太太就慢吞吞地把小狗抱在懷裏，回她自己屋去了。

從那以後，我倆清早散步經常踫到老太太領著她的小狗遛

達。逐漸小狗跟我們也熟了。看她倆親如母女，我不免有點艷羡。我倆大半輩子顛沛流離，好不容易把三個孩子拉扯大了，哪還顧得上養小貓小狗？我說：「現在若是養個小貓小狗作伴，那該多好！」妻子說：「得啦！冬天咱倆給伊萊家看家，那几只貓搞得你焦頭爛額，我這瞎子又插不上手。別一廂情願啦。」其實我也無意抱只小狗來養，只不過感到若有所失罷了。

沒過幾天，我隨手撿起一本宋詞，走到陽臺上小坐，打算享會兒清福。書還沒翻開，一眼就瞅見那園桌面後面端坐著一只鴿子，頭部深藍色，頸部翠綠，下半身銀灰，一副安詳入定的神態。她沖著我眨了眨眼，隨即拍拍翅膀飛走了。我發現園桌面後地面上有用小樹枝鋪好的窩，上面放著兩個雪白的小蛋，美極了。我立即喊妻子來瞧，她說甚麼也看不見。我讓她一直走到蛋跟前，又低下頭，她才又驚又喜地說：「鴿子來坐月子啦，大喜！大喜！你快離開產房，讓鴿媽媽安安靜靜孵小鴿子吧。」

鴿子的產房正好在我床頭的窗下。我每天起床前頭一件事就是輕輕拉開窗簾 ，瞅一眼鴿子的動靜。不管我的動作多輕，窗簾剛拉開一條縫，鴿子就飛走了。過了幾天，我發現一個蛋殼破了，露出一個黄嘴黄毛的小腦袋，急忙向妻子報喜。她說：「瞧你，比抱孫子還興奮哩。」第二天早晨看到的已經是一只全身黄色絨毛的小生物。另一個蛋還是紋絲不動，我又納悶兒，問妻子會不會是個死胎。她說：「你老人家真是杞人憂天。雙胞胎也有個先來後到嘛。」又過了兩天，果然第二只小雛也出世了。我每天要從窗簾的夾縫裏張望好几遍。鴿媽媽經常把小兒女藏在身下，也不再輕易受驚飛走了，抬起兩只無邪的小眼睛看著我，眨來眨去，大有「相看兩不厭」的味道。眼看著兩只小東西一天一個樣兒，黄絨毛逐漸變成褐色，倒像小雞，又讓我納悶兒了。又過了些日子，小雛已經會走動，體型和毛色也越來越跟媽媽一樣了。我和妻子商量，是否要搞點東西來喂牠們。在國內，用小米喂鴿子，不知這里裏洋鴿子喂甚麼。妻子說：「好在鴿媽媽每天飛來飛去覓食來喂兒女，咱先觀望一下吧。天氣熱，水可不能缺。」於是，我用一個塑料碗盛滿水放在鴿窩邊上，又隔著落地玻璃門看鴿子一家三口圍著碗飲水，心裏感到涼鏼`的。每有親友來串門兒，我一定領他們到床頭，輕輕掀起窗簾，看看我們的活寶貝，來人無不贊不絕口。我滿心喜悅，寫下《迎鴿》打油詩一首：

高樓斗室有陽臺，仙鴿飄然成對來。
窗下筑巢孵玉卵，枝頭覓食哺嬌孩。
雙喜臨門夏日暖，四海無家春常在。
同是天涯淪落客，獵人林裏共徘徊。

我高興得早了。一天早上，有人敲門，我倆有點詫異，因為這裏很少有不速之客。開門一看，是鄰居一位白人老太太，懷裏抱著一只雪白的哈巴狗。她面孔繃著，說有點事兒要找我們談談，搞得我倆莫名其妙。原來老人家在陽臺上養了很多盆花，近來常有鴿子去糟踐，她懷疑是我們喂食把鴿子招來的。

我如實說明了鴿子的來龍去脈，又說：「小鴿子還不會飛，總得等她們會飛，我們才能讓她們一家掃地出門吧。」

「你們當初就不該讓她在陽臺上坐月子。」她教訓我們說。

「我們發現時，她已經做好窩生了兩個蛋，你教我們怎麼辦？」我指望她能諒解。

「鴿蛋很有營養啊！」我倆一愣，沒再答話。

小鴿子很快長大會飛了，經常在陽臺上飛來飛去，給我們的羈旅平添了生趣，無奈好景不常了。白老太太又來催問過一次，而且告誡我們連水也不許喂。我倆感到無可奈何，只得趁鴿子外出時先把桌面搬走，再把窩鏟掉，把陽臺打掃乾淨，到底還是留下了一碗水。不久，鴿子一家三口都飛了回來，飲了水，在欄干上來回走了几趟，又拍拍翅膀飛走了。我倆相互看看，甚麼也沒說。第二天，我就去多倫多探親了。親人久別重逢，自然溫馨。可是我總忘不了那三只無家可歸的鴿子，又寫了一首《送鴿》的打油詩：

隔窗相望樂無邊，雛鳳清音最可憐。
方喜陋居得異趣，忽驚鄰舍有煩言。
我本無家存朽骨，君今何處作飛仙。
長空悵望送飛客，不識翱翔何處天。

九月底從多倫多回家，一進門就問妻子鴿子的下落。妻子說：「她們還經常飛來舊地重遊，好像並不介意我們的無情，你也不用耿耿於懷啦。你瞧，家裏有新客人啦。」她抬起手指向牆角，我張眼望去，看到那條熟識的三條腿子娃娃安適地躺

在一個柳條編的窩裏。我詫異地問道：「這，這是怎麼回事啊？」妻子笑著說：「你走後，有一天，又有人敲門，我以為又是鄰居白老太太來興師問罪。開門一看，卻是黑老太太抱著她的小寶貝。老人家開門見山，動情地說：『我在這兒住不下去啦，得進老人院，那兒不讓養小貓小狗，我想來想去，只有托付你們，我看得出你們心腸好。再說，我聽說你們的小鴿子也沒了。』我剛想說，我先生一來就嫌屋子太小，哪有地方養狗呢？只聽她又說：『她這麼小，又不佔什麼地方，她又那麼乖，你們會愛她的。我說，你若是有個殘疾的孩子，你能不管嗎？』我一下嗓子緊得說不出話來，等鎮靜下來我才說：『感謝你對我們的信托。我自己就是個殘疾人，大家都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我們的孫男孫女都不在跟前，我先生一定會把小寶貝帶好的，你放心吧。我們一定常帶她來看望你。』她把孓娃娃遞給我，摟著我親了又親，隨即回屋去把小寶貝的窩和各種食品、用品收拾齊給我送來了。你有意見嗎？」我說：「你倒會做人情，我這一下成了瞎子、瘸子總管啦！」她說：「恭喜恭喜，天意莫測啊！」

我走到牆角，抱起孓娃娃來親親。我說：「老人家一定會想小寶貝的。等我給你抱著她照張相，放大了給老人家送去。」妻子說：「妙！那咱何不現在先領小東西到林子裏去遛遛，順便照個相。」她從我手裏接過孓娃娃，我跟在後面走出屋子。一出門，迎面就撞見鄰居白老太太，懷裏抱著她那雪白的哈巴狗。她笑眯眯地說：「你回來啦，巫先生，好極了。我真不明白，你不在家，你太太怎麼會把這沒人要的瘸狗留下來，這不是沒病找病嘛！我勸你快點給扔了吧。」我說：「你太費神啦，太太。怎麼說呢？天意莫測啊！咱們走著瞧吧。」

駛向拜占庭

年青時候讀過愛爾蘭詩人葉芝的名篇《駛向拜占庭》，從此對這座遙遠的古城「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首詩作於一九二六年，當時詩人已是六十開外的年紀，痛感到「一個衰頹的老人只是個廢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為了追求一個崇高的精神境界，「遠渡重洋而來到拜占庭神聖的城堡。」葉芝並沒到過拜占庭，而我這年逾古稀的老朽，竟然因緣際會飛向我夢魂縈繞的古城了。

拜占庭早就是個歷史名詞了，現代地圖上只能找到伊斯坦堡，那是一座雄跨亞、歐兩大洲、擁有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我和妻子劫後餘生，四海無家，便欣然應友人之邀從新大陸先飛到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盤桓幾天，然後在黃昏時刻登上一列現代化的臥車，直駛伊斯坦堡。清早一下車，只見五月的朝陽下金濤滾滾，耳目為之一新。原來這正是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馬爾馬拉海和金角灣三水會合之處，停泊在港口的一艘艘船艦上各國旗幟迎風招展，氣象萬千。難怪當年古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南征北戰，佔有多少歐、亞、非三大洲的通都大邑，來到拜占庭卻一見鍾情，刻不容緩大興土木，改建為羅馬帝國的新都城，夢想為自己營造一座萬世豐碑。我倆登上輪渡，果真「駛向拜占庭」了。

下榻的小旅店位於老城的市中心，几處世界聞名的名勝古跡都近在眼前。早在奠都拜占庭之前，君士坦丁已欽定天主教為羅馬帝國國教。自己的輝煌戰績，千古一帝一概歸於天主的恩寵，新都的興建更是聖明天主的旨意。新建教堂達十四座之多，其中最宏偉的一座命名為「聖索菲亞」，意為「神聖的智慧」。這座大教堂初建於耶穌紀元三二五年，其後兩百年間兩次毀於大火，兩次重建。

妻子篤信天主教，久仰聖索菲亞大教堂的盛名，自然要先睹為快。眼前這座大堂是賈斯提年大帝重建的，費時六年，不僅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天主堂，而且從此成為拜占庭帝國宗教生活的中心。。五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賈斯提年親率滿朝文武，從皇宮徒步前往大堂，主持奉獻大典。我們正是沿著同一條通道，步著他的後塵，走向聖堂，一路上摹想當年的歆與盛況，浮想聯翩。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大教堂，我們朝拜過不

少，聖索菲亞卻和聖彼得大教堂、米蘭大教堂、巴黎聖母院等等截然不同。遠遠望去，看不到習見的灰色尖塔鐘樓或耶穌的聖像，連個十字架也沒有。只見一座粉紅色的宏偉建築，上面覆蓋著一個巨大的淡金色圓頂，兩側聳立著四座伊斯蘭尖塔。步入教堂，看到的是一片空曠的廣場，沒有習見的一排排條凳，沒有星羅棋布的燭火，沒有一座聖像，沒有聖壇。舉頭仰望，大圓頂離地面一百六十英尺，周圍有四十扇窗戶環繞，天光明朗，巨大的圓頂彷彿浮懸在半空。

聽說賈斯提年奉獻新堂之日，深感有幸建成這座無與倫比的聖殿乃是天主對他的殊恩，躊躇滿志，歡忭不能自已，不禁放聲歡呼：「所羅門啊，我超越你啦！」

豈料二十年後，大圓頂就在一場地震中坍塌了。大堂後經一再修建，圓頂縮小，仍不失為奇觀。可惜其後千百年間，戰禍連綿，不僅富甲天下的君士坦丁堡飽經兵燹之災，這座聖堂竟也未能逃脫以收復聖地為己任的十字軍的洗劫。及至一四五三年，拜占庭帝國亡於土耳其人的奧特曼帝國，君士坦丁堡改稱伊斯坦堡，聖索菲亞也從此成了清真寺。直到一九三四年，由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下令，聖索菲亞才改為博物館。如今圓頂依舊，聖神無蹤。面對十幾個世紀的滄海桑田，我不禁想起十八世紀英國史家吉朋曾慨乎言之：「一座雄偉的聖堂是民族品味和宗教的豐碑……然而較諸聖堂地面爬行的最卑微的昆蟲的結構，其技藝是何等愚鈍，其勞績又何等微不足道！」

賈斯提年大帝在位三十八年，精心營建了一座又一座教堂，帝國上下彷彿「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千年之後，奧特曼帝國統治長達五個世紀，留下了一座又一座清真寺，而天主教堂則多已湮沒。如今放眼望去，但見遠近都矗立著一座座伊斯蘭尖塔。我們參觀了几座最著名的清真寺，其建築都極為壯觀，但作為其核心的祈禱殿都是一間空蕩蕩的大廳，供信徒一日五次前來跪禱。歷代的「蘇丹」（土耳其皇帝）自然也留下了一座又一座豪華的皇宮。我們從聖索菲亞走到相距咫尺的「炮門」宮。這是一座最古老也是最龐大的皇宮，佔地七十萬平方公尺，亭臺樓閣，一應俱全。昔日曾有上千人幹活的御廚房，今天已改建成中、日珍稀瓷器展覽館，那麼多一套又一套明代的青花瓷讓我們看得眼花繚亂，僅此一端就不難想見當年宮廷生活之窮奢極侈。所謂「後宮」（Harem）更是百無聊賴的帝王「金屋藏嬌」的見證。在成千上萬件珍奇的展覽品中，最難忘的不是價值連城的赤金皇帝寶

座，也不是無數爭奇斗艷的珍珠寶石，卻是同一間展覽室裏施洗者約翰的一只手，錚錚鐵骨，兩千年後仿佛仍在為世人施洗。可惜，天主教信徒今天世界上雖有十億之眾，而在當年拜占庭帝國天主教宗教生活的中心，卻已「萬徑人蹤滅」！

　　博斯普魯斯海峽把伊斯坦堡分成歐、亞兩部分，是名符其實的「一衣帶水」。登上遊輪，溯流而下，兩岸景色如畫，一座座歷代的皇宮，一幢幢皇親國戚的第宅，「鳳閣龍樓凌霄漢」，目不暇接，而到今日伊斯坦堡的千古興亡，多少檣櫓灰飛煙滅，浪淘盡多少風流人物！放眼古今中外，滔滔者皆是也。葉芝參透了人世的過眼煙雲，對拜占庭藝術心向往之。他說：「我記得在甚麼地方讀到過，在拜占庭的王宮裏有一顆金銀鑄成的樹，樹上有會唱歌的人工制成的鳥。」於是，年邁的詩人希望把自己的诗制成的不朽的藝術品之上。若是他果真來到拜占庭，他也許會大失所望的。那些「不朽的藝術品」早已不知所終了，「歌唱一切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事物」的不會是會唱歌的金鳥，唯有博斯普魯斯海峽滔滔不絕的逝水發出永恆的浩嘆。

小詩入大堂

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寫過一首小詩，也算抒情詩吧，後來在《英語世界》上發表，中、英文並列。幾年之後，1994 年春，在香港中文大學作客，適逢逸夫書院舉辦一年一度的「吐露燈音樂詩歌晚會」，這首小詩《別》(Parting)也濫竽充數，由詩人黃燦然在晚會上朗誦。

事隔多年，再也沒料到這篇舊作竟然又得到一位美國作曲家的青睞。曼徹斯特學院(Manchester_College)的德威特(Debora_DeWitt)教授根據《別》譜寫了一部合唱曲。更沒料到，2001 年 5 月國殤日晚間，這個曲子由曼徹斯特學院合唱團在紐約舉世聞名的卡尼基音樂大廳(Carnegie Hall)首次公演，鋼琴伴奏由作曲家本人擔任，座無虛席，我也在場。當晚演唱的節目多為大家熟悉的歌曲，只有《別》是唯一的新作，因此合唱團指揮還特地在演奏前先朗誦了歌詞。一首微不足道的小詩竟然「平步青雲」，登上美國音樂的殿堂，我個人固然感到意外的驚喜，更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件小事也為當今美國的多元文化提供了歷史見證。

詩如下：
《別》

你終於走了
留下一片清秋
滿地落葉

一陣清風就會吹散的
記憶的浮萍
落花的嘆息
盟誓的音符
珍珠的淚
我瀟灑如浮雲

一陣輕風就會吹散的
朝露的晶瑩
落日的惆悵

生活的霧靄
昨夜的夢
我的心靜如止水

水如鏡
鏡中的朱顏
為誰憔悴

離情別緒是中國古典詩詞中一個傳統的主題。宋詞人柳永有言：「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這首小詩也是惜別之嘆，並且也在清秋時節，不過這裏既無溢於言表的離愁別恨，也無淚花啼痕。它不觸及具體的人和事，而僅僅抒寫「你終於走了」所喚起的一點淡淡的哀愁，一片似有若無的惆悵。雖說往事縈懷，舊情難卻，但一切都如過眼煙雲。不僅舊情如浮萍落花，即人生也不過是朝霧暮靄，因而以「浮雲」、「止水」自許，儼然從此了無牽掛。無奈人非草木，心有煜
妒恰钢祛仞褂钟橙胄溺 R。

當年主持「吐露燈晚會」的中文大學英文系教授 Andrew_Parkin 認為這首小詩含有多種意蘊。《別》顯然可以作為一首惜別的情詩來讀，但詩中的「你」並無確指，固然可以是一個情人，但也可以是一個密友，甚或是年青時代的「我」，以致是人生。

代跋:吐露港望远

我从不会写旧体诗。一九九四年春，有幸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客寓逸夫书院雅群楼，位于吐露港上。山岚水色，心旷神怡。夜来推窗北望，四十年来家国之痛都来心头，感喟不能自已，遂得仿七律一首。虽平仄不调，对仗欠工，然亦得一吐为快也。

吐露港望远

绿水青山怜我凋
天涯笑傲只身遥
四海无家一滴泪
万里还乡半步桥
任他狂犬吠红日
有我知音慰寂寥
七十余年如一梦
不留软骨羞儿曹

諾曼.梅勒的八十反思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國文壇元老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歡慶八十大壽，同時推出了一部新著、《鬼魅的藝術：寫作隨想》(The Spooky Art:Some Thoughts on Writing)，引起了廣泛的興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珍珠港事件以後，當時正在哈佛大學攻讀航空工程的梅勒應征入伍，後來被派到菲律賓的呂宋島參加對日本的戰鬥。戰後他到巴黎大學攻讀文學，根據他在戰場上一年半的親身經歷，撰寫了他的第一部小說、《裸者與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一九四八年出版。這部處女作忠實地刻劃戰爭的殘酷不仁，被譽為反映二戰的杰作之一， 媲美德國作家雷馬克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典《西線無戰事》。其後二十年間，他又發表了多部小說。

一九六七年十月，梅勒在華盛頓參加全國反對越南戰爭人士舉行的大規模示威游行，曾被捕入獄。根據這次反戰活動的親身經歷，他撰寫了報導文學《夜晚的大軍》（The Armies of the Night），獲普利策新聞獎和全國書卷獎。其後數年，又發表了幾部重要新聞報導文學著作。一九七九年發表了《劊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這是一部根據一個殺人犯的生平撰寫的「非虛構性小說」，再次獲普利策獎。

梅勒不僅著作等身，而且熱烈投入社會和政治活動，曾兩次競選紐約市長。他自命不凡，狂言傲世，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一名享譽文壇的怪杰。在他的新著、《鬼魅的藝術》中，他卻一反常態，對自己一生的寫作進行了反思。這部三百三十頁的巨著，其主體是選自他平生出版的著作中有關寫作和作家的論述，分門別類，匯集成書。新寫的部分是串聯各個章節的思考，佔全書不到十分之一，卻是全書的精華所在。

梅勒回顧自己五十五年的創作生涯，品味其中的得失憂喜，不禁感慨系之，認為文學創作捉摸不定，實在是一門「鬼魅的藝術」。想當初，他二十五歲一舉成名，滿懷豪情壯志，而到頭來並未實現他輝煌的夢想。他說：「我記得一九五八年說過，『我一心一意要在我們時代的意識中發動一場革命，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我肯定失敗了，是吧？當時，我認為我腦子裏有許多別人沒有的書，一旦我能把它們寫出來，社會就會改變了。多麼豪邁啊！。」

他認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神經和骨髓」，而他卻沒有做到。那麼他的作品在未來的評價到底如何？他說：「我會傳世，也會不傳世。這是你實在無法預言的一件事，因為歷史經常輪換。有一些作家非常偉大，你永遠不可能把他們拋棄。我不屬於那個範疇。我可能傳世，也可能不傳世。」

梅勒不僅為自己的創作生涯進行了反思，他也為同時代的美國作家的作為進行了反思。他曾經夢想有朝一日有一位美國作家會寫出一部托爾斯泰式的美國小說，將社會的和個人的、公眾的和私人的融合在一起。在這部新著的尾聲中，他承認，由於美國社會的千變萬化、飛速發展，使作家難以捕捉，這個夢想至今尚未實現。同時，像他自己一樣的作家之所以失敗，也由於自身的懶惰和自我中心。梅勒心情沉重地總結道：「人們不再重視作家，這也得怪我這一代作家本人，當然包括我本人在內。我們沒有寫出那些應該寫出的書。我們花費了太多時間探索自己。我們沒有寫出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來為美國定性，以致我國的普通公民在自我認識方面就無所長進。」

梅勒是文壇泰斗，一向以狂傲不羈聞名，在歡慶八十大壽的時刻回顧前程，並沒有以功成名就而沾沾自喜，卻反躬自咎，既有真情，又有深意，值得作家們和讀者們深思。

贈李志綏

误入牢笼廿二年 拋妻別子伴虎眠
閉口莫言宮闈事 低頭且讀老三篇
無定河邊堆白骨 合歡宮裏舞翩躚
勇揭畫皮揪鬼蜮 萬年遺臭代代鞭

九四年冬於華府郊區維也納森林又一村（此詩在香港《開放》雜誌九五年二發表後，志綏兄曾見到，孰料數日後故人即溘然長逝。）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

一九五一年初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開始撰寫論述愛略特（T. S. Eliot）的文藝批評傳統的博士論文。不料突然接到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的急電，邀我儘快回國擔任英美文學教職。隨後，也收到中國國務院發來的信，熱烈觀迎留學生回國工作。我去國已七年，近年接國內親友來信，大都對新中國讚不絕口，令我心響往之。我便不顧一些親友的告誡，毅然放棄論文的寫作，應聘回國。八月中旬，我懷著滿腔遊子還鄉的激情，帶著幾大箱進步書刊，到達新中國的首都，即將在風光旖旎的燕園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慶幸。思想改造；初嚐洗腦滋味

我回國不過兩個月，就到中南海懷仁堂聽周恩來總理做報告，他號召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我聽得頭昏腦漲，不禁想到送我上船的朋友送著說的「洗腦子」的前景，難道這麼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開始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而批判的重點又是「親美、崇美、恐美」思想。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來工作組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經多次大會、小會批鬥後，校長被宣佈為「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政策的美帝國主義份子」，停職反省。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陸校長最賞識的學貫中西的典範、美語副教授吳興華也登台控訴，慷慨激昂，儼然把校長當作美帝的化身。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本校一名應屆畢業生，也登台昂然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

緊接著，全體教授分別在各系學生中作「自我批評」，接受學生「幫助」，人人過關。輪到我在西語系全體師生大會上檢討，我坦承自己多年來迷戀西方文學，脫離祖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最需要改造思想。沒料到學生積極份子紛紛指責我平日與學生交談中的三言兩語竟被記錄在案，再加上一本被學生從我書架上借走的美國普及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作為我散佈資產階級思想的罪證。我耽心自己的思想太落後了。

思想改造剛告一段落，領導就宣佈「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並入國立大學。燕大校園成為新北大的校址，部份教師分配到其它高等院校，我被調到天津南開大學，事後聽知情人說是因為我歷史未查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偕家母來到南開大學，住進兩小間臨時建築。我被分配教三門課，我的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單調，但更苦的是刻板的政治學習和沒完沒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我認為天經地義的言論自由從生活中消失了，老於世故的同仁人人謹小慎微，而我這張沒遮攔的大嘴巴偏偏不時冒出一些不中聽的「怪話」，在小組會上往往成為眾矢之的。

五五年九月一日，新學年開始，但並未上課，卻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誰料到我竟中了頭彩，當上了頭號「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學院的教師大會上被揪了出來。積極份子一個接一個發言，聲勢洶洶，如臨大敵，把一個曾擔任過偽滿皇帝溥儀的俄語翻譯的教師嚇癱在地，被人抬了出去。中午休會後我剛回到家中，跟著就闖進來三男一女，自稱是公安人員奉命前來搜查反革命罪證。一個男的對我本人進行人身搜查，那女的對我的老母和懷孕的妻子進行人身搜查。另兩個男的翻箱倒櫃，既找不到「武器」，更找不到「電台」，不免失望，只得拿走了我的信件、地址本、札記等等。我還來不及吃一口午飯就被叫去參加下午的批鬥會，一直鬧到傍晚。會上宣佈我不得擅自離校，不得在家接待親友。上、下午開會成了常規。每次會上，主持人都要重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老調，動員我「徹底坦白自己的罪行」。我絞盡腦汁，卻仍然一無所獲。

開學三週以後才上課。但是，英語專業卻停辦了，因為一位資深的教授受不了運動的壓力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我和另兩位教師還被軟禁在家中。一月初，妻子臨產時，我還不能送她去醫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車去市內，當夜生下了頭胎的兒子，我給他取名「一丁」，祝願他在震耳慾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不久以前，周總理髮表了關於知識份子政策的報告，給知識份子鬆了綁，南開大學的「肅反運動」虎頭蛇尾地收場。後來市委派來的一位負責人找我談話，很抱歉

地說：「你剛回國不久，對政治運動一定很不習慣，好在這種運篋今後保證不會再有啦。」

五六年夏，我被調回北京，在頤和園附近的一所外語學院任教。毛主席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舞人心，新中國眼看就要進入一個自由民主、繁榮昌盛的時代。我也開始期望，浪費了幾年大好時光之後，從此可以在工作中發揮我的專長，同時跟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兒子過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反右運動：掉進陽謀陷阱

五七年「五一」勞動節，黨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了全黨全國的「大鳴大放」，「北京之春」儼然如花似錦。運動在學院起步較晚，一位副院長、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日本留學生，接連三個晚上到我家來，動員我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他反覆交代毛主席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我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我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我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我讚揚「雙百方針」，讚揚共產黨要求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的鼓舞。

「北京之春」曇花一現。「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我掉進了「陽謀」的陷阱。我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平日在會下和同事同學們的閒談，都成了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不久以前反覆動員我鳴放並主持會議的副院長又親自主持了一次又一次名為「大辯論」實為大批鬥的會議。最後，院長兼黨委書記、一位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積極份子召見我。她說，根據我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我，但是，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

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無言地告別已懷孕七個多月的妻子，鑽進一輛來抓我的軍用吉普車。我隨身帶了一個舊的

洗衣用的布口袋，妻子在裡面為我放了幾件換洗衣服和盥洗用具，還有兩本書－－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一本新近出版的《杜甫詩選》。我本以為車子是送我去農場勞動，哪知道我被送進了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近開業的勞動教養所。我被關進二樓的一間監房。二十來個中青年男子，個個囚首垢面，坐在鋪著水泥地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擠得滿滿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占兩三名，其餘大多是「歷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壞份子」。大家都感到驚訝竟然會有一位大學教授來和他們為伍。

在勞教所一關就是四、五十天。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一日兩餐啃有霉味的窩頭，日日夜夜聞屎桶散發出的臊味，倒有點「久而不聞其臭」。六月五日晚飯後，我正在翻看《杜甫詩選》，忽然接到妻子從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於三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恰巧我剛讀過杜甫讚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我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得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勞改營：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六天以後，奉旨離京。午夜時分，八百多名「勞教份子」浩浩蕩蕩乘「專列」，由大批武裝警衛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我們在湖邊一片荒無人煙的處女地搭起帳篷，投入建設「八分場」的勞動。第一項任務務是造一條幾里長的導流堤，防止洪水氾濫，作為墾荒準備。就地取材，挖土造堤。這裡夏季日長夜短，我們從日出苦幹到日落，每天十多個小時，又累又餓。蚊子和小咬成群，戴著防蚊帽幹活也難逃叮咬。趕上大躍進「放衛星」，還得連軸轉。九月中，導流堤完工，我們搬進自己動手蓋的牢房，準備過多。漫長的冬季冰天雪地，我們照樣在戶外勞動，最低氣溫攝氏零下四十度。冬天小興凱湖凍得死死的，我們就成群結隊拉著耙犁到湖上去收割蘆葦運到一座計劃中的大型造紙廠工地，有一次我差點兒在突如其來的煙兒泡中送了命，而這個造紙廠始終也沒動工。另一項冬季勞動是把農場與外界聯繫的一條航道加寬加深，建成一條運河。先用冰鎬把航道裡的冰切成

整齊的大冰磚，再抬到兩岸堆砌成冰的長城。再用鎬把航道的凍土一點一點挖走。春天一到，冰的長城融化成水，流回加寬加深的航道，一條運河「水到渠成」了。我這才明白，一提到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我們的史家和政客就讚不絕口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

清河農場：大饑荒的死亡邊緣

一九六〇年十月，農場的全部「右派」三、四百名奉命轉移到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大家都很高興，一來離親人近多了，二來靠近首都伙食肯定會好一些。誰料到，三餐改為兩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乾白菜幫清湯。越來越多的人患上浮腫，大便時鮮血淋漓，痛苦呻吟。政府已無力養活犯人，卻繼續強迫他們勞改。兩個月以後，農場領導人在大會上宣佈，奉上級指示，為了進一步體現黨和政府的寬大和「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准許「勞教人員」寫信回家，要家屬送食物來。這麼一來，犯人的死活變成了家屬的責任。

我是全中隊第一個患浮腫的，有時已不能上工，再餓下去就人命危殆了。妻子遠在安徽，靠微薄的工資撫養兩個孩子，度日如年，我怎忍心向她告急呢。無可奈何，只得向妻子在天津的親人和我在北京的妹妹求援。親人們得信後，急如星火送來從黑市用高價購買的營養食品，使我的病情有所緩解。

五月的一天，一位管教幹部吩咐我領三個人到農場一個僻遠的角落去埋一個死人，我發覺死者原來是在同一炕上睡在我右邊的「右派」。既然今天我來埋他，誰知道明天睡在我左邊的「右派」會不會來埋我呢？我和妻子一別三年了，我還能見到她嗎？我沉不住氣了，馬上寫了一封短信，要她「來見我可能是最後的一面」。她接到信後，好不容易請了幾天假，帶了一丁千辛萬苦前來探監。一見到我活像個餓鬼，她自然驚惶失措，最後決定硬著頭皮去北京向學院求情。那位副院長聽她匯報了我病危的情況後，無動於衷，卻大談大躍進的大好形勢，讓她鼓勵我加強改造。妻子忍無可忍，針鋒相對地答道：「院長同志，您說得不錯，寧坤需要繼續改造，但他活不下來怎麼改造呢？不錯，全國都有人餓死，難道硬要一個教授活活餓死在獄中嗎？再說，讓一個教授這樣餓死獄中，對學院、對國家

有甚麼光彩呢？寧坤的生死掌握在學校的手中，請你救他一命吧。」副院長竟然鬆了口，答應想辦法。妻子又二次探監，告訴我北京之行的收穫。那天是兒童節，她帶著一丁來探望似曾相識的爸爸。兩天後，她又著一毛來認從未見過面的爸爸，那天是她的三歲生日。一個月後，我奉准「保外求醫」，回到了妻子身邊，由她瞻養。

文革：在紅衛兵的蹂躪下偷生

一年後，「廣州會議」上給知識份子「脫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體已逐漸復元，在安徽大學外語系當上了「臨時工」，月工資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資三分之一，還不能享受公費醫療。但經過幾年的「改造」，我已經「細推物理須行樂」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們又得了一個兒子，我給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復工職，繼續當臨時工，每月加十元工資。我們的座右銘是「知足者常樂」，只要一家五口能歲歲平安地過日子，就於願已足。兩年之後，「文化大革命」一聲炮響，又無情地粉碎了我們卑微的心願。

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學兩、三千學生傾巢出動，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時，我班上的學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寧坤！」的口號，衝往我家，把我從床上揪下來，連拖帶拉押解到擠得水洩不通的水泥籃球場。幾十名教授、講師都直挺挺地跪在當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訴他們用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學生、搞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行。押解節的學生對我拳打腳踢，我踉踉蹌蹌地跪了下去。

從此我又成為「專政對像」，株連全家大小。妻子經常受到騷擾，要她檢舉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個孩子經常聽同學罵他們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小兒子「文革」開始時剛剛三歲，在幼兒園就沒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個牆角，看別的孩子嘻嘻哈哈玩樂。八歲的女兒被我班上的一個男生騙到宿舍去，照著他寫好的樣子，用毛筆依樣畫葫蘆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寧坤！」

八月中，「紅衛兵」到全國各地「革命大串連」，回校

後推廣「革命造反經驗」，甚麼大會批、小會鬥、掛牌遊街示眾、罰款、扣工資、等等，更是家常便飯。外語系的「紅衛兵」敲鑼打鼓來抄家，連我家的自行車都被不由分說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資減為十五元「生活費」。九月，又勒令我久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歲的寡母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安大，回原藉揚州。我提著她的隨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車，看著老人家白髮蒼蒼，苦難餘生又遭此橫禍，我除了叮囑保重，竟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兩年後她因缺醫少藥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深挖「階級敵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隊伍迅速擴大到一百幾十人，上自校長夫婦、各黨政部門領導人、絕大多數教授，下至臨時工和掏糞工人，彷彿也有點「大聯合」的味道。我這個小小臨時工竟然也算一條大魚，和校、系領導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時，我成為眾失之的，有時也曾懷疑是否我咎由自取。今日環顧左右，真可說「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規是白天勞改，晚間在小組會上交代問題，或在大會上接受批鬥。所有髒活、累活都成了我們的專業，因為革命師生和工人都忙於「干革命」。勞改時間長達每天十小時。我有過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煉，在一群文弱書生之中當仁不讓當上了重勞動力。合肥的盛夏氣溫經常在攝氏四十度上下，不但無雨，而且無風。從早到晚，或是拉著滿滿一皮車紅磚，奔來跑去，或是在農場車水抗旱，苦不堪言。

失棚：領教工人階級鐵拳專政

監督「牛鬼」勞改的農場工人姓鄭是一名復員軍人，橫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時間，他突然宣佈，天兒太熱，要保護耕畜，牛不下地。為了不辙ｒ時，派八個壯「牛鬼」拉一架大木耙來耙地，這自然少不了我。八個「牛鬼」一排，高頭大馬的張校長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繩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來。姓鄭的跟在後面，手裡揮舞著一根長鞭子，嘴裡不停地吆喝著「加油！加油！」「牛鬼」一個個汗如雨下，力竭聲嘶。姓鄭的還一個勁兒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干！哪個敢偷懶耍滑就地批鬥！」語音剛落，張校長撲通一聲倒了下來，

大夥兒急忙扔下繩子圍到他跟前，驚惶失措。姓鄭的大大咧咧地說：「死不了，有甚麼好瞎緊張的？去拉一輛板車來，送他去衛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車是我的專業，我忙不迭跑步去農場場部拉來一部板車，大家七手八腳把巨人般的校長抬上車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遊記》人小國中的一個場面。姓鄭的已回家吃中飯去了，我拉起車，把病人送到衛生科。校醫說：「他的美尼爾氏症又犯了，這樣搞下去有生命危險。我給開三天病假，希望他們能讓他休息。」

酷署勞改，固然是牛馬不如。更加觸目驚心的卻是沒完沒了的殘酷斗爭。勞改工間休息時，姓鄭的經常在工地召開批鬥會，揪出一個「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紅樓夢》的老講師，外號「沉瞎子」，因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大會小會批鬥，卻一直失口否認。姓鄭的自告奮勇，揚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氣焰、整得他低頭認罪不可。

他說到做到，一聽沉瞎子對他否認曾參與特務組織，沒等他說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猛然捅進沉瞎子還剩下一點視力的右眼。鮮血沿著他的面頰淌下來。弱不禁風的《紅樓夢》專家被打翻在地。兩名「紅衛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從此「沉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著枴杖打掃廁所。運動後期，他被遣送回鄉，不久去世。

從馬鞍山鋼鐵廠派來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到，工人師傅們也認為安大對待「牛鬼」太寬大了。殺氣騰騰的刁師傅每天契完晚飯就駕臨「牛棚」，幫助「牛鬼」觸及靈魂。第一個得到他幫助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經濟學專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系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語錄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發。刁師傅每晚來逼他承認是蓄意反對毛主席，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就左右開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師傅酒性發作，揮動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臉腫，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隊運動」開始「落實政策」，大多數「牛鬼」都陸續「解放」，下放農村。我妻子子兒女，沾了我

的光，也在「光榮下放」之列，而我本人繼續關在「牛棚」接受審查，又折騰了一年，才「落實政策」；停發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費，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縣孫堡公社高莊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總算出了「牛棚」，當上「不給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廣闊天地的無業遊民。直到文革快結束時，再一次「落實政策」，有了碗飯吃，苟全性命於亂世。七九年，錯劃「右派」得到「改正」，但時至今日，竟然連生存權也被某些狠人剝奪了，難道歷史非得走回頭路不可嗎？

回顧一九五一年回國以來，每逢大、小政治運都都首當其衝。到頭來，「貧歸故里生無計，病臥他鄉死亦難。」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個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一個「史無前例」時代痛定思痛的見證。

原載《開放》雜誌一九九九年四月號

《了不起的盖茨比》译后记

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但他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

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群星灿烂，各放异彩。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同年四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出版，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S·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忆菲氏时写道：“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些评价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澜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镣乱,神魂颠倒。菲氏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们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直到今天，《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美国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

我对菲茨杰拉德毫无研究，可是我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却有一段阴差阳错的“因缘”。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之聘，从美国回

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册英美文学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不时来串门地聊天，或是借书看。十二月间，全国高等学府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燕京着重批判“美帝文化侵略”，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检讨。轮到我上场那天，一个男生积极分子跳了起来，一手举起一本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我吓了一跳，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摈。原来是一本很旧的英文袖珍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想，“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

由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颠沛流离”，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几箱旧书当废纸卖掉。“文革”中，全家下放安徽农村，书遭了涝灾，我俩把纸板箱一个一个打开，把书摊在茅屋门口晾晒，发现那本破旧的《盖茨比》虽久经患难，却有点不服老的神态。后来，雨过天晴，我重返北京任教。时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要我尽快将《盖茨比》译为中文。简直不可思议！“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我背了将近三十年，怎么会偏偏找到我来翻译这本“下流坏书”？莫不是命运的嘲弄，还是菲茨杰拉德显灵，责成我为他平反，还他一个公道？思前想后，我虽自感译笔粗拙，难以重现他那优美的风格，却也无法回避这道义的召唤。

十年以后，我用英文以回忆录形式写了一本纪实体小说，自然把《盖茨比》这段公案写了进去。书于一九九三年在美国出版后，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位是曾在纽约舞台和好莱坞银幕上活跃过的女明星，她在信中特别提到这个情节，接着写道：

我认识他。三十年代期间，我是个演员，住在好莱坞一家名叫“真主花园”的旅馆，许多来做短期工作的作家和演员住在那儿。司各持·菲茨杰拉德那副愁苦的面容是我平生所仅

见。他那悲惨的处境刻画在他脸上，流露在他声音里。我是在餐厅里结识他的。那天我一个人正在埋头看雷格蒙的小说《农民》，有个人在我肩旁弯下身子说：“你干吗要看那本波兰式的《乱世佳人》？”我回答说：“因为是我的朋友纳特·福柏推荐的，我也非常爱看。”他听了嗤地一笑，又摇摇头，仿佛我无可救药了。我问他：“那你推荐什么呢？”他说：“唤，最优秀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的任何东西。”

我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仿佛《盖茨比》的作者又一次显灵！可惜“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只能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了。

但是故事并没到此为止。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有一座圣玛利天主堂，离我们在维州的住处不远。这座小教堂建于一八一七年，建筑古朴庄严。每逢主日，一位中国神父在那里为华人教友做弥撒。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我陪妻子去那里望主日弥撒。我送妻子进堂以后，独自出来在阳光下漫步，心旷神怡。不知不觉间，逛入了教堂边上的墓园，心里默诵起英国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又感到无端的惆怅，神思恍惚。突如其来地，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一块墓碑前面冒了出来，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谁？”定神一看，原来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白人男子，我舒了一口气。他没理会我的问题，却指着墓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低头一看，毫无雕饰的石碑上刻着：

弗朗西斯·司各特·凯·菲茨杰拉德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其妻
姗尔达·赛尔
一九００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奇缘！四十四年前，他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和我一道蒙冤受难。今天，我无意之中竟然又有幸在万里他乡邂逅他的阴灵。这是一片很不起眼的墓地，菲氏家族的几座墓占了其中一小块地方，没有树木，没有花草。这里既没有伦

敦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墓地的庄严肃穆，也没有米兰大墓园的瑰丽堂皇。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抔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园几步之外就是一条大路，日日夜夜奔驰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万万千千的匆匆过客中有几人曾在这里“解鞍少驻初程”，低回凭吊一下这位“美国梦”的化身和爵士时代的史诗大师？也罢，永远摆脱了名缰利锁，超越了生与死的磨难，菲茨杰拉德有福了，他将以他不朽的诗篇彪炳千秋。

时已正午，弥撒完了，妻子走出教堂，看到我在墓地踯躅，远远地喊道：“你不怕中暑吗？”我指着墓碑说：“又碰上老朋友啦。”她感到诧异，走到墓碑眼前一看，笑着说:“这大概可说是阴魂不散吧。我望了一台弥撒，你竟然就有一次‘幽会’。明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咱们带一束鲜花，来安慰他的英灵吧。”我又指着墓碑前地面上一块碑石，上面镌刻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句，她轻轻地念道：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今天中秋，我去多伦多探亲，误了在他百年诞辰去扫墓，怅然若有所失。也是天意莫测吧，正在这时，感谢译林出版社决定重印旧译，就算作献给这位英灵长在的奇才一个小小的花环吧。

巫宁坤
一九九六年秋于维州猎人森林客寓

海明威的古巴情

美國小說家海明威一生富於傳奇色彩， 趣聞逸事廣為流傳，最後二十年旅居古巴，這個期間生活和工作的詳情卻少為人知，一直令諸多專家學者望洋興嘆。

海明威酷愛捕魚游獵。一九二八年放棄在巴黎的記者工作返美，在佛羅里達州海上的西礁島（Key West）定居，專門從事小說創作，同時開始海洋捕魚，三十年代經常到古巴海面捕撈大馬林魚。一九四 0 年，攜新婚的第三任夫人瑪莎在哈瓦那東郊小山上的「瞭望山莊」（La Finca Vigia）定居。他在這裏完成了《鐘為誰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 、《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等名著。

海明威鍾情熱烈奔放的古巴人，熱愛古巴的熱帶風光。深摯的古巴情在他的生活和創作生涯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的作品和獨特的個人風格也在古巴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一九五四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後，海明威立即將獎章捐贈給古巴人民。

卡斯特羅奪取古巴政權之後，海明威於一九六 0 年七月返美，瞭望山莊被古巴政府接管。一年以後，海明威在愛達荷州家中用心愛的獵槍自殺身亡。一個月後，他的遺孀、第四任夫人瑪麗得到古巴政府許可回到山莊，用一條捕蝦的小船將死者的二百磅文稿等遺物運回佛羅里達，行前簽署文書，將山莊及其中全部財物捐贈給古巴人民。

瞭望山莊由古巴政府改建為國家級的海明威紀念館。海明威的遺產佔地九英畝，俯瞰哈瓦那的迷人景色和佛羅里達海峽的粼粼碧波，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無奈美國政府與卡斯特羅政權斷交，萬千熱愛海明威作品的美國讀者反而無緣瞻仰這片聖地。

所幸峰回路轉。馬薩諸薩州民主黨眾議員麥格文（James McGovern）一向主張改善美國和古巴關係，二 00 一年春獲悉瞭望山莊有一個秘密地窖，其中埋藏著海明威的遺物。麥格文通過外交渠道取得古巴政府同意後，於二 00 二年三月率領一個四人代表團前往哈瓦那，與古巴官員商討如何合作來保存和修復珍貴的遺物。雙方達成協議，並定于同年十一月正式開始推動合作計劃。

代表團看到紀念館的展覽廳妥善地保存著八間屋子裏原來的安排，主人當年使用過的大大小小物件，其中包括一架皇家

牌手提式打字機。牆上挂著許多他獵獲的野牛和羚羊的大頭顱，貼著他收集的油畫和斗牛招貼畫，書架上陳列著九千冊圖書。

地窖卻是一間低矮的屋子，陰暗霉濕，裏面除了一些海明威用過的獵槍和剝製的動物頭顱之外，代表團成員發現許多檔案櫃和箱子，其中存放著成千上萬頁海明威的原稿、草稿、手寫的表達愛和恨的書信、用英文和西班牙文寫的筆記，還有幾千張相片，他們 如獲至寶。

代表團成員、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海明威專家桑德菈?斯潘尼厄（Sandra Spanier）說：

當時我的手一定在發抖， 因為我在地窖拍的相片都是模糊 的。這是一生中最令人激動的事。這些資料正是我們關於海明威的知識中所缺少的環節。

地窖裏收藏著一個可能是作廢的《鐘為誰鳴》的尾聲、海明威二十年代在巴黎寫的短篇小說《在另一個國家》的打字稿原件，和一些從未發表過的海明威和第四任夫人之間的來往信件等等。另外還有他晚年的婚外情、年青的意大利貴族小姐伊凡塞奇(Adriana Ivancichi) 寫給他的許多情書。

這些豐富的新鮮資料可能是近代美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出土文物」。對海明威在古巴度過的一生最後的三分之一歲月，學者們和傳記作者們必將從中獲得更深刻的瞭解，從而促進對海明威其人和作品的全面研究。

韩战中国战俘的悲歌

- 编者按：旅美中国作家哈金继《等待》、《狂人》之后出版新着《战争垃圾》，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完美的小说」。该书描写韩战中被俘的中国官兵及其遣返回国后的悲惨命运，是一部回忆录形式的长篇小说。

哈金去国二十年了，十五年来用英语写了许多诗集和小说。贯穿这些优秀作品的是作者热爱故土和受苦受难的同胞的情怀。曾获一九九九年美国「全国书籍奖」的长篇小说《等待》深情地为一代人无名的期待和幻灭谱写了一曲感人的挽歌。二〇〇二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狂人》为几代知识份子的受难发出椎心泣血的呐喊，呼应着鲁迅的杰作《狂人日记》。今年十月六日上市的英文新着《战争垃圾》的题材是鲜为人知的在韩战中被俘的中国官兵的悲惨命运。

用回忆录撰写的长篇小说

《战争垃圾》是用回忆录形式撰写的长篇小说。回忆录的作者俞元是当年从朝鲜遣返的一名战俘。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当时俞元是位于成都的黄埔军官学校政训班二年级学员。军校被人民解放军接管，全体在校的军官和学员被送入「西南军政大学」，接受思想改造一年。结业后，俞元被分配到驻防成都的一八〇师任下级文职军官。他对自己的出路感到称心如意，因为上级已宣布该师将长驻成都，他既可就近照顾家住市内的寡母，又可在来年等未婚妻从四川师范学院舞蹈专业毕业后就结婚。

不料好景无长。一九五一年春节前，一八〇师突然奉命移防，北上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其中不少是国军旧部。俞元身不由己，黯然告别寡母，未婚妻更是难舍难分。

部队经过短期训练，学习使用苏式武器，接受「美帝纸老虎一打就垮」的宣传教育。一八〇师的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支部队，俞元也化名为「冯炎」。三月十七日黑夜，俞元随军寸步难行地从鸭绿江大桥上摸进了疮痍满目的异邦。部队训练不足，装备落伍，给养匮乏，经常枵腹徒步行

军，盲目向前方推进，上有敌机轰炸扫射，下有强烈的炮火猛攻，死伤枕藉，遗尸遍野，为「人海战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溃败后打游击又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不消几个月，全师就伤亡过半，师长逃至北韩。幸存的五千余官兵陷入敌军包围，弹尽粮绝，束手就俘。

俞元左腿重伤，开始了他的战俘生涯，先在釜山战俘收容中心的医院接受治疗，然后从医院转移到釜山港外海巨济岛上庞大的战俘营。这里收容了八千名中国和北韩战俘，其中半数就是一八〇师的官兵，包括师政委裴山在内。

国共双方的战俘争夺战

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介入，动员战俘前往「自由中国」，从而展开了国共双方的战俘争夺战。反共份子公开下手残杀拒绝前往台湾的战俘，亲共份子竟然也暗中杀害了在被对方刑讯中暴露政委身份的自己人。俞元从此陷入了这场残酷斗争的旋涡。他并不热爱共产党，但是他热爱寡母和未婚妻，便表示愿意遣返中国。可是，面对来自反共份子的暴力和死亡的威胁，他又被迫表示愿意前往台湾。后来，临到甄别时他却改了口，于是被送到一个亲共遣返派控制的营地。这里的中共党员干部已建立了以裴政委为首的军事建制，发动群众和亲国民党势力进行斗争，希望尽多的战俘得以遣返。

作为旧军人，俞元深知自己不受党组织的信任，在学习会上受到批判。但他既想回归祖国，就必须向党组织靠拢，参加各种亲共反美活动。在北韩和中国战俘发动的几次声势浩大的反美斗争中，由于他懂英语，在党组织领导下担任翻译官，兢兢业业，逐渐得到领导的信任。一九五三年二月底，裴政委的亲信常明接到美军命令需前往釜山战俘收容中心办理「重新登记」，可能有去无回。裴政委惟恐失去亲信，便派俞元冒名顶替。替身的诡计被美军识破，俞元面临严惩的威胁，便坦白交代，再次表示愿去台湾，于是又回到反共亲国的营地，在这里也受到批斗。

抗美英雄回国后成为战争垃圾

怀着回家与母亲和未婚妻团圆的希望，在决定何去何从的最后关头，俞元又选择了遣返回国的行列。等待着他的却是

另一种命运。一九五三年九月，两万二千名战俘当中，只有八千人遣返。他们以为自己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在战俘营里还继续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一定会受到祖国的热烈欢迎。不料祖国却认定他们贪生怕死，叛党叛国，全部开除军籍，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以儆效尤。「学习班」上，人人还必须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被俘期间所犯罪行，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和认罪态度好坏，或判刑劳改，或从轻发落，从此打入另册。「一失足成千古恨」，被战俘们视为党的化身的裴政委也不例外：

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级别最高的军官裴政委的遭遇也并不比我们大家强。换言之，他和我们都是共产党棋盘上的棋子，虽然裴制作了他自己的棋盘又把他的人放在上面，仿佛他玩的游戏和党玩的游戏是等同的。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小卒子，和我们当中任何人大同小异。他也是战争垃圾。

这时候俞元才获悉母亲已在一年前去世，未婚妻与「战争垃圾」断绝关系。难友常明的未婚妻也嫁给了他在北大的一个同班同学，本人连生活出路也没有，后来贫病交加，含恨去世。俞元还算幸运，受到宽大处理，一九五四年被分配到长春一所中学当英文教师，夹着尾巴做人，直到年老退休。他在中学任教两年后，和同事中一位品貌俱佳的女教师结了婚，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后来一儿一女都考上了大学。儿子毕业后又来美国深造，在美国成家立业。

主人公步步走向觉醒的历程

在不堪回首的历史背景上，哈金用真实细致的笔触刻划了小说主人公灵魂的受难，在身心饱受煎熬的同时，从天真的幻想一步步走向觉醒的历程。

俞元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经过出生入死的考验，在战俘营接受党的领导，自以为应当得到亲共派「组织」的信任。但是事与愿违，连他申请加入一个所谓「联合共产主义协会」的群众组织也遭到拒绝。他开始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

为什么我如此急切地寻求他们的认可？为什么为了加入那个组织而耿耿于怀？也许我害怕孤立，不得不依靠一个团体才感到安全。为什么我不能独来独往而不跟从任何他人？除了自己，一个人应当不依靠任何人。在反共派控制的营地，他同样感到孤立无援：你们这些人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在哪里我

才能置身于我真正的同志们当中？为什么我总是孤身一人？什么时候我才能在一个地方感到在自己家里一样？

继《等待》和《狂人》之后，哈金让《战争垃圾》的主人公，在另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漫长的身心受难的等待，从而展示了一个善良的小人物灵魂深处的痛苦，悲哀和绝望。

哈金善于运用令人玩味的细节折射主人公经历中命运攸关的事件。俞元出征前夕，未婚妻要求和他同房，希望留下一个爱情的结晶。终宵缠绵之后，她拔下夹发的玉簪，掰成两半儿，把一半儿给他，作为永远相爱的信物。这半根玉簪伴随着俞元度过了战俘营中的日日夜夜，用温馨的记忆和美好的幻想抚慰他寂寞和痛苦的身心，鼓舞他力求生还的斗志。到头来，他的等待和梦想都是一场空，恩爱的信物成为一刀两断的象徵，俞元把贴身藏了三年的半根簪子寄还当年的未婚妻。

俞元到战俘营不久就被反共份子强制纹身，在下腹留下「反共」刺青，使他精神上受尽煎熬。回国以后，在「战俘遣返中心」听候处理期间，他终于请一位医生将「反共」字样改为「反美」。可是这个烙印刻骨铭心，战俘营的悲惨经历耿耿于怀，他非得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不可。退休后，七十三岁的老人来美探望儿子一家人，随身带来有关当年战俘生活的资料，用英文写下血泪斑斑的回忆录，终于完成了多年来的夙愿。他希望有朝一日他的美国孙男孙女和他们的父母会读到这个回忆录，「这样他们才会感受到我腹部刺青的全部重负。」我们仿佛听到千百年前惨遭宫刑的司马迁的悲鸣。

圣经给主人公心灵的慰藉

哈金意味深长地给俞元在地狱般的战俘营的受难注入一线光明。他初到战俘营时，常去天主堂望主日弥撒，为美国神父翻译过赞美诗，并从他那里接受了一本英文《圣经》，而且时常独自阅读。他为此受过亲共份子的严厉批评，《圣经》被没收。但是他认识到他和神父的接触肯定唤醒了他心中的宗教情怀。后来，在冒名顶替去办理「重新登记」时，他又向美军索取了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带回反共营地。这里大多数战俘整天下棋，赌博。俞元天天独自读《圣经》，特别是《旧约》中的《训道篇》，更加深了他对人生虚幻的感受，不再患得患失，而以自由的心灵面对未来。

《战争垃圾》首先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怵目惊心的历史。作者在书后的「作者题记」中写道：「这是一部虚构的作品，其中主要的人物都是虚构的。然而，许多事件和细节却是真实的。」为了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哈金参阅了二十三部有关韩战的中，英文著作。成千上万「最可爱的人」蜕变成「战争垃圾」，这是中国现代史一个不能被遗忘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家卫国」不过是一场为时三年的局部战争，但是「一沙一世界」，哈金为沦落异邦的万千中国战俘谱写的悲歌它何尝不是神州大地上亿万中华儿女「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家国之痛。

蒋彦永，你真傻!--纪念 “六四” 十五周年

蒋彦永，你真傻!
在谎言王国里
你偏爱讲真话!
去年你捅了 “非典” 的大蜂窝，
就算你拯救了无数的生灵，
秋后也要算你的帐，
你五十年党龄也白搭.
怎料到你放言无忌，
又来揭 “六四” 的大伤疤!
难不成你是吃了豹子胆，
天不怕，地不怕?

蒋彦永，你真傻!
难不成你忘了你们的的党史，
犯天条的不都是为了讲真话?
彭大将军为哀鸿请命，
落得个什么下场?
两位堂堂的总书记
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又是个什么下场?
还有那些党内外知识精英，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哪个有过好下场?

蒋彦永，你真傻!
一辈子治病救人，功成名就，
何不安享正军级退休待遇，
游山玩水休长假?
何苦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你真傻! 你真傻!

唉! 也难怪，也难怪啊!
蒋彦永，你满腔爱国爱民，
救死扶伤的傻热血，

怎能忘却那个血腥的黑夜，
一批接一批血淋淋的伤员
被送进你参与创建的
人民解放军 301 医院？

“在堂堂的首都北京，
在我面前躺着的，
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
用人民给予的武器
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蒋彦永，你真傻！
十五个年头都过去了，
天安门广场花团锦簇，
血迹早已给喷泉洗净，
健忘的北京歌舞昇平，
纸醉金迷迎奥运.
你为何还不能识时务，
向那么多聪明人学习，
忘却这场千古浩劫，
还念念不忘要讲真话？
让你傻子的灵魂泣血？
让所有傻子的灵魂泣血？
唉！蒋彦永，你真傻！

2004.3.16 凌晨